

087C97



延安日記

周新譯

007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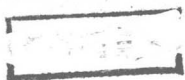
90105163



THE VLADIMIROV DIARIES

Peter Vladimirov's secret journals of
Mao Tse-tung's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089
794



097237

聯合書室

聯合叢書

彼得·佛拉第米洛夫原著 周新譯

延安日記

一個俄共代表的秘密日記
揭開了毛匪陰險的嘴臉和
偽裝抗日的真相



90105163

五季四日
劉澤濤帶函計

9808
498

785700

延安日記

印翻禁 • 權版有

延安日記

Peter

Vladimirov

著者 譯者 周揚
發行人 王 合 報 社 吾 新
出版者 聯 合 報 社

總經理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

印刷者 中興印刷廠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 伍拾元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第二次印行

目錄

有關本書及作者背景說明	一
英文本出版者對本書介紹	一
原書出版者言	一三
作者介紹	一五
一九四二年 五月至十二月	一七
一九四三年 一月至十二月	一〇五
一九四四年 一月至十二月	一九五
一九四五年 一月至九月	三三五
譯後語	五〇三

有關本書及作者背景說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氣焰高張，希特勒藉德義日軸心作爲其謀取獨霸世界的工具。蘇俄共黨很清楚，法西斯獨霸世界的野心意圖，與共產主義征服世界的最終目標是互不相容的。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由於利害的衝突，最後不可避免的必有一戰之日。鑒於納粹德軍之在歐洲，日本軍閥之在中國，從事積極擴張的活動，這個一戰之日必然不遠。到那時，納粹德軍從歐洲東線攻入，日本軍閥在西伯利亞夾擊，蘇俄紅軍勢必獨力難撐。因此，在我故總統 蔣公宣布決定對日長期抗戰之日起，蘇俄共黨便極力鼓勵中共與國內各黨各派團結一致，締結抗日聯合陣線，其用意雖在希望我國能够長期牽制日軍，削弱日軍軍力，使之無法在西伯利亞另闢戰場，與希特勒在歐洲部分遙相呼應。但此一決定，對於當初我國抗戰，確可大有裨益，使我可以全國一心，槍口一致對外，不致再有內顧之憂。

然而共黨狡詐陰險，變幻無定，總統 蔣公以其多年的親歷經驗，對於俄共此一決策，

不能不加謹防。在政府部門，雖然容許了中共黨人擔任若干工作，但於中共軍力所在之處，仍不得不安排部分兵力，實行警戒。此固 蔣公之深謀遠慮，有以及之。然而當時由於共黨的惡意宣傳，誣陷政府為破壞抗日聯合陣線，無意誠心合作，部署重兵監視共軍，並不對抗日軍，反而槍口對內，攻擊友軍之八路軍與新四軍。甚之自稱在中國唯有共軍從事於對日作戰。許多親共外國記者，乃至若干美國官員，以耳代目，聽信共黨譏言，肆意誣毀我政府領導之神聖抗戰，破壞我政府在國際間之聲譽，從而抬高共黨的地位。然而共黨在對日抗戰之中，究竟擔任了一種如何的角色？究竟是誰，中央政府抑或共黨，破壞了抗日聯合陣線？究竟是誰，並不對抗日軍？究竟是誰，擔負了對日抗戰的全部責任？政府的官方紀錄，在一般深中共黨宣傳之毒者，固可能把它視為宣傳資料，但一個在抗戰期間曾在延安駐留了三年有半的俄國共產黨人，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親身經歷的見證。

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共一直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希特勒撕毀了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簽訂了還不到兩年的德蘇十年互不侵犯條約，大舉攻入俄境。俄軍節節敗退，德軍進展神速，不到三個月，便已迫近了莫斯科。在遠東方面，日本軍閥在納粹德國壓力之下，也已調動部隊，源源開向西伯利亞邊界。

在如此情況之下，中國加強對日作戰，牽制日軍的兵力，便屬急如星火之事。而中共之

與國軍合作殲敵，乃成爲對俄的最大利益。此時莫斯科方面也早已獲有情報，中共始終並未尊重抗日聯合陣線，不與國軍合作。爲了加強聯合陣線的力量，「共產國際」於一九四二年五月，派遣了一位代表——彼得·佛拉第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前往延安，長駐該處，一方面擔任與中共之聯絡，同時也在蒐集有關延安方面的情報。

佛拉第米洛夫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中期，原任蘇俄塔斯社駐華特派員。後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再度奉派來華，至八月返國。他在延安期間，仍兼塔斯社採訪軍事新聞的特派員之職。我國抗戰勝利後，佛拉第米洛夫於一九四六年進入蘇俄外交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任駐上海總領事。一九五二年奉派出任蘇俄駐緬甸大使。一九五三年八月在莫斯科病逝。他在中國的經歷，足可稱得是一個蘇俄的中國通。

佛拉第米洛夫於一九四二年五月到達延安，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離去。

他到延安時，莫斯科之圍雖然已解，但在蘇俄南部，德軍仍繼續緊緊壓迫，俄軍始終居於劣勢。在從莫斯科搭乘飛機，啓程前往延安的前夕，他所得到的指示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已決定建立一個抗日聯合陣線。「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結束內戰，與國民黨採取聯合行動，團結中國人民一切勢力，保衛中國的完整與獨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必須遵從此一任務。」

佛拉第米洛夫在延安，雖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兼任塔斯社記者，但他的行動也像其他一些駐在延安的俄國人一樣，始終受到當時中共「情報局局長」康生屬下工作人員的監視，不能隨意行動。但三年六個月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在此期間，他還是親眼見到了很多，親耳聽到了很多。他從到達延安的一天起，便一直保持一本日記，將所見所聞，以及他所取得的文件，記錄下來。這部秘密日記，後來由莫斯科文學通訊社出版部譯成英文發表。美國雙日公司最近根據該社的英文譯本加以整理，節要輯錄，在美出版，題名「佛拉第米洛夫日記」(The Vladimirov Diaries)。

由於在這一期間，蘇俄在中國所主要關切的是在中共結束內戰，與中央政府合作抗日，以便牽制日本兵力，不致對俄發動戰爭。因此，在中共方面凡有違反此一目標之事，對於佛拉第米洛夫，便都特別敏感。他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的日記中說：據早在延安蘇俄所設電台服務的電務員尤辛告訴他說，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蘇俄司令部通知中國共產黨，日本正從本土把一批批完整的陸軍部隊單位運到中國大陸，集中在蘇俄邊界一帶。蘇俄司令部要求中共八路軍給以幫忙，設法切斷通往北平、張家口、包頭的鐵路交通，突破日本部隊向此諸地點的集結。但中共未予同意。

隨着在德蘇前線軍事情勢的轉惡，中共頭目們對這批俄國人的態度，也跟着愈來愈形敵

意。俄國人希望看到中共的軍隊能對日軍採取積極行動，但佛拉第米洛夫所看到的是：

「八路軍（當然還有新四軍）的部隊，早已放棄了對侵略者採取積極的和消極的行動，儘管現在日軍正在中國南部進行瘋狂的殺戮，日本正對蘇俄作着侵略的威脅，這種情形也並無改變。」

「中共部隊對日本目前正在一些地區，從事肅清共軍的行動，並不實施抵抗，他們逃入山區，或是渡過黃河。」

「中共領導階層把國民黨視爲主要敵人，不遺餘力的來佔奪中央軍控制下的土地。他們用『釣鉤和欺詐』（英文成語，意謂不擇手段）來達到此一目的。」

「中共這種黨派活動，顯然的損害到中國對抗侵略者的力量，平空增添中國人民的許多犧牲。」

關於封鎖問題，佛拉第米洛夫在一九四二年九月的一段日記中，也曾寫到：「那種涕泗交流，談到對特區施行最嚴密的封鎖的說詞，都是康生所發動的宣傳謊話。要通過特區的前線是很容易的。我們曾親眼看到了這個情形。」

「到前線去了一次，使我堅決的深信，中共領導階層並無意於與日軍作戰。他們把戰爭看做是一個建立自己基地的絕好良機，不是由他們自己的部隊進行戰爭，而是由互相對抗的

另外兩造來進行：日本人和國民黨。

「如果日本擊敗國軍，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破壞，八路軍的部隊，便立即滲入到那個地區去。如果必要，他們便幹掉他們在單一抗日陣線中的袍澤戰友，來攫奪政權。」

「毛澤東在來犯的敵軍之前，退却後撤，尋找一個機會，使中央軍與日軍的衝突，成爲對他有利之事。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候，在全國人民含辛茹苦，作着重大犧牲的時候，在國家受到法西斯主義者的征服的時候，這樣一種手段，可說是不忠不義而有過之。」

「甚至他把自己的人民，都當作是一種奪取政權的工具；我們如何還能對毛澤東來談國際主義的政策！成百萬人的流血和苦難、不幸與憂患，對他完全是種抽象的概念。」

佛拉第米洛夫來到延安的時候，剛好正碰上毛澤東發動的「整風」運動，共黨上下，反覆舉行集會，指控這個，批判那個，有的遭到逮捕，有的遭到殺害，鬧得烏煙瘴氣。佛拉第米洛夫漸漸明瞭，原來在中共黨內，內部分裂數派，毛澤東發動這一運動，正是爲了要消滅反對他的敵人。而其中主要目標，便是莫斯科派的王明（陳紹禹）。

王明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由「共產國際」派往延安，奉「共產國際」的命令，要與中央合作，建立抗日聯合陣線；這正是毛澤東所全力反對的。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不僅迫得王明派的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楊尚昆等，一個個的自認錯誤，

向毛認罪。而且，毛澤東還趁王明病中，暗中囑咐醫生用汞處方，打算加以毒害，幸虧爲延安的俄籍醫生發現，由佛拉第米洛夫出面干涉，纔算救下王明的一條性命。

從整風運動的發展，佛拉第米洛夫對毛澤東得到一個印象：

「毛澤東的哲學和理論水準，乃是原始的物質主義。他一直害怕民衆的民主本能。對毛來說，黨與民衆的爭論和接觸，主要是一個威望的問題。因此，他用整風的方法，來教育黨內大小人員，使他講出的每一句話，都成爲無可爭議的眞理。」

「在毛澤東認爲，盲目的服從，才是黨員和黨的理想關係。」

「毛澤東的民主政治，祇是限於他所穿着的那套樸質的唐裝，在一些特殊的時機，上面還縫上了許多補綻。」

「毛澤東爲了熱衷於爭取權力，壓迫每一個人。」

「毛澤東是沒有、也不會有任何情感的。他專心致意的熱情，祇是爲了爭取權力！這種熱情使他的心中再沒有可以容納感情的餘地。這就使毛澤東成了一個危險的巧取豪奪的人，沒有一點人性。凡是不符他的計劃的事，在他看來，便都是毫無意義的。凡是與鞏固個人權力相悖的事，便都是背離中國共產黨的事——這便是毛澤東在政治方面的最後信條。」

佛拉第米洛夫因爲所處地位不同，有其可以利用之處，因此毛澤東也常儘量和他接近，

盡力拉攏。他與毛便常有晤面的機會，使他隨時都能看清毛的爲人。在他的日記中，便有多次對毛提出了類此的觀察。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佛拉第米洛夫留在延安期間，剛好適逢其會的目擊了兩件大事。

他是出席從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三日到五月卅一日，中共在延安舉行的「七全大會」的唯一蘇俄代表。他對中共舉行此次大會，在事前進行的安排，會中發揮整風作用的表演，以及中共各主要頭目的報告與演說，和大會對外發表的文件與實際內容的不同之處，都有極詳細的記載。

在此時期，也正是美國出面，進行調解中共與中央對立的關係，從而產生政治協商會談的時候。佛拉第米洛夫雖然並未參與其事，但他從旁觀察，得到了很多在外界所無法獲知的內幕。

他以新聞記者的嗅覺，同時也蒐集到許多有關毛澤東和他的共黨頭目，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黨內相互殘殺鬭爭的故事。這些種種，使他對後來在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共，產生了極爲不良的印象。據本書出版者稱，「這部日記對近年來中共與蘇俄衝突的根源，提供了難得罕有的精湛資料。」當然，中共與蘇俄的衝突，並不能說是在那一時期種下了因，但

佛拉第米洛夫對當時延安的活動，向莫斯科所提出的報告，對毛俄的關係，無疑是有深遠影響的。

我們當然也不能忽略，俄共在我抗日戰爭期中，力主我國所有一切勢力，應建立抗日聯合陣線，其用意只在藉以適應當時的國際情勢，湊巧顯得與我們政府站立了在一條戰線上。不過從蘇俄爲其本身利害關係的立場，却使他們駐在延安的代表，揭開了當時毛澤東與中共在延安的內幕真相。

誠如本書出版者所稱，「這部日記，不論是以歷史文件來讀，或是以現代文件來讀，都提供了一個從俄國人的立場，對中共所作的驚人的新分析。它使美國對華政策——過去的與現在的——的含意，無疑證明了是高度值得爭議的，它的精細的觀察——對個人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對於中共「革命」的歷史，及其最持久的謎樣人物毛澤東，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看法。」

本書全文如譯成中文，至少有四十餘萬字。譯者爲便讀者先睹爲快，特爲擇要節譯。同時，在把英文譯成中文的過程中，許多人名、地名等雖經查對，恐仍有舛誤之處，還請讀者指正。

（The following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It appears to be a diary entry with several paragraphs of text, possibly including dates and descriptions of events or thoughts in Yan'an.)

英文本出版者對本書介紹

這是一本有關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最後奪取權力的內幕記載。本日記是由一位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對與 蔣委員長（後任國民政府主席）合作，對抗日本侵略者的問題，發生激烈分裂之時，一個派駐在毛共據點延安的俄國觀察者所記。

這本日記雖有作者政治偏見（也許還有蘇俄方面的修改）的色彩，但對近年來中共與蘇俄衝突的根源，提供了難得罕有的精湛資料。它的大批豐富的詳盡記述，它的第一手的觀察，為西方讀者對蘇俄與毛在那些嚴重危急戰爭歲月中的逐日政策關係，提供了在他們也許從所未見的最生動的一瞥。

從本書中所呈現的毛的畫像，是特別不表恭維的，然而却是那麼精緻細膩，那麼刻劃傳神，顯得決不能斥之僅為宣傳之作。佛拉第米洛夫曾與毛作過多少長時間的私人談話，對於他的傳奇性的「神威」或「天才」，並無絲毫印象——而他所留下的印象却是他的最可怖

的殘酷無情和斷然的決心。他對毛的文化意識，作爲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的品格，以及他的私人道德，表示了最強烈的懷疑，同時強調他在中國共產黨內是專心一意的追求權力，他最後終於控制了該黨。

這部日記，不論是以歷史文件來讀，或是以現代文件來讀，都提供了一個從俄國人的立場，對中共所作的驚人分析。它使美國對華政策——過去的與現在的——的含意，無疑證明了是高度值得爭議的，它的精細的觀察——對個人方面的與政治方面的——對於中共「革命」的歷史，及其最持久的謎樣人物毛澤東，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看法。

原書出版者言

本出版者並未讀過「佛拉第米洛夫日記」的俄文原文。本書係採自莫斯科文學通訊社出版部所供應的英文譯文編纂而成。據一般讀過原稿的專家認為，照塔斯社特派員兼「共產國際」派駐延安中國共產黨地區的代表佛拉第米洛夫所敘述的，這也許是對一九四二—四五年期間中共與俄國關係，最可珍貴的深入觀察。本出版者希望指出，本書含有某些並不一致之處，可能需要補充一些新的「解釋性」的資料。因此，本書應同時作為一種歷史性的文件和一種當代的文件來讀。



097239

作者介紹

彼得·佛拉第米洛夫 (Peter [Pyotr Parfenovich] Vladimirov)，一九〇五年出生。他的第一個工作，是在伏羅奈茲一家農業器具廠當裝配工學徒。旋在鐵科里茲克火車機車頭修理廠當裝配工人。一九二七年被徵服兵役。在紅軍中服役期滿出來，繼續畢業。

自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中，任塔斯社駐華特派員。自一九四一年四月至八月，他再奉塔斯社之命駐在中國。

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被派往延安，擔任「共產國際」的聯絡官，駐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部，並兼任塔斯社軍事特派員。他留在那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一九四六年，他任職蘇俄外交部。

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他任蘇俄駐上海總領事，一九五二年，奉派出任蘇俄駐緬甸大使。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因重病逝世莫斯科。

佛拉第米洛夫在他的日記中，同時記錄了他的個人印象和正式通信的摘錄。他這樣做，因為他不斷受到「特區」特務組織頭目康生的暗中偵伺。因此，雜記本和日記便成爲保存譯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文件、各種文章、報導、業務電報等等唯一方便而安全的方式。

佛拉第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係由佛拉索夫（Y. P. Vlasov）所編纂，即將付梓出版。這是一本縮本的形式。

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五月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

我們現在是在蘭州，我們搭乘T-28飛機，從阿拉木圖起飛後，這是在中國飛機場上過的第四個夜晚。我們在伊寧過了一晚，接着是在烏魯木齊（迪化），再接着是在哈密。我們的地是延安。我將代表共產國際駐在那邊，同時兼任塔斯社軍事特派員的工作。我從一九四一年七月起，便當了軍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

我們的飛機超載過重，在哈密時，好不容易的纔起飛升空。

最初，在我們的周遭是一片蔚藍的青天，後來却飛進了一片濃重的厚霧中。但過後飛機

衝出濃霧，又遇到一片寧靜的穹蒼。可是，半小時後，我們却飛進了一大片雲海。我們儘量爬高，但還是沒法擺脫雲層。我們試着低飛，但也還是沒用。

飛行指揮官嘀咕着：「在一年中這個時候，這兒還有這麼大的霧，簡直莫名其妙。天氣該是發瘋了！」一刻鐘後，他把飛機打了個一百八十度轉向，但我們還是在作着盲目飛行。每隔兩三分鐘飛行指揮官就叫出說，「駕駛員，注意方位！」

最後我們終於飛出了那個「漿湯」。

要是指揮官和駕駛員經驗差些，我現在便不會再寫下這些字句了……

我曾設法安排讓瑪麗亞（彼得·佛拉第米洛夫之妻）到了阿拉木圖。我從一九四一年七月以後，就一直沒有見到過她。我們在阿拉木圖的機場上見了面，我們就在那邊分了手。這個時候，她該已回到列寧斯克一庫茲尼茨基，跟我們的兩個兒子在一起了。

第二小時的飛行。……我們以儘可能最慢的速度向前飛，因為能見度很差。炸彈架上堆滿了貨。客艙內也擠滿了一些箱籠，還有一桶桶的汽油。箱籠裡都裝滿了給延安那座中國醫院的醫藥供應品、供應那座無線電臺的零件、還有一座新的發電機。延安的那座電臺已經老得隨時都會停擺了的。汽油是供電臺引擎用的。這座引擎一年消耗兩桶汽油。照這個消耗

量，這批供應足足可以維持幾年了。現在並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有一架飛機飛來。如果日本進攻蘇俄，我們就會給阻隔在陝西的千山萬壑中了。

這兒說「我們」，我的意思是指奧洛夫、黎瑪爾、以及我們在延安的一些朋友。

安特烈·耶科夫里維契·奧洛夫是一個矮矮瘦瘦的人兒。他是派在延安那座醫院當外科醫生的。奧洛夫在來到延安之前，原是在以季洛夫命名的那所軍醫學院教書的。

尼古萊·尼古萊維契·黎瑪爾是無線電電務員，我們都把他叫做古萊耶，他將協助我們在延安的無線電電務員杜瑪托夫。

我們身上都穿着皮裡的外套，我們的牙齒都還在格格格的戰抖。我們從窗口望出去，想到我們仍然可能會遇到日本人的飛機，心裡就覺得有點不安。總之，我們正在它們的軍事行動距程範圍之內。我們這架打了補綻，補了又補的I-16機，決不是日本強有力的新型戰鬥機的對手。那個砲手隨時嚴重的望一眼他的SHKAS（一種1·一二耗口徑的飛機用砲），但如果遇到日機攻擊，實際上我們是一點沒有防衛能力，可以很輕易的就給擊落了的。我們並不是飛行到延安去，實在的是貼着地面偷偷溜去的。

下面是山、山，到處是山。

我是在到達延安的晚上，寫下這些雜記。

TB-3 降落在一處兩邊都是山坡的河流地區。我們在那邊會見了杜瑪托夫、亞里也夫，還有一些中國同志。

「我很高興向我們親愛的蘇俄朋友致敬，」毛澤東握住我的手說。他向我問好，跟那些同事和機上人員打着招呼。接着他說：「我會很快約見你的。也許就在明天。」

他的態度很樸實。他的服裝，就像所有其他中國同志一樣，包括同樣質料的一件棉大褂子和一條棉褲。他穿一雙用編好的線結成的便鞋。這樣一種服裝叫唐裝。

我在過去一次來到中國，在蘭州和西安，已經認識了一些中國同志。他們大半都是經歷過內戰（剿匪之戰）的老黨員。

康生抱住了我，擁吻我。我沒法說我覺得很高興。前次我在蘭州的時候，他對俄國人很不客氣。我們的子弟在中國天空作戰，遭受了很大死傷，在日軍方面也損失了兩倍，甚至三倍的人員和飛機。祇要有蘇俄的飛機一出現，日本的轟炸機就再也沒法到達他們的目標。可是在地面上，康生的特務人員却在暗中監視着每一個蘇俄公民。我絕對沒法抹掉我對這個人的印象，他偽裝着作爲一個重要的「官員」，實際却是一個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康生做人很謹慎，但他所做的事蹟，比他所說的話，更加明白的表明了他的爲人。

康生的吻是猶大（聖經中出賣耶穌之人）之吻。但我是作客，我不能流露出我的情緒。毛澤東點燃了一支香煙，沒有和機上人員交談。康生皮笑肉不笑的又在耍嘴了，他湊着我的耳朵小聲說：「我們是偉大的兄弟……」

毛澤東說過再見，便朝向他的汽車走去，後面跟着幾個手裡拿着毛瑟槍的年輕侍衛。司機發動引擎，車便輾動開走。那是一輛英國或美國造的舊救護車。

他們給我介紹了塔斯社的一批人。官方翻譯員鮑里斯·伐錫耶維契·亞里也夫、無線電電務員李奧尼特·伐錫耶維契·杜瑪托夫（李文）。伊戈爾·伐錫耶維契·尤辛不在歡迎行列之中，他正在電臺值班。

今天天氣晴朗，陽光和煦。我們的H-B-3機卸下貨物之後，便離開了延安。

我是在一間現在作為無線電電臺的房間裡，和杜瑪托夫坐在一起，寫下這些東西。杜瑪托夫正給莫斯科發出一個電報，報告我們順利到達。汽油引擎正在外面軋軋作響。黎瑪爾在研究那些無線電設備。在隔壁房間裡，尤辛和奧洛夫正在佈置假日的餐桌。在那間房裡，幾支點燃的蠟燭，使氣氛顯得很溫暖。

我們也將住在這棟小屋裡。我們所有的人，除了奧洛夫，他將搬到那座醫院附近的一處地方。杜瑪托夫告訴我說，那座醫院是設在一座山邊鑿出的一些密洞裡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率領一股武裝部隊，後來盤據在井崗山上。不久朱德和他會合。兩股聯合的部隊，稱爲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一九二九年，第四軍團突破包圍，到了瑞金。「中央革命委員會」便開始以江西爲基地。

在「內戰」（剿匪）期間，紅軍蒙受了重大損失，實力從三十萬人減到二萬五千人。

「長征」（西竄）結果，紅軍分散的部隊，於一九三五年底在中國西北部集合一起。那個地方原先是由張學良和當地軍人佔據的，這時便成爲「解放區」，而以延安爲行政中心。康生和他的秘書蕭立（譯音）來訪，打斷了我的日記。

我急忙安排着在那間吃飯間裡接待我的客人。

我們通訊社所有一切的新聞消息——在中國發生的事，各戰線前線的情況，與國民黨的關係，在「特區」發生的事，東三省的情況——自今以後，都必須由康生或他的助理正式提供，實際上在過去就一直如此的。

其次，我勢必要將這邊的情形，向「共產國際」提出報告——我在這方面的活動，需要與「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和黨方其他高級人員取得聯絡。我是經由中共黨的協調到延安來

的。

康生詳細的問到一些關於德蘇前線情勢的問題，隨時的強調希望我們早日戰勝納粹德軍。

康生嗓音很尖，說話時有種嘶嘶的聲音。他講的俄國話帶有一種土音，不加動詞。他的字彙很少，不過他能很清楚的聽懂俄國話。

康生永遠面帶笑容。他的笑容彷彿像是黏在他的瘦削的愁眉苦臉上的。我已幾年沒有見到過他，他的樣子一點沒有改變——一付猥瑣的容貌，顯得一種緊張巴結的神氣。他給人的印象，就像是一個吊在線上的木偶。

康生講到「特區」的情形。這個地區包括陝西、甘肅、寧夏幾省。在這個地區，西北面受到地方軍人馬氏兄弟的堵塞。馬氏兄弟有大批武裝精良的部隊。

在山西省這邊，駐有閻錫山將軍的部隊。閻氏是服從重慶中央政府的。那些並未爲日軍佔領，通到「特區」的路線，都已給國軍的部隊所截斷。康生說，「蔣委員長絕不顧到聯合戰線，一直都在找着藉口，要對這個戰線發動軍事作戰。」

因此，在「特區」，內外的情形，極爲複雜。

我給釘住了在家裡，因為我正等待毛澤東隨時會要約見。

晚飯後，我又記下了一段日記，然後走到屋外看看周遭的景色。我們的屋子蹲在一座小山邊上。小山旁邊有一座有一個高原平頂的大山。下面是秀水和延水流域。流域兩邊是一些聳起的高原，長滿了灌木和矮小的樹木。流域地帶和山腳邊佈滿了一方方綠油油的農田。在我們下面是當地地主的一座大別墅，蓋有幾棟房屋，還有一片茂盛的桃園。這座大房子原名棗園，現在便做了康生的情報局辦公處。

我們的屋子是用淺灰色的磚塊造成的，有幾扇紙糊的窗子。祇有電臺那個房間的窗子，有四分之一部分鑲着玻璃，可以看到院子。

我們的屋子由一個曾在蘇俄遠東部分住過的中國老頭兒當管家。他姓鄭，能講一點勉強可通的俄國話。他有兩個孩子和一個中國廚子做幫手。……這個廚子又腌臢、又邇邇，是康生指派給我們的。

我寫這段日記，早已是午夜過後很久。

黃昏時分，我和奧洛夫、黎瑪爾、亞里也夫，一同邀去見了毛澤東。他在他的窑洞裡接見我們。這個窑洞前面是在一條小河上的狹隘的巖崖。在毛澤東窑洞附近的一個村子叫楊家

嶺。這個密洞和通到這個密洞的路上，一路都有掛着毛瑟槍的人嚴密警衛。

跟毛澤東在一起的有康生，還有另外幾個「政治局」委員。經過一番寒暄客套之後，毛澤東便向我們問到關於德蘇前線的情況。他特別關切的希望知道我們前線的穩定情形。隨後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效忠於國際主義的原則，效忠於抗日聯合陣線的政策，效忠於與國民黨的合作。

「孫中山的遺教歸納爲三個原則：民族獨立，民主自由，人民福利，」毛澤東說。「這位中國革命之父所有這三個原則，便是我們黨綱的神聖基礎。」

他心不在焉的在幾個口袋子裡摸索了一陣子，掏出一包壓得皺皺的香煙。他緩緩的點上一支煙。「主要的是人民的支持，」毛澤東說，「如果你贏得民衆的支持，即使沒有技術，光靠石塊和棍子，也能對敵人作戰的。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改善民衆經濟地位的道理。否則人民是不會支持我們的。……」

毛澤東的寓所包括兩個鄰接的密洞，上面嵌着屋頂板。洞內深處一片磚塊舖的地上，放着他的一張書桌，堆滿了書、紙張和燭臺。他講着一口湖南土話。

在這次正式接見結束時，毛澤東答允給我一切幫助，還讚揚史達林同志和「共產國際」領導的睿智。

「政治局」委員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任弼時，矮矮個子，鬚鬚鬚子，語音乏力，年約四十。

「政治局」委員王稼祥，瘦長條子，長得比一般人都要高些。

毛澤東喝的是荷蘭杜松子酒，招待我們喝的則是鳳翔酒（當地釀製的土酒）。他走到我們每一個人身邊，很客氣的問好。他仔細的問到一些關於史達林和迪米特洛夫的問題。

毛澤東給我介紹了他的太太江青，一個瘦削的女人，站在她丈夫矮胖個子旁邊，看去顯得格外脆弱。

她對他非常溫柔，儘量的討他歡心。

同時，康生跟我們講到有人謀刺毛澤東的事，所有幾次都失敗了。原來毛澤東祇要對那陰謀的人看上一眼，那人就會把他的意圖自己招認出來。過去曾有過三次這種事件。

毛澤東停止了談話，坐在矮榻上，抽着菸捲，把煙燼擲在地上。我們認爲這就是表示這次接見已經結束了的意思。我們站起身來，向主人告別。毛澤東陪我們一直送到門口。他緊緊握着我的手，再度表示他很高興我來到中國，他說他很感激「共產國際」和史達林同志所做的工作和所表的關切，並再一次的答應對我們的工作，給以幫助。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我們除了從康生的情報局、從我們到前線去的旅行、從我們與中共黨的領袖們和中國一般普通老百姓所作的會談中，取得我們的情報外，我們也從無線電中收聽重慶方面的廣播，取得新的新聞消息。

此外，我們和莫斯科方面維持着雙向的連絡。在夜深人靜，或者是在一個陽光普照的白天，這個連絡是最可靠的。

我們還有一批貯備的電池，以備不時之需。我們貯備這批電池，主要是在防備日軍可能的突破。

在我們西面大約十公里地方，有一座由博古控制的中共電臺。他負責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社」，還有其他一切印刷的新聞媒體。

博古（秦邦憲）是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政政局委員」。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博古一直是中共黨「臨時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舉行的遵義會議後，就由毛澤東當了黨「中央委員會」的頭兒。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

延安是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城市。曲曲彎彎留在一片廢墟堆中的，有幾條掃除了碎磚

破瓦的街道。日本人在一九四〇年時炸毀了延安。現在僅有的一些建築，便是城牆和幾棟房屋。在這幾棟未遭炸毀的房屋中，有一棟很堅固的石造房子，這便是「特區」的銀行。這座銀行的董事長是李富春。

李富春是中共黨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他負責邊區的經濟和財政事務。

「特區」包括陝西、甘肅、寧夏三省的地方，這時「特區政府」的主席是林伯渠。紅軍是在一九三五年來到陝西的。

中共黨的一些主要軍力，在一九三五年集中到了陝西，在那時候，共產黨的劉子丹和高崗，原已在這裡成立了一個蘇維埃區。

劉子丹於一九三六年在一次與國軍作戰中戰死。

現在高崗是中共黨「中央委員會西北局」的書記長。

在三月間，中央政府 蔣委員長曾訪問了印度。這是中央政府所作的最重要的外交行動之一。

這次訪問無疑是爲了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具有極端重要地位的緣故，因爲這是軍品

貨運運交中國部隊的最重要的路線。日本軍隊正在猛烈作戰，希望奪取這些路線。這時在緬甸和雲南境內，正在進行激烈戰鬥。

這次訪問於三月二十一日結束。

蔣委員長和尼赫魯發表了一篇共同聲明：

——中國與印度人民將爲自由與人道，盡其一切努力。

——中國與印度人民，構成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兩國之間在文化與經濟方面的關係，已有二千年的歷史；中國與印度從未有過軍事上的衝突；此外再無一個國家懂得如此一種國與國間的和平關係。

——這個世界現正受到殘酷的法西斯主義者暴力的威脅，使我們必須更爲密切地集合兩國的力量，共同奮鬥，加以對抗；我們必須站在單獨一條反帝國主義的陣線上，併肩作戰。世界和平的主要條件，即在於此，爲了這一崇高目標，我們的人民，準備接受任何的犧牲。

蔣委員長在一次記者會中，表示希望，英國最後將會給予印度真正的，而非虛假的，政治權利。

蔣委員長的訪問，主要目的是在中印間交通的安全。

主要的是，中國的沿海幾省，已爲來自海上的日軍所佔領，而沿海水域，則已爲日本海

空軍所控制。在北方，幾已全為佔領軍所切斷。唯一的交通線便祇有通過緬甸的路線了。

中國的工業區，或則已為日軍佔領，或則已為日軍破壞。現在要得到武器，唯一的希望就靠這條路線了。

在如此情況之下，依照一九三七年的協定，蘇俄和中國之間（越過新疆）的空中橋樑，運送作戰物資，便是斷然重要的事了。

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中國人民的反抗力量！抗日陣線的團結是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

延安爲了「整肅三種作風」，在冬天發動了一個廣泛的運動，這三種作風是黨的工作作風、民衆教育作風、和寫作作風。這個月裡，毛澤東也曾在幾次不同的會議中，發表演說，講到文學與藝術的問題。這個運動是他在二月間發表的一篇演說開始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

謠傳國軍即將對「特區」發動攻擊，在延安引起了一陣驚慌。老百姓亂喊亂叫，緊張地到處亂奔，趕着準備逃離。這種情形，顯得對人民的教育做得太糟，更重要的是，顯露

了共黨領導地位的薄弱。

今天我在康生的辦公處，遇到一個叫馬海德的人。這個形狀古怪的人，是一個歸化的猶太人。他的職業是醫生，就在奧洛夫派去工作的那家中國醫院裡工作。他中等身材，黑黝黝的皮膚，長得很結實。他的漆黑的頭髮，夾着絲絲灰白。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

到處都在舉行集會，歌頌毛澤東最近發表的幾篇演講。我曾參加了幾次這樣的集會。我還沒有拿到他們的印刷文件，不過，我會向中共同志們索取的。

晚上，我和尤辛討論這些演講的內容。我很奇怪，在對日長期抗戰的情況中，中國的存亡絕續，正有着重大的利害關係，在這樣的時候，毛澤東居然會專心致意的把整個心力放在像「整肅黨的作風」這樣一種問題上。這個措施固然可能必要，但無疑是一個次要的問題。

我從尤辛那裡知道，蘇俄的公民照例是並不邀請去聽中共黨的領袖們發表演說的。這一點也使我不能感到不滿。事實上受到邀請便是例外。尤辛和亞里也夫祇有受到過一次邀請，去聽毛澤東在二月發表的那篇演講。尤辛對這篇演講的內容，至今還覺得非常意外。毛澤東

突然轉而攻擊着宗派主義者、教條主義者、經驗主義者和主觀主義者，稱他們是共產黨的最大敵人。他並沒提出一個他所猛烈攻擊的那些人的名字。在演講接近結束時，毛澤東講的說話變得非常含糊不明，前後矛盾。他對一個人提警告，接着又對一個人提出攻擊，但却並沒有能把他自己的意思表白清楚，雖然他的整個語氣，都含有一種恐嚇威脅的氣息。

這一整個情形，非常離奇古怪，值得作一最仔細的研究。

「共產國際」對於現在中共黨領導階層中所發生的事，很感耽憂。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

這個「整肅三種作風」和反對「黨的保守工作型態」的運動，稱爲「整風運動」。中共黨的領導階層對於這些運動，似乎寄以最大重視。這就是在延安召開了那麼許多集會的唯一原因。整風無疑是一個政治運動，但它的意思仍很曖昧。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尤辛帶點嘲弄意味的講到他到延安時的情形。他、杜瑪托夫和亞里也夫一下飛機，便給帶到了楊家嶺。在那巉崖口上，守着兩個手持大刀，隨時準備揮動的武裝人員。來客給引到

了任弼時的審洞裡。一個接着一個的走進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鄧發，還有另外的一些人。經過一番寒暄客套之後，任弼時率直的說，「告訴史達林：我們需要武器！我們要用來打日本人！」

「你很快就會親自看到他們是怎樣打仗的，」尤辛接着說。

尤辛在中共同志中把他叫做尤仁。他們給了我一個名字叫宋賓。

鄧發是延安高級黨工學校的校長。

王明（陳紹禹）是「政治局委員」兼女子大學校長，那邊有一千五百個學生，王明現在三十八歲。

任弼時是毛澤東主管民政的助手。

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三日

康生跟我們講到在「特區」周圍前線的軍事情況：

一、北部前線：步兵一百十師、騎兵十一師。這一部分部隊的數目就有一百二十萬人。在這個數目裡，有二十八個師，也就是三十萬人，駐在「特區」。約有二萬五千人集中在通往新疆的各通道。

- 二、中部前線：步兵一百三十六師、騎兵三師。這一部分總數約一百四十萬人。
- 三、南部前線：五十二個步兵師，十一個步兵營。總共約七十萬人。
- 四、緬甸前線：步兵三師：約三萬二千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廿四日

我一直都在設法探究，有些中共黨的工作人員爲什麼總是對我們採取一種冷漠的，往往是敵意的態度。從我和一些中共黨的領袖所作談話的結果，使我深深相信，這種對蘇俄社團不友好的態度，祇是反映他們對蘇俄的一種敵視。

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五日

隨着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德國軍隊接近了莫斯科時，中共黨的領袖們，對蘇俄社團的態度，就變得格外的含有敵視。中共黨的高級工作人員就不再跟我們會面。康生監視着我們的行動，毛澤東則藉口忙碌，再沒接見過一次蘇俄的記者。

在這種不友好的情況中，我的任務就在建立起我們和中共同志的關係，不再提到我們的思想觀念問題。鑒於康生在中共黨中日益龐大的影響力，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七日

我會和馬海德遇到過幾次，有時在康生的辦公處，有時跟任弼時在一起，在王家坪，在南門衛。

我總是看到他和「特區」的一些高級「官員」在一起。我的那些蘇俄同事說，他喜歡招待客人，舉行舞會，永遠決不放鬆讓酒在客人身上發揮應有的效果，雖然他自己喝得不多，非常小心謹慎。

我曾向康生問到這個人的情形，據他告訴我說，馬海德是個很有技能的醫生，他在北延河醫院已經工作很久，是個忠實的同志。馬海德是在一九三七年來到「特區」的，雖然有人說還要早些。

據康生說，馬海德來到「特區」，因為他深信國際主義。他接着說，作爲一個醫生，他對中共提供了公正的協助。他是猶太人，屬於紐西蘭公民。他在近東出生，他的名字叫摩罕默德。在中國，便改名叫馬海德。我懷疑他是否真是受過醫學的教育。

「他受過很基本的教育，」康生說。「他是在美國留學的。」

我在塔斯社的同事們斷定這個紐西蘭人領有很豐厚的薪水，他把這些錢存在美國銀行賬

戶裡，同時相信他是一個職業情報員。

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九日

整風運動達到了一種大規模的性質。不僅是黨員，而且甚至在士兵和老百姓，現在都需要把毛澤東那些關於文化問題、「整肅三種作風」等等的演講，填塞到腦海中去。

在這艱苦的戰爭和經濟困難的情況之中，最後還有面對日本正在公開準備對蘇俄發動攻擊的時候，所有這一切顯得非常荒謬可笑。

整風運動無疑是意味着用來遮掩一些非常嚴重的事，一些在毛澤東非常迫切需要的事。這個運動就是他所策動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卅日

日本人的電台正在忙碌地廣播，說是蘇俄在邊境的設施正威脅着日本，並要求從「滿洲國」對蘇俄發動進攻。

在「滿洲國」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工人實行登記，並指派他們永久的工作職位。

關東軍司令部宣布，從即日起，「滿洲國」境內所有一切壯丁，都必須實施軍事訓練。

一九四二年六月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

日本人加緊了他們在八路軍控制地區的軍事活動。他們正在設法鞏固他們集結的部隊後方，準備從內蒙向「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動軍事行動，同時使他們在東三省和華北的交通線一旦在對蘇俄作戰時，可保安全無虞。

德軍在莫斯科附近失敗後，希特勒政府無疑會施行一切政治手段，並繼續施行一切政治手段，來迫令日本參加對俄戰爭。

日本收獲了極大的成功。美國在軍事作戰上毫無準備是很顯明的。現在日本除了蘇俄和中國的軍隊外，便再不會遇到一支真正的軍力了。

關於八路軍對付日軍部隊大舉進攻採取的行動問題：康生天花亂墜的一套熱烈的說話，

講到中共黨的忠實於國際主義的責任。但這些說話祇是一套空話、空話、空話。

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

昨天，奧洛夫正式開始了他在那座醫院的工作。

他講到那座醫院的情形：「這個蘊育疾病的地方必須要作一番清潔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把它弄乾淨，經過一番消毒。其次是我要訓練一批外科護士和外科醫生。我們要像那些最好的診所一樣來施行外科手術。……」

很好，祝你好運，安特烈·耶科夫里契！

從各種情形來看，使我得到一個斷然的結論，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領導階層，有意的不把蘇俄記者放在眼中。蘇俄記者要見毛澤東是極端困難的事。

在這方面，我也沒有預料到他們對我也會採取這樣一種態度。總之，我是由「共產國際」派來這兒的，多少年來一直都在對中共黨給以協助的一個國際革命組織。

「共產國際」在中共黨的歷史中所居的地位是絕對重要的。憑着「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協助，這個國家纔有了第一批馬克斯主義者的集團，並從這個集團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曾一再幫助中國共產黨克服了各種不同的左傾和機會主義的傾向。

現在這裡延安，却誰也不再提到李大釗、瞿秋白和另外一些中國馬克斯主義國際主義者的名字。在這樣一種情形中，是不容有機會提出他們的名字的，這完全是一種斷然手段的結果。

八路軍的部隊從不從事積極的軍事作戰，來壓制日本侵犯者的氣焰，他們祇是限於從事地方性的刻板的防守戰。如果在敵人方面策動發動一次戰鬪，八路軍總是大隊的退入山地，避免接觸。因此，日本人實際上便可毫不受到阻擾的來準備他們的後方梯隊，對蘇俄發動戰爭。

美國和中國簽訂了一個協定。美國承諾視中國為一個對美國防務極為重要的地區，繼續給以軍事與技術的援助。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

從我和中共同志們的談話中，使我深深相信，中共黨的領導階層，在外表上雖然顯得完整無缺，實際上却正在進行着一次劇烈的鬪爭。

據毛澤東自己所作的界說，中共黨內有三個集團：

一、右翼集團認為，「中央委員會」對國民黨的政策過於殘酷而危險，他們正在活動，希望在抗日聯合陣線體制之內，與國民黨採取合作。

二、左翼集團建議，整個放棄與國民黨合作的計劃，不怕和國民政府決絕，採取絕對獨立的政策。

三、第三個集團是由一批「對中國革命失去了知覺力的主觀主義者」所組成。

毛澤東雖然並沒舉出名字，但這第三個集團顯然是由周恩來領導的。

現在我纔知道，整風運動原來並非一種完全無毒的空談。這個運動是中共黨內部分裂所產生的結果。在思想觀念方面，這個運動是由毛澤東所領導的。

這個情形是太嚴重了，因此整個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正設法來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情況。是的，祇是設法試試而已，因為他們把每一件事都矇住了我，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必須要知道真相。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

毛澤東似乎認為，「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方針是錯誤的。王明（陳紹禹）遵循「共產國

際」的立場。他、博古、洛甫，還有另外一些人，都贊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全聯邦布爾塞維克共產黨（聯共，一九五二年改稱爲蘇俄共產黨）」友誼合作的政策。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中，氣氛並不好。我現在所知道的事，仍然太少，沒法構成一個完密的判斷。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

在五月間，日本的部隊和作戰裝備，不斷的運到東三省。日本的電台重申「滿洲國」的攻勢防衛：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我們要保衛由我們的父祖用血汗換來的產業！滿洲是保衛我們帝國的前線！

日皇的一個特派代表，日皇之弟松鷹宮，到了東三省，從五月廿五到六月二日，訪問了八天。這位親王曾和關東軍司令舉行了多次會議。……

即使沒有軍事行動，在遠東方面單是有這種緊張狀態的存在，無疑是有利德國的，因爲這種緊張狀態，使蘇俄分散了數十師的兵力，來保護邊界。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

尤辛概括的講到在延安黨的集會情形是這樣的：

黨的集會都是由上級的命令事前安排好的。「未經規定」的策動是不容許的。小組織的主席照例發表一篇開會詞，說明這次集會議程的要旨——也就是說，事前決定了發言的性質和內容。

黨的紀律基於一種荒謬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殘酷的方式。小組織主席在每次集會中指出誰應受到批評。照例，在每一次集會中，總有一個共黨黨員要「受鞭答」。每一個人都要參加「鞭答」，他是必須這樣做的。

「受鞭答」的人祇有一個權利：自認「錯誤」。但如果他不認錯，認為他是無辜的，或是他「自認」得不够，便會再行「鞭答」。

集會很多。演說很長，多半誇張。大致都是一個內容，一種真正的心理操練。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

在我們的軍隊在德蘇前線遭受軍事挫折後，尤其是情形變得非常顯明，由於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我們的政策沒法應付中共領導階層的需求，立即給以大規模的武器供應之後，中共方面對我們這批俄國人的態度，便有了激劇的改變。

中共領袖們絕不諒解，武器在我們方面非常重要，我們自己也正亟需着武器。中共領袖們認為，如果蘇俄戰敗，便也不會再有「特區」，不會再有中共部隊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如果蘇俄戰敗，他們不是會給中央軍打跨，就是會給日本人打跨。

在我認為，中共頭目們希望得到武器，不是爲了對侵畧者作戰，而是要對中央政府發動一次戰爭，在東京方面的人，會感到多麼的高興。

不過，康生却代表中共領導階層向我保證，中共的部隊堅決的要對日作戰。其他中共「官員」也向我提出了這個保證。這是不是一種並不認真的遊戲之言，或者是一種欺人之談？還是欺人之談已經成爲一種政策了呢？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人在去年十一月間在蘇俄和東三省邊境進行的軍事建築，現已快要完成。

在最近幾週裡，從日本運來的軍火和裝備，有了極大的增加。新的步兵部隊（據俘虜所說），正在日本國內加緊編組中。日本陸軍的步兵師，正在趕着改組摩托化。四個團的師，改編爲三個團一師。最新型的大型重坦克，陸續運到了東三省。

謠言很多，傳說日本曾有意就在今年春天進攻蘇俄。在德國的壓力之下，再鑒於要建立

一個「新亞洲」——那是說，摧毀在東方任何能反對日本帝國的真正軍事力量——東條的法西斯內閣，無疑並沒排除要對蘇俄進行一戰，但這大半要看德俄前線的情勢而定。

一九四二年六月廿日

在中共黨的領導階層中，毛澤東的集團漸漸佔了上風。這從領導階層的政策日益接近了與國民黨決裂的一點可以看出。雖然這個政策對解放戰爭的目標極為不利。這樣一種行動，不但剛好中了日本人的圈套，而且足以危害到「特區」和中國共產黨的生存。中央政府有着在數量上佔有極大優勢的軍力，可以輕易的摧毀駐在「特區」的少數一些陸軍部隊，然後再粉碎中共的黨政機構。中共領導階層的政策，是非常令人出於意外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三日

康生所供給的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情報部」的資料，總是那麼的蕪雜紊亂，前後矛盾。而且，最重要的是，那麼的充滿偏見，特別是關於國民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問題方面，非要傷透腦筋，經過一番仔細的推敲，纔能抽絲剝繭的找出一點接近的真相。

我們要設法克服雙重的封鎖：日本人的封鎖，切斷了我們和外面世界的連絡，康生的封

鎖，切斷了我們和中共領導階層的接觸。

康生和他的一批部屬利用他們及時得到的關於德國計劃進攻蘇俄的情報，不斷嘮嘮叨叨的灌進我和我們一些同志們的耳鼓。

杜瑪托夫跟我們講到，在德蘇戰爭爆發前幾天，中共向我們在延安的人提出警告，德國即將向蘇俄發動攻擊的情形。後來過些時候，我們纔知道周恩來曾從重慶發來過一份電報。

在六月十八日，周恩來報告說，蔣委員長已接到中國駐德大使陳介的報告，德國即將在六月廿一日晚，向蘇俄發動攻擊，因此，蔣委員長正在急切的計劃，將對「特區」發動一次總攻。

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五日

馬海德往往總在我們到了的地方，湊巧的到了那裡。他的那種有禮貌的鹵莽作風，早已使我感到厭惡。在他臉上那種尖銳的輪廓，他的大大的鼻子，一對深陷的滑溜溜的眼睛，那付嘴臉，我不用想都會記得起來。他對中國語言，非常精通，還能講得許多地方方言。

馬海德可以「不受」康生的人的監督，這對我們來說是辦不到的。他可以獨來獨往的去到延安和「特區」的任何地方，他和中共的「官員」有着很堅定的關係。他們把他看做貴賓

來接待。他用需要醫藥幫助的藉口，來掩護他在各處的走動。

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七日

有些中共頭目談到他們的友好，如像他們對於德國即將向蘇俄發動攻擊提出警告所表現的，顯然便是種投機的作用。實際的情形是隱藏在康生，也許甚至還有中共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背後的敵意。

毛澤東的敵意？！不，現在在我覺得，這個想法根本已經不再是那麼不經之談了。許多具有重大意義和並無重大意義的小枝細節，改變了我對這個人的觀念。我在延安從毛澤東這廝身上所遇到的，究竟是政治上的錯誤呢，還是有意的策畧呢？！這是件始終令我大惑不解，縈於懷的事。

我必須，由於我的責任，我要探求出中共領導階層這個政策的實質。不是假的政策，而是真的政策。我的到達，似乎剛好和這個政策的斷然轉變，在時間上湊合在一起的。對於我的黨，對於「共產國際」，一個重大的責任，落到了我的身上。

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九日

毛澤東採取了一種與「共產國際」的路線和原則背道而馳的政策。可是究竟是什麼事引導他這樣做的？！

在我出發飛來延安的前一天晚上，我在莫斯科知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建立一個抗日聯合陣線。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結束內戰，與國民黨採取聯合行動，團結中國人民所有一切勢力，來保衛中國的完整與獨立，對抗侵略。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必須遵從此一任務。這個文件的意義是：關於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聯盟，是向蔣委員長投降，這種見解足以有利於親日份子的活動，便利於醞釀兩敗俱傷的內戰。因此，必須對托派份子的圖謀，給以最認真的全力注意。因為托派份子以他們在中國所採取的挑撥性的活動，正在致力於破壞抗日聯合陣線的目標，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跟班。……

一九四二年七月

一九四二年七月五日

新聞記者史諾、安娜·路易·史壯、史沫特萊，使毛澤東得到了中國革命「公認的天才」的美譽。

這批記者都有一種自由主義和半無政府主義的心理狀態。毛澤東對他們的來到，總是盡其一切，竭誠招待，侍候得無微不至。他決不放過機會，使他自已建立一種有利的印象。這個「中央委員會主席」，在他的訪問談話中，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總是輕描淡寫的略為一談，就此帶過，而對自己的事，却就滔滔不絕的講個不完。

毛澤東向史諾自認他在年輕時的政治見解，一直使我感覺非常驚異。毛澤東講到那時他的政治見解，是一種烏托邦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大雜拌」。

他的外表，受到他在學校時的一個老師楊昌濟的影響最大。據毛澤東說，他的這位老師是個公認的理想主義者。

毛的第一個妻子（應爲第二妻——譯者註）就是楊昌濟的女兒。她的名字叫楊開慧。

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

我們所有一切的業務關係，祇是限於與康生採取連絡。要和毛澤東會面，很不容易。他在楊家嶺的客洞裡，過着一種隱士的生活。

康生設法把我們和中共一些有地位的黨員隔離起來。那些中共同志，也都避免和我們往來：康生一直都在監視着不讓他們和我們來往。

如果毛澤東真是接見我們的話，總有一批「政治局」委員一同在場，這就讓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正式性的集會。他曾來看過我們兩次，但還是帶着同一批的人。

祇有康生隨時在他認爲適當的時候，走來看看我們，他的秘書蕭立，也是如此。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

尤辛和亞里也夫剛從前線巡視回來。他們所看到的情形，使他們感到非常沮喪。

八路軍（當然還有新四軍）的部隊，早已放棄了對侵略者採取積極的和消極的行動。儘管現在日軍在中國東南部進行瘋狂殺戮，日本正對蘇俄作着侵略的威脅，這個情形，並無改變。

中共部隊對日本目前正在一些地區，從事肅清中共軍的行動，並不實施抵抗。他們逃入山區，或是渡過黃河。

中共領導階層把國民黨視爲主要敵人，不遺餘力的來佔奪中共政府控制下的土地。他們用釣鉤或欺詐（by hook or by crook，成語，不擇手段之意），來達到這個目的。

這種黨派活動，顯然損害到中國人民對抗侵犯者的「解放運動」，平空增添中國人民的許多犧牲，到處造成對國軍的衝突，而在目前，從各方面來說，國軍的力量，都非中共所能望其項背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

我一頁一頁的慢慢翻譯毛澤東在文藝大會中發表的講詞，題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

導言是他在五月二日發表的演講。但他在五月廿三日會議中發表的閉幕演講，我認爲，

實際上是一含有很大暗流的政治報告。在此是值得一讀的一頁：

「舉例來說，就像在文藝界中的宗派主義傾向。這也是一個原則的問題。宗派主義的傾向，是祇能靠提出「爲工農服務」、「爲八路軍和新四軍服務」、「走到羣衆中去」的口號，並付諸實行，纔能消除的。否則這種宗派主義傾向是不可能消滅的。」

這份報告，顯然是針對中共某一集團的工作人員而發的。

照毛澤東所說的話，在中共黨內，一切情形都不很好：在黨內，「活的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爲「教條」所取代。如果把它轉變爲「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斯主義」，那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

因此，「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斯主義」問題，便給列進了中共舉行會議的議程中。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

無線電中叫叫嚷嚷的都是關於蘇俄軍事失利的消息。從早到晚，日本電台把戈培爾（納粹德國宣傳部長）的報告反覆的播放着。

我感覺到很不安。有一件事是很顯明的——國內已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我突然給請去見了毛澤東。我到那邊時，已經很晚。他單獨一個人在那裡。我們互相寒暄了一番。

毛澤東詳細的問到德俄前線的情況。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了他。他默默的聽着，幾次轉過身去查看地圖。我幫他找出那些在他並不知道的地名所在的位置。

香煙的煙滲透了客廳裡的每一物件。到處都是煙蒂。毛澤東請我在一張椅上坐下，他自己坐下在我對面的一張椅上說，蘇俄政府是不用憂慮的，他和中國人民很了解史達林和蘇俄人民的憂慮，這就是爲什麼我「已下令，準備對日本法西斯主義者作戰。讓他們來犯蘇俄的邊界好了！你們不用擔心。八路軍正在進行必要的調配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

毛澤東從楊家嶺搬到了棗園。這個搬動，對外的解釋是說，由於中央方面情報活動的活躍，需要保障毛澤東的安全。

在棗園爲毛澤東建築密洞時，曾經特別考慮到最大口徑炸彈砲彈的摧毀能量。各種計算都是由軍事工程人員負責做的。

有時毛澤東會背出一些孔子名言。他的四書唸得很熟。

如果我們觀察中共領導階層的言語行動，我們真會感覺非常痛心。現在情勢對蘇俄是那麼危急，然而中共的頭目們對此，却完全漠不關心，無動於衷。他們的活動，或者更應該說是不活不動，顯然正好鼓勵着日軍加緊他們在我們邊界上的軍事準備。想到在德俄前線的最新發展，中共領導階層採取這樣一種政策，決非單是短視而已。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

據尤辛說，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間，蘇俄司令部通知中國共產黨，日本正從本土把一批批完整的部隊單位運到了中國大陸，集中在蘇俄邊界一帶。

蘇俄司令部建議八路軍突破日本部隊向北平、張家口、包頭方面的集結，因此在這危急情勢中給蘇俄幫一個忙。

這個請求說，「特別重要的是斷絕通到上列各地點的正常鐵路交通。」

中國共產黨的頭目們對於這個請求，以及其他任何請求，一律都未照准。

中國共產黨「中共委員會」從此停止再把通常關於國際問題的情報資料，傳送蘇俄，同時把黨的內部生活也嚴密保守着秘密。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

杜瑪托夫補充着尤辛的故事。

當時毛澤東用激怒的聲氣，回答一個蘇俄同志提出的問題說，「如果日本對蘇俄宣戰，我們祇能進行一些小規模的行動，爲了保持我們自己的力量，不會動用大批的軍隊。在進行戰爭之中，我們要看情勢來採取行動。……」這時王稼祥和康生都在場。我們的同志聽了這些話，大家都很氣餒。

王稼祥還並非毫無惡意的接着說：「我們並不需要滿洲。俄國纔關心到滿洲！」（當然，俄國是關心滿洲的。在那邊，在滿洲，關東軍正在集合兵力，白俄匪徒，也正在蠢動起來了。）

「要看情勢！……」杜瑪托夫忿忿的說。「就像如果我們戰敗了，他們還能生存似的。他們在這裡，在特區，不到一個月就會給日軍或國軍，或者也許是雙方的軍隊，打得粉粹稀爛了。他們現在活着，因爲蘇俄現在活着。」

我又再去訪問了王明一次。他說如果日本進攻蘇俄，中國共產黨最可能的是考慮到軍力

的平衡，它自己的軍力和敵人的軍力。因此，蘇俄在沒有摸清中共領導階層的確切政策時，便不應把八路軍考慮在內。

一九四二年七月廿日

晚飯過後，我和亞里夫坐在一起。他有許多值得回憶的事。

「我們的一批記者，」他說，「一直都表現了卓絕的機智。可是中共對我們的態度，一天比一天壞了。在過去幾個月裡，一切的禮貌客套，都已丟到一邊；現在剩下來的就祇是一種粗魯的下流行動和野蠻無禮的作風，來破壞我們在人民中的聲望。我可以絕對確定，一旦日俄戰爭發生，要靠中國共產黨的兵力來幫忙是沒有用的。一個敵意的集團，正在「特區」進行着秘密的活動。

「一個敵意集團正在進行秘密活動」——這個說法太過空洞，對我來說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要找出這個集團的目標、任務，它在中國共產黨內所擔任的角色，和所具的影響力。從各方面看來，這個集團現正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路線，施以日益加甚的影響力。

在我認為，我們在軍事方面的失利，使部分中共頭目對俄國一直悶在心頭的敵意發散了出來。康生就是一個例子，他的密報人員就一直在監視着我們的每一步行蹤。

最近這幾天裡，他就曾送來一個假扮的俄文教師，定規要我收她做學生。我還從未見過一個如此驚人之美的中國女孩子。這個女孩子沒有給我們一天的太平。

一九四二年七月廿四日

在國內，情勢慘烈急轉。法西斯軍已逼近諾伏恰爾卡斯克和津爾揚斯卡耶。俄軍正向伏爾加和高加索退却中。

中國國軍收復了瑞安（浙江省），在陝西，據第二手的情報，收復了臨潼。

也許是爲了提高人民的戰鬥精神，日本電台又津津有味地重覆播出最近的勝利：「……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在夜色的掩護和空軍的支援之下，光榮的皇軍開始將部隊登陸新加坡島。二月十五日，佔領了這個英國的最大海上堡壘。」

指揮這些日本部隊的是山下友之大將。

毛澤東和他的反對者——他帶着諷刺的意味，稱他們叫做「莫斯科派」，或是「莫斯科人」——的不和，已愈來愈明顯。「莫斯科派」並不贊同毛澤東的政治路線。

康生竭盡全力的支持毛澤東——單是這一點就使人不能不提高警覺。不論你在什麼地方

見到康生，這個地方就不會對俄國人或「共產國際」表示尊重。

王明和博古都是堅決支持效忠國際主義，對蘇俄友好的政策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廿七日

「共產國際」所通過的單一抗日陣線，最主要的是有利於中國民族獨立的。不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聯盟，對抗日本侵略者，也意味着對這時正為保衛一切勞工人民的利益，對法西斯主義作戰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以支持。

馬海德在這裡延安的家：他的妻子——一個中國女人，名叫蘇菲——和一個兒子馬玉。蘇菲是一個很女性型的女人，很大方。她對男人非常溫柔。她用她的一身媚力，來和我們的電務員結交朋友。

一九四二年七月廿九日

毛澤東一向都用輕蔑的語氣，談到蘇俄的領袖們。他毫不掩飾他的藐視態度，講到史達林說，「他並不懂得中國，他也不會懂得中國，可是他卻什麼事情都要插進一手。他所寫的

那些關於中國革命的所謂論文，都是狗屎。那些「共產國際」的人嘮嘮叨叨講來講去的就老是那麼一套。……」

毛澤東對蘇俄祇有一個極端模糊的觀念。他對這個問題唯一知道的就祇有「共和國」這一個名詞，除此之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最怪的是他從來也不問到我們關於蘇俄的事情。他對我們國內的事情完全沒有興趣。他所唯一發生興趣的就是德俄前線的情況。

在去年十月到十二月之間莫斯科之戰達到高峯的時候，毛澤東曾說：「看史達林嘮嘮叨叨的給他帶來好瞧的了。再別那麼多嘮叨了！我倒希望看看這個頭兒現在在那邊莫斯科再去嘮叨吧。……」

而從莫斯科傳來的消息，愈來愈悲慘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

毛澤東約了尤辛去到他的住所：要教他玩打麻將。在玩牌的時候，尤辛問：「毛澤東同志，現在住在特區的農人，常常因為非法販買鴉片，受到了懲罰，而如今就連那些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和機關，也都在幹着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毛澤東悶聲不響，不加作答。這個問題由鄧發提出了答覆：「特區過去祇有鹽和碳酸鈉輸送到國民黨的地方去。我們裝滿了一卡車一卡車的鹽送出去，帶回來的是一個並沒裝滿的錢袋。而且祇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並沒裝滿的鴉片，帶回來的却是滿滿一車的錢。這個錢是用來向國民黨買武器的，我們有了這個武器，就可以打垮國民黨了！」

中共「中央委員會」用博古主持的電台，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保持連絡。所有的通信，都是用的密碼。

博古是堅持原來立場的少數幾個同志中間的一個。如果他不同意一個人的意見，他會直截的說出來，或者就祇是給他一個微笑。他的這種微笑，就要比說話還更有意義了。

晚飯時，蕭立來訪，他的胃口很好，吃飽了飯，他透露了最新的消息：「你們的軍隊已經把庫班河地區放棄給德國人了。……」他的話裡充滿了惡意。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

蕭立的消息是正確的。德軍已進犯到庫班地區。

沒有第二前線在望。正像在中國一樣，盟國祇願從事空戰。因此，讓俄國人、中國人、還有被佔領國內的游擊隊流血吧。

爲了增強他的地位，康生在他周圍收羅了一批他自己的人。他的秘書蕭立是個激烈的反俄份子。他的副手李克農是在一九四一年從國軍地區來到這裡的，他原本是中央政府的一個

情報和反情報官長。他無疑是蘇俄的死敵。

特務部的頭兒是彭真。

據尤辛說，彭真在今年春天從新四軍方面一同帶來了劉少奇。劉少奇原是新四軍的政委。

李克農顯得一付愁眉苦臉的樣子，性情暴躁，非常專橫。他絕對注意不讓有人看到前去看他的人。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

運輸設備正在陸續運到滿洲，還有到濱海省（蘇俄境內）的渡河工具。

日軍在與俄國反革命領袖們舉行會議時，公開講到未來對蘇俄的戰爭，和建立一個緩衝國的問題。

日本的電台叫喊着「撲滅來自北方的威脅」。廣播的語氣，跟着一天天的過去，愈來愈形敵意。

據莫斯科報導，在五月到六月的兩個月中，日本部隊和日本飛機，曾發生了十五次侵犯蘇俄邊境的事件。這也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納粹德軍開始發動對俄戰爭時的情形。

自從今年開始以來，中共就一直都在籌備舉行黨的「七全大會」。這次大會原本預期在早些時舉行的，但新四軍的潰敗便用作了延期舉行的藉口。

有些從遙遠「解放區」趕來的代表，已經到了延安。更多的代表還將來到。……

我們相信，這次大會延期舉行的真正原因，實際上是由於中共頭目們發生內部鬭爭的情形，毛澤東不希望冒上在大會中大家公開發言的危險。

整風對未來的大會，似乎是有直接關係的。

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

康生正在極力拉攏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反對與國民黨聯盟，不惜任何犧牲，對日軍挑起武裝衝突。從這個情形可以表明，康生究竟不是一個日本間諜。他是斷然反對對佔領軍積極作戰的，他還煽動毛澤東將所有部署在日軍前線的部隊，一律撤到後方。

中共的一些領袖黨員，對待我們，一向採取藐視的態度，現在蘇俄軍隊正在節節敗退，他們對我們的態度，簡直就已接近了敵視。

康生已下令他的職員，不要和我們維持任何的關係。他們不讓我們知道任何有關當地生活的消息，我們不准去看戲，不准去聽音樂，也不准去參加文藝晚會。他們甚至設法瞞住在

「特區」有莫斯科報紙的存在。

康生爲人非常虛僞。在表面上，他還像過去一樣的客客氣氣。答應的話多，却從來也不見做過一件事。因爲我是他的「老朋友」，他總是打哈哈，堆滿笑臉，裝得一付客套的模樣來招呼我。

今天，亞里也夫再也認不住了，他發了一大篇議論。早飯過後，我們一同坐在桌上，他說：「我們有很多事實，大的小的，顯得我們是正處身在敵人之中！這裏沒有一點可以稱得是友誼的事！」

在這裏是很容易叫人失去心理平靜，發作起來的！

喝過一杯白乾，吃飽點心之後，蕭立嘮叨着說出了他的主子的命令。康生對那些從蘇俄回來的人說：「忘掉你們是在那邊工作過的！這兒是中國。你們必須照中國的方式來工作！記住你們在那邊受到了寵壞，不是受到教養。我禁止你們和俄國人隨便往來！」蕭立對我們這批「小鬼」的侮蔑，是絕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我們不論去到那裏，隨時隨地都受到了康生手下人的監視。不管是那個漂亮的教師，或者是我們以前的那個廚司。好多密報人監視着我們的每一步行動：康生的這一批人，腳步動

快，無所不在。他們的出現，總使那些我們希望跟他們談談的人，封住了嘴巴，死也不肯開腔了。康生親自決定，誰能講話，跟誰講話。自然，所有這些人都是經過適當的思想訓練的。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約略可以分爲四個集團：

一、毛澤東、康生和劉少奇（他並非「政治局」的委員，不過他正慢慢的僭越大權，漸取得了崇高的地位）。

二、王稼祥、陳雲、朱德，他們多少堅守馬列主義的原則，不過他們在理論方面，所知不多，往往沒法辯護他們自己的見解。

三、所謂的莫斯科派，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們的主要反對派機會主義者：王明、博古、洛甫。

四、任弼時屬於所謂泥漿。誰在當時力量較強，他就很容易的擺到誰的一邊。

鄧發採取中立的路線。

周恩來代表中共駐在重慶，實際上保持置身黨內的鬭爭之外。

王稼祥於一九〇七年出生安徽，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一九三〇年回到中國。現任中共「陸軍政治部主任」。

陳雲於一九〇五年出生江蘇。小學畢業後，在上海賣報。後在蘇俄求學。現任特區「財政經濟聯合部部長」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他的化名叫廖程雲。

朱德於一八八六年出生於一個貧苦的農家。在一所軍事學校畢業。一九二二年赴德國，就讀於哥丁根大學。在國外時，他認識了周恩來。由於從事政治活動，爲德國驅逐出境，經由蘇俄回到中國。一九二八年，參加毛澤東在井崗山的農民武裝部隊。

洛甫（張聞天），一九〇〇年出生於江蘇一個富有的地方官員家庭。畢業於南京一所工科學校，後留學美國，入加利福尼亞大學。回國後，從事翻譯西方與俄國的古典小說。一九二五年，經陳雲的推薦，加入共黨。一九二六年，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學。一九三〇年回國。自一九三一年以來，一直任「政治局委員」。在延安，他現在是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當地高級黨務學校首席講師。現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在黨的領導階層，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的副手。

周恩來於一八九八年出生於一個大地主家庭。曾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後至天津。因參加反日示威運動，曾囚獄中半年。一九二〇年，周赴法國深造。在法國，他建立了中國共

產黨巴黎支部，並參加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前赴英國，並在德國留學一年。一九二四年回國。自一九二七年四月以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八日

在七月間，日本又有一個步兵師調到了東三省。大批軍火輜重，繼續源源不絕的運交關東軍，還有大批部隊，源源不絕的空運到蘇俄邊境。另外並已開始動工，建造一條從大連通到哈爾濱的公路。邊境地區的公路和泥土路，都在進行整修。

那邊正在編起一個陸軍坦克部隊。

在若干地段，日本正將部隊直接送到蘇俄邊界。

因此，關東軍正在擴充增強了。

早晨，蕭立來到門口，也沒照例的打個招呼，就大聲的叫着：「照這樣的速率，你們的部隊很快就會給一直迫退到烏拉爾山了！」他奔到我身邊，假慫慫的堆着笑臉，問我俄國人究竟打算要在什麼時候，來制止德軍的推進。

我說：「蕭立同志，一九四一年時在莫斯科擊潰德軍，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可是我們

做到了。我斷定這次我們也會抵住他們的壓力的。德軍把他們的前線防線和交通線，拉長得到了非常危險的單薄地步。俄軍在撤退時，就在準備必要的條件，以備未來對納粹德軍施以決定性的痛擊。……

我沒有旁的說話可說。我甚至毫不懷疑，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不過像蕭立那種人是有充分理由對我們懷着惡意的。事實上，他和他那批同類的人，對於他們自己人民的敵人，也是同樣漠不關心的。

我和尤辛、亞里也夫決定搬到太平谷去。這樣可以節省我們很多時間。我們就可以靠近楊家嶺（毛澤東的住所）和市區了。

康生滿足了我們的要求。到十月初，我們在那邊就可以有他們爲我們鑿的密洞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二日

美國史迪威將軍被任命爲遠東盟軍參謀長。重慶的一些將領們對這個美國人來干涉到他們參謀本部的事情，非常的不快。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八日

今天從前線傳來的消息，初次提到了史達林格勒。德軍終於到了伏爾加。在該城西北部分爆發了激烈的戰鬥。

馬海德的太太蘇菲，和毛澤東之妻江青很要好。她有很多時間都消磨在江青的住所。

江青喜歡騎馬。

陳伯達是毛澤東的秘書。他看去像是一個很魯鈍的人，戴一付眼鏡，正在漸漸的長肥起來，有一雙不太相稱的深陷的眼睛。從我親自的觀察，還有從我那些朋友方面聽來的情形，陳伯達是一個很聰敏、很有天才的人。他和康生不同，很會交際，有許多朋友。他能造成一種仁慈友善的印象。

陳伯達於一九〇四年出生福建。一九二〇年代，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完成學業。他寫過很多本書。

一九三七年，他來到延安，目前在當地黨務學校講課。對一個像毛澤東那樣所受教育不

多的人，陳伯達便有很大的價值，特別因為陳伯達能把他主子的任何意見，加以「消化」，用適當的方式提出來。

一九四二年八月卅日

我發現在我和毛澤東所有幾次的會面中，他的一批隨從人員總是盡量裝得非常愉快的樣子，同時像孩子一樣天真的，勇敢地對當天發生的一些複雜事件，提出判斷。在這一方面，誰都沒法比得上鄧發、任弼時和蕭勁光。

他們的厚顏作風，彌補了毛澤東的拘泥虛套的態度。在這樣的時候，他總是在這一批嘈雜的人羣中間，靜靜的聽着在他周圍發生的事。

晚上，毛澤東請我和亞里也夫去見他。從那些「政治局」委員們紅紅的臉孔上，我知道他們是剛開過了會，而這次會議開得決不很平靜。

除了那種拘泥呆板的外貌——那是表示要使客人引起一種敬畏之感——毛澤東另外有一種純粹中國式的風格。這次他關切的問到我們的健康，問到我們有什麼需要的事，他讓我坐在通常保留給貴賓坐的皮沙發椅上，然後他自己搬出一些米花、鳳翔酒、和茶。江青搬來一張帆布躺椅，他就在我們旁邊躺了下來。侍衛兵遞給他一杯鳳翔酒，江青在他手裏丟進了幾

顆花生。

我們問他他對日本可能進攻蘇俄的事，作何看法，以及中共對這樣一個戰爭，採取如何態度。毛澤東心不在焉的回答說，「當然我們要對日本進行作戰。」

這個問題顯然問得很不得體。毛澤東極力用一個飄忽的笑臉，來遮掩他心頭的激怒，然後詳細的講到中國共產黨當前的任務：

「所有一切對團結沒有貢獻的事，都必須加以摧毀。我們必須剷除滿足個人願望之心，除去不健全的作風。」（他對此點，未加說明。）「我們必須考核在人事方面的公正作風，任用人員要憑工作的成績來作判斷」等等。

毛澤東忽然停止了說話，吩咐把辣椒送進來。我們認爲這是表示這次會談正式的部分已經結束。毛澤東指了指我，於是滿滿一碟紅辣椒首先送到我的手裏。同樣的一碟，送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很快的吃下了一隻辣椒，然後躺在椅上，發出了他的問題：「史達林是一個革命家嗎？他愛吃紅辣椒嗎？一個真正的革命家是必須吃紅辣椒的。……」他在酒杯裏喝了口酒說，「亞歷山大大帝當然是非常愛好紅辣椒的。他是一個大偉人，一個天生的革命家。至於史達林，他當然也吃辣椒的。你也必須要吃辣椒，宋賓。來，吃啊，如果你是一個革命家的

話……」

毛澤東一隻又一隻的把辣椒放進嘴裏，和着鳳翔酒一同吞下。我真佩服他強硬的頭腦，能够裝下那麼多的酒去。

過了一會，毛澤東的臉孔就變得跟我們碟子裏的辣椒一般紅了。

王稼祥也來了。這時話頭就轉到了當前的一些事情上去。

王稼祥和康生嘲笑我們花了那麼好大勁去研究他們的情報，却往往搞不出一點名堂來。從一切的標準來說，他們的情報也着實的難以令人滿意：既少且假。

約一個半小時後，毛澤東變得呆鈍起來。他打了個哈欠，在躺椅上伸展着身子。江青放上一張平劇唱片。毛澤東讚許的點了點頭，開始用兩手跟着拍着節拍。他的緩慢的節拍，漸漸的把他送進了睡鄉。

一九四二年九月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奧洛夫夫堅持要造一間手術室：在那窖洞外面添蓋一個石建築。他提出的理由是中共所有地位的人都是由他負責醫藥照料的。江青便是他的一個熱心的病人。他設法說服每一個人需要有一間手術室。

由於儀器、化驗設備、和藥品，都很缺乏，奧洛夫夫就必須儘量利用他的技能，尤其因為那些中國醫生對他都很嫉妬，不肯給他幫忙。

然而，奧洛夫夫還是希望能克服這種不信任的氣氛，來訓練一些外科醫生和護士。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日

從莫斯科傳來了一些並不一致的消息。我們大家都很侷促不安。我們不斷的聽到有人在問杜瑪托夫：「有什麼消息嗎？」「史達林格勒怎麼樣了？」

一個包括三個坦克師的坦克軍，已在東三省正式編成。這是日本的第一個坦克軍。

楊尚昆是追隨王明的人。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華北局」書記（一九三四年），現任「中央委員會統一戰線部部長」。他是四川人。

在整風的背景中，「政治局」內部的思想觀念鬭爭，有了一個特殊的性質。毛澤東指控王明、博古、洛甫，以及其他一些人為「教條主義」——機械式的將馬列主義的經驗搬到中國來，而並不顧到中國的現實情形。朱德和林伯渠對「莫斯科反對派」的主要看法，也抱有同樣的觀念。不幸得很，關於這個鬭爭的詳細情形，現在還不清楚。

在「教條主義者」中，毛澤東把那些曾經留學俄國，現在黨內負責政治工作，以及黨內那些遵循「全聯邦布爾塞維克共產黨」的經驗進行工作的知識份子，統統列入其內。

整風變得有了種令人難受的性質。現在人們不但把上面交下來的文件，強記死背的記在心裏，而且也在濫罵「教條主義者」，雖然黨內大小黨員，都給隱瞞着並不知道這些人究竟是誰。

一九四二年九月六日

日軍的後方並不位於日本，而是安排在東三省的軍火庫。這就使關東軍部隊變成了一支強大的獨立軍力。

「新京」是「滿洲國」的京城。「新京」也是關東軍司令部的所在地。

東三省是一個龐大的試驗場。從日本開來的未經訓練的新兵部隊，經常都在這裏接受訓練。訓練過後，就從這裏派到南洋，於是又有一些新的部隊來到，接上他們的地位。

現在，關東軍已進入了最高作戰準備狀態。

據亞里也夫說，現在「特區」境內，正有一批敵軍在進行作戰。我認爲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而且，用這樣一種空洞的說法，我是不會滿意的。如果這是一批敵對的軍隊，那麼他們的組織究竟是種什麼人，究竟目標何在，採取何種作戰方法？

整風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來頌揚毛澤東。由於毛澤東的領導，「黨高舉了革命的旗幟」、「主要的革命基地和黨的幹部，得以保全」、「一個統一的抗日戰線已經建立」、「一個新的革命理論已經訂立」（這是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是說，「黨在目前歷史階

段的任務已經正確地確定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九日

「解放日報」刊出了一篇稱爲毛澤東所寫的社論。這篇文章顯然照例是由他的書生秘書陳伯達寫的。陳伯達早年時，曾因宣傳托洛斯基主義，遭到過一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懲罰。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

我剛從「解放日報」翻譯了一篇題名「一個特別重要的政治措施」的文章。這篇文章呼籲以更大的熱情，參加整風，不光是在「特區」，而且要在所有共黨的基地。這篇報告引用了許多古時中國作家的文句（毛澤東的「典型」風格，也正是陳伯達的拿手工作），還談論到必須擊潰日軍。

我現在記下另一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爲了我在目前延安情勢中，把握住正確的方
向，所交給我的文件：

「一九三〇年一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收到秦易生（譯音）『有關於論朱德毛澤東之

「紅軍」的報告：

「朱德（因在湖南南部的失敗）受到嚴厲批評，毛澤東知道，這次的失敗，極大的損毀了朱德的聲望，便設法利用這個機會，對朱德的權威，給以最後的一擊。……」

「毛澤東希望把一切權力，集中到他自己一個人的手裏，當然，他雖然熱衷於此，却還沒法應付這個情勢。至於朱德，他深深知道這種情形，但他也並不希望出來干預毛澤東的事。……」

「朱德宣稱，一切都是毛澤東的錯誤。誰是誰非，雖然很難辨明，但應該一提的是，人民大眾對毛澤東，無論如何是很不滿意的。……」

「毛澤東對許多重要問題，都有他的一種斷然的看法。至於朱德，他的見解是時常變更的。……」

「毛澤東的弱點：在民衆中不孚衆望，在黨內耍弄手段。……」

朱德的名氣要大得多。毛澤東一直都在找機會要玷辱他。但這不是一個喜歡不喜歡的好惡問題。控制軍隊的權力——這是毛澤東的目標。我們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文件和實際的事實作一比較，便可很明白的看出來。

毛澤東在軍事才能方面是沒法和朱德競爭的，因為他自己根本就沒有一點這種才能。毛

澤東和這個軍事司令員放在一起，就相形見绌了。這就使他想盡一切方法來提升一些新的軍事領袖。因此，林彪就在不到幾年之中，由一個連長擢升到了一個兵團司令員。

據毛澤東自己說，他在少年時最愛讀的書，其中一本就是「世界偉大英雄傳」。他欽慕那些有名的征服者、君王，和所有那些能在「人類金字塔」頂得到一個穩固立足點的人。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

日本的坦克軍，從它的配置來看，是有意在普列莫里防線採取行動（奪取伯力）。山下大將是這一軍的指揮官。

關東軍的指揮部，已經改組為「前線指揮部」，準備在三個地段敷設地雷（特朗貝加利亞、普列莫里，以及沿松花江一帶）。

東三省已到處擠滿了日本部隊和物資。

千島列島、庫頁島、中國東三省——成爲日軍部署對付蘇俄的一條龐大防線。這個部署已經完成。

土肥原是一個惡名昭彰的日本間諜，是世界情報活動史上數一數二最邪惡的人物。實際

上所有的一切對蘇俄所進行的挑釁活動的一個陰險狡猾的組織者。

他畢生的目的便在削弱蘇俄的力量。從海洋到烏拉爾山脈之間所有蘇俄東部的土地，都必須屬於日本——這便是這個日本勞倫斯的政治信條。他扶植指導西米耶諾夫、季斯里夫、拉齊也夫斯基和烏哈托姆斯基的白衛隊匪徒。他就從這批匪徒中積極招募他的間諜人員。

這就是在內戰（指蘇俄布爾塞維克革命後的內戰）那些年中，在我們遠東（蘇俄遠東部分）留下了一條血腥足跡的那個土肥原。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從情勢看來，德軍正以史達林格勒作為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

外國電台一再播出希特勒的大言狂吠，誇稱伏爾加城即將於二十四小時內屈服於德軍之手。許多評論家將此種大言與蘇俄的最後失敗，以及建立一個類似維希法國的偽國連在一起。

中國前線顯得並無重大變化。雙方顯然都認為，夏季之戰已經結束。有一些零星接觸，專為佔領一些比較有利的陣地。

英國電台對印度發生的騷動，繼續表示焦慮。警察經常使用武器來驅散示威者。甘地受

到了殖民主義者的咒詛。

我們把日記本、記事冊和文件，都放在那間電台房間裡。我們不信任我們的那些警衛和警衛隊鄭隊長。

我們對鄭的看法，意見並不一致。尤辛認爲他是一個老實人。我和黎瑪爾、奧洛夫都肯定這個警衛隊長是康生的密報人。

我們把電台室用鎖鎖上，我們幾人中間永遠總讓一個人留在屋裡。

這裡延安所有的每一件事，都使我深信，中共黨領導階層中的秘密政治過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是因「共產國際」的地位，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和蘇俄所處的艱困情勢，變得日益薄弱造成的。我們不應匆促遽下結論。最重要的是事實，然後進行分析。但這個分析的趨勢已經漸漸明朗。

天亮時，我就要和亞里也夫一同到前線去了。我們必須就地去看，來證實八路軍作戰的性質。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至卅日

我們花了十天功夫纔到達賀龍的指揮部。

隨處一些小徑，都是那麼狹窄，我們必須跳下馬來，牽着馬勒走過去。在一些巉崖削壁上面放下一頂脆弱的橋，走到對面去。小徑上到處都是一些碎石。在這些部分，落下來的山石，打死了許多人。

要走到一些廟裡去，唯一的途徑是攀登一級級在岩石中開出來的石級。這些陡峭登山的小徑，總有幾百公尺長。

沿途我們驚起了一些野兔、狐狸、野豬、野山羊和胡狼。一羣羣的野豬結隊竄奔。

在這個地方，流氓土匪，多得不成比例。許多土匪幫自稱爲游擊隊。這些匪黨，就像日本軍隊一樣，在老百姓中間製造恐怖。

游擊運動的現代化，進行的情形，成績很差。許多大的游擊縱隊，雖然戰爭已經進行多年，但和延安仍然沒有可靠的連絡。

農民的窮苦和文盲情形，令人驚訝。徵用物資、戰爭、小片的土地，使他們永遠入不敷出。過一種勉強維生存的生活。他們光着身子睡在一張炕上，蓋上一些長滿蟲子的破爛棉絮。沒有一家不是自找苦吃抽着鴉片的地。

難民都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他們到處要飯討乞，用一個女兒或是一個姊妹，來換取

少許的米。他們的眼裡含着絕望的神色。有些人在挖掘樹木草根。

我決不忘記有一個老農夫。日軍毀去了他的村，殺死了全村的人。他總算微倖帶了他的
一個孫兒逃了出來。

「爲什麼他們的娘不會乾了奶呢？」每次有人談到日軍，他總會這樣的問。

共軍從延安方面並不領有一個小子兒，延安方面也不供應任何補給。賀龍、劉伯承、聶榮臻、陳光和蕭克這些人，除了他們控制的部隊和土地之外，他們還有自己的兵工廠，發行自己的鈔票。每一個司令員都向農民徵收他自己的稅。

一些軍事頭目，不免過着一種封建的生活。我認識一個司令員，他有兩個年輕太太，幾乎都還是小姑娘呢。但似乎誰也並不因此感到氣忿。

那些司令員和副司令員總是照他們自己的意思，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用電報向延安提出報告。延安發出來的命令，總是依照他們自己的便宜看法，而不是從是否應該遵循的立場，來加以討論。司令員們都把延安那些領袖同志，輕藐不屑的叫做「狗屁不通的人」。

八路軍和敵軍很和平的生活一起。日軍在集結地區，安安逸逸的安頓下來準備過冬。而八路軍則就在附近，無所事事的消磨着時間。

在新鄉地區，有一些很小規模的日本駐軍，大概從五個人到五十個人，佔據着一些爲數量上居於優勢地位的賀龍部隊所包圍的村子。我問他們爲什麼不把這些村子收復回來，因爲要毀掉這些敵軍是很輕易的。八路軍的兵看着他們過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他們糾正我說：「他們在那邊有四百個兵，不是四個啊！」

我們跨下馬來，跟那些兵一同抽着煙，於是他們承認，「上面叫我們別去惹他們。他們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毀去了這批駐軍，日本人就會調援軍來了。到那時候怎麼辦呢？所以我們不去惹他們，他們也不來惹我們。……」

敵人把田地上的收穫，部分運到日本去；他們也運出工業的原料，顯然是絕不償付一點錢的。

日本人管理這個地方。他們把中國人作爲劣等民族看待。把他們當做載重的牲畜驅使。日軍強姦中國女人，逼她們住在一起。他們虐待老百姓，絕不受到懲罰，爲了一點小小的不服從便加以殺死。

後方地區隨處都是一些妓院，黑市和盜匪盛行。

種族的宣傳，在日本少年的心理上種下了根。在這裡，凡是並非日本的東西，便都殘酷

的加以毀去。就連那些專爲安慰佔領軍的妓院裡，也都嚴格的遵守種族的原則。專爲供應軍人的女人，也全部都是日本人。

對來犯的敵軍所進行的戰爭，很明顯的完全屬於消極的性質。

我們沒法不感覺到，八路軍正在等待着納粹德軍和蘇俄作戰的結果，在這裡「特區」，人們對蘇俄人民的掙扎作戰，完全漠不關心，無動於衷。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並不採取有效的措施，來牽制住在中國北方的日本遠征軍。這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莫斯科向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所有請求，希望他們使用一切方法，來阻撓日本對蘇俄作戰的準備，却都給當做了耳邊風，置之不理。延安的政策還是沒有改變：繼續八路軍正規部隊的作戰規模。

我們可以看到，八路軍主要關切的是國軍。在部隊裡進行的宣傳便都針對着他們；未來的戰鬥行動也都預期針對他們。結果，日軍進行的作戰行動，近乎全部都順利成功。延安會下令不惜一切犧牲，來保全八路軍的兵員。因此，八路軍便向後退却，雖然向前推進的敵軍的兵力，微不足道。

毛澤東的教條是：戰爭的進行，是在保全他自己的兵員，而不是在消滅敵人。他用降低

對抗敵人和放棄更多土地，來達到這個目的。

幾年來的停滯行動，對中共的軍力，具有一種退化的影響。紀律鬆弛。開小差叛逃的情形愈來愈多。兵士不再看重他們的武器。部隊和參謀部，並無有組織的訓練。部隊與部隊之間，也無有組織的合作。作戰的命令，就當着農民之前，公開發表。這種情形，便應歸咎於準備發動內戰的鹵莽政策所造成。中共的軍隊，在目前是沒法對居於極大優勢地位的國軍作戰的。

那種涕泗交流談到對「特區」施行最嚴密的封鎖的說話，都是康生所發動的宣傳謊話。要通過「特區」前線和邊界是很容易的。我們曾親眼見到這個情形。中共領導階層談到嚴密的封鎖時，總就加油加醬的把實際情形，加添許多編造的假話。

到前線去了一次，使我堅定的深信，中共領導階層並無意於與日軍作戰；他們把戰爭看做是一個建立他們自己基地的絕好良機。不是由他們自己的部隊進行戰爭，而是由互相對抗的另外兩造來進行：日本人和國民黨。

如果日本擊敗國軍，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破壞，八路軍的部隊便立即滲入到那個地區。如果必要的話，他們便幹掉他們在統一抗日陣線中的袍澤戰友，來攫奪政權。

毛澤東在來犯的敵軍之前退却後撤，尋找一個機會，使中央軍和日軍的衝突，成爲對他有利之事。在國難當前的時候，在全國人民含辛茹苦，作着書不盡書的犧牲的時候，在國家受到法西斯主義者征服的時候，這樣一種手段是不忠不義而有過之。

甚至在他自己的人民，祇是一種奪取政權的工具，我們如何還能對毛澤東來談國際主義的政策！成百萬人的流血和苦難，不幸與憂患，對他完全是一種抽象的概念。

一九四二年十月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一日

王明病了。奧洛夫很擔憂。

王稼祥也病倒了。

王稼祥已被拉進了毛澤東的集團，不過他看不慣康生的那種作風。他對我們大家也不怎麼客氣。

王稼祥的朋友陳雲，也愈來愈受到康生的影響。說「影響」並不很恰當——兩個人顯然都給康生的恐怖手段嚇倒了。

劉少奇擔任的角色有着很快的發展。他一度原是新四軍的政委，現在已成爲毛澤東的秘書，而且是毛澤東整風構想的實際指揮者。他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局」委員和高級軍

事人員，都必須對他另眼相看。

「解放日報」上刊出一篇關於史達林格勒之戰的文章。這篇文章雖然由毛澤東署名，但照例的當然是陳伯達的手筆。

如果俄軍能堅挺下去，擊敗德國，這也就會影響到遠東的情勢——這便是這篇文章的要旨。

「……任何人在評估國際情勢感到悲觀時，都必須改變一下他的看法，」這篇文章的作者承認。

因此，保持與蘇俄站在一條線上——以防萬一！

從現在起，我和尤辛·亞里也夫，便都要像所有當地的中國人一樣，住進密洞去了。

在那狹隘陡峭的小徑攀登上去，首先到達一般黨工人員、學生和軍人所住的密洞的第一層突出之處。

我們的「套房」在第二層突出處。突出部分外面便是一個深深的山峽。

小徑上去走到最後一層密洞。詩人蕭三（愛眉）和另外一些中國同志都住在那兒。

蕭三是毛澤東在湘潭小學時的同班同學。

毛澤東把「教條主義派」和「經驗主義者」，都列入「黨的反對派」內。「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不同意義是很難搞得清楚的，就連毛澤東提出說明的時候，也還是很難使人領會。毛澤東把劉伯承、彭德懷、葉劍英、周恩來、聶榮臻都視爲是「經驗主義者」。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二日

目前階段的農民政策是：

——暫時不予沒收地主的產業。僅對賣國漢奸的土地，加以徵收。

——組織日軍後方的解放地區，如果這樣做不致牽涉進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話。

——減低一切解放地區的地租和貸款利息。

毛澤東說，抗日統一戰線應予加強，同時暴露「重慶反動派」的陰險行爲。

據毛澤東說，爲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利益，工農民主共和的口號，應以工、農和全國資產階級執政的人民共和的口號來取代。這是有利於抗日鬭爭的。

依我所知，這就是「共產國際」的策略，也正是毛澤東目前顯然正在暗中加以破壞的策略。

由於「共產國際」的建議，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締結了一個協議。

「共產國際」作此建議，當時便也就是考慮到一個事實，由於日軍的侵略，全國資產階級全都感到了驚恐，開始對日軍作戰。

毛澤東利用「共產國際」這些外表正確的分析 and 建議，來遮掩他暗中破壞抗日聯合陣線的活動。他口中講的是贊成團結一致，但實際做的是拒絕團結一致，停止軍事行動，提出反國民黨的口號。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三日

九月間，賀龍在一次集會中公開講到，與國民黨決裂是不可避免的事，因此需要準備行動，佔領土地和財物。他說，這是「教條主義者」所未認清的，「他們已部分得到了他們應得的報應，並應使之最後屈服。……」

賀龍在政治方面是一竅不通的。他是受了毛澤東的指示的。

賀龍是一二〇步兵師師長，在共軍裡面很有名望。他出生於毛澤東的同一省份，很得毛的信任。

賀龍人很溫和，但却有種病態的野心，毛澤東便利用這一點來推進他的活動。

事實上賀龍是一個地方軍閥，他對這點並不隱諱。目前他是「特區」部隊的「聯合參謀

長」。

林楓是一二〇步兵師的政委。

周恩來與「經驗主義者」同列。他整個時候，一直都在重慶。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五日

把各種資料作一比較，產生了一些最令人沮喪的結果。在八路軍方面沒有一點積極的軍事行動！而且，這樣一種行動是嚴格禁止的。

中共黨的領導階層，繼續以假稱準備對日作戰來欺騙莫斯科。

毛澤東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來和他的政治反對者鬭爭。這部書就做了他整個一批依附者的一種政綱。在這一階段，我們可以確切的說出這種政治勢力的分裂情形。任弼時、林楓、陳雲、王稼祥，當然還有康生（在此，我祇是提到這一集團中一些最有地位的代表），一般的都遵循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訂的路線。

把這部書作一徹底的分析，無疑可以看到，毛澤東是反對有一個抗日集團，和調整對重慶政府的關係的。毛澤東的立場削弱了抵抗侵略者的力量，割裂了各種的勢力。

這就是在「特區」所以繼續不斷進行反國民黨宣傳的原因。

所有這些情形使我們對「新四軍」的悲慘結果，以及共產黨與國民黨繼續不斷的爭執，有了一個新的看法。

毛澤東的見解，並非每一個人都贊同的。前些時，主要的國際主義者，中共派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團長王明，把朱德、周恩來、博古、洛甫，據我認爲，還有許多現在共軍裡面極有地位的軍事人員，集合了在他的身邊。

國民黨歷次提出的建議，都以各種不同的藉口給拒絕了。蔣委員長在七月十四日建議與毛澤東作一會晤，實際上已被拒絕。

在軍事方面，毛澤東和他的一批跟班，主張「保全兵員」的策略，這個意思便是停止戰鬥行動。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六日

毛澤東對待反對者的態度，愈來愈粗暴了。

有一次，在爭論中，有一個反對派的人提到一篇史達林的文章，毛澤東大聲叫出說，「這正就是你們一批『莫斯科派』的嘴臉——要是史達林放個臭屁，你們就準備去嗅着，崇拜着！」

但在我們面前，毛澤東却就歌功頌德，聲聲不絕的讚揚着史達林。得到史達林的垂青，將來對毛澤東是有很大好處的。

我和王明做了朋友。他害着胃病，正由奧洛夫爲他治療。

王震是三五九步兵旅旅長，兼延安城臨時司令員。這個年輕能幹的「指揮官」發動要共軍不斷作戰鬥訓練。他的部隊是「特區」最有訓練的。

王明的健康情形很壞。他的太太很擔憂。

王明現在由那些照料中共黨「中央委員會」領袖人物的中國醫生照顧着。

一九四二年十月卅日

毛澤東和他的一批人低估着蘇俄的軍力，高估着德國的成功。因此，他們所下的結論認爲，蘇俄可能失敗，從而拒絕由八路軍和新四軍對日作戰。他們暗示他們的看法，乃是不惜任何代價，保全兵員理論的正確性的又一證明。看來，甚至不惜賣國的代價。

毛澤東向我解釋說，在中共黨內的「經驗主義者」，都是一些出身工農、有實際經驗的

工人，他們以不同程度贊同「王明和博古的教條主義派」的見解。他講這個說話的時候，顯得非常生氣的樣子。

王明是中共黨「中央委員會」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也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委員。公開的攻擊他，便表示是輕蔑「共產國際」的路線。這個棘手情形，使毛澤東很生氣。要是換上一個對手，他早就已經把他幹掉了。

毛澤東簡直沒法容忍博古，特別因為後者對於毛「對黨的服務」從不表示重視，而且採取一種獨立的態度。

「教條主義」這個烙印，就可以不用正式攻擊「共產國際」的政策，而幫助解決了「王明博古派」的眼。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

晚上守着收聽收音機的時候，亞里也夫又講出了許多事，發了許多牢騷。

「從我們來到這裡以來，他們對待我們的態度，一直就是每況愈下，現在已經變成了敵視。最初還掩藏着，表演得很客氣的樣子。現在我們遇到的却是公開的粗野無禮的態度。康生是脫不了干係的。大家都怕他，都要儘量的討好他。」

「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們在我們身上打着算盤。中共的領導階層出動了來領受從蘇俄運來的最新軍火和其他裝備。接着偉大的愛國之戰（德蘇之戰）爆發了。我們紅軍的武器都已不夠。關係就馬上變得冷淡下來，在我們軍事方面的失利之後，更變得敵視和粗暴無禮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

史達林格勒！世界各地的電臺都在讚揚它的堅忍不屈的精神。

美軍已在北非登陸。通到柏林的道路還很遙遠。

關東軍正在等待時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毛澤東和「莫斯科派」在中共黨內的鬭爭，是在中國內戰（圍剿）期間開始的。

在那時候，博古居於黨的領導地位，李德（「共產國際」派給中共黨的顧問，德籍，原名奧托·白朗）是共軍的首領。

毛澤東利用在長征期間若干指揮官犯了的錯誤，把這些錯誤用來指控博古和李德，終於解除了他們兩人的職位，接下了軍隊的指揮，哄騙着朱德來執行他的意志。

他把總書記的職位給了比較順從的洛甫。

王明從莫斯科回來時，向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報告，需要實施與國民黨採取統一抗日陣線的策略。

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無異議的一致通過了王明的建議。

我們可以想到，從那一天起，毛澤東就把王明看做了第一號政敵。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康生，一八九九年出生於青島一個小地主和教師的家庭。中學畢業。

一九二四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二〇年入青島大學預科。自一九二〇年底至一九二三年，在諸城縣（山東省）一家農村學校當教師。後入上海大學。同時參加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所設黨領袖補習班。一九二六年後，先後任中共黨在上海的「中區」及「北區」委員會書記。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路軍到上海前夕，上海發生武裝暴動期間，曾領導工人進行巷戰。自一九二八年起——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江蘇省委員會」部長兼「稽核委員會」委員。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長。

一九三一年，由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四全大會」選為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兼「政治局」委員。任「中央委員會」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直至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康生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一九三五年任出席「共產國際」第七屆大會代表。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任中共黨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員。

我們開始明瞭毛澤東對陳雲、徐向前、李先念、陳昌浩所以仇視的原因。……他們曾目擊了毛在長征期間的「戰略天才」。……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四日

康生現任「情報局局長」，這個局將情報、反情報、司法、法院、檢察處和新聞處的職能，統統一把抓的合併在一起。至一九四一年，康生將「總指揮部」的許多職能也納入了它的工作範圍之內，使這個局變成了一個極有權力的機構。「總指揮部」的參謀長是葉劍英，這時多少便變成了有名無實的機構。

康生也是「黨幹部與非黨人員考核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的工作與整風運動結合一

起，取得了一種最邪惡的形態。

「黨幹部與非黨人員考核委員會」的委員——高岡、彭真、陳雲——全部都落入了康生之手，處於康生的影響之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俄軍的楔子，在德軍後方愈插愈深。但願法西斯軍會堅決留在這個大汽鍋裡就好了

公報報告了史達林格勒的直接保衛者第六十二軍的特殊任務。這個軍的軍長是朱可夫。此人也正是在最近以前，一直擔任蘇俄駐重慶陸軍武官的同一朱可夫。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

江青很友好。她常來找我們，請我一同去騎馬。

她本名李雲鶴，藝名藍蘋。

據她告訴我們，她在一九一二年生於諸城（山東）一個貧苦家庭。她的父親早死，母親出外幫傭。她的母親很愛她，憑她微薄的收入，供她女兒接受小學教育。

十七歲，她改名青雲，入青島省立中學。一九二九年，轉入山東省實驗劇院，決定從事演戲事業。

據一般所知，江青在她的事業中，一路都受到一些有力人物的幫助。

因此，在一九三四年，他隨富有的王敬（俞啓威）到了北平。在北平，認識彭真，就此

參加革命活動。

後來隨山東實驗劇院王藍田(譯音)教授去到上海。在一些愛國反日的影片中擔任角色。江青在做毛妻之前，已四易其夫。每易一夫，便使她在社會階層的梯級上攀高了一級。我們對她得到一個很確切的看法，並不是她要設法使我們得到的一種想法。

她的最特有的性格是極端的有所爲而爲。她排除一切障礙，不屈不撓的向上爬登社會上的光榮地位。她的心控制着她的情緒。她毫不容情的督促自己，她所唯一關心的便是她的事業。她急於要在她還年輕的時候達到她的目的。

江青在一九三七年隨同一批演員來到重慶。一九三八年，她在延安出現。當時她純粹以一個真正的電影明星，受到接待。現在她丈夫的秘密通訊，便都握在她的手裡。她知道他的所有一切計劃，很受康生的崇拜。總之，她主持着她丈夫的內政部。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情報局(蘇俄)的報告，講到一些意義重大的事：鹵獲飛機一〇五架，坦克一、五一〇輛，不同口徑的大砲小砲二、一三四座；俘獲納粹德軍七二、四〇〇人。在這些數字上面，毀去了的人員和物資該有多少！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二日

毛澤東對整風的想法是這樣的：

許多富農、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愚蠢的無產階級份子，混進了黨裡。他們甚至高踞在領導階層的職位上。

批評和自我批評，成了日常的基本工作。「教條主義」是一種危險的機會主義，必須加以徹底消滅。

遵義會議救全了黨——是這次運動的主要假定。

王明受到強烈壓力，要他承認「他的途徑的錯誤」。他堅不認錯，使毛澤東非常生氣。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延安對史達林格勒的勝利也表示了點意思。

我們被邀參加了「特區」政治工作者的會議。毛澤東發表了一篇冗長的演說。他再度設法說服每一個人關於整風的利害關係。

他呼籲共產黨人從事發展當地的農業，他說，「根據馬克斯的教訓，生活，為生活而奮

鬪，最要緊的是必須有些東西從這裡進去」——毛澤東指着他張大的嘴巴——「再有些東西從這裡出來」——他給大家看着他所指的地方。

一個文明行為的傑作！想得多深刻！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卅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些嚴重時機，揭開了毛澤東的政治面貌。爲了爭奪權力，他挑選了政治賭博的方法。這是事實。

他儘量的榨取他的「階級兄弟」。他絕不顧到「階級兄弟」流血而死。

所有我們的同志，大體都作同樣的看法。

尤辛承認毛澤東是犯了錯誤，認爲他是一個具有左傾偏差的共產主義者。杜瑪托夫·伐錫耶維契將中共黨的思想觀念鬪爭，解釋爲一種典型的爭奪權力之爭，再無其他意義。

一九四三

117

大正

一九四三年一月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

延安方面拍了個電報到重慶去，要求派一位有經驗的醫療學家到延安來。在發出這個電報之前，曾經發生了下面的一些事。

那家主要醫院的醫師，擬了一份電稿，講到王明的病，以及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蘇俄去醫療。

這份電報是在王明的健康激劇轉惡後擬的。他的病有了新的危險轉變。王明現在有了生命之危。他的肝和腎都已失去機能。他講到他頭痛得很利害，身體普遍的微弱無力。

在第一批一流醫學專家舉行的一次會議中，提出了需要電請 蔣委員長派一架飛機來接病人的問題。毛澤東把這批醫生擬好的電稿打了一個大槓，另外發出他自己起的一份電稿：請

重慶派一位有經驗的醫療學家前來延安諮商。

我決不能寬以對己。我必須祇把真情實事寫出來。我決不能對自己說假話，或是謀求妥協。不論我的報告是否會發表出來，以及我的報告在莫斯科會加以如何處理——都非我所關心之事。我的責任是在寫出真話。我對成千上萬在對法西斯主義鬭爭中死亡的人，有此責任。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

毛澤東的一批跟班，繼續用各種陰謀計劃包圍王明。毛澤東第二次拒絕了致電給 蔣委員長，儘管一些醫生堅持將病人立即撤離。

由於王明是「共產國際」書記處的一員，王稼祥和任弼時建議毛澤東先行採取措施，以防有何事故發生，不要等着迪米特洛夫（共產國際總書記）來出面干涉。

王明受了康生恐嚇，很怕我們去看他。他透過奧洛夫夫通知我，要我幫忙送他到蘇俄去治療，但要安排得使他不受毛澤東的報復。

我常常在想，太多的時候在想，毛澤東實際以反馬列主義出道，自己確立了，並且繼續鞏固了他作爲共產黨頭兒的地位。是的，奸詐、殘暴，但下一步會是怎麼樣呢？

所有這一切，當然並不那麼簡單。他的作法，有他的聰明處——事實上，比了他的那些反對者聰明得多。當然，並不是說所有的反對者。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九日

凡是到過蘇俄的人，在「特區」都被宣告爲「教條主義者」。

毛澤東甚至見都不要見到這些黨的工作人員。在他認爲，那些在蘇俄留學過的中國同志都是「教條主義者」，都是康生和其他整風頭兒施以惡毒懲罰行動的對象。

毛澤東昨天對我說，「全聯邦布爾塞維克共產黨的經驗，是不適於、而且有害於中國共產黨的。」這次會談時間很長，談得很不愉快，在他那方面充滿了很勉強的矯飾和生硬的阿諛之詞。……

顯然的，每一國家都有其自己的歷史與民族的特性，馬克斯主義的黨必須顧到此點，但不信任全聯邦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不重視它的經驗、甚之更糟的對一般同情全聯邦布爾塞維克共產黨的人施以懲罰，却就並非完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在政治方面的一種不成熟的跡

象，而是完全表示它對馬克斯主義的敵視。

毛澤東正在發動進行一次內戰。他完全不顧當前的政治情勢，一直在勉強加速事態的發展。

一九四三年一月廿六日

在工作人員舉行的新年年會中，毛澤東用痛恨的語氣，講到「教條主義」的活力，呼籲大家要盡力對付。

毛澤東宣稱，「中國共產黨目前領導階層相信，全聯邦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過去實施的整肅是錯誤的。必需進行的是現在特區正在進行的精神整肅。」

照毛澤東的意思，這就是每一個人必須公開承認自己所犯的罪。

毛澤東的目標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一向是並不符合一致的。現在更對中共黨與全聯邦布爾塞維克共產黨的關係施以重重的一擊。

任何與此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感情，便都受到了壓制。這樣一種政策的結果是可以很輕易預見到的：在中國共產黨方面，不能有其他比「毛澤東思想」更爲廣泛深刻的權威和「思想」。

一九四三年一月廿九日

「解放區」代表一幅離奇古怪的景色。中共軍事單位所代表的，也決不稍爲遜色。所有單位都在儘量的和日軍後方分遣隊做買賣。

到處都在進行非法的鴉片交易。因此，在蔡嶺（譯音），在最後方的一二〇步兵師的指揮部，他們分配到一座房屋，在那裏把原料加工，將製成的鴉片送到市場上去。

在陝西西北部，幾乎所有各縣都充溢了各式各樣的日本貨。這些日貨都是直接從日軍後方軍火庫提供的。

在一二〇師的師部裏，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行動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在商業的交易和利潤。

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某些指令所造成的結果。從這些指令，所有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單位，一律嚴格奉令不得對日軍進行任何激烈的作戰或行動。這包括受到攻擊便撤退，如果可能的話，謀取停火。

中共最精良的戰鬥部隊都已重加部署。他們離開了華北地區。新的地位是在「特區」。這些部隊都集中在對向西安的方向。

我確實知道，中央政府的部隊都住在原來的營房裏，駐在「特區」南部邊界一帶。

一九四三年二月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

我過去所下的結論，一點不錯。康生對毛澤東的心情，有着很強烈的影響。

毛澤東絕不注意於社會主義的實際問題。他對俄國情形，裝滿了一腦袋康生所給他的不正確的故事；在這方面，這是他所得到的資料的唯一來源。康生祇能稱做是一個佞臣。（原註：中國舊小說中在人民中播種死亡的臣子。）

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

爲了慶祝史達林格勒的勝利，我們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舉行了一個酒會。來賓有毛澤東、那個佞臣、江青、王稼祥、任弼時、……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

那個佞臣舉行了一個宴會回請我們。一席有七十道菜，沒法一一詳細記下。

酒和冷飲非常豐富。有冷盆、甘藍菜、鴨子、不同燒法的肉、海鮮、……然後是幾種香味撲鼻的湯。

在海參送上時，毛澤東便站起來，小心翼翼、一本正經的自己挑了一隻，就那樣的站在那兒吃着，那種嚴肅的神情，彷彿就像是舉行宣誓似的。看他那種吃相，實在是够瞧的。

康生的大師傅原是前宣統皇帝、現在傀儡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廚司。

毛澤東對每一個和他談話的人，都露出一個友好的微笑，他還教杜瑪托夫怎樣吃紅辣椒的方法：要把辣椒一直放到喉嚨口，然後吞下去，不能放在舌頭上。

毛澤東抽煙是一枝連一枝抽的。他把香煙捏在大姆指和食指中間。他也很能喝酒。

毛澤東那種輕視文化的態度，是很令人驚訝的，這說明了他的心地狹窄。他喜歡讓人怕他，他對這樣的人纔會喜歡。

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

前些日子，蕭立帶點惡意的問：「蘇俄正把武器供應 蔣委員長。這些武器已經交給了國軍部隊。這些部隊現在正在南面封鎖我們。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我說：「現在世界上有一個共同的反法西斯陣線。法西斯主義是所有一切國家共產黨人的主要敵人。法西斯日本正在蹂躪中國。現在對日作戰的主要軍力是國軍，他們在數量上要比八路軍和新四軍高出許多倍。」

「好吧，我們會對付我們的敵人的，」蕭立回答說。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

江青在所有政治方面幕後陰謀中擔任的角色，非常曖昧。我愈是想到毛——江——康的聯盟，下面的發展便愈見顯明。

康生在中共黨內，原是個沒沒無聞的人，他決心把他的事業和一個從重慶來的女演員連在一起。把江青介紹給毛澤東的就是他。毛澤東原已有過三次婚姻經驗，但他對性的享樂，仍有極大的熱情。

康生在江青身上下的賭注是下對了。江青和毛結婚後，他便一天天的接近了毛澤東，兩人之間便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由於野心和追求自私的利益，驅使江青和毛澤東互相密切結合一起。他們的感情則是由兩人臭味相投的天性促成的。毛澤東從江青身上找到了一個可靠的助手、顧問，和爭奪權力的同志。

奇怪的是，劉少奇來到延安，帶來了一個人，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江青的老相好彭眞。這一個注也是下在私人關係上的。

江青和毛澤東的婚姻，不僅使江毛兩人得了好處。還在那個佞臣，也有極大的收穫。也許對劉少奇來說，也是如此，他很正確的把賭注下在彭眞身上。

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原是違背了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的意志的。新娘竟是一個聲名大成問題的女人。但佞臣還是克服了大家的不滿情緒。

一九四三年三月

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

楊家嶺造了一座堅實的建築，專供「中央委員會」開會之用。星期六晚上和放假的日子便在這裏上演平劇。

劉少奇對平劇毫無興趣，不過，他常在臺上正在演戲的時候，拿了一些公事趕來。遇到這樣的情形，江青總厭惡地放大了聲音湊着耳朵說：「這個土包子又來了！」

「精神整肅」——每一個人都必須出來承認他所犯的罪。凡是留在蘇俄、以及和王明有關的人，顯然都是犯了反黨的罪。

佞臣規定低級幹部反對領袖幹部，播種互不信任的情緒，供應低劣的物質和日常生活環

境、使男人與女人，甚至和自己的妻子，都不可能有何往來，這種情形，引起了普遍的激忿。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四日

我的印象覺得，毛澤東跟李富春、王稼祥、任弼時三人，並不如何合得來。他們在一些很重要的問題上，如像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前線進行軍事行動的問題，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以及黨的內部生活問題等，過去原本是意見並不一致的。我覺得，現在仍然是不一致的。不過，整風手段對每一個人都發揮了一種恐怖的效果。這些在黨內最有權威的工作人員，寧可保持緘默。即使他們表示不滿，他們也決不公開的，或是在一次集會中表示出來。他們怕懼毛澤東，這就是他們所以決不鼓起勇氣來批評他的政治路線的原因。因此，毛的地位就漸漸的增強了起來。

「莫斯科派」受到了屈辱，其餘的人便祇保持着緘默。祇有康生和另外一些支持毛澤東的人，來塑造政治的意見。

所有這一切便造成了一種虛假的印象，使人覺得毛澤東正受到了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無異議一致的支持，他所採取的政策是決不錯誤的，雖然這個政策是違背了共產黨的政策。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在去年和今年作成的一些決定、毛澤東的演說、劉少奇的幾篇演詞，編進了「二十四項文件」裏，由毛澤東命令，大家必須把它念得爛熟。

幾部小說是必須強制閱讀的：三國志演義、紅樓夢、水滸傳。

閱讀小說。……這個看來似乎是毫無意義消遣時間的事，目的便是用來激起黨內的國家情緒。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二日

奧洛夫夫去探視了王明。

替王明治病的那個秦醫生開的藥方，送到一家藥房去時，負責配藥的藥劑師，對這個異乎尋常的配方，感覺到非常意外。那個照顧王明的護士也是這樣的說。

露莎·佛拉迪米洛芙娜（王明之妻，我們照俄國人的稱法，這樣叫她）立即找到開這藥方的醫生。秦醫生證實必須服這個藥，即使這個藥到了適當時候變了顏色（變成墨綠色）。

奧洛夫夫抄下了這個藥方，同時斷然禁止病人繼續服用。奧洛夫夫向我解釋說，這個藥方在

表面上看來是正確的，但時間一久，混合劑分解開來，便變得有毒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三日

毛澤東深怕這件事給「共產國際」公開揭露出來，便想設法「說服」王明。爲了這個目的，他「詳細的指示」任弼時、王稼祥和劉少奇，要他們進行談判。

王明以健康不佳爲詞，拒絕談判。不過，他宣布說，毛澤東推行他自己的政策，並未經過任何核准手續，來處理實際上所有一切黨的問題，以及他與國民黨的關係。

毛澤東建議在王明家裏舉行「政治局」會議。後者也拒絕了。但是因爲一些醫生堅持，王明必須住進一家醫院去長期治療，毛澤東終於讓步，決定派王稼祥以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的正式報告人和王明的反對者的身份，陪他一同到莫斯科去。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五日

莫斯科發來的一個電報說：「配方正確，但有某些足以爲害健康的偏差。如保持相當時間，甘汞便分解成爲昇汞和水銀。……如果長期服用，這樣一種分解了的藥，便會使人慢性中毒，最後造成汞毒。如情形嚴重，就會因嚴重貧血死亡。」

毛澤東採取了最有力的措施，來保護自己，不致為「共產國際」所揭發。一個措施是把黨各機構的領袖工作人員，集合在他身邊。毛澤東希望依賴周恩來的幫助。這就是他堅持要把周召回到「特區」來的原因。周是中共黨常駐重慶的代表（我想他是和董必武共同擔任這個職位），一直沒有離開過重慶。毛澤東在他的部屬中，表示了一種意思，使大家可以得到結論認為，他絕不懷疑周是充分支持他的政策的。

毛澤東對王明表現了一種特別的態度。毛對他的態度，已到了痛恨的地步。王明也許是他在黨內達到不受控制的權力的最大障礙。現在，康生和毛，以及所有支持他們的人，便都出動全力，來孤立王明，造成一種印象，王明在黨內是勢孤力單的，王明的見解，對中國革命，也就是對中國共產黨所有的國家特性是不合的。關於這一點，雖然至今還沒有公開表示過。但康生和毛的活動，特別可以看得出來。否則，洛甫的突然東山再起，又該如何解釋？洛甫是王明思想觀念的追隨者。總之，洛甫曾贊同「共產國際」的活動。他是那些在遵義會議中遭到毛澤東打擊者的一個。的確，他現在仍居有一個很重要的職位，這似乎是很難解釋的。毛保留着洛甫顯然是有某種原因的。不過，在這次的運動中，洛甫實際上還是以一個「教條主義者」受到了斥責。

這便是毛的一套作法：洛甫受到了特別客氣和重視，他們繼續不斷的把各種有關王明的壞事，灌進他的耳鼓。

他們寬宥了洛甫的一切——他的「教條主義」，他的頑強不妥協。

在此之前，佞臣曾把洛甫驅逐出境，趕出了延安，唯一的目的是在分裂「莫斯科派」，孤立王明，一個一個的使他們所有的人感到威嚇困惑，無所措足。

現在，毛和康生便要利用「莫斯科派」份子，來幫他們粉碎王明的思想觀念。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六日

王明服用甘汞，約已半年。結果，他的肝和腎都出了毛病，牙齒開始脫落。秦醫生敦促他的病人，要在這個配方的藥，剛好在顏色變成墨綠色時服用。

這個藥方傳到了中共黨「中央委員會」醫務處處長傅醫生的手裏，他說，以如此劑量的甘汞，用如此的配方是最毒的。

傅醫生立即將這件事報告了「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八日

因此，便產生了「處方事件」。

晚上，江青突然悄悄的來看我。他講了很多話，講到「秦醫生的不可靠，他也許是一個國民黨的間諜。……」

但，儘管毛和康生採取了一切的手段，他們在黨的一些主要機構中，還是沒有得到他們所希望得到的一致意見。就連像劉少奇這樣一個極有地位的人，對於「黨幹部與非黨人員考核委員會」所採的手段，顯然也很生氣。他認為這個由康生領導的委員會採取的手段，從黨的政策標準來說是不容許的。這裏應該註明的是，劉少奇甚至並沒提到毛的名字。

他親口對我說，他認為對王明和另外許多同志提出批評是不對的。

劉少奇勸王明，堅持把這個問題，在「政治局」的會議中提出來討論，連同對這個委員會，以及委員會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動，進行一個分析。

一九四三年三月卅日

康生邀請我們去看三個國民黨間諜——三個滿臉病容的瘦弱孩子。

尤辛說，這樣一種「表演」，以前就曾搬演過。中國共產黨採取這樣一種手法，爲了使

我們深信，他們的反國民黨宣傳是正當的。

尤辛斷定這三個孩子一定會給槍斃。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需要用來證明國民黨的陰謀計劃。這三個孩子究竟是否真是間諜，這在康生是一點也不關心的。有效的表演，那纔是真正重要的。

一九四三年四月

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

毛澤東和康生斷定，我們已經知道了那個預謀毒害王明的「處方案件」的內幕。……

這就迫令他們放棄了謀害王明的念頭：那些中國醫生固然可以加以威嚇，不許聲張，可是對於我們怎麼辦呢？

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

在博古和我所作的一次談話中，他對康生用了一些激烈的字眼。他稱他是中國共產黨「一個在政治上的外國人」。他對康生所引用的監視制度，非常激怒。

博古用並不如何徹底隱藏的不滿口脛，講到劉少奇。

原來劉正激劇的改變了他的見解。他儘量的和康生拉關係。他甚至設法討好他。這顯然就是劉少奇所以還留在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新的書記處的原因。書記處的書記人數已經減少。毛澤東希望對黨內所有比較高級的機構，能作有效的控制。書記處現在包括劉少奇、任弼時和毛本人。我並不認為這就是最後的選擇。現在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的這個機構中還祇有三個人。……

一九四三年四月九日

關於「幹部在精神方面實施整肅」的運動，必須有所行動，加緊推行，並免除其所有的罪責。因此，毛澤東便提出了一個新的論旨：知識階級需要實施整肅。當然，並非整個知識階級，而是在一九三八年以來一直留在這裏的那一部分。毛澤東認真的相信，信任這些同志是很危險的，他認為他們應該先加以思想觀念的改造，然後再交給康生的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裏，一個一個的指出那些不同思想的人，施以集體改造。很自然的，毛澤東的一批跟班也都抱着這個見解。在中共領導階層中，誰也沒有因為想到在那些老幹部（在西竄中來到延安的人）中，現在還活着的，已不過幾百個人，那些新來的至少便有三萬人，而感到退縮。毛澤東把這少許幾百老幹部，看做是他「自己的」人。這樣一來，就把餘下成千上萬的

黨工人員，列爲非法。他們便能、並且應該加以懷疑、考驗和改造。

於是，所有在西竄以後來到延安的人，便都陷入了極端危險的地位。由於毛澤東的這個最新的命令，結果便產生了一片逮捕之風。

問到康生關於這種逮捕的事，他很明顯的不願談到這個問題。不過他說，這個「孤立國民黨和日本人的嘍囉的命令，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階級發出的。」

逮捕之事，正以有計劃的方式繼續進行。一個個人在半夜裏給帶走。

在毛澤東發表了關於知識階級和幹部工作人員，在政治方面不能信任的談話之後，每一個人便都給看做了是一個國民黨的間諜，或是日本人的間諜。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

王明很不滿的講到康生在莫斯科時的情形。在莫斯科，這個未來的佞臣原屬王明部下。他極力的討好他，討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員。

王明講到在那時候，康生在所有的會議中，總是第一個跳起腳來，熱烈地鼓掌，瘋狂的大聲叫喊「……萬歲！」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三日

整風和「間諜」的逮捕，在延安愈來愈加了普遍的緊張。

蔣委員長建議透過會談來解決各種爭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却陰謀破壞了所有一切來自重慶的建議。

抗日統一戰線並不表示是拒絕馬克斯主義的思想觀念，而是確定中國共產黨在當前階段革命中所有的正當地位。共產黨的合法化，便可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宣傳的活動，敞開廣闊的機會。然而黨的領導階層，却傾向於對國民黨發動一次武裝的衝突。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八日

毛澤東說，「教條主義」必須加以粉碎，黨相信他的意見，使「教條主義派」完全停滯了沒法有所活動。

毛澤東的實力，並不在他在這個鬭爭中，絕不厭棄的使用一切手段，而是在於他的徹底了解中國農民、小資產階級、人民的風俗和習慣。「莫斯科派」便談不上這一點，他們往往都是過份的純理論家，儘管他們都是誠意獻身革命的。

毛雄辯地顧到國家的特有性質，這就是他之所以能彈性地、狡猾地偽裝起來。毛玩弄着由於外國壓迫受到創傷的民族情緒，而以馬列主義的地位來作投機。

一九四三年五月

一九四三年五月七日

莫斯科轉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議，解散「共產國際」組織，並呼籲「共產國際」之一切支持者，集中於全力支持，並積極參加，反希特勒之人民與國家所進行的解放戰爭，早日擊敗勞動人民的敵人——德國法西斯主義及其盟國和屬國。

一九四三年五月廿九日

我原本預期，「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對毛派的人將會成爲一件非常高興的消息。但實際情形，却超過了我最大胡思亂想的猜測範圍。

但不管好壞，總算來得恰當其時。

一九四三年五月

一一九

毛澤東一接到「共產國際」決議解散的電報，便立即召集了所有「政治局」委員。他們都爲之大感震驚。

這個電報對毛本人却未引起迷惑或推測——他把這個問題早就都想過了。

這次「政治局」會議由毛澤東任主席。他唸出了這份電報。他說主席團的決定是完全正當而正確的，因爲「共產國際」作爲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機構，早已超過了他應有的壽命，因此，由於它誤解中國共產黨活動的本質和特性，便一直都在干涉這個活動，損害了這個活動。

一九四三年六月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日

共黨與國民黨的關係，顯然將會激劇惡化。因此，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定解散這一國際組織前不久，便會由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發出了一個重要的電報。

除了其他之事外，這份電報建議毛澤東和中共黨整個領導階層，對他們抗日統一戰線的夥伴，儘可能的保持認真的正常關係。然而在上次中共黨「政治局」舉行的會議中，却就根本沒有提到共黨對國民黨的政策，對單一抗日集團的態度，以及對日本法西斯主義者聯合抵抗的明確性質。

我們可以預期，一種暗中破壞與國民黨聯盟的策略，將會成爲中共黨領導階層的正式路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這份電報的命運，便可舉爲例證。依照一向的慣例，他們對這

個問題，通過了一個自己的決議案，下令共黨所有一切軍事中心，切勿對中央政府的部隊採取任何行動，並絕對禁止採取獨立行動，以避免與國民黨發生衝突。

當然，這和毛澤東的見解並不一致。在這次會議過後不久，毛便下令勿將此一全面保持與國民黨正常關係的決議，發給各基地。這個決議案隨後即宣告無效，加以廢止。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五日

祇要利用馬克斯主義能保證他登上權力地位，毛澤東便在表面上表示接受這個主義。但馬克斯主義還沒有開始限制他的權力時，他便對馬克斯主義宣了戰。截至目前，一直還是一種秘密的戰爭。……

他覺得要經營一個黨，他的實力、智力和文化，都屬不夠。「教條主義」（在毛澤東的看法）譴責他不斷的渴求權力，而這一點是他所不敢容許，也是不會容許發生的。

消滅「教條主義」，即在由毛澤東來控制黨，使所有黨員都像軍人一樣的服從於他——這就是整風的目的，也就是「七全大會」不斷延期舉行的幕後原因。毛澤東以國家主義，連同一種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的假革命熱情，來摧毀馬克斯主義。我們在十四個月過程中歷次的會晤，使我對他有了了一個充分的觀念。他的學識都是假的。在這後面是一片空虛。

一九四三年六月廿二日

蘇俄獨力支撐，對希特勒作戰，已進入第三個年頭。

德軍數百師，在俄國境內作戰。從巴倫支海一直伸展到黑海的龐大前線，數百萬人陣亡戰死。

一家日本電臺的播報員講到盟國已有多次空襲日本三島本土。

任弼時談話時，現在祇是談着他的疾病，需要到蘇俄去醫療。至於政治問題，他顯得毫無獨立主見。他一切都表示附和毛澤東。……總之，一個機會主義者，再無其他。……

朱德對蘇俄的人，仍很友好。他準備做一切的事，唯恐得罪了他的客人或朋友。他和毛澤東不同，並不拘泥形式。他玩排球、態度很隨便，並不怕因此失去了尊嚴。他並不在乎跳舞，或是跟一些朋友玩玩紙牌。……

現在他也正受到了「精神的整肅」。……

一九四三年六月廿五日

最近正在逮捕國民黨的間諜。在這兒究竟有多少間諜呢？

究竟是誰給了毛澤東這個懷疑任何共產黨人犯了叛逆嫌疑的權利？究竟是種什麼權利，享有最高智慧的權利？這種自稱爲絕不錯誤，這種以導師自居的情形，實際表現了在每一言行中。

對於這種沉迷於自己的智慧的人，是多麼難於應付！在那種客套、假紳士的姿態、以及溫和的談吐中所包藏的殘酷，該是多麼的險詐！

一九四三年六月卅日

康生對所有有問題的人物，表現了一種特殊的態度。這裏有種印象，在「特區」，祇要能尊重康生，即使是真正的日本間諜，或是其他方面的間諜，也都不會有危險的威脅。多少各種可疑的人物，都得到中共黨領袖工作人員的深信和保護。但忠實的共產黨人却不在這個佞臣所主持的局的喜愛之列。

黨、軍、行政機構的工作都變得癱瘓下來。到處顯得一種敵意和相互不信任的氣氛。康生委員會的壓制活動，當然激動了整個的黨。

康生在黨內很不得衆望，但他也在黨內安插了他的人。秘密報告和在集會中透過「揭發

演說」提出指責——這便是中國共產黨的整個黨內生活。

中共部隊放棄前線，移入與國軍接觸的地區，在重慶爆發成爲一個政治的醜聞。

中國的許多組織，要求將「特區」和中共的部隊，無條件的移交中央政府控制。重慶各界忿忿的談着共產黨的背信，把國家拱奉日本佔領者。然而在「特區」，却正以更爲無情的態度，煽動反國民黨的情緒。

一九四三年七月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

林彪，前一一五師師長。他曾到過蘇俄多次。他現正參加起草軍事改革方案。

有一時期，林彪對康生委員會的工作，曾表不快，依附於王明的反對派。但，後來他顯然明瞭毛澤東的實力和他所採取行動的背景，從此便保持緘默。他被派到朱德的參謀部，但並無職位。他正在找尋機會，與毛澤東和康生修好。

林彪一九〇七年出生。黃埔軍校畢業。北伐期間，曾任營長。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博古受有良好教育。冷靜沉着，爲人和善。他的一口土語，一聽便知是出生北方的人。

我們單獨一起時，他總會激烈的批評着「特區」的政權，痛罵毛澤東，敏銳的提防着毛在手中所握有的權力。

一直總是顯得心裏很怕懼。我們在談話時，他總是小心翼翼的望着四周，甚至一次一次的走到外面去，祇怕有人在竊聽。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到處流傳着驚人的消息，說是國軍部隊已在「特區」以南集結。

情勢的確變得十分嚴重。我們已在收拾行李，準備把我們自己的東西和無線電臺作緊急疏散，把沒法搬動的設備加以炸毀。

毛澤東、康生和另外一些人，不希望把他們的家醜外揚出來。他們着急，並不是完全無稽的，因為這批蘇俄人是中共黨領導階層政治活動的唯一目擊者。

蕭立毫不顧忌的表示不希望我們再繼續留在延安。

因為我們是對這兒所發生的情形一批並非志願的目擊者，因此，我們便成了使中共黨領導階層深感激怒，束縛了他們的活動的重大根源。他們以一種屈辱我們的尊嚴的方式，使我

們明瞭這點。我們受到了跟蹤，阻止參加社交生活，對我們散佈着流言誹語，供給我們很少一些在當地報紙上見過的消息。

紊亂和驚慌，籠罩了延安。每一個人都預期國軍和一些地方軍的部隊，即將進攻延安，雖然後者（國軍和地方軍部隊）寧願對日軍作戰，而不願冒進攻延安的危險。

我們給邀去見了毛澤東，他講了許多關於愛國精神，關於中共黨效忠統一戰線策略，關於國民黨「破壞中國人民解放奮鬥」的陰險政策的話。

突然之間，他記起了「共產國際」，告訴我們說，「這個無產階級政黨的軍事聯盟機字」，雖然已經解散，但在這嚴重的時刻，中共黨的領導階層正寄以厚望，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忠實友人」迪米特洛夫同志，能夠出面干預。

遵照毛澤東的命令，已在籌備召開一次集會。爲了這次集會，印刷了大批傳單。用日印區出，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停止在「特區」周圍集結部隊，並將國軍前線的部隊從前線調到「大構黨」邊界。此外還有一些呼籲和口號，要求強惡聯合抗日集團，擊敗法西斯野蠻活動，和本對特的咒罵。

大批這種呼籲，在集會尚未正式揭幕之前便已送到。我取了一份這樣的傳單，以備將來的參考。在這薄薄的半透明紙上，印着向國民黨呼籲的全文。文內稱任何可能爆發的內戰，都是犯罪的，不可准許的。

所有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都參加了這個集會。所有領袖黨員都登臺發表了演說，祇有毛澤東一個人顯得冷落在一邊。演說者一個一個猛烈譴責日本侵略者，誓言支持重慶 蔣委員長領導的中央政府，然後每一個演說者突然提到他們過去所受 蔣委員長的不公正待遇，這些是用着哭喪的聲調講出的。所有的演說者向 蔣委員長保證，在「特區」，沒有一人，連想都沒有想到，要發動一次內戰，「特區」所有一切的軍力和資源，都將用於對抗日本侵略作戰，八路軍所有的單位都將加強抵抗，都將堅持不屈，保衛鄉土。這次集會，也有一些農民、工人、和兵士，發表了演說。

我立即發了一個電報給莫斯科，講到「特區」南部邊境的嚴重情勢，需要採取緊急的措施。唯有藉蘇俄的迅速干預，纔能防止「特區」的潰敗。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

顯然爲了與我們修好，中共領導階層意外的邀請我們參加黨特工人員在楊家嶺舉行的一個集會。我們接受邀請，我和尤辛一同去到楊家嶺。

那座大會堂擠滿了約有一千個共黨黨員。這次集會由彭眞揭幕，他向這批共產黨員講到這次情勢的嚴重性，他說，有大批「國民黨間諜」（註：原文加框）已經暴露，並已逮捕。

「特務部沒法抓住大批來到延安的所有間諜人員。因此本部呼籲共黨黨員，大家要幫助這件非常重要的事，」彭眞說。講完之後，便有幾個表示悔悟的「間諜」，魚貫走上講台。他們講到他們所做的活動，大半聽來都很愚蠢而幼稚。他們懇求寬宥，立誓他們將忠心地毛澤東領導下的八路軍中服務。

總共一起，有十二個這樣的「間諜」，向大會發表了演說。

彭眞講出了如何辨認國民黨間諜人員的方法，接着說，凡是坦白講出來的人，都可釋放不究。

彭眞高高的個子，顯得特別觸目，他漲紅了臉，看去就像一個屠夫。

其次發表演講的是康生。這個「情報局長」充滿了火氣。他露出了前面的一排牙齒，瘋狂的揮動兩手，大聲的叫出：

「你們完全明白知道，你們有許多朋友已給抓了起來！你們一離會場之後，你們會發現

在你們中間又有許多人不見了。如果今天在這兒出席會議的，其中有許多人給幹掉，你們不必感覺到太驚奇！」

接着康生開始請參加這個集會的，以及在延安的所有共產黨員，保全「特區」，不致受到間諜的破壞。

「你們在這兒所有的人，都是替國民黨做間諜的！」康生嘶喊着。「你們爲什麼希望要毀掉我們？我們那兒待錯了你們？你們什麼都有：住的地方，吃的口糧？……你們爲什麼要我們死呢？悔改，我們就會寬恕你們，不過，你們也必須記得，悔改並不永遠都是誠意的！……而那種再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康生的演說，有一種恐怖的效力。一片沉重壓迫的靜寂，降落在大會堂上，降落在顯然可見受了驚恐的聽衆身上。

大家突然深深領會到，這個「情報局長」掌握着多大的無限權力，領會到要是有人膽敢提高了嗓門來爲真理辯護，將會遭遇到如何的結果。

彭眞剛要宣布大會結束，朱德突然走上了台。從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這次黨「工作人員」的集會，他以「政治局委員」的地位，還是初次知道的新聞。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在這次大會之後，我就應該不要信任我的朋友和親密同志嗎？」

朱德用平靜的聲氣問。「這是不是說，從現在起，我就應該在擔心逮捕的心情中生活，或是預期看到我的朋友遭到逮捕呢？你好大膽居然敢用這種方法來對待黨的工作人員，黨的最優秀的人員，黨的主力？」

朱德猛的轉過身去，回到他的座位上。

彭真宣布大會結束，那些共產黨員便都默默的散去。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

朱德奉毛澤東之命，發了一個電報給「特區」以南國軍地區副司令胡宗南：

自閣下巡視洛川宜川間邊境後，本地區之情勢，已瀕戰爭狀態。謠言流傳，中央政府有意乘「共產國際」解散之機，決定對中國共產黨作一最後解決。又據謠傳，大批部隊已自黃河以南地區，向西移動。大量軍火與糧食，亦正向此方向輸運。內戰威脅，已迫在眉睫。

在此解放作戰嚴重危急之時，必須加緊我們的團結。內戰勢必極大損害於解放戰爭及鞏固國基之大業。此則唯有日本可以坐收其利，而我們自己的國家，必將處於危殆之境。

此亦足極大損害於我盟邦——英、美、蘇俄——之軍事目標。

貴軍部隊之發展，顯示閣下正準備對我發動攻勢。此種發展，實令敝方深滋驚詫與迷惑。

尚祈

見覆爲盼。

朱德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

莫斯科採取了措施。

國民黨領袖宣布，他們並無意於侵犯「特區」。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九日

出席大會的代表，都早已來到。整風不僅在精神上鎮壓着毛澤東的反對者，使整個黨反對着他們，而且用意在把他們圈進某種思想範圍之內。……現在可以合理的預期，在大會揭幕之前，他們大家都已「在精神方面受到了整肅」。

一九四三年七月廿日

過去一年來的發展，業已有了預期的，亦即合理的結果。「政治局」賦與了毛澤東無限的權力。自今以後，毛在書記處有了最後決定性的一票。這就是說，毛對一切的事，都有了最後發言之力。他決定什麼，便可實現什麼。事實上，現在黨內各機構都已遵循他的想法，來執行純粹技術方面的職能。

反國民黨運動在延安已產生了成功的結果，毛澤東多少達到了他的目的。第一點，他終於把八路軍的大批部隊調到了「特區」。他們從黃河東岸悄悄移入，在邊界附近部署陣地。毛澤東知道危險時期已經過去，中央政府不會冒險來對反國民黨的宣傳運動實施報復。另一波的反國民黨歇斯底里。毛澤東設法儘量利用現有的情勢，他採取行動，相信在必要時，莫斯科自會從中插手的。

現在便對重慶中央政府大肆謾罵起來。

毛澤東把最近與國民黨的衝突，公開的記爲他自己的功勞。他說，對蔣委員長是老早就應該採取堅定立場的。他堅持說，要是老早採取了堅定的立場，新四軍的崩潰也就可能避免了，而且還可能佔取一些政治上和物質上的便宜。因此，反國民黨的政策，便被宣布爲正

確的，必需的，而毛的所有行動，便都被稱爲是一種具有遠見的分析。

毛澤東說，在此情勢中，「共產國際」的策畧是短視的、不切實際的、脫離了中國的具體環境。

這些談話，意思便在毀譽中共黨國際派。在黨的眼中，洛甫、博古、王明、以及其他「共產國際」的支持者，便都是失敗主義者。

毛澤東跟我面對面的講到這點。他嚴厲的批評「教條主義者」對國民黨採取投降政策，大大的傷害了黨，稱他們是短視的理論家。

毛澤東向我詳細說明他的看法，是要給我一個印象，希望把這個印象，傳到莫斯科去。他希望把我帶進他的看法，讓我受他的影響。因此，我就可以透過他的眼睛，來看各種的發展。

他希望莫斯科相信，他的行動祇是將馬克斯主義切合實用的應用於具體的現實，因此信任他，支持他。他的坦白直言，是要從我口中引出同樣坦白的反應。因此，他希望知道莫斯科對他的政治「路線」，作何看法，他究竟可以做到如何程度，來壓制中共黨內的國際主義者，而不致引起了懷疑。

想到這些事件，我又得到另外一個結論：毛澤東正在耍弄一個遠程的政策，設法在「七

全大會」之前，造成一種適合於他的陰謀計劃的氣氛。而這是最重要的事。……

毛澤東的一切活動，便都是朝着這個方向去做。舉例來說，他把洛甫、博古、周恩來、王明、王稼祥、陳雲、康生，都調離了「政治局」書記處。毛在「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中取得了這個決定。因此，毛在書記處不僅調去了他的反對者，而且也調去了他的支持者。此舉幫毛掩蔽了公開的排除他的政治反對者，因為就在這同一會議中，在毛的壓力之下，組成了一個新的三人書記處：任弼時、劉少奇和毛本人。

一九四三年七月廿三日

中共黨的頭目們儘量利用由於與國民黨發生衝突所造成的情勢。特區的行政、軍事、和黨的機構，每天都在搜捕國民黨間諜。

在此作業中，康生用了一批社會工作者來幫他工作。集會又集會，這些社會工作者敦促所有日本和國民黨的特務人員要坦白招認，威脅他們說，不然的話，他們是要砍頭的。這種集會簡直不是這個名詞通常所有意義的集會，而是一種神志不清的瘋狂祝禱儀式。每一個人都需要傾聽着那些整風頭子似懂非懂的謔語。

今天大約有六百人被迫招認。悔改的人數一直都在增加。一羣一羣的人自認他們所犯的

罪——大半都是一些學生和小職員。……

整風的下一階段便要暴露中共黨內中間一環的「間諜」，然後是黨的領導層。因此，毛澤東便把黨內的「教條主義」與叛逆和向國民黨屈服視爲同一的事。他發動民衆來反對「教條主義」，顯然要連他們的肉體一同加以摧毀。

毛澤東帶着很滿意的神氣告訴我說，他打算把整風一直進行到明年。

延安一陣自殺之風，迄未稍戢。

這個「城市」看去就像是一個集中營。現在已經接連第四個月，誰也不准離開辦公室或學校。那種鏑住人民的縛手縛腳的紀律，就等於像在牢獄中一樣。

許多被捕的人釋放了，但凡是屬於「教條主義者」，或是那些「沾有一點同情蘇俄的聲名，與王明或共產國際有連絡，……」的人，却沒有一個能夠釋放出來。

一九四三年七月廿四日

王明顯然中了毒，毛澤東和康生是都有干係的。中共黨國際主義者的頭兒，「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一個受到「共產國際」敬愛的人，是不可能加以公開殺害的。不過，據毛澤東說，時間的壓力很大。目前的情勢有利於剷除反對的人：全世界正有一個瘋狂的戰

爭，「共產國際」已解散，延安地處偏遠，鞭長莫及，誰也難以管到。……

一九四三年七月廿九日

整風運動顯然是在使黨成爲官僚化，以便把每一共產黨員的熱情和創新力減低至零。中共黨的頭目們，設法給他們注入基於恐懼的盲目服從觀念。恐懼、恐懼、再是恐懼，總括起來，便是延安的一般氣氛。

康生的嗶囉們竟是那麼的殘暴無情，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他們連孕婦都要逮捕。這就使我想到他們的道德觀念。

我們並不需要精密的觀察，就能看到，他們在人生哲學方面都是一丘之貉，就像性慾衝動一般的粗野原始。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大半人都沒有一點實際成就的功績。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文化落後的庸庸之輩，腐化而在知識方面一肚草包的動物，竟在這兒各種不同懲罰機構中擔任職位。他們隨時準備着手暴力行動，干犯偽證之罪，執行死刑，寫出譴責文字，來保證他們能獲緩步的，但繼續不斷的昇遷。更重要的是，保持他們過一種超乎貧窮的生活。卑鄙無恥是空的東西，但它却比了其他任何東西更加緊緊的與鬚足和歡樂黏貼在一起。

一九四三年八月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延安非正式的實施了戒嚴狀態。所有辦公處和教育機構都加上了柵欄，警衛守在門口。已婚男子以逮捕加以威脅，嚴禁與家人聚晤。任何兩個人私下談話，也有顯然的危險。

許多「暴露身份的人」，奉令留在他們擔任工作的場所，因為在牢獄中已沒有足夠的牢房。

不同的機構，經由康生局中派出的特別信差，互相傳送公事。

到處都在對「暴露身份者施以改造」，對不久即將輪到改造的人，則施以嚴格的思想教育。毛澤東承認，他對這個運動寄以「特別重視」。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劉少奇正在調動中共黨各主要機構的人事，如果沒有經過毛澤東的同意，是決不會這樣做的。

在康生機構中的工作人員，百分之八十都承認犯了間諜之罪。

全城籠罩了一片喪家似的沉靜，到了晚上，萬籟俱寂；聽不到一個聲音，沒有笑聲，沒有燈光。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

「中央醫院」的工作人員，十個中間有九個給指控犯了間諜活動，奧洛夫夫給楞住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廿一日

在許多機構中，百分之一百的人員，暴露了國民黨和日本「特務人員」的身份，所有其餘的機構，也不少於百分之八十——康生真會造謠。

因此，在一批精選特挑的黨幹部中，却有百分之九十是「間諜」。多麼令人痛心的諷刺！

劉少奇是毛澤東構想的直接指揮；任弼時是技術執行人；康生是報復人。

一九四三年八月廿六日

一架蘇俄飛機來到延安，打破了延安的日常生活。久病沉疴的王明，必須撤離，但毛澤東設法冒此危險。一些醫生一次又一次的給召去會見行政主管。這些主管要他們說，王明病勢嚴重，王稼祥身體也不很好，他們兩人都沒法受得住飛行的勞累，他們不應加以打擾等等。

一九四三年八月廿八日

博古說，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繼續不斷雪片似的給莫斯科發去了大批電報，偽裝起現在「特區」和中共黨內的實際情況，歪曲整風的真意，對重慶關係的策畧，以及與王明不和的性質。

毛澤東要不是因為希望將來能得莫斯科的協助，要不是因為怕國民黨，他早就和「共產國際」過去那些領袖斷絕關係了。毛澤東因為希望和國軍一戰，他便計劃着要把蘇俄牽入進去，用這個方法來解決中國的權力問題。

在目前這個階段，「中國革命」最重要的，必須首先針對外國敵人和奴役者日本帝國主義。但這些在毛澤東看來，都祇是空話。……

一九四三年八月卅日

王明留下了在延安。蘇俄飛機的機上人員把起飛日期儘量拖延，但毛澤東最後還是得遂所願。

康生現在可以喘一口氣了。王明交給了他負責監視，表面上是說，爲了保護他不致受到傷害。

「解放日報」刊出一篇關於中央政府部隊和中國共產黨部隊參加對日作戰的資料。這種比較資料的發表，還是初次第一回。這個做法是有斷然目的的。據我所知，毛澤東正在極力設法和美國人取得聯絡。這些也就是毛澤東下令供給重慶美國大使館的資料。

依照這批資料，現在中國境內所有全部百分之五十八的日軍部隊，和百分之九十的土匪傀儡部隊，據稱都已爲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部隊牽制住。這個資料，最低來說，是太過誇張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

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

在今年七月以前，周恩來一直都率領中共黨的代表團，駐在重慶。爲了他効忠於王明集團，他已解除了這個工作。在過去幾星期中，他一直在發表悔改的演說，矢誓盡忠「毛主席」（註，原文卽已加有引號）。

除了王明和其他若干同志外，「悔改流行性病」，傳染到了所有黨工人員和中共黨的軍事頭目，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批評。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

從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一直都在舉行會議。

從最初一開始，毛澤東就為這個黨的最高機構，訂定了工作的範圍。他在第一次會議中說，「共產國際」已由執行委員會的決定，實行解散，它已不再存在，不再成爲一個機構，因此，現在便不必再要小心注意，把事情隱藏起來，等等。毛澤東強調這些事實，敦促聽衆要把心裏要說的話公開的說出來。

周恩來提出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大報告，講到共黨在全國抗日戰爭期間（從戰爭開始到現在）的政策。

毛澤東的呼籲得到了反應。這次的辯論顯然針對兩個主要的方向：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保全了，並增強了共產黨，而博古、周恩來、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却是分裂了黨，威脅着黨的毀滅。

這個運動也因纏綿病榻的王明，並未出席會議，無法發言，爲他自己辯護，因而益見卑鄙。這是毛澤東有意採取的手段——你們並無特別理由，需要擔心，你們都是因爲「共產國際」支持者王明把你們引入了歧途，他是罪魁禍首，他使你們受到了迷惑，使你們處於不安的地位。毛澤東的這個手段便分化了國際主義派。這個手段解除了他們對於黨所負有的一切道義的和政治的責任，而他們也就放寬了心，立即表示了支持。

毛澤東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把王明孤立了起來。同時，他把王明過

去的那些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邊。

一九四三年九月廿二日

「政治局」任命了任弼時爲「鴉片問題專員」。除此之外，毛澤東常指示他爲我們作各種的傳話。

要把「特區」所有生產鴉片的真正規模隱藏起來，是不可能的事。鴉片是當地貿易的最重要的項目之一。任弼時設法在這個「業務」之下，建立一個思想觀念的基礎。從一次沉悶的長談中，終於使我明白，與毛澤東的談話正好相反，特區的財政經濟情形，極爲嚴重，貨幣激劇貶值。財政工作，一天天的愈來愈困難。發行紙幣，已達美金六百萬元之數！但這還是沒法改善經濟的情況。

任弼時詳細的講到經濟的困難。在「特區」，所有的人，包括我們在內，全都感覺到了這種困難。

「政治局」曾討論了經濟困難的問題。最後終於想出一個相當原始的方法。「政治局」核准加緊發展「公營鴉片生產和貿易」。同時，作爲一個立即的措施，決定在一年之內，至少以一百二十萬兩鴉片，供應中央政府地區各省的市場（稱爲對外市場）。

鴉片大部分將由軍隊來處理。主要的供應者是賀龍一〇二師的地區（該區早就一直都在經營這個生意）。

同時下了一道命令，從事大規模的鴉片生產。鴉片體積不大。把鴉片運到延安，或是「特區」境內的其他指定地點，再從這些地方送到中央政府地區各省，以高價售出，並不困難。

任弼時最後的結論說，毛澤東知道，種植鴉片，加工製造出售，並非很好的事。但據毛澤東說，在合適的情況之下，鴉片要負起一種打前鋒的革命任務，如果忽略不做，那就是錯了。「政治局」無異議的一致支持毛的見解。

任弼時設法領導我走上一個方向，使我能對毛澤東的「鴉片政策」，有一「正確」的瞭解。任弼時要求蘇俄的新聞記者明瞭這個決定。我說我會把這一點告訴我的同志的。

一九四三年九月廿三日

莫斯科來電通知，要把尤辛、亞里也夫、杜瑪托夫召回國去。十月下旬就有一架飛機要把他們帶走了。依照跟中共黨「中央委員會」領導階層達成的協議，我和奧洛夫、黎瑪爾仍留在延安，一直留到年底。

關於這一件事，毛澤東和我作了一次長談，用種種方法來試探我的情緒。

一九四三年九月廿四日

今天我們會晤時，康生開始很鄭重的講到一些關於王明的事。他說，王明在漢口時，他完全不像是一個黨員應有的態度。王明和他的一些同事在那邊據稱建立了一個就像是黨的另外一個「中央委員會」，不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王明實際上完全沒有把整個毛澤東領導的延安領導階層放在眼裏。他們有證據可以證明王明並不服從毛澤東同志的命令，甚之拒絕重印他的許多非常重要的文章。

康生還說，王明以中共黨駐在國民政府地區的代表，還違反了他所接到的指示。王明未經獲得毛澤東的同意，居然直接寫信給 蔣委員長。未經毛澤東同志知悉，這種通信是很可怕的，因為現在始終還不知道，那些寫給 蔣委員長的信，究竟寫了一些什麼。……

（譯者註：林森於八月間逝世， 蔣委員長繼任主席。）

康生顯然希望從各方面來損毀王明的名譽。他所提到的事實並不能視為是種嚴重的事。他很清楚這一點。在有些情形中，如果情勢要求，王明便撇開通常例行的方式，遵照「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命令，作了通信的決定。在這一方面，對王明這種活動——關於他給

蔣主席信中一些不爲外人所知的部分——投下的懷疑，顯然具有挑釁的作用。這是很無聊的事，但無聊的事，却是大家都會很快相信的事。這是對王明的另一指控。……

據康生說，在這件事發生後，「政治局」便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自此以來，在毛澤東和王明之間，便一直保持着非常緊張的關係。（據我所知，毛澤東曾設法想要控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作決定的合法地位，那就是說，他要爬到「共產國際」這一工作機構的頭上。）

康生又說，在「政治局」對周恩來的報告和許多「有關問題」，進行討論結果，所有那些有關的人，都這樣那樣的承認了錯誤，除了王明，他「堅決的站立在反黨的地位」（毛澤東就正希望要把王明迫到這樣一種地位上）。

康生說，有些同志講到他們錯誤，並不坦誠，他們的招認，「顯然都是官樣文章」。不論是天真或是愚蠢，康生認爲我會採取了他的看法的。他跟我談話時，有時並不隱諱一些顯然不利於他自己和毛澤東的事實。唔，這種情形雖然不會維持長久，但在眼前，我知道了很多確實非常可貴，非常有趣，在過去一直小心地瞞住我們的事。

也許這是毛的手腕，可能他希望因此使我本身工作失去效用，把我轉爲他的喉舌？……總之，江青對我們的態度，顯得如此。她很樸實、友善、設法多多的和我們做伴。有時她拉

拉扯扯、動手動脚的強人所難，顯得幾乎沒有一點風度，完全背反了中國對女性儀態所有嚴格規範的民族傳統。……

一九四三年九月廿九日

江青比她丈夫讀書讀得多得多。無論如何，她對世界古典文學很諳熟。

毛澤東對他兩個現在蘇俄唸書的兒子一點都不放在心上。我們中間沒有一人記得他曾提到過他們，或是問到他們的健康情形。他對他的小女兒也顯得毫不關心。如果真顯得有點關心的話，那還全靠他的太太盡力使他恢復他做父親的感情。她對他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毛澤東已分化了他在思想觀念上的敵人。他用軟硬兼施的政策，把他們拉到他的一邊，然後再使他們自己互相敵對。他甚之透過王明和博古過去的同事朋友，清算了對這兩人的賬。

一九四三年十月

一九四三年十月三日

我覺得很滿意。我們留在這裏，阻止了王明遭到謀害。

很顯然的，我們所知道的延安情形，也阻止了對其他中國同志的殺害，也同樣的約束了恐佈的活動。

我深深相信，在這次暴露國民黨和日本「間諜」的運動之後，便會跟着有一次不分皂白對所有「教條主義者」，特別是那些稱爲莫斯科派的人，毀害身體的運動。

晚上，有人毀壞了我們無線電臺天線的饋電線。杜瑪托夫便祇能使用那座備用的電臺，

一方面由黎瑪爾進行修理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

十月五日的「解放日報」上，刊出了一篇毛澤東論國民黨在重慶的發展的文章。

毛澤東聲稱，除了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之外，再也沒有人在對日軍作戰，還說「特區」的領導階層，不但並未從事破壞，而且一直都在鼓勵重慶方面進行軍事努力。

毛澤東引述 蔣主席在國民黨執行委員會最近舉行的全會中發表的演詞說：

「……我們要毫不含糊的明白的說，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沒有其他任何的要求，祇希望共產黨能放棄他們武裝讓渡領土的觀念。……」

毛澤東真是有他挑撥煽動的一套。他寫道：

「……正當的說，國民黨人的意向，是讓蘇俄獨力支撐，來對希特勒作戰，並挑動日本匪徒進攻蘇俄，來造成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覆滅或削弱。……」

真是天曉得！難道毛澤東這些年來對蘇俄的政策不就是這樣的嗎？難道毛澤東不是一直都在追求這個目的——在蘇俄與日本之間開上一仗？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

棗園，現在是毛澤東的寓所。在延安，誰也不知道這裏面是怎樣一個樣子。在一個山坡上，從花園裏走去幾步，便是毛的住宅，一個可靠的防空洞，許多秘密甬道通到附近一些荒涼的山峽。

離開小小的延河不遠，在一些桃樹蔭下，在配備着毛瑟槍的衛隊保護之下，毛澤東享受着他的優閑時日。……

即使是他最接近的部屬，也都不能隨便的去到棗園。人們祇有給召去。誰也不能未經毛的核准，去打擾着他。

劉少奇實現毛澤東的意願，再加上他自己的熱情，他便成了楊家嶺的主人。他已不再是新四軍的一個普通的政委，他現在是黨的第二號人物，賦有極大的權力！

在莫斯科，幾乎每天都有隆隆的禮砲聲！紅軍一個接一個的解放了那些城市。……

關東軍雖然仍舊部署在邊界上，但是蘇俄在遠東發生戰爭的威脅，已經消失。……

然而日本的這一地位，牽制了多少師的蘇俄軍隊，多大的幫助了德軍來完成他們的軍事

任務！由於這些幾十個師十足編制的蘇俄正規軍不在前線，却使多少人因此喪失了生命。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

雖然沒有人指控彭德懷「百團之戰」的失敗，但這樣的一種意思確有存在。這就給毛澤東有了根據，來考慮軍事領導層——包括朱德在內——的無能。這就使毛澤東得以不斷的收縮八路軍的戰鬥行動。他是這兒的最高軍事當局。誰也不敢說，在過去，毛也曾參加指揮過中共部隊所有一切重大作戰的。「百團之戰」的失敗，使一般司令員格外的依賴於毛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廿四日

一架Tb-3飛機，就像一縷煙似的在天空中消失。現在我們一共是三個人。奧洛夫、黎瑪爾，還有我自己。

明天我就要搬到我們在棗園附近的屋子去了。再見，窩洞生活。……

一九四三年十月廿八日

延安的情形，壓得叫人透不過氣。最近的發展，使人不敢再與朋友往來，避免接觸外界

的事，大家相互的不敢信任。人們的言語行動，都顯露了緊張和恐懼。

大家並不希望要爲眞理辯護，要爲他們受了污蔑的同志辯護。各人都在爲自己的生活掙扎。不用說，多少下流的無賴，憑着假裝「效忠毛澤東」爬升上去。至於職業的知識、服務工作、以及經驗之類東西，都非必要——重要的是要表現自己是一個忠心耿耿的毛澤東的支持者，多多的這樣大聲叫出來，對自己的同志施以濫罵污蔑。

黨的原則，已由謀求一己的私利、毫不矯飾的諂媚、和自己貶抑自己所取代。自己貶抑自己漸漸的變成了延安一般生活的特質。人人似乎都已變瘋，不惜一切代價來謀求生存、保全他們的工作、也許還有創立一個事業。榮譽、尊嚴、同志之誼，一切都已丟諸腦後。……大家並不提出意見，祇是引用毛「主席」的談話和文章。所有這一切都有一種反蘇的氣息，對蘇俄的黨和蘇俄政府的政策不信任的氣息。

我終於得到毛澤東的許可，讓奧洛夫去探望一次王明。現在急需做的事，便是要控制康生那些醫生的工作，因爲康生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奧洛夫去時，王明正和他的太太在一起。王明看到奧洛夫，就放聲哭了出來。……

王明的體重減輕了很多；他很衰弱無力，還不能走路。在檢查身體時，王明請奧洛夫發一個電報給迪米特洛夫同志。

奧洛夫認爲他有責任來實現這個請求。王明口述了電文。奧洛夫答應把這電報交給我們的電臺發出去。王明請他不要把這個電報告訴任何人，因爲別人知道了決不會饒恕他的。

王明顯得很困頓消沉。他的情形是可以了解的，因爲問題並不完全在於他的疾病，而是他現在所處的異常困難的處境。王明的一些朋友都已放棄了他，誰也沒有來看他。他已完全照字面上的整個意義，十足的處於孤單的地位。

我立即把王明的電報用無線電發了出去。王明要求前「共產國際」的頭兒們告訴中共黨的領導階層，他過去是遵循「共產國際」的指導方針、奉行「共產國際」的決定，這是他的任務和責任。他堅持認爲毛澤東的新路線，違反了對法西斯主義作戰的利益，從所有一切意向和目的來說，是一種分裂的路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大會的決定，「六大大會」的部分決定，都已認定爲機會主義的。這是對中共黨國際主義派的又一打擊。

很顯明的，在彭德懷和周恩來不在延安的時候，對輿論施行了壓力。……兩人都曾參加那次全會的會議。因爲這次全會的觀念受到了歪曲，因此，在他們不在延安時來破壞他們的名譽，是最輕而易舉的方法。

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甚至最近的歷史，正在趕着進行修改。……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

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正像朱德一樣，因為是王明派的一份子，已實際的解了職。目前正在處理有關日軍與國軍的情報資料。他是一個機靈的外交人員，他們常派他跟國民黨的代表進行會談。是朱德的至友。痛惡康生。

葉劍英和朱德兩人都住在王家坪。

劉伯承是一二九師師長。他高大個子，有一顆很大的頭顱。曾受過多次重傷。他一直在日軍後方行動，跟彭德懷一同來到延安。他和葉劍英因屬王明集團，現在是待罪之身。

陝冀察軍區司令聶榮臻從戰地指揮部來到。他以王明的支持者被指控為「教條主義」和

「經驗主義」……

紅軍的勝利愈大，中共黨的領袖們便愈熱情的對蘇俄表示着友好。我每天都受到了那些前些天還在譏諷我們不幸的人的道賀。甚至康生也撤去了他派人對我的監視。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

在職位上，彭德懷是朱德的副手。他是在這個秋天從八路軍戰地指揮部來到延安的。他是王明集團的一份子，照毛澤東的界說，是個經驗主義者。毛澤東正在想盡一切方法，要爭取他到他的一邊。

他的尊嚴感是罕見少有的。他對毛澤東以中國共產黨的首領地位尊重他。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日

……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落入了我的手裏。

第一個文件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前敵委員會」致「協助委員會」函。

第二件——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五日「省執行委員會」第九號緊急通函。

第三件——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二十軍一七二團政委李特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會」函。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一六七

我把這些文件譯出加以研究後，得到如下結論：

一九三〇年，毛澤東任「中央前敵委員會」主席（他顯然就從這個委員會主席的地位，「借來」了中國共產黨「主席」的地位）。是年秋，在贛西黨委員會的一次全會中，毛澤東因過於極端的軍事與農業建設，受到激烈抨擊。就在這次會議中，他的同事劉少奇給開除了黨籍。

在上海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接到贛西黨委員會關於這項決定的報告，便決定召回毛澤東，另派向忠發接替他的職位。

毛澤東壓下了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不給「前敵委員會」知道，却假騙委員會的委員，指控贛西黨委員會與富農地主聯結，並由他自己策動，設置了「協助委員會」，用意是在毀去贛西的黨幹部。在十二月五日，他開始了行動。……：

「中央前敵委員會」致「協助委員會」函：

劉少奇同志轉省「協助委員會」。

地主富農業已深入本黨，這次他們極為嚴重的暴動，已廣泛擴大。你們必須用斷然決然的手段，加以壓制。

你們不能再像上次「特別委員會」被毀那樣的情形，必須用一個不同的方法，來找一個會址。否則我們的領導地位很快就會消滅了。

據龍肇慶（譯音）稱，「青年團委員會」主席段良弼、「煽動宣傳部」部長袁朝凰（譯音）、「組織部」部長姜谷瓚（譯音），目前都在滕田。應即一律加以逮捕，徹底究訊。

李伯芳是更爲危險的罪犯！

我們希望你們已將他們逮捕！

此外，用他們來發掘更爲重要的罪犯！

今夜已派出紅軍人員二人，專送有關審訊要犯丁秀奇（譯音）情形函一件。他至今尚

未坦誠招供。

你們不必限於遵循此函的指示爲範圍。明天將有更多的囚犯要審訊。

專送此函的紅軍人員二人，可即留在你們處，在兩三天內送回信件。如有緊要報告需要遞送，可派一信差送來。着他將文件放內衣袋內，上面放一普通信函，俾A B團（原註：一個富農地主的反動組織）不致讀到你們的報告。

「省執行委員會」第九號緊急通函。

「中央前敵委員會」，華岩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在紛擾暴亂革命浪潮的氣氛中，佔有支配地位的階級，爲了亟於自救，現正暫時的彌合起他們內部的衝突。這是佔有支配地位階級對革命潮流不免有的反動，充分證明，如果我們在一省或數省得到勝利，革命就可很快獲致全面勝利。但以目前情形，革命的全面勝利，將需國內所有共產黨人的配合工作，而主要在一個或幾個最重要的省份，進行活動。因此，我們必須以堅決的階級鬭爭，來對付敵人的屠殺，在全國各地，向敵人發動攻勢；一旦支配階級受到壓制，立即從事摧毀敵人；總之，在江西奪獲政權後，應即繼以建立「蘇維埃中國」。

這樣一種鬭爭的爆發，及其結果，無疑可使「革命」早日帶來勝利，造成支配階級的失敗。這就是敵人要在所有各方發動大規模攻勢的原因。堅決奮鬥，摧毀敵人的時機已經來到。我們唯有從積極的攻勢和在戰鬥中的自我犧牲，纔能獲得勝利。

很自然的，在此爆發猛烈階級戰鬥的前夕，黨內右傾份子，便在猶豫動搖了。他們正在退却，成爲布爾塞維克黨的叛徒和階級敵人。例如，毛澤東在階級鬭爭繼續高張之時，

屈服於他的右傾情感，實施了一個絕滅黨內同志的陰險計劃。毛澤東掛出了他引誘敵人，以便所稱隨後加以撲殺戰術的招牌，實際却是收縮了鬭爭，安排叛逃的步驟。因此，在敵人已進入了蘇區心臟的時候，毛澤東却還在主張後退，不與敵人作戰。

在第三軍，省執行委員會曾提出了我們的想法。但他親自採取了……（原註：原件字跡不明），並不召開一次會議。毛澤東如此一種猶豫動搖態度，使他成爲目前階級鬭爭中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與罪犯。因此，毛澤東有意要達到他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叛逃者的目的，完成其他卑鄙無恥之事。

是以，毛澤東早就已經懷着他反對江西布爾塞維克組織的計劃。他正在致力毀滅所有負責的工作者，依照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採取行動，來消滅革命鬭爭，然後，在他的夢想實現了時，成爲黨的皇帝。這就是在富田事件發展的幕後原因。

一、毛澤東之爲人。

大家無不知道，毛澤東是一個非常狡詐陰險的人，有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感。他的腦中充滿了空洞的思想。他對同志們施以影響的方法，便是透過命令和威脅，以及一種壓迫的手段。如果他對黨的問題作成了決定，他便很少在集會中提出討論，永遠關切於祇對他自己的意見得到批准。

毛澤東在需要採取行動時，特別虛弱無力。他採取一種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和梟雄主義。他對每一作戰，感到懷疑，極不穩定，特別是在目前階段的激烈階級鬥爭中，他設法逃避，總是絕不放鬆，設法加以撲滅。

毛澤東早就一向反對「中央委員會」。在他喜歡這樣做時，便用一些無足輕重的實際困難，作為藉口，多次暗中破壞過去歷屆「中委會」的指令。他從不把「中央」派來的工作人員放在心上，想出種種方法來阻撓他們的工作。例如，「中委會」派遣蔡聖希（譯音）到第四軍，來糾正騙人的游擊戰術所犯的錯誤。隨後，蔡聖希原應擔任第三軍長之職。

毛澤東不僅無視於「中央委員會」所提的意見，而且甚至設了圈套來叫蔡聖希上鉤，阻止他接任軍長之職。

「中央委員會」曾一再來信要把毛澤東調任另一職位，但他從未聽從任何人的意見。毛澤東不厭要弄政治手腕，經常攻擊同志。

對於幹部，他完全依賴於派系的手段，利用同夥和私交親屬關係，結成集團，供他作為聽命服從的政治工具。

毛澤東在他過去的任何活動中，並未證明他是一個革命的領袖，甚至也不是一個普通的無產階級布爾塞維克黨人和鬥士。

毛澤東徹頭徹尾的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者，懷着一些空洞的觀念，是黨組織的敵人。他是逃避戰鬥和消滅革命的階級鬥爭思想的化身。他是個徹底的共產黨叛徒。布爾塞維克的黨不會猶豫，把他逐出黨外。

二、十二月七日事件發展詳情。

在此事件發生前不多幾天，毛澤東派遣劉少奇率同駐在華岩坡第十二軍的一連人。這批陰謀份子便匆匆出發，前往富田，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七日中午到達那邊。

下午三時，在富田，劉少奇把他的一批人駐在「省委員會」辦公屋子門口，宣布說，他正要找個地方，歇宿一夜。

劉少奇走到「執行委員會」辦公處，要找曾山和陳欽仁（譯音）。這時，任信達（譯音）和白峯（譯音）正在談話。

奸賊劉少奇看到他的同謀者曾山和陳欽仁走出房間，便立即跟隨出去。這時段良弼同志已經回來。

於是奸賊劉少奇帶領了大約十個兵，衝進「省執行委員會」的辦公屋子，首先把段良弼和白峯捆綁起來。劉萬金（譯音）同志和任信達同志，就在那邊遭了逮捕。稍後，謝漢昌、祁雲鵬（譯音）、馬明（譯音）幾位同志，和另外一些人都遭逮捕。在他們問到究竟

是怎麼一回事時，劉少奇和他的同謀者曾山和陳欽仁，便祇是用左輪槍威嚇着他們。

奸賊劉少奇指揮那些兵進行搜索。曾和陳幫着他。

然後那些奸賊命令一連人把屋子團團圍住。

軍隊開始全面搜索。所有文件，都給毀去，財物裝進了私囊。這樣搜了幾個鐘點。

入夜時，另外又有九個人，都是「省執行委員會」通訊系統的電務員，遭到了逮捕。

晚上，這些同志都給施行了可怖的酷刑。他們就在劉少奇、曾山、陳欽仁的面前，受到殘暴的鞭笞。劉少奇他們還問了這樣的一些問題：「你們承認不承認你們是A B團的團員？你們是幾時加入進去的？這個團是怎樣的一種組織，採取什麼策略？誰是負責的工作人員？把全部真相告訴我們。」

這些同志否認犯有此種罪名。他們便被用點着的煤油燈芯，施以酷刑。然後再恢復進行審問。

如果囚徒堅持不屈，這種酷刑便變化各種不同的花樣。

他們沒有選擇，祇有認罪。他們的指甲折斷，遍體灼傷。他們已既不能動，也不能說話。這是第一天的情形。

第二天，十二月八日，奸賊劉少奇和另外幾人，根據那些受了酷刑硬迫出來的口供，

又逮捕了十個「省政府」、政治保衛隊、「財務處」、青年組織，和「省執行委員會」方面的人。他們也用點着的浸有煤油的燈芯，施以酷刑。他們全「認」了罪——如不如此，便是受酷刑而死。劉、曾、陳監督着這個審問。被囚之人，尖聲叫喊，從未稍停。真是人類所設計的最恐怖的酷刑。

白峯、馬明、和周敏幾位同志的太太，同時遭到逮捕。她們給剝光了衣服拷打，她們的手用尖銳的東西刺穿，她們的身體和陰部用點燃的燈芯燒着，她們的乳房給用鉛筆刀割掉。這批屠夫，手段狠辣，做盡做絕，光是提到此事，都會叫人渾身打起顫來。

這些被囚的人，不論已經審問過的，或是尚未審問過的，都給手脚綑綁，分別隔離。他們不敢講話，也不敢動。守衛的兵就站在一旁，手裏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槍，隨時準備行動。一聽到有一聲音，刺刀便即行動起來。

他們給這些囚徒吃的是殘羹剩餚。這是第二天的情形。

第三天，另外來了一排懲罰兵。王偉和另外許多贛西「執行委員會」的同志被捕。早飯後，那些兵帶走了二十五人，執行槍決，其中許多人甚之都還沒有經過審問。

奸賊劉少奇，押着二十軍的囚徒，包括謝漢昌在內，出發到東固。其餘囚徒便都給帶到山裏，在那些村子裏繼續施以酷刑。這是第三天的情形。

在東固，被囚者繼續受到酷刑。這些同志用繩索給綑綁着。他們祇給吃了一次東西。在審訊時，應用了野蠻的酷刑。首先提出一個名字，他們要受審者承認這個某人是「反革命者」，這些囚徒的「共謀」。就這樣的把所有省方「官員」全部名字提了出來。

每一囚徒甚至尚未開始問話之前，先要經受兩三小時的酷刑。

行刑的人即將在明天上午離去。因此，他們在晚上就槍決了大批同志。

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二十軍的一七四團突然開到。部隊包圍了屋子，把囚禁的人都放了出來。

二十軍揭發了在東固那些懲罰遠征隊的人員。發動了一次譁變。奸賊劉少奇給抓住。

二十軍的「官員」和謝漢昌也經釋出。他們都是跟這次富田事件有關的人。

一七四團的人聽到這次事件經過後，都很激憤。李特同志便帶領他們去到富田。

在富田，他們包圍了那所監禁囚徒的屋子，繳了懲罰隊的械，把一些主要的反動份子抓了起來。奸賊曾山逃逸。

這是第四天的情形。

關於在這幾天中所發生的情形，我們祇聽到了簡略的報告。此外，那種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恐怖之事，書不盡書。

三、在我們未獲「中央委員會」核准之前，不會准許公開叫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

毛澤東顯然是個壞人，階級鬪爭的罪人，布爾塞維克黨的敵人。我們必須動員全黨黨員，毫不容情的打倒他。這是一個與中國革命前途，與國際革命運動有關的重要問題。這就是在我們作任何決定之前，必須非常小心謹慎的道理。這個罪惡決不能就此放過，不加懲罰。江西黨的組織，必須從布爾塞維克黨的立場，對毛澤東發動一次堅決的鬪爭。

但江西的黨組織決不能自行處理這個問題。我們有責任將毛澤東陰謀計劃摧毀江西省的領袖幹部及其黨的組織之事，告知「中央委員會」，究應如何處置，仍待「中央委員會」的裁決。

因此，在我們未經取得「中央委員會」的核准之前，我們無權在民衆之中宣布打倒毛澤東的口號。

至於有關毛澤東一案，我們現正在黨與青年團中，加緊我們的解釋工作。我們正在從事說明他的犯罪行動，特別是根據十二月七日的事件的意義。

我們在本黨及青年團之前，揭發毛澤東的陰謀，乃在動員他們來反對他，使他不准再來粉碎江西黨的組織，把黨視爲他自己個人的集團，把他自己視爲黨的皇帝。

我們過去曾提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現在我們分函各方，以便基於本文件的精神，組

織一對他鬭爭的運動。

在十二月七日，江西省的布爾塞維克組織，勢已危若累卵。倘毛澤東的奸詐陰謀，果能得逞，則不特江西省黨的組織，而且整個中國革命，均已蒙受危害。

同志們，這是一個在我們必須堅定遵循布爾塞維克黨綱，阻撓毛澤東的努力，同時繼續對A B團奮戰的問題。

「江西省委員會」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於龍南

二十軍一七二團政委李特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函。

……李特進入本軍司令部，劉少奇走進後進宿舍，與軍長劉鐵橋（譯音）談話。

不一會，他坐到我身旁，神情顯得很古怪，他說，「李特，你的事情很危險啊。」

我問，「是什麼危險啊？」

他回答說，「許多人提出了對你不利的供詞。」

「他們有什麼證據呢？」我問。

「他們說你是A B團的一份子。」

我望着他，笑着問他，「那你怎麼想呢，我像一個A B團份子嗎？」

我知道他們對A B團份子施行的那種可怕的酷刑，於是很坦白的說，「如果我受到了A B團份子的陰損，我也沒有辦法。我祇要求黨主持正義，廓清這個案件的一切情況。我並不怕死，不過那種苦刑是沒法忍受的。」

劉少奇假裝關切的回答說，「那是決不會的。這不是一個A B團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你承認你的錯誤，遵照指示去做，事情就不會動到拷打和槍斃了。」

因為劉少奇說這不是一個A B團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我就覺得這裏面就有着一個什麼圈套存在了。

我一向知道，劉少奇在思想觀念上，並非一個很完整的人。他缺乏無產階級的警覺，他老會想出一些卑鄙的手段，最後搞得大家一陣爭吵。……

劉少奇說，贛西南「二屆大會」就是A B團安排的。可是我完全知道，「二屆大會」剛完成了「中央委員會」消除農民心理和零星游擊行動觀念的指示，並特別注意於在城鎮的工作。我已聽到，「中央委員會」曾批評毛澤東的農民心理。我對毛澤東從未把他看做是一個大權威。他曾寫過一封信給林彪，批評「中央委員會」，還把這封信在「紅旗報」

上發表出來。

八月一日，「中央委員會」來函，宣布以向忠發同志爲「省工農政府」主席。但毛澤東繼續發佈命令，照舊用他「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署名。

吉安佔領後，在那些至少曾受過基本訓練的軍隊幹部中，開始感覺到一種極度的焦慮和幻滅。我也看到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正在黨內一天天的消失。這種情形，都是對那種建立一種由一人控制的制度採取的手段，引起的反應。

在向吉安發動第九次攻勢之前，我曾遇見了毛澤東。他問到我關於贛西南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情形。

我把我所知道的事告訴了他。當時毛澤東說：「土地的平均分配和對江西的攻勢，都要歸功於劉少奇！」

我問他關於劉少奇的情形，毛澤東回答說，「他是中央政治部的秘書長。劉同志人很能幹。」

我從不相信毛澤東能領導我們；至於劉，他是個卑鄙下流的小人。……

我已明白，這次發生的事，跟對A B團作戰是毫無關係的，而祇是毛澤東派來了那條獵犬劉少奇，來毀去在江西西南部的黨幹部。

我也已明白，如果我堅持黨的立場，我就是死定了。所以，我採取了一個不同的態度，唱出了長沙的歌：「我是你的舊部，我的政治地位很低，我要遵從你的政治指示，我會承認我的錯誤。我確實知道毛澤東不是A B團份子，正像你和軍長都不是的一樣。我會跟從你們三個人到隨便什麼地方去。我自己憑我這點能耐算得什麼人呢？」

我講了這些話之後，劉和軍長對我便立即改變了態度。他們開始安慰我，勸我不要驚慌。因為他們還得去審問人，他們便請我在一個有衛兵守衛的小房間裡等着。

我聽到劉少奇正在審問「政治部」的「政治學組」組長向濟倫（譯音）。他那樣殘酷的拷打他，叫號之聲，震天動地。……

「政局究竟有了什麼變化，」我問劉少奇和軍長。

回答是，「你是個聰明人，何必多問這種無聊話？很明顯的，誰是屬於A B團，誰最近犯了錯誤。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是否能把一七五團調開，也不知道一七二團的李蕭大鵬（譯音）是否可靠。你知道你們這個團是二十軍的唯一力量，事實上是主要力量。你必須用一切手段來粉碎你們團裡的A B團。」

講完這個說話，他們便派一個傳令兵把我帶到營部去。在我到了那邊時，張信同志（譯音，營長）和梁學泰同志（譯音，政治代表）都很意外，不過對我的來到，顯然很高

與。在那些日子，許多黨裡同志都知道，所有共產黨員都在恐懼中過着生活，等着一切意外事件的來到，便也聽天由命，無所謂驚慌了。

張信同志說：「我不信所有這些人全都是屬於A B團的。」

我也希望置身危險之外，但我爲黨感到痛心。

我愈多想着，我便愈是深信，在我身邊竟沒有一人可以向他請教商量的。

十二月十二日，我起得很早。我的心裡覺得很煩悶。

早飯過後，我和張信、梁學泰在存放機密資料的那所屋子裡，舉行了一個緊急會議。

首先我告訴了他們當前的情形，然後作了一個簡單的分析。那兩位同志認爲，這次事件是一個秘密陰謀的一部分。我們遵照布爾塞維克黨的原則，決定派人去請劉少奇，來參加我們的會議，然後加以逮捕。如果他猜到有什麼用意的話，我們就召來部隊（這時已有一七四團的三個營，派去逮捕一七五團團長和政治代表），釋出受難的同志。

會議結束時，張信同志說，曾炳春和另外一些人都沒有一點理由，被控爲與A B團有鈎串的。

因此，我便到二十軍司令部去，向劉少奇和劉鐵橋軍長問到這件事。但他們開始向我提出一些問題，於是我便把他們抓了起來。接着，我迅速調來部隊，決定幹到底；那就是

說，我把司令部包圍了起來，把劉鐵橋捆起，釋放了謝漢昌和另外的一些人。

同日下午，我們到達富田那所學校，把另外囚禁的人，全部釋出。……

這就是東固事變的經過情形。從組織的觀點而言，這個行動是絕對不容許的。尤其是這個事變發生在階級戰鬥正在一個轉捩點上的時候。不過，我基於布爾塞維克的原則，同時爲了救黨，在那種情形之下冒了這個事變的危險。我並未受有高級機構的指示。李特一向在「中央委員會」和「省委員會」的布爾塞維克指導之下作戰。他誓言決不違背這個原則。他向「中央委員會」對他此一錯誤行動，自請處分。

李 特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吉安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澤東的若干談話，甚至比較最近的一些，現已爲大家所熟知。下面是其中少數的一些談話，一字不易的照抄下來：

「……邊區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像中國其他各省一樣，歸中央政府所節制。……」

「這樣，我們的政策……就應是（一）堅決進行武裝抵抗，（二）團結全國抗日統一戰

線，(三)進行長期戰爭。」

「中國能渡過目前所處的艱鉅局面嗎？當然能。統一戰線在此時擔任着一個決定性的任務。」

「民族抗日戰線祇限於國共兩黨的合作嗎？不，不是的。這個戰線應該是一個全國聯合戰線。毫無疑問的，國共兩黨在這聯合戰線中是主要的勢力，但它們仍祇是其中的一部分。民族抗日戰線應該是所有一切政黨和組織的一個聯合戰線，……所有一切愛國中國人的統一戰線。」

這樣的一種談話，真是舉不勝舉！

事實使我深信，毛澤東講的話，是應出以最大謹慎的態度來處理的。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事，便是朝向他的目標推進。此外什麼都非重要。

從最初開始時，他是反對建立抗日聯合戰線策略的，但在這個戰線建立的那一年，全國各地，愛國情緒，洶湧澎湃，激昂高漲，使他不得不來玩上一套手段。因此，便有上列的談話。……

我們必須先知道這個人的意向，然後再對他所講出的話，推演結論。往往有太多時候，他所講出的話，和他所要做出的事，剛剛正好完全相反的。……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八日

莫斯科似乎和我作着同樣的看法。我可以從他們對我的報告所作的簡短答覆中，判斷出來。迪米特洛夫對我最近提出的一個報告答覆說，毛澤東是不應把他和中國共產黨視爲一物的……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在王明纏綿病榻，康生把他與外界完全隔絕了的時候，各種發展，對他未來的整個政治途徑，愈來愈形險惡。

「政治局」接連着舉行一個個的會議。現在，在其中的一個這樣的擴大會議中，正在進行分析「莫斯科派」的錯誤。

王明被指控犯了所有一切十惡不赦的大罪。「機會主義傾向」在中國共產黨中的生根，便應歸咎於他。據稱，他（連同博古、周恩來、洛甫，還有其他一些人）由於對國民黨所採的修好態度，終於癱瘓了「全國解放運動」的發展。就在這些「政治局」的會議中，他給加上了「國民黨的同謀、反革命者」的帽子。

他們用了最卑鄙的藉口，來證明王明是「反革命者」——他曾在上海被捕，然後給放了出來，這中間就有令人可疑之處了。因為這個緣故，就證明是「叛逆」。

此外，基於王明忽視共黨鬭爭在本國的環境，因此，他便被指控為注入了各種反黨的見解。那些在王明還是他們的領導人之一的時期，受到中共黨懲戒的人，現在便把他指責得最兇。

葉劍英、洛甫、周恩來，都毫不猶豫的承認了他們的見解是有害的深深的錯誤，他們的談話便證實了「王明路線」的破產。

為了鞏固這個鬭爭的結果，中共黨「中央委員會」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趕着出版了一本題名「兩條路線」的書。把這本書祇是約略的翻閱一下，就可看出這是一本專門寫到毛澤東對王明的「有毒政策」（「機會主義」）進行鬭爭的書。

博古是前共黨的頭兒，因此也特別受到注意。由於毛澤東的緊迫，他曾三次發表演說，說明他的見解，每一次都承認了他的錯誤。

博古向我談到這件事時，覺得非常悲哀。但他所受到的屈辱，並不到此為止。昨天，毛澤東和康生表示，他應徹底準備一下，把一切的事，更加詳細的說出來。

「中央委員會」的一批領袖工作人員，都懷着一種喪家的心情。他們儘量留在家裡，靜

以待變，大家都相互的感到怕懼。他們挑着沒有人見到的時候談話，用各種藉口來避免與人接觸。到處都是一片低壓陰險的情調，每一件事都含有一種低壓陰險的情調。……

我對中共黨「中央委員會」那些高級人員對於蘇聯的態度，仍然覺得很驚奇。對於蘇聯，一直都有着一種隱藏的不滿，因為蘇聯祇供應特區各種貨物，而並不供應武器裝備。……在這兒他們不是沒法知道，就是不願知道，我們國人正在進行歷史上最激烈的戰爭，蘇聯的人民正在流血，蘇聯的經濟已遭受了極重大的損害。

他們很自然的把對美國的觀念來看蘇俄。但在美國的土地，沒有爆炸過一顆炸彈，沒有一個城受到了焚毀，敵人並沒佔領了整個的工業區。美國的人民並沒受到殘酷的、有計畫的消滅。

雖然美國正在進行作戰，但它的經濟正在極有利的環境中繼續發展。因此，它有機會可對那些反希特勒聯盟的國家，給以大規模租借法案的協助。

在蘇聯方面提出任何的協助，便都是使原已緊張的經濟，超過了力所能及的範圍。在這裡，他們把蘇聯看做了像一個「豐饒角」，可能，而且必須從它抽取各種東西的。但甚至在這些艱困的年歲中，我國還曾把大把大把的錢，協助了中國共產黨。

我自己就曾目擊了這樣的一種交易。毛澤東對這件事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親自就曾得到過這種很大的數目。……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

盟國——蘇聯、美國、英國——在德黑蘭舉行了一次會議。三國的宣言顯示，他們決心要去掉希特勒的政體。

紅軍排山倒海的勝利，迫使中共黨的頭目們，在態度上有了百八十度的轉變。蘇聯正在贏得了這個戰爭——跟蘇聯聯起手來！

我想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把「兩條路線」的集子譯完了。我還剩三頁要譯了。

這本集子包含三個部分：（一）「大革命」時期，（二）內戰時期，（三）抗日戰爭時期。

這本集子含有一些「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文件，毛澤東和王明的演說辭。

這本集子是有意編給上中級政治工作人員讀的。其中主要的結構，是在讚揚毛澤東的政策和猛烈譴責王明的「煽動叛亂」……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毛澤東講到王明說：「經常是黨裡的一個引火之物！」他是多麼的痛恨王明！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特區」儘管受到封鎖，但却一直都在跟自由區的省份，甚至在日軍佔領下的地區，進行活躍的貿易。

從「特區」運出塩、羊毛和牛，最近還有一天天數量增多的鴉片。

朱德是一個很自愛的人。永遠平衡、鎮定、友善。以我所知，他並不熱衷於譴責（「批判」）別人。接受毛澤東的權位，但並不曲意奉承，求取恩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廿三日

「肅清三種作風運動」，產生了痛苦的果實。

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擴大會議把暴露博古、王明、洛甫、楊尚昆和其他「莫斯科反對派」份子的「投降主義孟希維克」路線的結果，作了一個綜括的報告。他們的政策被斥爲反黨的政策。在思想觀念方面受「莫斯科派」引導的「教條主義者」，都給誣贗爲出賣革命利益的叛徒，他們「向國民黨屈膝投降」，鼓勵將「西方馬克斯主義教條」滲入「中國革命」的思想觀念中。

現在整個黨都已明白告知，黨的鬭爭，祇是碎裂了中國共產黨的上層外殼。因此，一股令人作嘔的新東西，滔滔不絕的流進了整風運動，它的工作是在「幫助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年輕共產黨員，採取一種更爲堅強的工人階級立場」。

在黨的組織之內，受了毛澤東和康生意向的可靠執行者偏見的影響，對王明的「偏差的機會主義」路線和毛澤東的路線，發動了一次最詳細的討論。

整風的第一個階段，祇在對社會大眾施以思想教育。在中共黨領導階層內部的鬭爭，對黨內一般的黨員是遮掩着的。壓制的手段是對整個「教條主義派」施行的。王明和另外一些

人的名字，祇偶或很空洞的加以提到。但對王明本人，一直保持着嚴格的隔離。

現在，洛甫、博古、周恩來，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中所發表的一連串聲明，都已承認犯了錯誤的見解。毛澤東已對王明對黨所犯的罪，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證據」，給他戴上了帽子。

洛甫、博古和周恩來，都已向毛澤東提出了特別書面文件，承認他們的「有害的和錯誤的見解」。

整風在質的方面便有了一個新的狀態。現在，中共黨的領導階層中，每一國際主義者本人，全都受到了玷辱，因此，亦即整個「主張國際主義投降路線」和整個「蘇聯教條主義」受到了玷辱。……

現在，這就是一個在人名上已經具體化的切實的運動。

這就使王明不可能再保持蒙在鼓裡了。露莎·佛拉迪米洛娃便把整個真相告訴了她的丈夫。……

然而毛澤東的目的，並非祇在毀損王明的名譽。他是堅決的要粉碎他的精神。使王明用嘴講出話來，承認「他（毛）的路線是正確的」，這是很重要的。

在王明身上，已經開始來做功夫。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李富春，便給挑選了來和

王明會談。

露莎·佛拉迪米洛娃把當前發展的全部真相，告訴了她丈夫時，他知道他在思想觀念方面，實際已處於孤立的地位。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廿四日

我去探視了王明。

前些日，毛澤東曾去看了他，對他應王明之請所提出的要求，和他作了一次長談，並答應挑一批黨的工作人員，來聽取他的陳述。

王明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都已不勝消沉。他已同意向毛澤東屈服。他認為他請我們轉到莫斯科給迪米特洛夫同志的那個電報是錯誤的，一個黨員是不應這樣做的。在他認為，他與前「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的關係，勢必會破壞了他與毛澤東的修好。……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廿六日

在德黑蘭會議前夕，蔣主席曾與羅斯福和邱吉爾舉行了一次會議。關於中國現在和未來的地位，似乎曾為德黑蘭會議討論的問題。關於以後幾年的展望，很難預料。不過，有一

件事是很明顯的：土地問題和外國資本的規定，將能促進，並且繼續促進反封建和反帝國主義革命的發展。毛澤東考慮到這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在他認為，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足以削弱和動撼重慶政府的政權。照目前的情勢，他可藉危害中央政府的權力，避免對日軍作積極戰鬥，來建立自己的權力。當然，中共部隊對入侵的敵人採取消極性的行動，並不排除作戰鬥的活動，不過，這種作戰活動的規模，在過去和現在，與八路軍實際所能做到的，顯然太離了譜，現在所做的完全是一種被迫採取的有限度的報復性行動。關於八路軍和新四軍作戰行動的資料是故意誇大的，用意祇在給外面世界看的。

盟軍遲早將會擊敗日本。這是毛澤東整個政策的出發點。不過，他不能忽視人民的抗日情緒，以及世界進步勢力對法西斯主義的共同鬭爭。這就是中共部隊所以參加戰爭的原因。但他們所有的行動，都是以毛的思想觀念着眼的。

一九四四

一九四四年一月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

康生的資料：

八路軍之實力：部隊三八七、二四五人。

軍械：步槍，一九〇、〇〇〇支；機槍，三、一八七挺；重機槍，三六〇挺；大砲，二
三二尊。

八路軍進行擾亂、活動、和具有勢力的地區：在華北，三五〇、〇〇〇方哩，即，所佔
地區之百分之四十，有人口三千四百五十萬人。

此一地區分爲如下四個軍事行政區：

一、冀察陝邊區（八路軍最強之基地）。

一九四四年一月

一九七

在此行動者爲蕭克，鍾（期光？註，原有括號），聶榮臻。作戰部隊屬聶榮臻。

二、陝西省西北部邊區。

幅員，四萬方哩；人口，一百七十五萬人。部隊六萬五千人，由賀龍指揮。副手有續範亭及政委關向應。

三、冀豫晉邊區。

幅員二二五、〇〇〇方哩；人口，一千三百五十萬。此爲軍事上最不重要之地區，活動者爲劉伯承之一二九師及其他部隊，總員額九萬五千人。

四、山東邊區。

人口，四千萬人。主要戰鬥部隊爲林彪之一一五師，與張振武八萬五千衆之山東縱隊配合作戰。

根據中央政府與中共黨領導階層之協議，八路軍以三個師爲限（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這就是一個師所以僭越了一個軍的規模的原因。

毛澤東顯然接到了迪米特洛夫的一個電報。到棗園去的人都給擋了駕。……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日

博古證實了我的猜測：莫斯科來了一個電報。

在這個電報中，施米特洛夫表示關切中共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中共領導階層對「莫斯科派」的政策，並提出了他對康生在延安事務中所居十惡不赦地位的評估。

談到「特區」的整風，博古帶着苦笑說：「誰會到過這裡，他知道。誰會來到這裡，他會知道。」

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

很意外的，我接到毛澤東的邀請，請我和他一同去看平劇，消磨一個晚上。

我提早了一些走去，因為我們還得到楊家嶺去。毛和江青已在等着我了。大家說了幾句寒暄話，我們便出發到楊家嶺去。

毛的態度表現得很隨便。他知道，在他需要的時候，應該怎樣表現得很隨便，使人感到毫不拘謹的隨便，他知道怎樣裝得很和藹可親。

他並不浪費一點時間來虛套，便立即開始講到他尊敬蘇聯，尊敬蘇聯共產黨，尊敬史達

林。江青默默的走着。

毛說，他誠懇的尊敬那些在蘇聯接受教育和工作的中國同志。

這是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說得更正確些，這是一個人的獨白，一直都是毛一個人在講話。他講到蘇聯對「特區」的生存具有的重大意義，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前「共產國際」爲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方面所擔任的角色。

他的外套袖子多少長了一點，他用它們來作爲暖手的沒指手套。……

左右沒有外人，除了幾個衛兵走在遠處。

臺上演戲的時候，毛心不在焉的，但很有禮貌。他並不講出一句在他心裡專心一意正在想着的事。

江青跟我講許多關於戲院和演員的事。毛望到會場裡，眯緊了眼睛。他有眯眼的習慣，不過我覺得他心裡很不安，他需要我。

戲散後，他對我說，他希望和我詳細談談。

左右無人時，毛說他接到了迪米特洛夫關於「共產國際」政策的電報。他對這份電報思索了很久，使他感覺很興奮，他對電中所表示的憂慮和關切，已銘記於心。他瞭解迪米特洛夫深切誠懇的希望幫助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他的協助一直都是非常睿智的，他很感激他。

分手時，毛說，他一定會再和我會面，來討論這份電報中所提出的問題。

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

一月份註定是一個獨多意外事件的月份。很意外的，我和奧洛夫、古萊耶，接到一份請帖，請我們去參加毛澤東的晚宴。參加宴會的都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頭目。一切都很隆重、友好，……鞠躬如也。

這次邀請我們的用意，非常明顯——要說服我們，相信整風跟對「教條主義者」和「莫斯科反對派」的鬭爭並無關係，他們並未採取行動，暗中破壞抗日統一戰線，他們並無反「共產國際」宣傳的存在。他們祇是抓間諜，祇是間諜而已。

他們要我們說服莫斯科，相信現在延安的情形，一切都很好——這是毛澤東的目的。

劉少奇、周恩來（他變得很快，來配合毛，現在他是毛澤東數一數二最熱烈的支持者）和康生，都證實了我的臆測。他們都已變得使人無法辨認。除了意外的對我奉承外，他們也極力巴結着古萊耶，他們和他根本就不太熟悉的，這個表演完全是由毛澤東一手策劃的。

毛澤東一接到迪米特洛夫的那個電報，便趕緊分配各人擔任的角色，指點誰講什麼話，

誰來應付我們，誰避開我們。

毛又再一次的顯示了他懂得如何對付人。他知道怎樣對待人，怎樣把他爭取到自己一邊來，用最隨便的方式，講出一些最抽象的事。如果周恩來和劉少奇的態度顯得很不自在，毛澤東却是幾乎不停的一直都在講話，顯得很高興愉快的神氣。

我們在他厚厚的唇上，看到他露着笑意，從他繃緊的眼裡，看到一個好客主人的親切神情。……

他不讓我有一分鐘離開了他的慫慂。劉和周則積極的在奧洛夫身上「做功夫」，康生則分別侍候着我們三個人。

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

昨天上午九點鐘，毛澤東突然來訪。他並未隨帶衛隊，也沒有通常在我們談話時候總是在場的康生、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

他的來訪，直如一個晴天霹靂。並不祇是因為他從未如此輕車簡從的來找過我們，而且因為在這個時候，通常還是他睡眠的時候。……

我請他到會客室裡。古萊耶匆匆的泡了杯茶，送上酒和點心。毛澤東把吃的東西推在一邊，並不拖泥帶水的就談起正經事來。他開始熱烈的解釋着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在黨內和

交政策問題方面所採路線的本質。

我知道古萊耶在場，使他很尷尬，就請這位電務員迴避一下，毛很高興。

毛澤東說，他認為抗日統一戰線是一支能抵禦日本侵略的龐大勢力，他是團結全國一切勢力的一個誠懇的支持者，並且說，他一直都在竭盡全力，來增強和發展這個抗日集團。不過，他認為，必須採取堅定手段，來約束國民黨的挑釁態度。

幾乎在每句說話之後，毛澤東便重覆一遍，說他如何深深的尊重史達林和廸米特洛夫同志的經驗。

他忽然談到王明——用一種完全不同的，幾乎用很友善的口吻！最初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談的王明。……

這次談話談了很久。毛抽完了一包煙，又再開始第二包。他顯得很擔憂，他的眼皮都紅紅的。他不時的站立起來，穿着一雙氈鞋，在房間裡沒有一點聲息的踱來踱去。

這次訪問在一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形中結束。毛澤東向我要了幾張紙。他在辦公桌旁坐下，擬了一個給廸米特洛夫同志的電報。他請我切勿耽擱，「打到」莫斯科去。毛顯得很心煩意亂，他的行動暴露了他的緊張和不安。

分手時，毛澤東說，他和其他中國工作人員，過去都沒有給我們足夠的幫助。他答應在

這方面要給我們補償。

他顯得極度的困乏，彷彿這天晚上沒有闔過一會兒眼。

我送他走出了門。……

毛澤東在發給前「共產國際」首腦迪米特洛夫的電報中，請他正確的瞭解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對黨內部的政策。他請迪米特洛夫同志不用耽憂。他和迪米特洛夫所關切的，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因為他們具有相同的想法。

毛澤東寫到，除了在一月二日發給莫斯科的那份電報外，他願再度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所奮鬥去做的那些基本原則的問題。

在一月二日的電報中，他曾說明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但必須再度決定這個工作和政策的要素。他感謝這位「共產國際」前首腦給他的幫助，和忠告他不應分裂抗日統一戰線，在當前的情勢中，不應採取反對國民黨的政策。毛澤東向這位「共產國際」前首腦保證，他會加以誠意尊重。

他寫到，自從一九四三年七月以來，一直到那一天，他一直都在採取有力措施，來加強黨的團結。結果，黨內的情形，已經有了激劇改善。這個黨內政策的精義是精誠團結。至於王明，他正依照黨內政策這個同一的主要規定辦法，加以處理：精誠團結。

對國民黨的政策，始終未變。這個政策是從必需有一抗日統一戰線的出發點進行的，毛澤東一直都嚴格遵從這個政策，恪守不渝。這個政策的要旨是與國民黨合作，這種合作是必需的。在本年內，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預期應有改善。毛澤東強調他指望能達到此點。

啊，他給了我一些思索的資料。毛當然很清楚我對「特區」政治發展的態度。他來看我目的，不祇是要使莫斯科深信中共黨領導階層的友好態度，而且也在指點我應該怎樣來解釋他的政策。這是他設法要動搖我的態度，如果不是要引我去入迷途的話。這是表示，毛澤東將以同樣的精神，來採取行動，他設法早在事前，爲他自己取得採取此種行動，主要是反蘇行動的自由。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王明並不知道迪米特洛夫的那份電報。我們不可能把這個消息通知他。在這改變了的情況中，毛澤東正在設法對王明施行壓力，以便不僅徹底損毀他的政敵的名譽，而且也相當程度的證明迪米特洛夫的電報是無稽的。

王明已經屈服，稱他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毛澤東一面保持孤立王明，一面開始運用手

腕，設法使王明依照他答覆迪米特洛夫電報所需要的精神，取得他的招認。當然，如果王明自己認為他的政策是錯的，那麼，關於毛澤東的行動是正確的，還有什麼能懷疑的呢？

一月六日，毛澤東和王明作了一次長談。從毛自己所講的話判斷，這次談話，他保持了相當溫和的立場，跟他過去那種絕不妥協的立場迥然不同。……同時，毛澤東私下表示，如果王明的態度能够改善，自認錯誤，大家重歸於好是可能的，未來的合作也是可能的。

這個手段生了效。王明並不知道迪米特洛夫的那份電報，也不知道毛澤東已改變作法，希望結束這個衝突。他堅定的相信自己的看法，終於開始慢慢的放棄了他的立場。王明把毛澤東翻雲覆雨的說話，當做了真心話，他把他們關係的改變，也完全的信以為真。毛澤東便很快的朝向他的目的推進。……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三日

中共黨的領導階層，現在對我們一批人的態度是確然「熱誠」的。他們總是一接到我的要求便立刻接見我，而且很樂意的回答我的說話。……

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認清，莫斯科對中國共產黨的情形，詳細細細的，都已知曉得一清二楚，因此便正在改變他們的方式。他們知道，沒有蘇聯的幫助是沒法渡過難關的。他們以

特別注意於偽裝遮掩宗派政策，來替代厚顏無恥的作法。

我給中央送去了一個結論說，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決不會放棄他們那個多少年來一直都在奮鬥爭取，而現在已經達到具體化勝利成功的政策。

毛澤東的電報祇是一種虛套。他們對我的慇懃奉承，熱情親切，祇是一套面具而已！我正在瞧着一齣連續不斷的悲喜劇。

一九四四年一月廿一日

又和毛澤東見了一次面。這次談話叫人覺得特別之處是他對美國的態度。雖然他祇是帶過一句，他的話聽來却很有意義：「對中國來說，美國的政策是最重要的。」

一九四四年一月廿三日

我跟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的關係，在廸米特洛夫電報的影響之下展開。因為這個電報中包括有康生對政治情勢所作的率直的研判，這個「情報局長」便設法向我（以及經由我向莫斯科）表示着他的效忠。他對我講話，一向都非常小心謹慎。上次我們見面時，他突然開始講到關於王明的事。

康生告訴我，王明已當着毛澤東的面，認了錯。他說，王明要求毛澤東在「七全大會」中不要強調他王明的錯誤，至少緩和對他的錯誤的討論。

康生說，主要的事是，王明已承認了他在政治方面的錯誤，這就是毛澤東爲什麼向他保證，他將採取一切防範措施，來防止在未來全會中發生反王明衝突之事的原故。

康生說，王明的身體已經好得多了，危險期已經過去，因此對他已沒有擔心的理由。康生說，「王明比王稼祥的身子還要強得多。」

我問他爲什麼那麼確定。

康生提出了解釋。原來在新年假期中間，毛澤東曾兩次去看王明，和他作了長談，因此相信王明的健康情形還不壞。不過，這還不算。接着在毛澤東兩次訪問過後，周恩來又去看了王明，他們談了足足約有五個鐘點。

康生說，這就是王明健康情形很好最令人深信的證據。

「他幾乎已經完全好了！」康生說。

這對康生特別重要，因爲他曾犯有預謀毒害王明的嫌疑。現在問題就簡單了，王明祇是害病而已！爲什麼大家還要多談這個問題呢？……

延安的情形，還是一種整風的氣息。你不論走到那裡，你都可看到一些反國民黨標語和

整風的標語。在岩石上，祇要能寫上字去的地方，到處都寫滿了字。

一九四四年一月廿五日

我又給毛澤東召了去。又是燭光、傳令兵、口令、毛澤東的演說。……

一切都是爲了要把我爭取過去，使我深信延安目前的政策是正確的。用這個方法來安慰莫斯科。

毛澤東沒有一點聲息的在房間裡踱來踱去，講個不停。……他隨時的在我旁邊坐下。他喝着沸燙的茶，講着笑話。

這些笑話和誠懇的表演，遮掩着他在心中毫不猶豫的動到的念頭，這是毫無疑問的。

毛澤東設法使我相信，蔣主席必須在政府中給共產黨一些位置，以及「特區」需要大量武器來對日本作戰。……然而却絕口沒有一字講到，對日軍的戰鬪行動，已經減縮。這是個不爭的事實。毛祇是在口頭上承認抗日統一戰線。他的整個腦筋都在那邊，重慶。那邊，那邊的人必須把他們趕開、粉碎、剝削掉權力——那是主要的事。

莫斯科已經知道了「特區」的反蘇運動和對國際主義派的壓制。

迪米特洛夫的電報對毛來說，真是個晴天霹靂。他原以爲他可以一方面依賴於蘇聯的支持，同時還是可能從事詆毀蘇聯，……對它的利益造成傷害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

毛澤東代表社會主義，却背叛了社會主義，他代表共產黨，却毀去了共產黨，他代表民主政治，却施行恐怖。……

一九四四年二月廿五日

負責日本戰俘工作的是岡野。他性情溫和，但意志堅強。他的工作結果，並不能稱爲令人印象深刻。日本軍人把少年人養成對天皇有種狂烈的尊敬，並不顧到別人。一個軍人的任務是爲天皇。一個軍人蔑視死亡（死猶輕如鴻毛。）

但這裡在戰俘之中，已經有了一批工作人員，他們參加對日本在華遠征軍的宣傳工作。

岡野過去原在美國。他在英文方面頗有造詣。

一九四四年二月廿八日

在延安，他們正在積極籌備「七大大會」。在接到迪米特洛夫的電報之後，列寧的兩種著作，「兩個策略」和「左翼共產主義——一種嬰兒的騷亂」，已緊急的列入了在全會前應加「研究」的資料目錄單中。

在談話的時候，毛澤東常提到中國歷史的例子。

絕非並不常有的情形，他往往從一個談話話題，隨便的扯到另一話題，接着再扯到另一個話題，然後又回到原先的題目，於是忽然又跳到一個新的題目，然後再回到原來的題目，就好像是他在一個人自說自話似的。

有時他突然的問到你的意見，但希望得到一個簡短的答覆。如果跟他談話的人，開始發揮起他自己的想法，他先是注意的聽着，並不反駁，但很快的打斷了這次的談話。他曾好幾次跟我講到，和一些「愛講話的人談話」，他就會感覺疲倦起來，覺得很不舒服，特別如果那個談話的人，是一個並不熟悉的人。

一九四四年三月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

冀察陝邊區「司令」是聶榮臻。

聶榮臻，一九八八年出生於四川省。他曾留學法國和比利時。他曾在法國雷諾汽車廠工作多年。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赴莫斯科求學。曾參加北伐和西竄。是出席「七全大會」的代表。

在聶榮臻負責的這個邊區，駐有蕭克的一個軍。

蕭克於一九〇七年出生湖南。他是毛澤東的同鄉。他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事業一開始以來，就一直在中國紅軍裡面。曾參加西竄。他會有過相當一段時期，充任賀龍的副手。

我在指定時間，去拜會毛澤東。他正在房裡踱來踱去，隨時的看一眼縛在牆上的許多紙張。這是他爲一篇文章，或是一篇演辭，思考的方式。他首先把它寫下來，然後把一張張寫好的紙掛起來，在一兩天內，他把它們研究着，在原稿上加以修改。……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

關於整風。

毛澤東時常講到知識階級的無黨派地位和模糊的階級意識的論旨。

基於這個論旨，他在身體和精神兩方，一直都在從事摧毀知識階級，代他自己的教條主義者和他自己的一種教條主義。而且，他把這個政策應用到基於原則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

毛澤東不但不與知識階級從事認真的合作，而且，實際的養成一種對知識階級猜疑和無禮的態度。

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七日

知識階級份子遭受整風的打擊，最爲嚴重。整風顯示了一種特別的熱情，來整肅他們的

「精神」。大多數知識份子，甚至一些真正具有天賦的人，却要他們向一些雖然讀過一點書，但似通非通的煽動者去學習。各種強烈的建議，要他們在體格上進行再教育的措施，使他們發展一種正確的階級意識。這種思想訓練，部份是出於一種科學知識和整個教育觀念的輕視態度而來。知識份子的價值，祇是掛在嘴上講講的東西。在實際上，他們受到了一種最嚴峻的「精神整肅」。作爲一種教育措施，他們被強迫做着手工工作（如像必須編織襪子）。在黨的知識份子中一些很少有的幹部，却被屈降去做一種執行技術工作的角色，如辦事員、信差、非熟練工人、勤務兵等。

毛澤東正在砍伐掉世界上數一數二最偉大民族文化的數千年古樹森林。他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的說教，完全歪曲了馬克斯主義的原則。在這兒，文化絕未因革命的熱情有所充實。毛澤東所喜愛的古老平劇，在延安已盛行十年，然而在這裡，却沒有產生過一部好的小說，也沒有產生過一本好的短篇小說集子，也沒有有一些像俄國在內戰期間所產生的那種有名的歌曲。

在延安，他們甚至並不講到一種崇高、多形式、和在道德方面純淨的文化。他們並不懂得這種文化，也不願認真的重視這種文化。雖然毛澤東是從「無產階級的藝術」開始發動整風運動的。

毛澤東對活的思想，很明白的顯示具有一種敵視。這就已經成爲一種文化呆滯的先決條件。關於知識份子對於革命的價值那種說話，便都祇是一些空話。在實際上，真正的知識份子，已由一些並未受有教育、滿腦子裝着教條的人所取代。革命的嚴重環境，以及後來的抗日戰爭，都不能成爲這樣一種政策的正當理由。

這種對知識份子毫無正當理由的無禮態度，造成了經濟管理的困難，並削弱了對資產階級思想觀念鬭爭的力量。整風政策現已成爲一種黨的生活的標準。的確對黨造成了危害。

黨內受有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負有訓練幹部之責。這些年來，由於整風運動的結果，這一部份的知識份子，不是已經排出黨外，就是已經自己轉變爲教條主義者。

就連毛澤東的那些有學問的秘書，他們所受的教育，顯然也沒有够得上他們所負責任的應有標準。

因此，由於忽視世界過去的文化遺產和整個的哲學知識，於是便導致了知識的貧乏和對教學方法的忽視，以及教學方法的原始狀態（在延安所謂的高等學府中，每週的學習時間，最多爲五、六小時）。

在文化方面，他們漸漸開始懂得了少許一些必須閱讀的歷史小說，外行人寫的政治性內容的劇本，簡單的詩——又是一些把政治口號改頭換面，拼湊而成的粗劣作品——當然還有

包括在「二十四項文件」書目單中的那些選定的作品。

毛澤東在有關於無產階級文化的談論中，宣布了整風運動（毛澤東一九四二年的談話）。黨現已剝奪了馬克斯主義，讓位於「現實的馬克斯主義」，而這，不過是一個必須加以死背爛記的教條而已。因此，藝術便給帶上了鐐拷，縛住了在整風觀念上。凡是越出整風觀念（毛澤東的「現實的馬克斯主義」）範圍以外的事，便都必須受到「精神的整肅」，這便已成了政治生活的規律。

一九四四年三月廿八日

我詢毛澤東之請，替他發了個電報給莫斯科，給他的兒子岸英。

他告訴他的兒子，他的信都已收到，他很高興他唸書唸得很好。

毛澤東要他的兒子向學校校長和教師、在蘇聯接受教育的中國青年、以及岸英的弟弟岸青，轉達虔誠的致意。他叫他的兒子不用擔心他的健康。他覺得身子很好。毛澤東告訴了他的兒子關於中日戰爭的發展。軍事作戰正在極端困難中進行，但中國人民決不會被擊敗，因為他們堅持不屈、耐勞吃苦、而且非常勇敢。中國共產黨現已構成一支龐大的軍力，有九十萬人之衆。在此數中，在國軍控制的省份和「特區」，不到十萬人。其餘八十萬共軍，正在

各處前線對日本法西斯主義者作戰。

毛澤東要岸英，在他見到曼紐爾斯基（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迪米特洛夫兩位同志時，切勿忘了向他熱烈致意。並稱，曼紐爾斯基和迪米特洛夫同志都會協助，並將繼續協助中國的「革命」。中國的同志和他們的孩子在蘇聯學校唸書、他們的教養和生活，都全靠他們的幫助。

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九日

中共黨的領導階層，正在試探與美國人進行接觸。第一步，他們開始做着基層工作，安排一批外國記者前來。不過，他們設法做得使人有種印象，這批記者是自己要求前來的。

同時，康生持之以恆，不停不息的將各種不同的情報，供應給美國的大使館和軍事機構。

一九四四年四月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

由於外國記者即將來到，延安顯得非常興奮。

毛澤東知道，關於抗日戰線團結的態度，乃是衡量中共黨領導階層的政策誠懇與否的重要之點。在此方面，重慶有着很多的不滿和各種各式的事實。毛澤東必須使這批記者，深信他効忠於聯合對日作戰的大業、忠心於全國抗日政府領袖的蔣主席、驅散各方猜疑，使他對重慶的挑釁態度，顯得是種和平態度，而使蔣主席顯得是造成「一切誤會」的人。

在延安，毛澤東禁止用任何或多或少或激烈措詞，提到或攻擊國民黨及其政治領袖們，特別是蔣主席。不過，在預定外國記者訪問的地區，將組織一些表示對中央政府政策不滿的「自動自發」的爆發。中共黨的領導階層，指定了一些村子和共軍部隊，來表現這樣一種

情緒。當地當局都受到了有關的指示。

在「特區」，留有所有各階段反國民黨運動的痕跡。在牆上，在泥巴的茅屋上，甚至在岩石上，到處都可看到反國民黨的標語。這就是爲什麼毛澤東要下令把所有這樣一種標語統統除去的原因。反國民黨的標語，立即換上一些新的：「加強抗日統一戰線！」「與蔣總司令合作到底，完成抗日最後勝利！」「打倒法西斯日本！」「國共聯盟萬歲！」「一切努力爲對抗法西斯日本奮鬥！」

爲了贏取外國記者的同情，最後對美英政府施行壓力，外國記者將有充分自由，隨意行動，並與他們所到之處的當地民衆交談。一些模範村匆匆作了一番掃除，老百姓的談話舉行了預演。總之，這個「交談」的自由，是必須遵照一種預先設計的計畫進行的。這裡每一件事都證實了那個古老的真理——一句假話，使另外一句假話得到了證實。

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

劉少奇和毛澤東是同鄉。劉現年四十六歲。他是在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劉的無可爭議的資產是他與工人階級運動有密切關係。自從一九二二年來，他就一直活

躍在工會中。參加過所有各次工人階級的大規模罷工，示威運動和武裝行動。一九四二年，他被任命爲新四軍的政委。

在迪米特洛夫的來電之後，毛澤東便時常的邀我去看平劇。我們總是坐在一起。江青知道怎樣使氣氛沒有拘束。在我對一些深奧的比喻，或是戲文的成語，覺得不懂的時候，她就隨時給我提出解釋。……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

延安的報紙突然琳瑯滿紙的刊出了大批來自前線的報導，講到關於中共部隊對日軍和傀儡軍所進行的虛構的大規模戰役、收復了的城市和村子、俘擄的戰俘和鹵獲的物資。

行政部門奉令準備資料，表示「特區」制度的民主性質。依照這個路線，正在建立一些模範村。

中共黨的領導階層希望使外國記者深信，「特區」是中國唯一的民主與軍事的勢力。

一九四四年四月廿日

在外交政策上，中共黨的領導階層寄望於美國能對「特區」的軍力感到興趣。

中共領導階層知道，美國正要找尋兵力，來對日本作一決定性的戰鬪。毛澤東準備把共黨的武裝部隊借出去，用於未來對日發動攻勢之戰。但，毛澤東希望依照某些條件，如此做去。……

在政治方面，這是假定美國改變立場，把中國共產黨視爲目前和未來中國的主要勢力。在物質方面，這表示美國將會給以作戰裝備、彈藥、武器的大規模協助。

我的假設，獲得了博古的證實，和任弼時的部分證實。毛澤東正在進行與美國人接觸。他的目的仍未改變：利用抗日集團來佔奪國民政府的主要陣地（集中中共黨的全部力量，致力於解決此一任務），最後，發動內戰。在毛的計畫中，對日積極作戰，祇是對美互惠協議中的一點。

中共的部隊便是毛在與美國賭博中的主要王牌。

我是否應該說，毛把所有這一切都瞞住了我？他的意向跟他向我和莫斯科所作的談話，距離差得遠。

實際上，毛澤東的活動，簡括的說，便是在加緊準備進行內戰，把這個國家帶到這個戰爭的邊緣，在侵略者正在蹂躪這個國家時所發動的一個戰爭。

一九四四年四月廿二日

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對於在聯盟之下所有承諾的忠信態度，需要有以證明。這就是在一方面是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董必武）和「特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另一方面是代表國民黨與中央政府的王世杰和張治中，雙方在西安開始舉行談判的原因。

林伯渠的別名是林祖涵。爲了不讓林伯渠這樣一個知名的人物引起注意，因此，他是以林祖涵的名字派去參加談判的。林祖涵原是他過去在黨內所用的化名。在所有有關談判的官方報導，都稱他爲林祖涵。這個謹慎措施是多餘的，因爲大家都知道他是「特區」行政機構的首長。

一九四四年四月廿八日

對於外國記者未來的訪問，毛澤東認爲有了一個機會，可與反希特勒聯盟的領袖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式接觸。他認爲新聞記者可以塑造輿論，政界人士就可坐下來辦理正經事了。

然而，在這兒，中共黨的領導階層却遇到了一個事前所未想到的困難。「特區」是以生產鴉片爲其特色的，這是說，成百公頃的土地都種着罌粟。這是一個非常不愉快而可恥的事

實。

如果播種正在進行之中，數百公頃都已播種，而罌粟花——並非花園裡的花卉——即將盛開，怎麼能把它遮蓋起來呢。……

於是著名的三五九旅，便被派出，把連接該營和延安之間一些道路，沿途兩旁種植的罌粟，統統加以毀去。第一旅也在做着這個同樣的工作。

一九四四年五月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

在四月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開始了談判。現在他們已陷於僵局，停止了進行。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

第一個大規模逮捕浪潮是在一九四二年秋發生的。這次鎮壓手段是隨「精神」整肅而來的。

第二個逮捕浪潮於一九四三年春橫掃「特區」各地，與蔣主席可能派遣代表前來延安有關。

第三個逮捕浪潮是在與國民黨發生衝突後，於一九四三年六月爆發的。這個運動稱爲「

暴露特區日軍與國民黨間諜」。

這幾次的運動，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已經完成。這些運動，都與整風混和在了一起，成爲一個龐大的壓制運動。

許多不同的較小規模的壓制運動，繼續不斷的增強了整風的力量。康生的「黨幹部與非黨人員考核委員會」於一九四一年開始工作。這表示這種壓制活動，要比外表可能看到的還要長久。

這個可怕的暴力浪潮，滾滾輾動，殘害著毛澤東的反對者。整風的工作是在保證毛澤東在未來全會中無可爭議的勝利。如果沒有獲勝的信心，毛是不會召開全會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廿五日

毛澤東正在加緊與盟國建立接觸。在他認爲，任何拖延，都屬冒險的事。

他透過他在重慶的代表團，盡力設法說服美國人，使他們相信，共黨及其部隊，乃是在中國唯一具有希望的勢力。……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日

在湖北，日軍正沿粵漢鐵路和公路一帶推進。在湖南，國軍已在攻擊粟裕的部隊。

日軍司令部利用在衡陽大戰的勝利，不遺餘力的致力於從印度支那半島，一直伸展到華北，建立一條單一的戰線。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一次訪問談話中說，他這次訪問中國，並不在於追求狹隘的選舉目標。

他強調現在中國軍事情勢的嚴重性，接着說，但這不應引起美國人民的失望。……

一九四四年六月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

盟軍順利成功的正在擴展在法國的灘頭。盟軍現在是由艾森豪將軍所統率。

日軍幾乎已達成了他們的目的——佔奪了整個縱貫中國的鐵路線。國軍未能擊退日軍多師的大舉殺戮。中國正面臨了戰敗的威脅。

在王家坪，每星期六照例都有舞會。江青和愛玩的葉劍英，便是這些舞會的靈魂。朱德總是第一個出場跳的人。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

塞班島之戰，已經進行三天。盟國不屈不撓的把更多更多的部隊登上陸去。日軍猛烈抵

抗。盟國將印度與中國之間的空運路線稱爲駝峯。每一個月都有數百萬噸貨物，在這條路線上空運送。

日軍正在攻擊株州（長沙以南）鐵路交會點，顯然目的在針對桂林（美國在中國境內的一個重要空軍基地）發動攻擊。在通向這些城市的遙遠通路，都有戰鬪正在進行之中。

日本在中國境內的軍事收穫，極大的補償了他們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島嶼蒙受的損失。縱貫中國鐵路線的佔奪，給了日本一個機會，可以通行無阻的從亞洲大陸，將最有價值的工業原料和糧食輸送出去。

滿載掠奪物的列車，就可越過整個中國、東三省和朝鮮。從朝鮮釜山港口到日本，祇有約二、三百公里的距離。日軍就可憑他們已經削弱了的海空軍來防護這條海上交通線。縱貫中國鐵路線的佔奪，以及中國在軍事方面的失利，便保證日本可以得到繼續進行戰爭所有一切必需的原料。

日本的作戰潛力，便大半有賴於這些交通線的正常運用。

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二日

華萊士在六月廿日到了重慶。

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七日

中央政府的軍事失利，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是一件最好的禮物。毛澤東在他與美國進行政治賭博中的機會，意外的有了很大改進——美國人正在亞洲熱烈地尋求軍事的支援。相互的試探，隨時都可能產生認真的接觸。

一個前日軍戰俘，現在是岡野數一數二最積極活躍的助手，給我看了些鹵獲的照片。這些都是叫人看了血都會得凝結起來的日軍暴行照片。我向他要了幾張這種照片。

簡直連想像都沒法想像得到，居然可能有這樣一種事的。

這些照片照出一些農民剝光了衣服，赤裸着身字，釘在他們屋子牆上。

這裡一個剖開肚皮，拉出了腸子的屍體，接着又有更多更多這樣一種屍體。

據這個岡野的工作人員向我解釋說，日本軍人的習慣，總是要把他們的受難者剖開了肚皮，把腸子抽出來。他們對大部分的中國戰俘，幾乎是每一個男人，都是這樣做的。但他們並不就此罷手。依照中古時代的信仰，肝是勇敢和威猛的象徵；因此，在許多情形中，日本軍人不但把他們的受難者剖開肚子，取出腸子，而且把肝割下來吃掉。要不是我親眼看到了

這些照片，否則我定會把這種事當作是狂人譫語的。

這裡是一些屠殺的照片。那些受害者顯出了最可怕的姿態。日軍並不是用槍打死他們的受害者，根本不是用槍打的，因為他們要節省子彈。他們把婦孺老人趕在一起，然後像練習劈刺樣的用槍上的刺刀向他們刺去。這裡是一張這樣的照片。照上顯得一些戴着平頂軍帽的矮兵，用刺刀和軍刀正在一批瘋狂的人羣中亂劈亂刺。……：

一張張的照片，照着一堆堆原本是人的肉堆。每一張照上都有一些軍官和士兵，擺起姿態，照在一起。

這裡是一張照片，上面有幾十個女人，掀起了裙，把褲子褪到膝蓋上。一些日本兵在她們面前蹲着。我希望這是唯一的一張這種照片！

大半照片都是照着一些強姦和羞辱的場面。隨處都有一些受了酷刑的女人和一些軍人照在一起。

又是一張典型的照片。照上是把一些受害者用傳統的方法砍下頭來。在照片上甚至可以看到那些日本人把這當做一種運動，大家比着技能。

那些軍人的臉孔顯得驚人的平靜，無動於衷，甚至像在打着瞌睡。

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最無人性、最厚顏無恥的一種暴力形式。

一九四四年六月卅日

毛澤東把所有到過蘇聯的人都稱爲「教條主義者」，儘管他認都不認識他們。

毛澤東和江青生有一個五歲的女兒。我祇見到過她一兩次。他們把她放在幼稚園裡，很少帶回家去。

一九四四年七月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美國代表團前來延安的問題，終於解決了。

這個代表團將由美國陸軍武官率領。代表團到達的日期尚未確定。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

毛澤東在六月廿九日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這次會議（祇有少數幾人參加）討論了美國軍事代表團未來訪問延安的問題。……

毛澤東要求把所有有關新四軍和八路軍，以及偽軍和戰地日軍的資料（一些最近正以最厚顏無耻，亂吹亂唱的數字），加以作一修改。

毛澤東詳細的說明共黨領導階層所規劃，對未來與美國全權代表進行談判的立場。主要的事是要得到美國的武器，第一步是取得四個完整步兵師的武器。作爲一種保證，毛澤東準備答應，在戰爭期間和勝利之後，與美國合作，並願向他們提供使用「特區」的資源（軍事的與經濟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今天是中國開始對日抗戰的七週年紀念日，雖然這個戰爭的開始，實際上還要早得多，從東三省的割裂就已開始了。這個屠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多大的痛苦和悲哀！

我正在學習日語，現在已有半年了。我還不能講，不過我已能很方便的閱讀日文。日本字是基於中國字來的。這對我的學習，就很方便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三日

華萊士副總統會盡其全力，造成一些先決條件，來消除全國團結的分裂。從新聞報導判斷，這便是他這次訪問的主要目的。

五月間，林祖涵從「特區」去西安，恢復共黨與國民黨的會談。

中國輿論對於這個實際已有多年未曾進行的會談開始舉行，寄以極大希望。

外國電台廣播，強調這個會談的極大重要性，因為由於七年戰爭的結果，國共的分裂，使得中國的局勢，益形惡化。

五月間的恢復會談，對於克復這種分裂，也產生了樂觀的情緒。而國共的分裂，正是日軍攻勢，得以順利進行的原因。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我和毛作了一次長談。

他顯得很困頓，他的背比往常彎得更厲害了；香煙灰落到了他的膝上和紙上。

毛的談話意義，充分表示，從今以後，共黨的總路線即將採取完全獨立的地位，與國民黨對抗。從他的談話，使我覺得，國內最近情勢的發展，對中共黨的領導階層，是一個愉快的意外。重慶的政府，已瀕臨危機和崩潰。那就是為什麼與國民黨會談的方法，已經過時。會談已不再需要；那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階段。……

毛澤東說，「美國的立場，對我們的未來前途是非常重要的。」

他和他的支持者深信，一方面，在美英之間，另一方面，在美國和「特區」之間，相互

修好是不可避免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正是白宮需要的軍力。而且，延安當局的團結和實力，在盟國方面是必然會感到吸引的。盟國方面別無抉擇，唯有承認「特區」（隨後還有其他的蘇區）為中國唯一的真正勢力。

毛澤東並沒一個字講到蘇聯或蘇聯對解決遠東問題的關切，雖然蘇聯的遠東邊界，曾有一過不祇一次，成爲一個軍事緊張情勢和流血的地區。

在「延安解放出版社」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曾寫到（至少他的意思可以這樣的解釋），沒有蘇聯，中國是沒法打勝法西斯日本的。現在他已得到了相反的結論，有意把他自己大部份與美英聯起手來。

我認爲，在所有這種情形後面，還有另外一些事，在毛澤東却不願說出來。他指望美國和英國有種畏懼。在他認爲，這種畏懼應能推動這兩國家，緩慢地，但是可靠地，與「特區」進行修好。

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很明顯的希望用蘇聯侵略成性，以及所稱它熱切希望吞併中國（特別是東三省）的神話，來敲詐盟國。他們相信，在未來與盟國的關係中，這種虛構的蘇聯威脅，將爲美英主張與延安修好的主要論據。

然而，這也還不是全部的意思。毛澤東不但希望得到武器，推翻中央政府。他還計畫要

利用美英承認「特區」，來排除蘇聯有效的參加解決遠東問題。總之，他希望能使蘇聯的一切外交努力，失去作用。

憑着美英兩國的援助，毛澤東希望得到一種力量，幫他建立對整個中國的控制，進行對他自己有利的政策。

當然，毛澤東並沒對我講到這點，但是爲了與美國代表團舉行會議所做的籌備工作，確是朝着這個方向進行的。同時，他增加與莫斯科的通信，用來遮掩未來談判的真正動機。跟我談話，用意是在消除我的懷疑。

這和毛最近告訴莫斯科的話，正好是背道而馳的。他雖然繼續發出他的「友好電報」，但他認爲蘇聯頭子們的意見煩死了人。中央政府的部隊正在敗績，毛澤東指望美國人無法避免的會同意他的那些主要建議的。在外表看來，一切都顯得非常冠冕堂皇：這些武器是需要用來把日軍趕出中國的神聖國土。

我們的談話顯得很古怪。大半時間都是毛一個人在講話。有時他一連講個一兩小時，甚至更多時間。我是擔任一個洗耳恭聽的角色。如果我有不同意見的時候，他就很不高興。如果我把不同的意見表示出來，他會突然的改變了話題（要是換了別人，遇到同樣的情形，他就會用侮辱的態度來對待他了），或者就是專心一意的神經質地一支連一支的抽着香煙。在

這樣的時候，我覺得他這樣的容忍我，在他該是多麼的難受，在我心裡也會多麼的不痛快，他跟我們實際上有着多大的距離。……所有這一切客氣的交談，請去吃飯，還有相當粗鄙的笑話。……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

毛澤東承認蘇聯是反希特勒聯盟的領導勢力，祇是一種嘴上講講的空話，專門在一些文章裡和發給莫斯科的賀電中用的。但他這樣的表示承認，也就顯示他對他自己與蔣主席的地位相較，並無信心。如果明天就爆發一個軍事衝突，那就怎麼辦？誰在過去曾幫助過他，將來也會幫助他的呢？這就是爲什麼一直都有有一些特別選定的標語口號、保證和「誠意」的談話，來討好莫斯科的道理了。

王明已不再提到。這個對「莫斯科派」的鬭爭，對毛澤東來說，已成過去之事——這個階段已經過去，雖然並不怎樣順利。……

現在我對毛澤東已經知道得很清楚，我知道他跟王明的衝突，另外還有一個動機（當然並不像那主要動機那麼重要，具有深長意義）。在世界大戰前，王明被認爲是中國共產黨中數一數二有名的理論家。毛無法容忍這個情形。當然，這並非主要之點，但這是毛的特性。

夜，萬籟靜寂。當我在紙堆裡一頁頁的翻去時，蠟燭火焰漸漸放大，跳着舞。報告、報紙、無盡的翻譯。在最新一篇翻譯中，最後的結尾是：「毛澤東是我們的黨和人民的狼戰好鬪的頭目。」情形就是如此發展出來的，這是無可逃免的。

我跟毛的接觸，使我深信，他祇有在真心誠意對他有利時，他纔是真心誠意的。道德標準是與他無關的。如果你有實力，或者可能達到一種什麼目的（即使是經由一種最不漂亮的手段），那就幹！是否正當，以後再找理由！

無論那一個人，或是成百萬人，對毛都沒有興趣。重要的是爭取權力。他很少顧到，究竟需要多少犧牲，這一步驟或那一步驟，是否是種冒險主義的行動，或者是否可能以較小的犧牲，來達到這個目的。在他看來，人民祇是用來實現他的計畫的一種工具。我覺得在他的談話中，有時就有種像基督救主樣的味道。他高高站立在人類、法律、道德和苦難之上。在談話談得忘其所以時，有時他確實就是用這種口氣講話的。他是極端無情的。對他來說，善惡是種可隨一己便利來決定的事。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

毛澤東由我經手，又給莫斯科發出了一個電報。

這份電報詳細敘述國軍部隊失敗的原因。在衡陽之戰中，中央政府的部隊，不是逃避作戰，就是與敵人最初一有接觸，便拔腳就逃。軍官士氣低落。人民並不支持軍隊。國共談判並未產生任何結果，雖然中共黨領導階層維持着一種審慎的路線。這個會談將會繼續進行。

在日本後方進行戰鬪行動的中共部隊，與在前線作戰的國軍，其間便有極大不同。而這種不同，正在繼續增加。中共部隊繼續有着進步，實力不斷增強，而國軍部隊則正日益受到危機的影響。國軍部隊正在慌張退却。他們即將解體。如果敵人繼續採取攻勢，共黨與國民黨雙方部隊之間的不同，將會愈益顯明。

共黨在敵後，一直都有順利成功的作戰，特別是在過去幾月中。在一些主要基地，人口已有增加，現在已非七千萬人（如過去所報告者），而是已達接近八千六百萬。在中國不同戰線上，中共部隊已消滅了大批偽軍和敵軍官兵。在南方、中部和北方戰線，業已克復若干地區，以及許多城鎮，包括二十四個區中心。

我在毛澤東電報下面加上了幾句：

——毛澤東對一些主要問題的觀點，與實際情形不符。毛澤東對國共關係，以及他們的參加對日戰爭，所作評價，頗多偏見，不够客觀。

——電中所舉數字，均係採自專為一批外國記者到達延安，作為宣傳之用準備的材料。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據同盟社報導，東條首相業已辭職。

中共黨的頭目們，希望在與美國人談判期間，撇開重慶，單獨獨立的與美英取得外交關係。他們將建議盟國在「特區」設置領事館。

毛澤東告訴我說：「不論我們和美國採取什麼形式的接觸，我們的革命最後還是會轉過頭來對付帝國主義者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二日

對毛澤東來說，這是一個最大勝利的日子！美國代表團第一批九位官員到了延安。

中國共產黨所有的頭目，都到了機場。毛澤東和朱德都穿着新的唐裝，有意要表示黨與軍的團結。

毛澤東顯得很神氣活現。

軍樂。外表顯得很勇氣勃勃的兵士，表現着中共武裝部隊的高昂士氣。等得不耐煩的人羣。鄙人自己，帶着一架萊卡相機，還有最近從莫斯科來的塔斯社記者普洛盛科。……

降落時，那架道格拉斯飛機溜出了跑道。一片塵灰，螺旋槳咯的一聲落了下來，駕駛艙癟進了一大塊。很幸運的，沒有死傷。

毛澤東興奮極了。總之，美國是否會承認中國共產黨爲中國的領導勢力，並非重要（在他們沒有來到之前，他本來認爲這是很重要的）；主要的問題是得到武器，儘可能多的大量武器，毛澤東一直知道，權力是憑武力奪來的。……

日軍的佔領國土、同謀侵略、背叛蘇聯對法西斯作戰的利益——所有這些，在毛看來，都祇是「策略上的成規」，別無其他意義。……

正式典禮過後，美國人和中國人，使用繩索齊聲協力的把道格拉斯飛機拉回了跑道。

美國人都穿着皺癟兮兮的軍服。領上釘着軍階章。

就像白瑞德上校一樣，其中許多人在左肩上都有一個中國陸軍美軍顧問的徽記——並排的一面青天白日中國國旗和一面美國國旗，下面部份是鋪滿了藍白相間的直條。

白瑞德上校是代表團團長。他是從昆明來的，過去原在緬甸叢林中作戰。

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三日

蔣主席將美軍觀察團的最後人數，訂爲十八人。昨天來了九個人。其餘的在必要時再來

延安。這個代表團一部份人將長駐在此。

江青向我訴說，他的丈夫患着失眠，已有相當時間，一直都要吃安眠藥片。……

毛澤東很易害傷風。他喜歡穿棉大褂，避免住暖熱的地方。

我愈多認識了他，我便愈明白的知道他是個多麼心胸狹隘的人。

毛澤東極喜歡人家把軍事的勝利，都記在他的身上，他甚至從不把這種勝利歸諸「中央委員會」或軍事指揮部。

一九四四年七月廿四日

七月廿二日到達延安的是白瑞德上校、克洛姆萊少校、卡斯柏格少校、史坦爾上尉、杜姆克上尉、惠特賽少尉、雪孟尼中士。他們是由重慶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謝偉志陪同前來的。

一九四四年八月

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

美軍觀察團的團員，大半都是重慶美國陸軍武官處的軍官，或是史迪威將軍參謀部的軍官。他們都是情報、政治、通訊、大砲和步兵武器方面的專家。一批有很多人的新的軍官，加入了這個小組。

在這個小組的軍官中，有日本問題的專家。我和這批美國正規軍人初步的接觸，使我深信，他們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反俄情緒，在許多情形中，更擴大到了率直的恐俄病。在這個小組中的情報人員和政治軍官，在此方面，也都沒有例外。在美國，反蘇精神是每一個正規軍官所必需有的特性，特別是在情報軍官。

周恩來在中共黨的領導階層中，是跟美國人談話的領袖專家。沒有一次會談是沒有他參

加的。在所有這些日子裡，他和毛澤東可說是寸步不離，從未離開過他的身邊。如果說，在這許多個月裡，周恩來一直都在準備和推進一切有關組織這次觀察團訪問的談判和措施，那是絕非誇張的。他在重慶的整個機構，曾不辭辛勞的進行工作，來克服在舉行這次會談途中所有的各種困難。

陳家康是在這次與美國人談判中的首席翻譯員。他是周恩來的親近助手之一。他擅長與美國人的接觸。這樣一種接觸是直接與美國陸軍武官處人員建立的。

馬海德立即擔任了美國代表團翻譯官的任務。美國人把他稱做馬博士（醫師）。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

中共黨的領導階層對國軍部隊在河南湖南失利的消息，大為高興。這是天賜毛澤東的一個禮物。他和美國人討價還價的機會，正在迅速擴大。他在內戰中的未來敵人，力量正在削弱了。

他的估計很簡單——不論什麼時候國軍遭受一次失利，「特區」就因此得到一個便宜。美國人帶了一些武器樣品到延安來，讓雙方可以會同來挑選最合適的東西。

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

林祖涵與國民黨代表進行的談判，已從西安遷到重慶，最近又告失敗結束。

國軍部隊在湖南的失利，把「特區」代表林祖涵送上了一個完全新的地位。在過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曾擔心，國民黨會對他們暗中破壞民族統一戰線，以及將中共黨正規部隊對日軍發動的戰爭，降低爲局部零星衝突（游擊戰）的政策，施以相對的制裁。

談判陷於僵局的原因，已爲衆所週知。

據重慶和外國報紙報導，這時共黨已將他們部隊兵員的實力，增至四十七萬七千人，人民志願軍，增至二十二萬人。

外國報紙開始報導，共黨已在日軍後方的基地區，組織了他們自己的權力機構，並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重慶政府對這些地區的態度，自然便充滿了懷疑。共黨還要求在陝西、河北、山東，建立他們的政權。

在過去幾星期的談判中，林祖涵要求准許中國共產黨在政府中給以合法的地位。接着，在重慶，林祖涵提出了一些新的條件（這次是二十條）。

蔣主席已斷然加以拒絕。這位中央政府元首希望以組織聯合政府，來達到折衷解決。

一九四四年八月七日

美軍觀察團的另外一些團員已於今日到達。他們是福斯中校、彼得金少校、杜爾少校、杜萊上尉、祁區中尉、瓊斯少尉、葛萊斯中士、和四等技士中村。

重慶美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魯頓也來了。

歡迎場面完全是七月二十二日那一次的翻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在整個儀式中自始至終一直在場。

一些外國記者也都在場歡迎這些美國人，其中有艾普斯坦、伏陶和另外一些人。馬海德也在場。

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

在湘豫發展之前，「特區」的政治情況，一直都很緊張。他們儘管有反國民黨運動，但對蔣主席一直很害怕。而且，國軍駐在「特區」南部邊界的幾個師，也形成一種威脅。現在這個態度便有了激劇的改變。

美國人參觀了醫院、在延安遊街觀光、諸如此類的活動。馬海德就像是他們的一個自己

人。

宴會和各種戲劇表演，來招待這些美國人。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

今天，毛澤東把我召去說，「我們正在想着要把我們的黨改一個名字，不要稱它『共產』，用一個另外的名稱。這樣對「特區」的情形就可以比較有利，尤其是在美國人方面。……」

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日軍的文件紀錄，都給美國人仔細看過。他們都熟悉了中共軍在過去幾年中進行的軍事作戰過程。不用說，其中所提出的，含有着多麼大的宣傳成份。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

政府部隊在河南湖南的失利，以及美國新聞記者和軍事觀察員的到達，使「特區」的軍事情勢，有了極大改變。各種發展，對中共黨的領導階層來說，比了過去更加有利了。甚至超過了最樂觀的預測。

中共黨的政治總路線，並未改變；仍然是激烈的反對 蔣主席，祇是最近的發展，已對這個目標的實現，造成了更爲有利的環境。

毛澤東的權威變得格外大了——總之，他一直都反對抗日統一戰線，主張對國民黨進行內戰。現在國軍的失利，似乎證實了他的一切分裂活動和他在歷史分析方面對「馬克斯主義的深切研究」的正確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和美國人方面，正在度着他們的蜜月。他們熱情地相互獻着慫勸求愛。

我們沒法知道一點關於毛澤東的傳記，除了那本經過文飾了的「官方」版本。他從不提幼年的回憶，也從不講到他的愛人和朋友。這些都是犯禁的。他的一部「官方」傳記，是每一個人都必須閱讀的，以便「鞏固革命的精神」。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

儘管在報紙上和其他方式的反國民黨運動，叫囂喧嚷，聲勢洶湧，但大家還是很怕蔣主席。在反國民黨運動中，便可感覺到一種怕懼和不穩定的意味。每一天、每一小時、他們都害怕來自重慶的相對的壓制——他們的部隊突然發動全面攻擊，作爲掩護，也作爲一種保障。中共黨領導階層決定派林伯渠再去進行一次談判。他們曾把這一件事通知國民黨領袖

們。我斷定（毛澤東的作風使我首先第一個深信），要不是因為前線情況，有了這個突然轉變，共黨領導階層當然是會提出讓步的。

反國民黨宣傳和整風，在黨內造成了一種低壓、窒息的氣氛。在黨的各種組織中，人人都擔心着明天，他們放棄了任何的主動，機械地填塞着從中共黨「中央委員會」交下來的命令，填塞着「二十二項文件」，來使他們自己贖補他們並不存在的罪，來表現他們更大的效忠。缺乏信心，顯然可見。他們所大聲高呼的口號，他們對毛澤東的宣誓效忠，祇是掩蓋住了迷惑、失去同志之誼、恐懼、甚至失望。

至於團結，在黨內從底到頂，就並不存在，那種在毛澤東所稱，過去所曾力求爭取，目前仍在力求爭取的團結。在他和我所作的談話之中，他總喜歡反覆一遍一遍的說，整風實際上是「爲爭取黨的團結進行的奮鬥」，當然並不提到這個運動的詳情細節。在此，我也同意他的意思——這是爲了爭取服從毛澤東而團結、爲了爭取承認他爲領袖地位而團結、爲了爭取所有黨員同意他的，僅祇同意他的意見而團結，所進行的奮鬥。

這便是過去在黨內和領導階層中的情形（在目前，相當的程度，也仍如此）。

在領導階層中的多數派——劉伯承、葉劍英、博古、周恩來、彭德懷、和其他許多領袖同志，故意的反對（當然是遵照毛的指示）由劉少奇、賀龍、彭真、當然還有康生一批人組

成的少數派。

最初，共黨領導階層的這個多數派或多或少，「對他們被判的罪名表示了改悔」，和惡性重大的康生那一小撮人站立了在一邊，接着在一九四三年經過了思想觀念方面的「粉身碎骨」之後，他們便隱隱的變成了毛澤東的信徒。

但在領導階層中這兩部分的關係，一直都很緊張、互不信任、充滿猜疑、在許多情形中，更是率直的敵對，雖然在外表上，他們都採取了同一的意見。

湘豫的失利，外國新聞界代表在「特區」的訪問之行、觀察團的來到、俄軍的勝利、蘇聯權威與軍力的繼續增長，都強烈的影響了延安的情形和共黨內部的氣氛。中央政府方面鎮壓的可能，已經排除，至少是暫時的——在每一個人的肩上都卸去了一付重擔。生活漸漸的恢復了正常，當然，其間並非毫無困難。

但毛澤東假稱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計劃進行的。總之，他正在把這個黨和「特區」做着準備，以便對 蔣主席進行衝突，他煽起反國民黨的熱情，或者利用湘豫的發展——他不是曾經預言到這個結果的嗎？

毛澤東用種種方式，把這些事都從有利於他的立場，來提出解釋，來證明他的政策的正確……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日

羅斯福總統宣布，納爾遜和赫爾利將以他的私人代表身份，訪問中國。

納爾遜是美國軍事生產局局長。赫爾利是前美國陸軍部長。

毛澤東漸漸的適應了新的情勢。那些過去的「機會主義者」、「教條主義者」、「莫斯科派」，都給拉來參加了工作。毛澤東亟需一些有經驗、有效率的幹部，這種人是沒法由康生情報局中提升起來的人取代的。至於領袖工作人員，毛澤東漸漸的重用着朱德、彭德懷、博古、周恩來、聶榮臻、葉劍英的一批人。他們慢慢的變成了他的主要僚屬。所有這一切決非出於毛的誠意，而是情勢所迫，不得不爾。

這就不可避免的使過去有力的康生少數派（包括劉少奇、賀龍、彭真等）失去了權勢。一九四三年的行動，在目前黨的組織之內，根本就不可能重演了。共黨黨員決不會再加以接受。康生感覺到了這一點。毛和其他所有的人都感覺到了這一點。

不接受這個新的情勢，便表示將會失去了對未來發展的控制。這就是毛所以使他自己適應着這個情勢的原因，以便利用情勢的演變，來謀取他自己的利益。

黨員們都很高興。在他們認為，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的壓制是越軌的，康生和他的

部屬必須負起全部罪責。

毛對這樣一種態度，並未有所行動，來加以制止。這是一種手段。他仍保持着清白、賢明、無瑕可擊。整風對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必需的運動，但遺憾的是，給那些「技術上的執行者」歪曲了。這就是對毛澤東的態度所能提出的解釋。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一日

美國總統宣布派遣赫爾利和納爾遜來中國，携有一個緊急而極端機密的任務。

納爾遜實際上是華盛頓最重要的行政官員。納爾遜負責美國整個國防生產計劃，換句話說，也就是美國工業的軍事化。他在美國整個經濟的管理中，居有一些極重要的職位。把這樣一位人物派來中國，證明白宮對中國問題的特別重視。無疑的，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對美國政策的發展，極關重要的訪問。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四日

美國人今天視察了王震的三五九旅。在主要的專家中，包括有白瑞德、福斯和杜萊。魯頓也擔任了一個活躍的角色。

這批美國人和新聞記者，乘坐一輛汽車，去到這一旅的駐地爛泥灣（譯音）。

我也不讓自己錯過機會，參加了這次視察旅行。

那些美國人給介紹認識了這一旅的指揮官，他們展示了他們的武器，說明了他們的軍事記錄。一切似乎都是經過了預演，使來賓留下一個深刻印象的。

聽隨朱德的指揮，在後面幾排裡有一些兵士大聲叫出：「打倒國民黨！」又一次的表現人民與軍隊自動自發的情緒。

白瑞德上校向部隊發表了一篇演說。

美國人顯然渴望要找尋一條經由「特區」到東京的最短的途徑。……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六日

我一點都不確實知道關於中共跟美國人談判的情形。談判已在全面進行。

許多外國記者曾訪問了「特區」，現在經常的又有一些新的記者來到。每一個人都熱切的希望知道這些接觸究竟會產生一些什麼結果。

情勢純粹依照毛澤東的作風發展中。現在毛有意把整風的「越軌」行動，完全歸咎於康

生一人身上，保全他自己良知的清白。許多事實都可說明此點。

例如，毛澤東把所有由康生寫的文章，送給博古（！）去修改。博古是康生的最大死對頭之一。博古始終沒有跟康生恢復修好過，一直都讓他感覺到這是一個完全並不存在的東西。

毛澤東的這種姿態，毋庸置評。他把他的指頭指在那些對整風懲罰行動實際負責者中間的一個人，來讓他自己擺脫與此種行動的關係。這是對康生當胸踢出的殘酷的一腳。

在分配在共黨未來「七大大會」中提出的報告裡，毛澤東「忘記了」把康生分配進去。康生給丟了不用提出任何報告。又是當胸的一腳！

毛澤東埋怨整風的越軌，說是一切的計劃，原來都是清清白白、公公正正的，但現在應該承認，關於對黨幹部進行整肅運動所採取的方法是錯誤的、有害的、甚至是相當武斷的。再是一腳！

康生顯得很迷茫。他絕未想到他所崇拜的主子，竟會做出這樣的事來。

毛澤東也曾對我講了這樣的話：康生完全越出了他的權力範圍、歪曲了這個很有價值的工作、把對幹部的政策「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九日

毛澤東對於必須對王明爲首的「莫斯科派」進行鬭爭的這一重大問題的立場決不退讓。他下令要寫一個譴責王明的劇本。但這終究和用汞處方來加以毒害，或是把他放在一個密洞裡，加以隔絕，並不給以任何合適的醫療，有所不同。這是在新環境中譴責「莫斯科派」的一個頗能爲大家所接受的變化方法。這並不祇是譴責，而且也是繼續的鬭爭！

這個劇本的結構已經計劃好了。題名是「同志，你走錯了路」。這個劇本譴責那些使中共與國民黨和 蔣主席合作成爲可能的黨員。

康生已不可能與那些曾經受過他「鞭笞」（實際的與名義的）的人重新修好。他們痛恨他，現在便來發洩他們的仇恨了。

彭真和一些低級工作人員，便都公開的背叛了他們的頭兒。他們深恐受到譴責和孤立，他們儘量設法和那些曾受他們「鞭笞」過的人，尤其是毛澤東的一批新的僚屬，建立接觸。

一九四四年八月卅日

軍事情勢（僅對「特區」而言）的有利變化、外國新聞記者的訪問、和美軍觀察團的留駐，使毛澤東不得不停止了整風。至少是整風所有外表的表現，已經看不到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

在共黨黨員中，對於過去幾年的「精神整肅」和報復行動，有着一種不滿的暗流。在國際和中國本身，政治情勢的激劇演變，使毛澤東對康生的「黨幹部與非黨人員考核委員會」過去的活動，以及康生個人的活動，提出了強烈的口頭譴責。

毛澤東並非反對整風和黨的整肅，在思想觀念方面的意義。他祇是勉強的反覆說，康生是做得太過份了一點，犯了「某種歪曲」。……

現在「特區」的美國代表團，由重慶助理陸軍武官白瑞德任團長。美國代表團中最活躍的是謝偉志和魯頓。

謝偉志和魯頓是史迪威總部的政治顧問。

白瑞德已通知中共黨的頭目們，他很願意充任延安和美國政府的聯絡人。

周恩來的一舉一動，彷彿就像他是這些美國人的老朋友。

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

白瑞德本人很關切於裝備、武裝和管理八路軍和新四軍。

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

如果並不知道毛澤東對於此事的想法，很可能會有人敢於公開批評康生的。對毛澤東來說，很重要的是他不僅要與這件不名譽事擺脫干係，保持清白，而且也要使這因整風運動已告窒息的黨，重新恢復活力。在他認為，這是最高優先之事，因為他需要黨的幹部。在新的環境中，這個需要便高度的急迫，在明天，還將更加急迫。共產黨人的熱情，對於與國民黨衝突的結果，有其重大關係。「精神整肅」癱瘓了幹部、使他們變得虛弱、害怕獨立行動。

這就是在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最近一次會議中，周恩來突然對整風運動，發動

攻擊的原因。

周恩來直到這一刻為止，過去一直是熱情地實行着所有一切整風的箴言，他並曾屈辱地立誓將來決不犯此「錯誤」，現在他却忽然的要求譴責整風的形態和方法！周是心照不宣的獲有毛澤東的支持的。他利用周作為傳聲筒，向黨的幹部提出呼籲說：「你們無緣無故的吃了苦頭！你們是無辜的！讓我們工作！不要怕工作！」周恩來確定聽衆已聽清了他的意思，於是便要大家不要對這樣一種整風加以譴責，而應對在技術上的執行者算賬。

黨內的這個新氣質，便對整風那種令人心驚肉跳、痛遭屈辱的方法，提出了自動自發的抗議。但毛澤東把權柄緊緊握在手裡，以最適合於他的方式來指揮所有那些「預定提出抗議的人」。在這次情形中，就必須譴責那些在技術上執行整風的人，警惕黨的幹部，使他們處於「備戰」狀態。如果不知道毛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是誰也不敢開腔的，因為祇有在毛親自訂定的範圍之內，纔能享受政治的獨立地位。

周恩來的演說是針對康生而發的，他在這兒似乎已經成爲大家普遍厭惡的人物。現在中共黨領導階層之間的普遍恐懼和相互不信任的情況中，唯一的例外，便是他們毫無保留的承認毛澤東的權威和他們對康生的一致痛恨。友好的感情是很少有的。這一切都是由於殘酷的權力鬭爭所產生的政治與思想觀念越軌的結果。

但周恩來的演說還有另一面的意義。他顯然要設法把康生和毛澤東分開，讓他來反對毛澤東。這樣做法，他便是在追求多種目標。第一，他正盡其全力不要傷害到毛澤東，用斬釘截鐵的措詞來指出那種報復活動，究竟應由誰來負其罪責，盡力爲毛洗刷，來取寵於他。第二，他正致力於貶抑康生的聲望。這不但可以使周得到滿足，而且也可使所有由於康生的懲罰權力吃過苦頭的人得到滿足。康生失勢，同時也就使他失去了報復的能力。

周的演說，在黨的領導人員中，引起了極大的興奮。現在毛澤東所關切的，便是注意這個新的路線，不致發展成爲一種一發不可收拾的措施。

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

日軍正在大舉朝向桂林推進。

毛澤東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態度，既非策畧的論據，亦非政治的論據，所能證明其爲正當的。不論怎麼說是與國民黨勾結的那種說法，與抗日統一戰線的團結，都是絕不相干的。這種暗中破壞的活動，採取幾種不同的方式：公開的反國民黨運動、拒絕談判，自稱是爲防止分裂而提出的不合現實的要求。這個政策便利了日軍的勝利。在日軍方面，並不要打跨毛澤

東，而毛澤東認為，國軍的失利，便是削弱國民黨的地位的主要方法之一。

毛澤東利用「特區」在地理上的特殊地位，其中大半地方都在僻遠之區，一些幾乎無法接近的山地省份之內。而且，毛澤東已下令作零星分散的戰鬥，而並不對日軍作有計劃的掃蕩戰，因此，以他大部份的部隊用來蠶食國軍的陣地。除此之外，中共黨現在已能在邊界地區集合起龐大的部隊，以便對中央政府作戰。

毛澤東現正從日軍的勝利、各戰線的崩潰、毫無理由的推測國軍的失敗，來等待他的勝利。同時，他正設法以「現實的馬克斯主義」來頌揚他的策畧。「現實的共產主義」便是一種對全國戰線的一個不共戴天之仇，所作的理論化的投機，一種不僅對蔣主席，而且也是對抗日聯合行動鬱鬱於心，年深日久的敵意態度的產物。早在一九三八—四〇年時，這個敵意就曾表現了在毛與王明的衝突中。在那時候，毛澤東投票贊同了統一戰線，但他却竭其全力，來使這個戰線解體。事實上，他暗中陰謀計劃要達到他的目的，來向「共產國際」的策畧挑戰。

毛澤東對中國全國抗日勢力的分裂，其所應負的責任，決不亞於那些最反動的右翼份子。

我們可有充份理由認定，在所有這些年中，毛澤東的政策，使日軍可以容易得很多，來

挑選他們軍事行動的方向。

日軍繼續採取攻勢，但同時，從共黨部隊所採取的消極策畧，取得了一些切實的結論。

中央政府軍事將領在黃山舉行了一個會議，由蔣主席擔任主席。參加會議工作的有中國的盟國。

中共黨的頭目們接到這個消息，非常關切。朱德和周恩來立即要求白瑞德提出一個解釋。

這位美軍觀察團團長並不否認這個來自黃山的報導。

八路軍和新四軍實際上自一九四一年以來，就已停止了軍事作戰。最後一次對日軍進行的大規模作戰，是在一九四〇年發生的（稱爲「百團大戰」）。那次的作戰，目的在截斷日軍在華北的交通線。日軍擊退了這個攻勢，對中共部隊造成了重大的損失。由於與突破日軍後背的第四軍發生衝突，對日軍的抵抗，就此大爲削弱。

這些發展，與毛澤東有意在黨內發動一次鬪爭，剛好有了巧妙的配合。毛澤東利用這些事實，來證明他在這些發展以前，很早就已定型的見解的正確性。這種見解有一部份曾在

的「新民主主義論」著作中提出過。毛認爲中國共產黨參加抗日戰線是錯誤的。軍事作戰的結束，便是發動內戰計劃的一部份。黨內的鬭爭（爭取「現實的馬克斯主義」的鬭爭），便產生了整風。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

觀察團中最積極的團員是謝偉志。他在上次與毛澤東舉行的會議中，提出了許多問題。謝偉志認爲，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答覆，進一步的會談是決不會有何實質結果的。

這些美國人實際上是問毛澤東：如果你答覆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知道你抱的究竟是什麼信仰。

謝偉志也問毛澤東，美國的資本，究竟要以何種政治與經濟的立場，纔可能在中國進行投資，他對於由美國人來主持（或是准予參加控制）一些龐大的工業組合，究竟作何想法。

謝偉志對於在中國雇用大批美國人員（工程師、技術專家等），顯得具有很大興趣。

他直截了當的問毛澤東，他認爲中國未來的國體組織（在形式上和實質上的）將是一種怎樣的組織，中國共黨的領導階層究竟正在如何計劃在中國取得政權。

謝偉志順便談到美國方面對這未來組織的看法。

謝偉志年紀很輕，一身衝動，記性很好。毛詳細的回答了這些問題，甚至給他提供了一些意見，然後跟着發表一篇冗長的演講。謝偉志耐心聽着，接着再提出一些問題來。如果毛拒絕給以率直的答覆，謝偉志便另外再提出一些問題，緊釘着迫出他所要知道的中心要點，就這樣的取得了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資料。他也告訴毛澤東，美國大使館已接到華盛頓方面的一個重要電報，希望要重慶政府進行改組。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聯合政府，包括所有一切具有影響力的政治組織、集團、政黨，當然還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代表。

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便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華盛頓趕着投進這個爭執中，以便在中國取得一種主要的地位，把「特區」置於它的控制之下。羅斯福政府相信，它決不會受到挫折，在「特區」成立一個親美的集團。

在美國方面，所有一切政治問題都由魯頓和謝偉志來處理。如果沒有華盛頓的授權，他們顯然是不敢從事這樣一種接觸的。

白瑞德負責軍事戰畧的問題。

謝偉志照他進行會談的方式，使與會者毫無疑問的覺得，中國未來的政治組織，將是建立一個「人民的中國」，而以共產黨作為領導勢力。

謝偉志顯然是美國代表團中最重要的一員。現在他以美國全權代表的身份，專心一意的

來進行政治方面的討論。他無疑的會把他的會談結果，向重慶提出報告，再由他們轉送華盛頓。很顯然的，美國和中共黨領導階層的政策，對於他們共同目標、永久的聯盟、以及雙方的利益，正在互相拍合起來了。蘇聯的幽靈，不免的一直出現在這些會談中，對參加會談的人有着一種顯然可見的影響。整個來說，會談的氣氛，還是不免有種緊張的急促、保留的談話、和相互的不信任。……

在過去四週，謝偉志一直反覆徘徊於他和毛澤東以及中共黨許多高級人員所談到的同樣一批問題之間。這個美國人曾會晤了葉劍英、博古、周恩來和另外一些人。我得到了很少一些資料，而這些資料和實際的情形，往往很不相同，博古幫我在這些陰謀的手段中，摸清一些路子。

魯頓不是一個很能講話的人。他通常都是跟着白瑞德或謝偉志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

謝偉志、魯頓和白瑞德，曾跟周恩來和葉劍英會晤，詳細討論黃山會議的結果。在這個會議中，那些將領擬訂了一個對日軍進行軍事作戰的計劃（反攻計劃）。但蔣主席向美方代表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條件。主要的問題是，國軍部隊已失去了很大的戰鬥效率。這就是

爲什麼必須把那些在特別訓練中心，由美國軍事教官訓練好的完整實力的幾師新軍（這樣的幾師新軍，這時正由魏德邁少將編練中），加以裝配起來的原因。約有五千美國軍官，預期待即將到達，擔任教官和顧問。但美國顯然不會讓這批新軍用來對付共黨。

在黃山會議中，美國也警告中國將領，切勿基於陳納德將軍的空軍（基地設在印度，僅用於支援作戰），或是美國的登陸部隊，來作反攻的計劃。美國無法派遣任何大規模的步兵部隊，來到中國。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

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曾就黃山會議的結果，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並作成適當的決定。這些決定，可從朱德和葉劍英向觀察團提出的要求，畧見一斑。中共黨的頭目們要求，將來美國武器的分配，應加監督，因爲蔣主席可能會撥給大部份的武器和最精良的武器（他們認爲毫無疑問的，美國會將武器供給「特區」）。至於武器的數量，共黨要求全數的一半，最少最少也要百分之三十。

美國人方面告訴中國同志，納爾遜和赫爾利都知道這個預定計劃的反攻，目前正在與蔣主席和何應欽談判這個問題。

白瑞德說，赫爾利和納爾遜對「特區」極感興趣，「特區」現在美國的政策中居有很大的地位。這就是爲什麼納爾遜和赫爾利將以最早的機會，前來「特區」，與毛澤東會晤的原因。謝偉志也作同樣的說法。

遵照毛澤東的命令，寫了一封邀請函，送到重慶。

納爾遜和赫爾利都是美國政壇的人物，他們在這裡特別表示歡迎。

美國代表團團長在答覆葉劍英和朱德所提出的要求時說，他很了解中共黨頭目們，所擔心的事，不過他們必須把他們的意見，用正式的文件列出來。「然後我會把這文件送給軍事指揮部，」白瑞德說。

中共黨的這個要求，如獲核准（關於送來「特區」的武器數量），「特區」無疑便將擠滿了美國顧問和各式各種的專家。

如果這個要求遭拒絕，美國方面無論如何還會把他們的人員派到「特區」來。關於這一點，觀察團人員曾經加以反覆提到。

不論美國觀察員們可能如何說法，華盛頓方面決不會把運送武器的問題和中國的政治前途，加以分開。美國政府並不很有把握，可以確定，毛澤東在接受武器之後，不致失却了控制。這個美國小組來到這兒，正就是爲了研究以武器供應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有關情勢的。

美國人在這方面很可能有着不同的意見。不過，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意見佔有優勢。在美國政界人士中比較保守派的，很怕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締結聯盟，堅持應更進加強國民政府的地位。另一批美國人的政治意見（謝偉志無疑是這批人的發言人）認為，整個中國正在醞釀革命，單是對蔣主席提出承諾是太危險的。必須尋求一些在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決定，並在這個「全國（！）勢力」之內，尋求新的盟友。據他們認為（謝偉志對此曾提出了結論性的證明），共黨領導階層可以成爲一個合適的伙伴，易於應付。這種決定的中心是毛澤東領導階層對蘇聯和聯共的態度。從謝偉志的這個作法來看，他似乎正在設法說服他的同僚，大家不必害怕「可怕的革命措辭」，也不必害怕那種無論如何無法避免的發展（人民大眾的革命熱情）的。

這是我從那些重要事實所得到的結論。不過，我並不知道，在這兩派政治意見之中，究竟那一派會佔據上風！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三日

又有一位美國人到了延安。他是美國駐華軍事情報處長麥克費雪。

從現在美國人方面普遍的氣氛判斷，美國並無意於在延安保持長駐的外交官，深怕因此

引起 蔣主席的不歡。這便是謝偉志對於中共方面一再建議美國，在延安開設一個長駐機構的問題，始終嚙口不談的道理。在這方面，他顯然曾奉有嚴格的指示，雖然他似乎並不同意他們的這個意見。

謝偉志最近宣布華盛頓方面所採取的新行動（要求 蔣主席同意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使中共黨的頭目們，有着很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已下令他駐在重慶的代表，加強反對國民政府。

中共黨駐在重慶的代表是董必武和林祖涵。毛澤東給他們發去了第二個電報，要他們開始將所有反對政府的人組織起來。這個行動預定計畫的方式，是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在國民參政會最近舉行的會議中採取阻撓手段。毛要求社會上所有一切勢力，對政府作全面抨擊。軍事的挫折和經濟的危機，刺激了中國社會的反對勢力。毛敦促他的人员，竭盡一切手腕，來利用這個有利的情勢。

事實顯示，共黨代表已向 蔣主席和國民黨的右翼，發動了全面攻擊。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

麥克費雪在他與中共黨頭目們所作的會談中，提出了在延安建立一個軍事情報處，中央

局的一個分支機構的構想。整個來說，麥克費雪並非一種熱情的人物。

白瑞德是美軍觀察團的團長。在最初幾星期裡，這位美國上校，一直很小心謹慎的避免討論重要的問題，不作諾言，把他的意見，保留在自己心裡。現在就像謝偉志一樣，他也猛烈的批評起中央政府，以及它沒有能力控制大局。他也批評國軍為不可靠。這位上校也強烈的不贊同 蔣主席反對共產黨的立場，並強調他對「特區」和中國共產黨政策的好感！

在麥克費雪方面，他堅持要中共黨的頭目們，准許他的部屬來到「特區」工作。他對這一問題提出試探，表示即將有大批美國情報人員、心戰專家，來到延安。據麥克費雪說，這批人將從事分化敵軍的戰鬥部隊，破壞敵人的後方。這些美國專家將在延安設置總部。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毛澤東沒有朋友。祇有他所需要的人，但沒有朋友。他祇欣賞在當時他所需要的人。凡是對他個人沒有用場的人，便是沒有價值，甚至是有害的。此外，他把他所認為對他有用，對「他的」革命有用的人結合在一起。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之外，在這個世界上便再沒有什麼東西存在，再沒有什麼東西是有意義的，甚至革命本身。

這是一種特殊的虛榮，一種無視於生活安適的虛榮。權力是他的唯一夢想和野心。真理

和美德的唯一途徑，便是通向最高權力的途徑。他的整個生活格調，鍛鍊而成爲他的狀貌，有種對每一限制權力的事物，表示輕蔑的氣息。一切都是塵芥，一切——唯有權力最高。他就從這一角度，來看歷史上所有大偉人的事蹟。

這些過去偉人所有的無限權力迷住了他。據毛澤東說，權力是唯一值得生活的事。這就是對一切事的正當理由，這是勝利，這是一切，一切。……

黨和人民祇是一種幻想的虛構事物（一種抽象的觀念），專供達到他的目標的虛構事物。

毛認識許多人，但雖然如此，他却單單的不喜交際，甚至很孤獨。這種孤獨可說是絕頂的、苛刻的，簡直到了危險的地步。

他的權力是直覺的。他把他自己的那種馬克斯主義（現實的馬克斯主義）和他爭取最高權力的願望，技巧地混和一起。他在革命的暴風眼中朝向權力推進。凡是遇到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和他個人的觀點發生衝突時，他便把這個主義一陣亂劈亂斫。利用詭辯作爲盾牌，他繼續不斷的歪曲、歪曲。……

他的整個活動可以歸納爲，痛苦地運用各種在爭取權力中最能適合於他的目的的手段。在他眼中，主義不過是別人對革命事業所作的一大把承諾。一個多方方便的公式！這就是他使

別人屈服於他的意志的方法。主義束縛住千百萬人的手脚；他以主義的名義進行活動，同時却可不受主義的束縛。……

「現實的馬克斯主義」是他的，毛的哲學，一種沒有道德、害有異常肥大症的野心的哲學。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

白瑞德上校在去過一個旅部作視察旅行後，對於以八路軍和新四軍參加盟軍未來對日作戰的問題，歸納得到他的一些結論。

這位觀察團長把他在他的報告中所提出一些主要結論，送給了共黨的軍政頭目。這個報告是這批美國人在「特區」逗留了幾近兩個月所產生的第一個結果。

白瑞德把這個報告送給他在重慶的美軍總部。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二日

毛澤東花費了足足兩個小時和我談話。這是他的談話節略：

美國人絕對解決不了一個中國的問題，更不用說是整個一套複雜的遠東問題了。這意思

是說，到了最重要的關頭，莫斯科是不免會插手進來的。憑着這樣做法，憑着解決蘇聯東部邊界的一些重要問題，這也就可以「解開了中國的結」。蔣主席顯然是反對蘇聯方面採取這樣一種行動的。

考慮到蘇俄所遭受的重大死傷，以及目前軍事人員的短缺，中共準備提供必要的協助。中國共黨領導階層將挑選出一萬多指揮人員，把他們派到西伯利亞去進行再訓練。這批指揮人員可以帶領龐大的中共軍隊，在東三省和日軍佔領區協助蘇聯部隊。

如果蘇聯遠東部份遇有危險，中國共黨將派出兩個最精良的團，一句話，決不哼一聲。將來也會採取同樣的行動，不過規模還會大得多。

這些談話的顯然意義，毋庸置評。

晚上，白瑞德、朱德、葉劍英曾會晤談話。

朱德和葉劍英說：

「如果政府和蔣主席的最高統帥部實行了改組，如果中國共產黨從美國方面並不接到軍械、子彈和其他援助，那麼，未來的反攻，特別是對日的勝利，不免就會導致一個長期的內戰。」

「美國關切於貿易、關切於投資、關切於穩定的市場。一次內戰便將嚴重的傷害到美國

的經濟利益。……」

這些話都是毛澤東教朱德和葉劍英講的。這是葉劍英親口對我說的。

中共黨的頭目們已經準備，萬一他們的計畫失敗，便將採取一項認真的政治行動。

毛澤東有意在「特區」和所有分散在敵人後方的基地區（在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河南、湖南等），建立一個聯合政府。

這意思是說，中國便將有一第二個政府。中共黨的頭目們不但並不設法隱諱這個計畫，而且，相反的，現正熱情地把這個計畫詳細的告訴了盟國。

美國人在原則上對此並不反對，但建議這個政府應稱爲「中國解放區聯合民主委員會」之類的名字。

在中共黨頭目方面，他們有意同意這個建議，因爲像這樣的一個名字，不會嚇壞了美國盟友。

毛澤東正對這些美國人施以一切壓力，再經由他們，對蔣主席施行壓力。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四日

史迪威未來的訪問，在延安引起了極大的希望。毛相信，由他親自與一位高級軍事將領

會晤，就能解決了所有這些問題。而且，這位將軍是負責以美國軍品運交中國的。這當然就可避免掉經過中間途徑繁文褥節的公文手續了。

這位將軍擬議中的訪問，現正保持着嚴格的秘密。

同時，觀察團仍在試探採取可能的合作。美國人正在談判建立一個聯合情報網，針對對付日軍。中共黨的領導階層正在向美國人試探這個問題，但所有這一切，並非毛澤東最希望做到的事。截至目前為止，他還沒有得到他所那麼渴望得到的軍械和彈藥。

有了軍械、彈藥和裝備的運交，其他一切問題就都可迎刃而解了。這就是中共黨頭目們所相信的，這也就是他們要美方了解的。

美國人方面指望要用他們自己的專家來操縱擬議中在延安建立的情報網，供以必需的配備和經費。

但在主要問題，運交武器的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其他一切問題都不可能得到切實的解決。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五日

毛澤東對外國新聞記者訪問的重要性，並沒判斷錯誤。在國軍的軍事挫折、政府官員的

腐化、軍官的非法收入的背景中，「特區」便顯得相當具有吸引力了。

在這許多年裡，「特區」始終並未受到日軍的壓力，因此，它的地位有了增強。中共黨領導階層把這裡安排得整齊齊，和那些在經濟方面脫了節，地方窮困的省份相比，便顯得情形很不錯了。中共黨領導階層把所有這一切特別的表露出來，技巧的加以誇大出來。

外國報紙對「特區」和毛澤東的領導階層，曾有若干讚揚。這裡便把所有這樣一種報導仔細的收集起來，凡是寫出這種報導的記者，將來都可希望得到優厚的招待（現在已經有了若干這樣的情形）。

我們可以從觀察團人員發表的簡短談話和議論，得到結論，他們對「特區」有着一種有利的看法。

現在由於一般情勢的改善，和「特區」的軍事力量，便使毛澤東能開始要起他的把戲。他已放下了釣餌，正在等待美國人上鉤。如果他們游上來上了鉤，毛就可以得到武器，還可能享受到華盛頓在政治方面的保護。這樣一種保護，將使他能解決若干在中國國內的政治問題。……

現在唯一懸在空中的問題是，白宮是否會放棄他在重慶所擔任的保護者的地位。這一部份的談話是小心仔細地遮掩着的。在我所知道的一切事實顯示，毛澤東顯然正在賣身投靠，

要把他自己來做美國人的一個伙伴。……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七日

對毛澤東來說，權力的誘惑，比了黨的任何利益都更重要。他背着蘇聯，設法照他自己的方式，來解決遠東問題。

毛澤東推測國軍在軍事方面的失敗，渴望着要用美國的援助，來增強他的地位，以便成爲中國的領導勢力，雖然這可能並非他們所願。因爲這個原因，他便不但願意改變黨名，而且還願意出賣蘇聯的利益。

毛澤東認爲蘇聯在對納粹德國的戰爭中，已經流了太多的血，因此無法在遠東早日發動軍事行動。如果如此，那就沒有理由來浪費時間。……在他認爲，美國在中國的成功機會，遠爲重要，這就是他要爭取做他們伙伴的原因。

毛澤東斷定，遠東和中國的命運，現正處於危險的境地。祇有美國能充任主要的仲裁者！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八日

毛澤東希望知道，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軍力，究竟有多大興趣。我想他已開始猜到，美國決不會與蔣主席斷絕關係，而把他們的政策轉向延安。而這正是他所夢寐以求，在他認為是目前與美國人接觸的理想結果。

盟國希望把中共黨的軍力歸由他們控制，而並不改變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勢力的相互關係。

蔣主席帶是他們的同道。他們害怕有一個共產黨的盟友。

蔣主席是能信賴的。他是一個歷經考驗的真正的反布爾塞維克勢力。至於毛，他有共產黨做他的後台。這一事實使美國人無法知道，共黨頭目們的地位，究竟不穩到如何程度。毛將來會作怎樣的態度？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是所有使他們感覺懷疑的主要根源。他們沒法單是聽信他的說話。他們害怕相信他。

延安正在紛紛談論着重慶中央政府未來的改組。毛澤東這次便決不會放過機會了。關於這方面的證據是，在當地報紙上又發動了一次新的反國民黨運動。儘管這個運動鑼鼓緊密，極為緊張，但這個形勢顯然還容許可能有所修改。關於這方面的一個表現，便是劉伯承最近在國民參政會一次會議中發表的一篇演說。劉伯承強烈的要求改組政府。

很特別的是，劉伯承的演說所有細節，都是和美國在重慶的官員配合一致的。毛正極力

設法要讓美國人相信，合作是可能的，他完全效忠他們，因此推動他們更加密切地和他接觸。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九日

由於美國人對他的信任，以及他們的過份討好，毛澤東透露了他的整個政治要旨。就連我（曾在這裡看到過許多的事）看到他竟會做得如此過份，也深深感覺意外，諾言、擔保、保證、發表一些接近公然背叛的談話。

由於盟國的討好，使他不禁有點渾渾淘淘起來，他公然的講出了他對莫斯科的真正想法。博古同志向我提供了關於毛澤東這種卑鄙行爲的詳細情形。

一九四四年十月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日

白宮宣告納爾遜已辭職。

納爾遜認為他任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的任務，業已完成。他來中國之行，使他深信，美國對中國的承諾，已經順利完成。

延安代表林祖涵在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中要求解除對「特區」的封鎖、開放黨禁、以及各種軍力聯合起來，對共同敵人作戰。

一九四四年十月六日

又有一批軍事專家到了延安。

一九四四年十月

在昨天到達者中，有美國駐華陸軍武官戴巴斯上校；美國情報處的阿姆斯特壯上校、麥克奈萊上校、兩位下士。這一批人由柏金准將率領。

毛澤東急急趕到機場，在機場靜候一架載着貴賓的道格拉斯飛機來到，等了很久，毛是從不等候任何人的。

陪同毛澤東的有朱德、葉劍英、周恩來，和其他等人。

毛一直希望與美國軍事指揮部或政府的高級人員接觸。他似乎希望能改變他們的觀念，使他們深信，美國與「特區」聯盟是可能的，而且必需的。我認爲毛不希望把他內心深處的想法，讓美國政府一些小中間人知道，這就是爲什麼他極力爭取與美國政界一些頭兒腦兒直接會晤的道理。我可確定，在過去的一些會談中，他並未徹底坦誠，因爲他怕事情可能洩漏出去，使他在莫斯科之前受到牽累。他希望保持緘默，不願透露出他的真正目標和意見。他需要談，但不是跟一些上校或秘書來談。……

戴巴斯是一個富有經驗的情報官，曾來過中國多次。他的中國話講得很好。對下屬很隨便，不善交際，不多講話。

周恩來對各種事件，通常並不表露他的態度。周是毛澤東處理黨務軍事重要問題的主要

幫手。

周妻是鄧穎己超。他們自並沒孩子。他們有一個領養的女兒。

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

羅斯福說，援助中國很困難，因為沿海的水路都受到了日軍的充分控制，而緬甸還沒有克復。

羅斯福說，重慶目前一個月獲有貨運二萬多噸，一年半前祇有約三千噸。空中運輸還不能載運更多的東西，因為超級重型的B-29機，耗油太多。

毛澤東對柏金將軍的訪問，非常生氣。他原本指望美國人方面會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議，並與美國高級政界人士進入接觸。但柏金將軍祇是限於給白瑞德上校鄭重的頒贈一個戰鬥獎。爲了這個頒獎禮，美國人舉行了一個全部男性的盛大宴會，酒很豐富。我敢說，白瑞德獲得這個勳章，絕非毫無由來——他是美國在東方數一數二最富經驗的傑出情報官。這個現年四十五歲，有點禿頂，體格結實的人，做事富有信心，保持尊嚴。他爲人非常友善，時常面帶笑容。很誠懇隨和。毛正盡力希望把他爭取到他的一邊。……

無論戴巴斯和柏金，都未與中共黨的領導階層進行會談，使毛很感不安，因爲他已準備

好了一份必需物資的清單，許多不同的建議等。

我想這兩位美國人決定要查核一下他們代表團的實地工作，並討論一些重要的問題。總之，中共同志們顯然的很感失望。

謝偉志在這些美國人中是最注意小節的。不知是出於他自己的主意，還是奉命行事，他對毛澤東說，這兩位高級軍人來到延安訪問，乃是對重慶中央政府所作的一種表演。總之，他替毛的苦丸上加上了一層糖衣。……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

在湘豫戰事失利之前，劉伯承給派去重慶，與政府進行會談。在那時候，「特區」的反國民黨宣傳又引起了國軍發動攻擊的危險。大家都認為延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失敗的。

中央政府部隊在湘豫兩省的意外失利，使中共黨在重慶的代表，從乞兒的地位，一變而為自我自信的盛氣凌人的指控者！

多利害的搖身一變！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這個國家的分裂，乃是日本贏得勝利的幕後主因。這並非是中國軍隊的戰鬥效率問題。毛澤東從敵人的勝利，看到一個暗中破壞 蔣主席權力的要素。無論是軍事方面的大災害，或是對於法西斯主義鬭爭的考慮，都不足以使毛澤東放棄他造成不和的政策。這個分裂是在中國的一個不祥的現實。而這個分裂顯是有利於日本黷武主義者的。毛澤東從事破壞全國聯合抗戰的政策，等於給日本額外增加了數十師在中國作戰的實力。

毛澤東從 蔣主席在前線可能獲得的勝利，看做是對他的政策的一個威脅。 蔣主席的地位無論如何必須加以削弱。這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的政策的要義。因此，讓日軍佔奪中國國土，焚燒城鎮！

毛澤東自稱是共產主義者。但一個共產主義者能鼓勵敵人來佔領他的國家，掠奪他的國家的財富嗎？他對嚴密結合的抗日集團並不存有幻想。他充分知道，這是一個有效的勢力，但他寧願讓 蔣主席去面對日軍和他們的傀儡。他自己的抵抗，祇以游擊戰為限。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至廿日

重慶對於中國共黨領導階層與觀察團日益增進的諒解，深感驚憂。……

美國方面相信，條件已經成熟，可以派遣部隊，在中國登陸，因為這是擊退日軍順利推

行的最有效方法。美國人深信，在若干沿海省份，中共部隊已準備了（或是正在準備）強有力的據點，以供盟軍登陸之用。

一九四四年十月廿二日

周恩來實際上建立了他自己的一個並不隸屬於情報局的情報機構集團。在這個機構裡的主要人物是劉小文和陳家康。這個機構使周不受康生的約束，因此保證他能與其他國家進行秘密接觸，這對毛澤東是特別有價值的。

周恩來實際上對每一政治問題，都有他自己的情報，他知道許多在一些人希望保持秘密的事。毛澤東便曾經常不斷的把他找去商量各種事情。周恩來有他自己的一批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極有能力的人。具有特別價值的是，他與英美人有各種不同的有力連絡。他甚至較大同情於英國。我在毛澤東家裡度過的那許多夜晚，在那裡，大家暢飲歡笑、講着笑話，使我在這方面知道了一些情況。

一九四四年十月廿八日

那位四星上將給那二星少將一下子擊昏了。史迪威在美國陸軍中居有最高的軍階。他是

上將。美國的武裝部隊現在祇有六位上將。

這位四星上將已結束業務，離開中國，回到美國去了。幹得好，赫爾利！現在你是斡旋者了。

利用美國在政治上對「特區」的承認，毛澤東現在便希望讓兩個大國鸚蚌相爭起來，自己坐得漁利。這是他的明確政策。

中共黨領導階層堅定的相信，如果不解放華北，要征服日本是不可能的。華北有一批中共黨的基地網。這就是爲什麼現在延安認爲，與中共部隊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

在十月二十七日那天，日軍發動了一個新的大規模攻勢。目的很顯明：奪取一條鐵路，摧毀陳納德航空隊的基地，阻止盟國軍隊在中國沿海地區會合，暗中破壞中央政府的權力。

蔣主席任命美國魏德邁少將爲他的參謀長。魏德邁少將原在緬甸指揮部隊。

現在中國的日本遠征軍總司令是田畑六大將。

蔣主席決定派遣一個特別代表團到莫斯科去。這個代表團將由蔣主席的公子蔣經國率領。

蔣主席是一位見多識廣、富有經驗的政治家。他很清楚，遠東問題的解決，並不祇是有

賴於重慶、延安和華盛頓三處地方，他採取了一個非常合理的行動。……

他挑選蔣經國，並不祇是出於父子的感情。早在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期間，蔣經國到俄國去留學，唸完高中和弗倫茲軍校。

蔣主席決定派遣蔣經國到莫斯科去，因為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的兒子對蘇俄社會情形很熟悉。料想蔣經國擁有有關於日本侵略者統一抗日運動情況令人信服的證據。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

關於蔣經國代表團的消息，使毛澤東大為驚恐，由於這個問題，使他和我會晤了幾次。我詢毛澤東之請，發了個電報給莫斯科。

毛澤東在電中報告說，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鬥效率，已有極大增進。這些軍隊現已有了更多成功作戰的成果。部分部隊和黨政軍專家，目前正在調到湖南、浙江、河南去了。

毛的報告講到，在工業經濟和其他重大中心，以及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後方的主要補給路線，業已加緊了軍事、宣傳和煽動的工作。

共黨的權力和聲望，已有不斷增高。黨的政策始終未變。包括增強、改進、擴大軍力，此外，並繼續在政治方面與國民黨合作。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實力，在過去數月中已有激劇增

加。現在各基地和日軍後方的總實力約爲五十七萬人，而已不是過去的四十七萬人。人民兵團現有二百二十萬人，而不是過去的二百萬人。

毛澤東申訴說，所有一切與蔣主席進行的談判都已失敗。國軍部隊現在遭受失利，不想對日軍作戰。羅斯福總統的私人特使赫爾利將軍已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支持它的所有一切建議。蔣經國的特別代表團是要試探蘇俄對「特區」的態度。蔣主席派出一個曾在蘇俄接受教育的兒子，不是沒有用意的。

我在電報上加上了我的評語。

第一，電中數字，殊屬勉強。中共部隊的實際實力，要少得很多。把軍隊和人民兵團的兵員之數，加以虛報誇大，現在對中共黨的頭目們是佔便宜的。

第二，毛澤東深怕給人揭穿他並不誠懇。蔣主席可以隨時提供證據，表明中共黨領導階層對抗日統一戰線的實際態度。

第三，蔣經國的代表團可能提出許多在中共黨領導階層政策中的不利面。毛澤東便先設法爲自己提出辯護。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

延安與重慶間的空中交通，非常熱鬧，延安一直都在忙碌地歡迎來客。沒有一天沒有一架道格拉斯機出現在山谷降落路線的上空。……這一次的來客是戴維斯，和一個姓白的。

毛澤東希望要我相信，中共與美國會談，是一種嘗試——如果不是愚弄他們的話——無論如何，這是對 蔣主席的一個敲詐活動。他以這個心思來評論我們已經知道的關於中共黨和美國方面的所有建議。

戴維斯毫不浪費時間。他已和博古、葉劍英、周恩來、朱德，以及另外許多高級中國同志會談過。白瑞德也很活躍。

中共黨頭目們把美國觀察團的這個新的活動浪潮，跟美國與重慶關係的發展，連在一起。

蔣主席已拒絕再行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對延安採取了不妥協的立場。在中國舞台上的美國領袖人物——史迪威將軍——已召回美國。白瑞德很關切的希望知道這些發展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究會有些什麼影響。

從我和這位魏德邁參謀部的政治顧問所作的談話，也透露了下面一些情形。

美國對於「特區」與蘇俄關係可能的增長，很感擔憂。他們特別擔心這個關係，可能發展成爲一種密切的經濟與政治的聯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如果「蘇俄以她的統治限制於」（戴維斯如此說法，中國同志平心靜氣的傾聽着）太平洋的北部，那樣在美國並無可怕之處。問題是，蘇俄可能推進到這些限界以外，而且正好就是經由「特區」來進行。美國最憂懼的是蘇俄的影響力可能擴展到整個的亞洲（據我所知，中國同志對戴維斯的這個談話，也沒有一人表示爭議）。

美國雖然準備與「特區」合作，但深怕蘇俄會不勞而獲的來摘取美國加強中共黨經濟與軍力政策的果實。

戴維斯明白表示，此外便再無其他原因會得限制美國與「特區」的聯盟，如果有的話，那也是無關輕重的。

戴維斯說明，美國的目的永遠祇有一個——進行貿易。他們完全並不關切在戰後他們究竟要和誰來進行貿易。那可能是單獨與「特區」進行，也可能是與中國分開的兩個部份進行。在這種情形中，重要的是，「特區」必須不受蘇俄的控制，成爲一個獨立的經濟政治結構。「特區」唯有具有完全政治獨立的地位，美國纔能做中國共產黨的伙伴，不會害怕這種修好的後果。

戴維斯明白的說出，他並非表示個人的意見，而是表示美國領袖們的一個非常確切的看法，雖然由於可以瞭解的理由，他們的這種看法並無紀錄。

在這些談話中，許多在我過去所不知道的情況都透露了出來。美國人並不懷疑可以接受與毛澤東締結一個堅定的聯盟。他們甚至對共黨成爲「特區」的領導勢力，並可能在將來成爲中國的領導勢力，並不感到不安。在他們認爲，極端重要的是，中國共黨應「對莫斯科具有主權和獨立的地位」。這就已經預先規定了中國共黨政策某些國家主義性質的條件。總之，在「特區」或中國實施「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合乎華盛頓的胃口的。這就等於是公開承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國家主義傾向。

但環境情況却比戴維斯和毛澤東所認爲的複雜得多。現在有一個共產黨，不論如何，毛澤東還是要依靠着它，現在還有一股具有歷史性的反對因素。

美國這種行動，有意希望要在中國共黨和蘇俄共黨之間，在蘇俄和「特區」之間，打進一個楔子。很特別的，這樣一種希望在這裡却並未有人加以提出駁詰。一陣吵吵鬧鬧的，最大爭論的問題是付出的價格問題。……

白瑞德上校和顧問戴維斯，向中共黨的軍事指揮部提出了一份他們自己的登陸戰計劃草案。這個作戰預定在連雲港地區進行。

這個草案洋洋巨篇，毫無條理。預期應用空降和兩棲部隊。在作戰期間，美方將供應中共黨五萬人的彈藥和武器。部份武器和彈藥將用飛機空投。至於其餘部份，中共部隊就須到

美軍登陸處去領取。

白瑞德緊迫着中國同志提出一個答覆。他們認爲很重要的必須知道，中共黨究竟準備拿多少部隊，來參加執行這個作戰行動。這一計劃草案在美方和中共代表舉行的一些聯席會議中，於極端機密的氣氛中，成爲定稿。

在所有這些情況中，毛澤東顯然體會到有了一個朝向權力推進的愉快機會。世界大戰的結束、全國的熱情、美國的興趣、國軍的挫折——情勢變得再有利也沒有了。我從未見到他如此洋洋得意過。

他對人民的疾苦，如果這種疾苦對他個人的計劃並無不利影響的話，他祇淡然處之。

我得承認，他們在毛澤東的晚會中，總是喝得很多的酒。並不是每一個頭腦堅強的人都能支持得住那麼多的酒，而保持清醒的。

戴維斯是重慶美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我有種印象，他比謝偉志更富有經驗，對各種問題也看得更深入。

他精力充沛，中國話講得很道地。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

納爾遜將再以羅斯福私人代表的身份，前來中國。納爾遜將由一些極有地位的經濟學家和實業家隨伴同行。

那個姓白的是和戴維斯同機來到延安的。他可能就是白修德——美國一些主要雜誌的遠東問題評論家。

白修德的文章向以深諳重慶政治花絮著稱。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

赫爾利本人到了這兒！他未經事前通知，突然來到了這兒！

毛澤東坐着他的古董救護車，急急忙忙的趕到機場。

赫爾利已在飛機附近等着他。

他們一同坐車回去。在一陣塵灰中，一路在低窪和隆塊上顛簸而去。

赫爾利絕不耽擱，立即開始進行會談。在晚上，他已會晤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赫爾利的譯員便是美軍觀察團團長白瑞德。

赫爾利交給毛澤東一份準備討論提出詢問（以及他自己對於解決每一問題的建議）的清

單。他要毛澤東把這份草稿研究一下，明天提出他們的意見。

赫爾利將軍告知在場的人，他是獲得中央政府同意，由羅斯福總統派來中國，擔任一項任務。這位白宮的使節說，「不過我的目的，跟美國和中國共產黨建立關係完全無關。我們現在的會談，不會談到這個問題。現在要順利結束世界大戰，最重要的事便是中國的團結，最後解決兩個主要政治集團——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爭執。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

赫爾利正與中共黨的頭目們進行會談。

赫爾利少將曾任陸軍部長，是奧克拉荷馬的一個百萬富翁律師。

在昨天的宴會中，他很不得體的說，不久以前，羅斯福總統曾徵求他的意思，要他去當駐俄大使。赫爾利曾參加了德黑蘭會議，他是羅斯福的親信之一。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羅斯福當選了連任美國總統。

昨天，美國和中國共產黨仔細的討論了一份預定由共黨與國民黨簽訂的協定草案。由於

赫爾利的堅持，這個協定將具有共黨與國民黨簽訂的正式條約的性質。赫爾利負起了斡旋的任務。

這個條約擬議一切抗日政黨與政治組織，包括非政黨的組織，團結一致。這個政府必須保證所有一切抗日愛國勢力，以及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自由與公開存在。

根據這一條約，軍事委員會改組為聯合委員會。所有一切主要抗日武裝集團，均派遣代表參加此一聯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必須嚴格恪遵，以盟國供應的軍械與彈藥，比例分配各抗日武裝集團的原則。

主要由共黨和國民黨的代表，組織一全國聯合政府，負責集合所有一切愛國勢力（主要是武裝軍力）的力量，來實現擊敗日本侵略部隊的最高目的。勝利之後，這個政府便基於孫中山博士的三民主義，來發展這個國家。

一切抗日愛國武裝集團，均必須毫不爭議的服從「聯合國民政府」的命令。最高執行軍事機構為「聯合軍事委員會」，該會命令，對一切抗日武裝部隊均具約束力。

十一月九日晚上，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在延安舉行會議，核准了這個協定草案。這一文件由赫爾利和毛澤東簽了字。

十一月十日晚，赫爾利啓程前往重慶。與這位羅斯福總統特使同行飛去的有白瑞德和周

恩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毛澤東對此次與赫爾利的會晤，頗爲高興。他約我前去，把這次會談結果，作了一個簡報。

毛請我給莫斯科發出幾個電報。他當然知道我對這次舉行的會談，所聞已多，他要趕着搶先，來制止我向莫斯科提出報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除了在「特區」進行情報工作，觀察團也已採取步驟，來削弱中共黨與莫斯科的聯繫。從最初一開始，美國方面顯然就並未存有幻想——他們對於以武器給予共黨的問題，一直就很謹慎。蔣主席對他們，過去很合適，將來仍繼續很合適。然而，中共黨的頭目們，却把他們的心意全都抖了出來。他們完全忘其所以，甚至也忘了把他們那種卑鄙下流的活動隱藏起來——他們是那麼急於希望得到軍事的裝備。

赫爾利此行的目的，不祇是在誘導「特區」採取積極行動，對付日軍，而且也要在中共黨

領導階層和莫斯科之間，打進一個楔子。

不過，中共黨的頭目們還是給這位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上了一個大當，把他們自己的一些在 蔣主席必然拒絕接受的條款，列進了草約。

赫爾利是個過度自信的人，他並不了解國共之間的矛盾衝突情形，基於他自己的龐大權力，就在四份草約上簽了字。一份留在延安，兩份分送 蔣主席和羅斯福，第四份我想是赫爾利給自己保留的。……對赫爾利和美國外交來說，真是件不幸的紀念品。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十日晨，赫爾利寫了封親筆信給毛澤東，告訴他對此次會談結果，深為滿意。

赫爾利表示，希望這次談判的輝煌合作精神，在對日勝利之後，能繼續保持，致力於促進和平及中國民主的前途。這位美國總統的特使，認為這是他此次任務的高貴目的。

他感謝毛澤東的卓越的合作。

這位總統特使感謝毛澤東他所表現的深信。這使這位將軍深為感動，他請毛相信，他確實深知，毛澤東表現了多大的誠意和諒解。一個最困難的問題解決了。中共黨與國民黨協定草約已絕未稽延的轉送給 蔣主席。

這位總統特使對毛澤東請他親自轉交美國總統的那封華翰，表示感銘。

這位將軍寫到，毛澤東的活動，將有貢獻於建立統一民主中國和戰爭勝利結束的大業。毛澤東在給美國總統的信中，講到兩國的傳統友誼。這個友誼，具有深深的歷史淵源。毛澤東祝總統政躬康泰，並表示最熱切的希望，在戰爭勝利結束之後，兩國（中國與美國）並肩前進，建立世界和平。祇要總統希望走去，這條共同建設一個新世界的途徑是可能的。

毛澤東告訴美國總統，他以正當的禮貌招待他的特使。四天來，他與赫爾利將軍曾討論了許多重要問題。這些問題是關於中國人民一致對抗侵略者的問題，在全國體制之內，在政治上統一各抗日勢力的問題，以及中國的民主化問題。

毛澤東寫到，共黨一直都在致力於與蔣主席達成一個堅定的協定。這樣一個協定將表示中國人民的希望，幫助促進他們的幸福和他們的最大利益。

赫爾利此行，正好配合了我們的希望。我們突然有了一個達成我們目的的機會。三天會談的結果，業已同意了一項協定草案。這個草案包括了那些共黨一直都在不斷進行奮鬥的目標。這個奮鬥，現已進行了八年。這個奮鬥的基礎是抗日統一戰線。

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已核准了這個條約。

毛澤東更進而寫到，他對赫爾利將軍對中國所表示的同情，深為感銘。總之，他能認識赫爾利，極為愉快，對於他的卓絕能力，尤表欽佩。

共黨將在其權力範圍之內，盡其一切，實現此一條約的原則。「中央委員會」授權於余（毛澤東），簽署此一國共兩黨的協定。此一協定，係由閣下代表親臨見證簽字。

毛澤東報告說，赫爾利已徇他之請，答應將此約副本一份，送致美國總統。

毛澤東對美國總統在抗日戰爭中所給予的協助，他對統一中國所給予的支持，他對民主政治所表的誠摯關切，深致謝忱。他代表中國人民、共產黨及其軍隊，表示感激。

此函係由赫爾利將軍建議所寫，他向毛澤東保證，他將以此函親為轉交羅斯福總統。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美國代理國務卿史坦汀尼斯宣布，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已予召回，但新任大使總統尚未提名。

南京傀儡政權頭兒汪精衛已死去。死得其時，因為他可以逃過了中國人民的審判。

毛澤東很懶。一張沙發和靠手椅，幾乎就是他所需要的全部休閒。他好吃成性，喜歡精美佳餚，吃得很多。他有鮮菓乾果的特別供應，都是最上品之選。

不過，最近，毛已不再參加午夜的宴會。他已縮小了客人的圈子。在他的席上已祇能見到經過精選的少數幾人。

江青的一舉一動，有一種獨立的氣息。她什麼事都愛追根究底，仔細多問，很有野心，不過能深藏不露。她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

毛澤東完全聽受着她的影響。他甚至短短一點時間都沒法離開她。據奧洛夫告訴我，他沒有了江青，就會變得任性起來，有時甚至拒絕量體溫或吃藥。

江青機巧地、小心謹慎地推動他的丈夫，去解決一些完全不屬家務之事的最紛雜不同的問題。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如果毛澤東正在進行他的邪惡之事，他便是在利用我來作為煙幕。他要我把他的電報發到莫斯科去。

毛澤東深知，「特區」在政治與軍事方面，還不是一個如何獨立的勢力，無法撇開蘇聯的支持。因此，他趕着搶先把「第一手的」消息告訴莫斯科。他這樣作法，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在毛澤東發出一個電報後，我就很尷尬，沒法再提出不同的意見了。

在「處方事案」和莫斯科的干涉之後，毛澤東便一直都在提防着我，雖然他始終小心的不讓我注意到。我是一個目擊的證人，事實上是唯一超乎他的意願和權力範圍之外的目擊證人。毛設法假裝對我信任，請我在他的屋子裡親切地挑燈夜談（毛、他的妻子、和我，通常便再無別人參加），來使我「中立化」（失去作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日軍正在桂林以西沿鐵路一帶，朝向貴州推進。他們已進抵柳城和忻城附近。國軍已撤離柳州的一個龐大機場。美國人應用他們所有一切運輸工具來搶救貴重的配備。

納爾遜到達重慶。

美國已開始出動所有一切政治、外交和軍事的資源，以便依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迅速解決遠東的問題。……

如果「生命線」（即「史迪威公路」）通行時，美國方面答應基於租借法案，激劇增加他們在卡車、大砲、彈藥和其他武器與軍需品的供應。在戰爭的第八個年頭，中國甚至連最簡單的武器，都很缺乏。

以一個有五億以上人口的國家，中國共產黨遠非一個人民大眾的政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需要與莫斯科維持關係，無疑的，使毛非常生氣。他準備與我們斷絕一切關係，如果祇要……。因此，這些「如果」，使他沒有這樣做去，使他假痴假呆，暗中運用手腕。凡是一切國際性的事——「共產國際」便是一個具形——在毛澤東看來祇是一種錄鏽，或者就是一種巧妙設計的契約。現在莫斯科就已成了一種東西。

可是，這些「如果」的鬼東西！如果國民黨對共產黨發動了武裝衝突，那該怎麼辦？如果內戰爆發，中國共產黨一無準備，沒有武器，又該如何？

那麼多的這種「如果」！而要解決這種「如果」的問題，大部份實際上都有賴於蘇聯的態度。毛澤東很清楚這一點，因此，他一方面依賴於莫斯科的支持，同時却不斷的以卑鄙齷齪的手段，來詆毀蘇聯共黨的政策。他深恐這種（對他）強制的接觸，將會在黨內和人民之中培養起對蘇聯的同情。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毛澤東把事實來變戲法，追求一些非常重要的目標。

共黨依賴於有一支龐大的軍力，其中也包括「人民兵團」在內。剛在最近前不久，「人民兵團」的實力還估計爲二百萬人。現在，在各種文件中，這個數字已武斷的增加了二十萬人。這個新的數字二百二十萬人，曾向莫斯科和美國方面提出報告過（毛對我們，也絕未表示內心有愧）。這個假話，在他的心裡正藏着一個斷然的目的——使莫斯科和美國都深信，共產黨的武裝實力，與國軍實際無分軒輊。這個數字的關係，雖然並不反映實際政治情況，却可對軍力陣容，導向一種不正確的評估。

我很確切的知道，就連那個二百萬人的數字也是假的。剛在最近，便曾發表過一個小得很多的數字！甚至以葉劍英提出的機密估計，這個數字也未超過一百萬人。但就連這個八路軍的參謀長，也故意的把它誇張了。總之，誇張是所有軍方和黨方負責人員，千遍一律，毫無例外的運用手法。在這兒是沒法聽到真話的。由於毛的創導，說假話已成爲一種策略。

依照美國的軍事計畫，將應用兩棲部隊佔領中部地方。中共黨的領導階層便也因此改變了他們的計畫。現在這些計畫便基於與美國的作戰採取密切合作，預定以沿海地區作爲戰關地區。

毛澤東運用他的假數字策略，正式向莫斯科報告，中共黨正規軍部隊的新實力爲五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七人。但這個數字也包括了大批游擊組織的實力。因此，正規軍的兵員實際

上便要小得很多。最多，也祇有整個數字的一半。

照我所能看到，那些頭目自己就不知道他們部隊的確實數目有多少。在此方面，中共黨領導階層對我們和盟國作了不同的處理。他們向美國人提出的數字是六十三萬人。

據毛澤東認為，美國與中共黨的聯合作戰，可能在明年春天進行。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毛澤東對我祇限於簡略的談判。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三日

共黨頭目們儘管厚顏無恥的公開宣傳他們「對日本法西斯主義不共戴天之仇的鬭爭」，但他們對此鬭爭的實際態度，始終保持不變。

毛澤東最近向各師師長發出的指令，便可證明此點。

毛澤東宣佈說，主要的任務是在剝奪 蔣主席的部隊朝向沿海推進的可能。「中國共產黨部隊最重要的任務，是在堵塞未來與盟國聯合作戰的地區。切勿讓 蔣主席的部隊來解放日軍佔領的地區。」

毛澤東嚴格命令，不得對日軍進行大規模作戰。部隊遇有戰鬪行動，必須繼續自行限制於小規模的衝突。

關於毛澤東的這些指令是朱德告訴我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五日

日軍的攻勢，對中國達到了一種軍事災害的性質。桂林已告放棄。柳州的美國空軍基地——美國在華南的最大基地——已炸毀。價值億萬元的貴重裝備，均告摧毀。隨着桂林和柳州空軍基地的陷落，便敞開了通往盟國在貴陽、重慶、成都的最後幾個空軍基地的道路。陳納德的航空隊正在拼命的攻擊日軍的進攻部隊。

中共黨的頭目們爲了欺詐，締結條約，甚至並不假稱準備加以履行。

毛澤東正盡其權力所及，設法阻撓國軍向東推進，以便在偽裝協助美國登陸作戰之下，使他自己可能得到軍械和彈藥。

中共軍裝配了這種物資之後，他們就將開始依照他們自己的計畫來進行，佔領大城市和戰略中心，同時加強對國軍的抵抗。因此，把侵犯者逐出中國的「麻煩」，毛澤東便很客氣的讓給盟國——將來也許還有蘇聯——去做。他自己寧願爲爭取個人統治這個國家，來對蔣主席作戰。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美國登陸作戰的辦法並未實現，中國共黨頭目們便將照樣堅持實現

他們自己的計畫，憑着他們自己的資源和他們始終並未完全排除的，預期來自蘇聯方面的協助。

在毛澤東的一批跟班中，絕口不談華北。那是共黨的堡壘，他們把它視爲是他們私有的保留地。如果佔領整個國家的計畫失敗，毛澤東有意在華北建立他自己的主權獨立國。毛澤東將爲此戰至最後一人。

如果「美國的」和其他辦法都失敗，中共黨頭目們便保持蘇俄這張「備用」的牌。他們寄望於這個「兄弟共產黨」的支持。毛澤東曾泛泛的暗示，這個支持是無可避免的，因爲蘇聯對這一地區的情勢，並非漠不關心。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史丹汀尼斯出任爲美國新國務卿。赫爾利已因病辭職。

羅斯福駐在重慶的私人代表納爾遜，可說已擔任了中國政府的經濟顧問。此事本身即表明了中國在美國政策中所居的地位。美國顯然已着手取代英國和日本在中國的地位，同時並假手中國政界人士，來對蘇俄建立一條新的衛生隔離警戒線。

隨着法西斯德國的潰敗，盟國的經濟和軍事潛力，便可集中用來擊敗日軍的侵略。

毛澤東亟於犧牲美國的利益，來取得一個堅強據點，以便立即向蔣主席猛撲過去。美國人很清楚毛澤東的實際意向。他們很可能給他武器。不過，所有像赫爾利和魏德邁的一

批人，都並不反對排斥蘇俄對中國共黨的思想觀念影響，使他們成爲「特區」和整個中國的政治樂隊隊長。

毛就像叫賣的小販一樣，衡量着兩方的遠景，結果所得的結論認爲，蘇俄已因戰爭流盡了血，不會很快就能參加遠東戰爭。此外，他把美軍觀察團玩弄於股掌之上，便有機會可對國民黨施行壓力，保證他的軍隊與基地的安全。任何可能與美方發生意見不一致之處，便祇有關於他們對國民黨的態度問題。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

赫爾利給重慶送去了一份在 蔣主席所無法接受的協定草案。如果同意這個協定，

蔣主席便表示是自願放棄政權。赫爾利跟他會談之後，纔知道他做錯了。不過，毛澤東和羅斯福總統都已相互發出了賀電。赫爾利設法要爲這個棘手問題找出一個解決辦法。他應該把中國共產黨推開一邊嗎？不行，美國方面對利用共黨武裝基地這一構想，現正深感吸引。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

毛澤東密切注視着蘇俄部隊在西方的推進。他常和我談到軍事題目的問題（他希望大概

的知道，戰爭將會在什麼時候結束）。

不用說，中國共黨領導階層，最近對我和我的幾個同志，特別友好。

跟美國人進行的交易，當然已經失敗。

魏德邁將軍堅持要蔣主席同意組織一個聯合政府。魏德邁發表了一篇特別聲明，表示了這個意思。他警告蔣主席，如果他拒絕改組政府，美國就會不經他的同意，來解決這個問題。華盛頓將獨自與延安建立關係。這種關係包括以軍械、軍需、裝備等供應「特區」。美國是鑒於在西方，戰爭現已接近結束，而受到了這一情勢的促迫。他們熱切的爭取，要對整個中國建立控制。他們希望統治重慶和延安，最後在遠東堵塞蘇俄。在這一方面，毛正落進了他們的圈套。……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美國總統已下令加速簽訂與「特區」的協定。魏德邁少將已接獲白宮命令，要他和中國共黨領導階層會晤。顯然的，在未來幾天內，魏德邁就將出現在延安了。

貨物即將空運延安，作為遵循羅斯福的命令所採取的最初步驟。數十架道格拉斯機已撥出專供此一用途。我並不知道這些貨運的性質和重量。

魏德邁將軍和赫爾利已將此意告知周恩來。周證實美國政府確已下了如此的命令。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這兒的生活充滿了圈套陷阱。我可說我現在正處於一種不斷緊張的狀態中。各種的活動設法愚弄我，或是使我失去活動作用，種種方法來使我喝酒，來採取莫斯科對延安各種發展的真正態度；滔滔不絕的似乎天真，但很陰險的問題；設法透過一些親切體貼的女孩子來引誘我；設法使我相信他們虛構的說話，最後，設法從事贏得我對他們的信任，並非在於要排斥我，而是要把我改變到他們的思想方式。並不是要把我爭取到他們一邊，而是要完全依照字面上的意思，使我成爲「他們的一份子」。說服我，強迫我，相信毛所主張的一切，使我在向莫斯科提出報告時，便可把毛的政策說成是毫無錯誤的，並爲他的利益辯護。這就是他們在這兒追求的目標。

他們似乎相信，我已採取了他們的思想方式。這就是爲什麼毛澤東那麼時常的當着我的面「不避隱諱」的緣故。但這並不是一種與一個同志的密談——毛澤東是一種把每一句話、每一動作，都要經過仔細考量的人。……

我欣賞他的「深信」。這是一種玩弄「深信」的把戲。……

有一件事我確實是屈服於毛澤東的，那就是慫恿款待。他常邀我去。原因不一定都在談正經事。……在這一方面，我完全放棄了我的「原則立場」。拒絕接受邀請是既優而又可怪
的。

由於深怕共黨佔了上風——美國已拒絕供以武器。

這使毛澤東大爲生氣。直到現在，除了有一些口頭的宣告外，再沒有什麼進一步的發展。

中共黨領導階層接到重慶送來的一份國民黨與共產黨協定的新草案。這是對赫爾利將軍與毛澤東在延安簽字的那份草案提出的反建議。在重慶，他們無意與共黨分享政權，更無意自願的把政權交出來。這份草案顯然是和毛的計畫對立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毛澤東談到立即需要舉行一次全會。

重要的大事，即將來到。現在就必須把黨作一調整，來鞏固整風的成果，補充黨方高級機構的人員。

對 蔣主席的反建議，進行討論之後，共黨領導階層開始考慮到，進行這樣一種談判，究竟是否合理。經過一番熱烈的辯論後，毛澤東下令對國共協定 蔣主席所提的草案，不表反應。

作為報復的措施，使 蔣主席處於一種棘手的局面（讓美國人來對他施行壓力，維持羅斯福的命令），毛澤東決定立即撤回他駐在重慶的代表。

董必武和周恩來都不用再回重慶去——這也是毛所頒給的明令。

一個巧妙的行動。不過我已習慣了延安那種迂迴曲折的外交。

祇是一個月前，毛澤東給美國總統的信中還寫到他正不斷努力，要達成與 蔣主席簽訂一個協定。據毛澤東說，這個協定將為中國人民帶來幸福。

董必武和周恩來離開重慶，對外將解釋為他們需要向領導階層作例行的報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毛澤東向我說明中國共黨導階層進行外交政策的意義如下：

- 一、對國內進步勢力的發展，給以一切協助。
- 二、用宣傳和煽動工作，來孤立反動派和保守派。

三、從日軍手中奪取土地，來擴張「解放區」。

現在便是特別依循這些路線，強調與美國進行接觸的權宜之計。美國方面指望得到中共部隊的軍事協助，便會提出許多讓步，對蔣主席施行壓力。自然絕未講到實際的目的。

事實顯示，與美國人接觸，結果已經失敗。小心謹慎，猜忌多疑，使保守的美國政壇人士佔了上風。盟國有意把未來在政治上控制中國的競爭，與蔣主席的政治制度連在一起。盟國事實上已拒絕把武器裝配八路軍和新四軍，便可證明此點。白宮顯然已否決了使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部隊，作為突擊軍，來擊潰中國境內日軍的希望。美國人也許考慮到了毛澤東在此競爭期間，在中國着手佔奪新的龐大地區的秘密意向。因此，延安與華盛頓進行的談判便陷入了僵局。美國政壇人士不願甘冒危險，把賭注下在毛澤東身上。從各方看來，重慶政府顯然比較可靠。

美國人並不了解實際的情況，這一點使毛澤東氣得怒火直冒。他曾用了一切方法，來向他們證明，締結聯盟的正確性和必要。他把他對中國目前和未來地位的看法，以及中國共黨在奪取政權各階段中所擔任的任務，都曾作了足夠坦白的說明。

美國方面所採的立場，當然有其意義（從他們的觀點而論）。他們充分明瞭毛澤東希望要利用這個時機，來攫取一個大獎。在毛的政策中確然有此因素存在。他所最愛採取的手段，

便是一週可能時機，便利用當時情況（隨同種種諾言，而並不把自己束縛在一些原則上面）來巧取豪奪。在毛澤東看來，爲了擴大武力，就必須巧取豪奪。至於如何運用這個武力，在這一方面，他是毋需給以提供意見的。武力就是他的目的！用整風的壓抑手段、用美國的軍火、用對解放東方人民的情緒的詭辯的賭博、用馬克斯主義和所稱與聯共的國際友誼，來取得武力。

武力是他的政策的主要之點。憑着武力手段，他希望取得丟棄一切原則的權利。

但赫爾利將軍與毛澤東十一月間在延安舉行的談判，却產生了若干必然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未經預見的先決條件。在目前階段，這些條件不免會使此種關係變壞，甚至激烈惡化，這是最可靠的。在這方面，誰也不能責備，除了赫爾利將軍。就從他的斡旋使毛澤東在對重慶所作的政治賭博中，得到了一些王牌。

毛澤東有了一個正式的理由，來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因爲正是一位美國的特使，就在這裡延安，已同意了國共之間政治解決的方案。現在，由於蔣主席的壓力，這個方案却被宣布爲無法接受了。

在未來黨的全會中，毛澤東有意通過一項決議案，成立一個所謂的「中國各解放區聯合委員會」。這也是赫爾利的拙劣斡旋的結果，他自己在延安的談判中承認，在中國必須有一

這樣的最高權力機構，而為這樣一種委員會肅清了道路。

同時，現在雖然祇有一份草約，這份草約是已經通知了美國方面的。毛便準備利用這份草約，來脅迫美國站到他的一邊，最後使他們把武器給他。如果美國在這一點上也不合作，他便有意分裂中國，安排一次內戰。

在延安，誰也沒有顧慮到所有這一切陰謀計畫，是在日軍的砲火和在中國淪陷區內高呼「萬歲」(Banzai)聲中編織成的。

延安的頭目們利用赫爾利的失誤來變戲法，現在便正加緊着手籌備中國共黨的「七大會」。現已毫無疑問，這個大會即將在以後數月之內舉行。赫爾利拒絕了在延安所簽的那份協定草約，使毛有了整個一批有力的論據，其中主要的一點，便是國共的聯盟是不可能的。這個辯論產生了一些深遠的結論。這可以回溯到過去，證明毛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間的政策（反對對日本侵略者進行積極作戰、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暴露國民黨間諜運動、在日軍介入的氣氛中發動一次內戰等）是合理的；那就是說，這使他所有的宗派活動，全都變得有理了。

現在毛澤東公開的說，跟國民黨聯盟是絕不可能的。他故意曲解這樣一種聯盟的目的。他稱這是一個與階級敵人（與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締結的邪惡聯盟，却並不指出這樣一

種爲反對一個侵略者而締結的聯盟，在性質上是迥然不同的。在全世界每一國家，所有各種全國勢力，無不集合了他們的力量，來擊敗法西斯主義。但毛却絕口不談這個問題。他口口聲聲的說，與一個階級敵人締結聯盟是荒謬可笑的，王明派的主張與國民黨聯盟是短視。他代表了「共產國際」「主張投降」的策略（主張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

毛喜歡表現他用階級來處理各種發展的方法，但如果這種分析與他的目的發生衝突時，他就以大言不慚的詭辯，來結束這個問題。但這種詭辯，也有一個專門的型態。那是基於不是用愛國主義、中國歷史的特殊情形，就是用「現實的馬克斯主義」加以偽裝的國家主義的原則。

毛當然會告訴全世界，「聯合委員會」並非中國的政府，他設法建立一個這樣的政府，因爲深怕分裂了抗日統一戰線。又是詭辯，在這兒延安，他們設想了他們自己的解釋。他們自稱「聯合委員會」祇是使中國實現民主化的一個有效方法，而中國的民主化將可促進對日本共同勝利。在這些話裡，真真假假，混和了在一起。

「聯合委員會」自必就是第二個中國政府（當然，南京的傀儡政府不能計入）。這個委員會的成立，結果必然使中國造成最劇烈的分裂。在對日抗戰期間發生的分裂。一個使人民受到加倍災害的分裂。……

在另一方面，毛所熱切渴望的夢想，便可成爲事實：他將成爲這個政府的首領，採取最堅決的步驟，發動內戰。

現在延安，都把赫爾利當做了笑料。但儘管如此，對美國人仍繼續維持接觸，以備不時之需。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莫斯科頒給了我一個「保衛莫斯科勳章」，作爲向我道賀。

毛澤東不論是作何事，他的整個政策總會考慮到蘇俄的協助。在任何危急情況中，這個政策總會想到蘇俄的不變支持。要克服任何政治危機，總就想到蘇聯會對延安作有利的決定性的干預。

毛澤東在他與美國人所作的賭博中，他原是一個受到歡迎的人物，主要因爲他有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實力。不過，他是受蘇聯支持的，這一點在美國人看來，就變得特別令人吸引的賭博。美國便以使中國共黨反對莫斯科，來削弱莫斯科的地位（現在還保持這個政策；美軍考察團並無意於結束這個政策）。與毛澤東聯盟，美國便有一機會，可以經由中共的基地，

趕到蘇聯的遠東邊界，恢復那「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衛生隔離警戒線」。

白宮認定，這個危險太大了，不敢與中國共黨結爲聯盟，把自己束縛起來。

我爲什麼這樣確定呢？在十二月十六日，白瑞德要求與葉劍英和朱德會晤。他提出答覆說，不幸得很，現在中國的盟軍領導階層，沒有機會可將武器裝配八路軍和新四軍。

白瑞德強調說，這是由於中國共黨領導階層拒絕接受中央政府領袖提出的協定草案，所表現的那種固執態度的直接結果。「我們沒法依照這種條件來運交武器，」白瑞德說。

毛澤東固然可以提出讓步，但凡是涉及權力的問題，便決不退讓。這是對他的一個重大打擊。因爲他會有意至少能多少的從美國人方面得到一點好處。

在與朱德葉劍英分手時，白瑞德說，時間也許會得來到，使這種援助成爲可能，不過，大家必須耐心。

如此，白宮已決定，要從獲有保障的投資，來收取利潤。蔣主席可以慶祝，得到了一個勝利。……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史特萊邁耶中將麾下的美國空軍第十軍，駐在印度。他的部份單位，也在中國參加對日

戰爭。

陳納德少將麾下的美國空軍十四航空隊，整個駐在中國。在日本對美宣戰前，陳納德即已在中國率領了一批美國志願飛行員。

戴維斯又來到了延安。

美國人經常舉行各種晚會，大吃大喝，還拉着中國同志去參加。

有一個叫柏德的人跟着戴維斯一同來到。他的肩章顯示他是一個陸軍少校，柏德是美國軍事情報處的代表。

所有這些人的來到，觀察團的新人，顯得這個賭博正在進行之中。同時，美國人正在等待機會，衡量各種利害得失。中共軍和黨的領導階層，正在「特區」積極進行軍事和政治的視察。

誰也沒法預料遠東究竟有些什麼發展。在這個情形中，雙方都有意維持消息的溝通。柏德也參加白瑞德與延安領導階層的會議。

毛澤東由我經手，向莫斯科發出了一個電報。他使我想起一個玩紙牌的人，在兩張牌桌

上賭運道。

在這份電報裡，毛澤東宣稱，共黨對中國的命運，擔任了一個主要的角色。這是一個能救這個國家的主要勢力，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因素。所有這一切都是過去八個月來震撼中國的演變的結果。

目前情勢的發展，使國民黨和共產黨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影響，即將有一重新分配。共黨的影響力不久即將超過國民黨。截至目前，還有所不同。

毛澤東接着又來了他的的一套數字騙術。他說，正規軍之數已達六十五萬人。並稱，在明年，這個數目很可能會達到一百萬人。

重新改變方位，把新的方位偏向莫斯科，已經成爲事實。在黨的頭目中，商談有關蘇俄爲保衛中國共黨利益所擔任的角色問題，關於「兄弟黨的精神」問題，時機已經成熟。

毛澤東有他私人與莫斯科通信的工具（強有力的電台、私人的密碼），但他固執地保持着把他的電報交由我來發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一日

在此演變的情勢中，十二月二日「消息報」刊出的一篇文章，令人具有高度的興趣。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二日

毛澤東和我談了八個多鐘點，嚴格命令不准有人來打擾。

毛向我解釋，我們應該明瞭，在目前情形中應用統一戰線策畧的真正意義，他提出了中國共黨領導階層的「官方」說法（這是在他自己實際生活中所加以漠視的）。

毛告訴我目前與國民黨維持關係所遵循的原則。接着也把軍事建設的消息告訴了我。許多有趣的事實，但一切都充滿了過去那種牽強附會的數字策畧的氣息，暴露了他正圖以虛偽的手法，向我提出一切的問題。

毛特別注意於分析過去黨內的鬭爭。「過去」，因為在毛澤東認為，現在黨內已經完成了團結。毛澤東並未提到王明、洛甫、博古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姓名，他說，「整肅三種作風」的鬭爭，終於能暴露了那些主張對「反動」國民黨讓步等等的投降政策的人。這個鬭爭終於得以在黨內上下，實現了改組。它使黨有了明確的目標。

毛澤東分析着中國共黨領導階層與美方談判的經過。在這方面，他告訴了我上次與美國觀察團團長白瑞德會談的詳細情形，扮演了每一與會者的角色，模仿着白瑞德上校的語氣和姿態。

毛澤東向我指出，第一個協定草案是由赫爾利在延安簽了字的，這就使盟國「正好跌進了圈套」。他們沒有辦法，祇有要求 蔣主席方面提出讓步。他們從「他們的今天」，取得了讓步。於是美國人便來找到中國共黨的領導階層。……

這時，毛站起身來，開始在室內踱着。他走到我前面，模仿着白瑞德那種反對他的神氣。

毛向我解釋說，他沒法同意讓步，因為不論對 蔣主席同意什麼，便都是給共黨加上一個套索。美國天真地極力爭取一些誰也無意提出的讓步。因為共黨所提出的要求，都估計着 蔣主席是一定會斷然加以拒絕的。從一開始，所有一切的安排，都是準備 蔣主席會拒絕共黨的要求的。「我們知道這點，我們是對了。」

「於是美國人方面派了白瑞德來見我，」毛澤東自己格格地笑着說。

白瑞德來找到毛澤東，開始談到 蔣主席的讓步，談到共方不免要作互惠讓步，接着提出這種讓步的大致方式。

毛採取了攻勢，滔滔不絕的對國民黨和重慶政府提出了一連串的謾罵。為了使白瑞德無話可說，毛說，「當時赫爾利先生在這裡。他自願的在那協定草案上簽了字。爲什麼要拒絕那個經過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同意、並且簽了字的東西呢？」

毛澤東用高度生氣的聲氣，對白瑞德講着這些話。他向我重新做出了當時他的語調和面部表情，看去更像是憤怒，正義的憤怒，受了創傷的情緒！

毛澤東神經質地在室內來回踱去，格格的笑。回想到赫爾利裁的筋斗，以及白瑞德那付蠢相，使他覺得很滿意。他一遍又一遍的欣賞着這個場面的瑣屑細節。……

有人打算要進來——毛粗魯的叫他們別來打擾。他把椅子移到我前面，開始詳細的講出所有這一切如何使白瑞德感到了非常驚慌，他如何的提高了嗓子，勸毛切勿自貽錯誤，因為在中共黨領導階層方面如果堅持固執，美國的輿論是決不諒解的，勢必付出很大的代價。美國輿論將會反對延安和所有的中國共產黨人。於是一切協助，便都泡湯了。

毛表演了更加激怒的反應。他說用輿論這種東西來恐嚇「特區」，完全是蠢事。這個把戲在這裡是起不了作用的。所有那些保守份子和反動份子，對共產黨進行憎恨和宣傳的活動已有很多年了。

「我們曾受到了最骯髒的辱罵！」毛說。「他們大家都把我們看做是犯人。我們對這種公開的譴責，從來就不放在心上。」

白瑞德決定以祇給重慶的中央政府援助，施以威脅，來達到他的目的。美國的援助，祇給國民黨。……

毛回答這個說話時，嗓音都失去了控制。他大聲叫出說，總之，「特區」決不在乎是否有人承認它。共產黨一直都在獨力奮鬥，以後還會繼續這樣做去。美國拒絕幫助八路軍和新四軍，決不會有何好處，因為「我們一直就沒有得過這種援助，以後沒有援助，還會繼續做去！」因此，直到現在，一直都祇有重慶得到武器。一切都祇給國民黨。如果情形就是這樣，那麼「特區」就會召開一次會議，成立它自己的政府。「特區」決不在乎這個政府是否受到蘇聯（！）、美國、或是英國的承認。如果他們是够聰明的話，他們對這個問題，就不要太苛求。如果他們拒絕建立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也不會因此變得更糟糕些。十年、二十年會過去，一百年會過去，他們最後自會來締結協定，派遣使節的。他們都會要承認我們的！可能在一百年以後——不過他們是會承認我們的！他們決不會放棄機會——他們會承認我們的！

白瑞德上校會談結束時，毛說，他永遠都樂意接待美國人的。

「如果上校飛到這裡來，」毛說，「我們會迎接你，我會親自到機場去的。我們並不拒絕談判。我們是主張談判的。」

第二天，白瑞德上校就匆匆的趕到重慶去提出報告。

毛講到他和白瑞德的會晤，就變得非常的興奮。他的頭髮落到兩鬢，也不把它摺回去；

他的臉漲得紅紅的。他提高了嗓子，用急促的聲音，講着一些粗鄙的笑話，還用手勢表現了這種粗鄙說話的意義。

毛演了一齣戲，表現他對我是完全坦誠的。他甚至並不隱瞞，他有這一切大聲的談話，都是故意扮演的。然而這種似乎很坦誠的態度，也絕非真的，也是他事前預演過的一齣戲的一部份。

毛始終並未提到白瑞德這次來到延安，還有一些旁的的原因，這次的會談也在進行一些隱藏着的陰謀計劃。毛顯然有意在取得美國的支持與援助之後，憑藉權力手段，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當然，他沒有一字提到，他有意要由白宮來反對莫斯科。

有了美國方面的幫助，毛就可以開始全力策動，把他未來與國民黨的衝突，轉入一條有利的途徑。實際上，在所有這些月裡，他一直都在做着向白宮，而不是向蔣主席，進行賣身投靠的工作。他深深知道，美國方面祇有基於一些確切的政治條件，纔會同意這樣一種聯盟，而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條件，便是把蘇聯和遠東的政治隔絕。

實際上，這些工作，便正是毛在這次爭取武器中幕後所進行的活動。他當然知道，在這樣一種建立友誼關係中固有的一切困難，但他懷抱着這樣一種希望，即在目前，始終並未放棄。就在白瑞德臨動身之前，周恩來就曾交給了他一封新的給赫爾利的信，這是決非毫無意

義的。

由於美國挑選了與蔣主席聯手，迫使毛尋求莫斯科的支持，而同時並不與白宮完全決絕。這便是這封秘密信件，他所爲我扮演的那個與白瑞德會晤的一齣戲，以及其他許多事實的原因。總之，毛是爲了保險，不擔風險，這是事實。莫斯科在他的計劃中是一個以防萬一的變數，在他看來，是最壞的一着。

我就依照這些路線，向莫斯科提出我的報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我對「消息報」所載克萊諾夫的那篇文章，深感興趣，因此，我請莫斯科把內容告訴了我。

這篇文章聲明無產階級的團結，並表示蘇聯對中國人民的親切感情，儘管毛澤東採取了那種無恥的政策。但毛澤東却用他自己的方式來解釋這篇文章。在他認爲，這是蘇聯將來將在遠東進行活動的證明。

這篇文章認爲，中國的分裂，乃是它在軍事上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在中國，中國兵大約以十五對一的多數，壓倒日本兵。在中國，日軍並未像納粹德軍那樣的使用龐大的坦克軍

力。盟國空軍保持着空中的優勢。雖然這兒缺乏彈藥、武器和糧食，但這並不能認為是日本贖武者不斷佔了上風的主要原因。

中國在軍事方面的挫折，是在於全國兵力的分裂。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回想上次我與毛澤東的會晤，使我得到一個結論。毛表演這一齣與白瑞德合演的戲，純粹是依照預先安排的計劃做的，雖然毛對它的後果，多少感到憂懼。

他說他想到他對白瑞德是否做得太過份了，深怕美國人方面，如果把這情形看得認真其事，就會和他破裂了，這句話是絕非毫無作用的。

毛澤東認為盟國方面無疑是會同意他的要求的（回到原始的協定草案）。一個具有高度重要意義的事實！他仍然抱着希望。……

作為一種妥協辦法，毛澤東想到可能建立一個全國所有一切軍力的聯合參謀部。白宮可能會提出一個這樣的計劃，蔣主席將被迫同意這點。美國會使他同意的。這樣一個參謀部將包括共產黨、國民黨和美國武裝部隊的代表。這個參謀部當然由一位美國將軍擔任首長。

毛澤東事前就對這一計劃表示痛惡。這將成為對共黨所加上的鐐銬。原因並不祇是在美

國的教官——他們將會派到八路軍和新四軍裡——而是在隸屬於這個聯合參謀部之下。見他鬼的間諜人員、教官和顧問！至於隸屬於這個參謀部之下——這便是真正的錄鏑！沒有一個步驟不要受到命令。這表示是要對日軍作戰，而不是主要的在增加中國共黨的基地。一般而言，這就排除了所有一切與蔣主席進行衝突的準備，而這却正是八路軍和新四軍過去、現在、將來的唯一目的，也就是在過去幾年來所全力做的工作。

如果毛澤東對我完全坦率直言，那就是天大的怪事了。他不是曾對他的一些主要伙伴講過，建立聯合參謀部的構想，是要比了加上錄鏑還更糟的。因為如果蘇聯宣布廢止日蘇中立公約，開始在東三省或蒙古對日本採取軍事行動，八路軍可能會發現他們給美國的登陸部隊堵塞住，而與蘇聯部隊的軍事行動隔絕了。這是無可寬恕的錯誤，因為中國共黨必須攫奪那邊的政權。但在那種情況中，美國人決不讓他們這樣做。結果，中國共黨就沒法取得蘇俄勝利的果實，因為所有深入這種地區的道路都將為盟軍先行加以切斷。

如果真是不可能推翻聯合參謀部的構想，毛澤東便有意採取下面的一些措施。他將祇把八路軍和新四軍那些預定對盟軍登陸行動作直接支持的部隊單位，交給聯合參謀部。舉一個例說，他將提到共黨與盟軍部隊在連雲港合作的計劃。為了遵從這個計劃，中國共黨領導階層曾答應他們以不下於二十個完整團，參加作戰。我們不免又想到另外一些例子：如果在

九四一—四二年期間，中國共黨頭目們能撥出一半這個軍力，來支持蘇聯在遠東的陣地，那够多好！在那時候，他們一點都不關心到我們的困難！他們的電報，信誓旦旦，滿紙友好。他們的宣言，是不吝費辭的。……

我知道了一件離奇怪事的詳細情形。原來這個在連雲港進行軍事行動的計劃，居然已給日軍司令部知道了。

啊，這兒是你們的整風。抓間諜，暴露他們的身份，而這個祇有在中國共黨高級工作人員一個最狹隘的圈內知道的計劃，竟立即就被敵人知道了。當然，整風是爲了進行另外一些目的。……

這一齣跟白瑞德合演的戲，還有一個目的，毛澤東也瞞住了我的。他當然希望說服美國人，共黨已充份成熟，可對外交政策的工作，來作獨立的決定。無怪他曾威脅他們可能建立一個中國的第二個政府。

而且，白宮仍然亟需一些新軍，他們希望用中國的兵來加以補充。如果在國共發生分裂時，這些兵士便將參加內戰作戰。白宮不希望要他們自己的公民來流血。

在此，每一個決定，都是一批糾纏難解的爭論問題，其中有些問題，都屬互相排斥，難以調和。一種惡毒的糾纏，總之，整個糾纏便是一場爭吵！

毛澤東也在追求另一個目的：給共黨加上一個光圈，使它顯得是一個可以和它進行交易的獨立勢力。

他們雖已沒有接受武器的希望，但他們還是不想失去這個希望。總之，他們仍然還在希望。……

他們對盟國的痛恨，雖然正在發酵起來，但他們還極力的討好，裝做是伙伴——簡直像個馬戲團！

這些月來，毛一直工作很多。他積極工作，要把未來的發展，轉為對自己最有利的管道。他設法阻止一些主要大事（遠東戰爭的結束）的發生，並在中國扮演一個主要政治勢力的角色。但在他認為，這個主要政治勢力不能和蘇聯有政治的關連。他把希望寄託在以美國作為對蘇聯的反制力量。照這個情形，白宮撕碎了這個計劃，當然並非他的錯誤。……

這次和我所作特別冗長的談話，並非祇是湊巧的事。毛希望顯得他是中國共黨與蘇俄共黨國際關係的支持者；他證實了中共黨拒絕美國草約的「合乎原則」的理由，並以「現實的馬克斯主義」的精神，提出了一個理論的基礎，證明他的行動是正當的。實際上，毛是在掩蓋他所留下的各種痕跡。

一連八個小時，毛澤東和我談着。談個不完，熱烈地、興奮地。有時，他熱情洋溢，不

知疲倦。……

但在另外一些時候，譬如就像今天，他很苦燥乏味、行動乖張。他有氣無力的和我握手——彷彿就像病了一樣——請我坐下。他開始用沉重的脚步，在室內踱來踱去，彎着背，像是感覺寒冷似的。他心不在焉的，接着是一陣長長的靜默。然後他坐下來，讓身體鬆散着。他把一雙手懶洋洋的放到膝上。

他重又向我談到中共黨領導階層與美國人進行談判的方針，顯得很關心於蘇俄對日俄中立公約的態度，但在實際上，他是要設法探求莫斯科對他的行動的態度。

他臉上帶着一種倦乏的笑容，不住的把目光注視着我。窗格子依稀的影子，在他的老棉褂上戲耍着。

毛的哲學和理論水準，乃是原始的物質主義。他一直害怕人民大眾的民主本能。對毛來說，黨與人民大眾的爭論和接觸，主要是一個聲威的問題。因此，他用整風的方法，來教育黨內大小人員，使他所講出的每一句話，都成爲無可爭議的真理。

在毛澤東認爲，盲目的服從，便是理想的黨的關係。

毛澤東的民主主義，祇是限於他所穿的那套樸實的唐裝，在一些特殊時機，上面還縫上

了許多補綻。

毛澤東爲了熱衷於權力，壓制着每一個人。他的所有一切「理論」，便都祇是用來遮掩他對這個觀念縈繫於懷的感情。

毛澤東是沒有，也不會有任何的感情的。他能養成習慣，但他專心致意的熱情，祇是爲了爭取權力！這種熱情，使他心中便再沒可以容納感情的餘地。這就毀了毛澤東，使他成了一個危險的、強取豪奪的人，沒有一點人性的自然情感。凡是並不符合他的計劃的事，在他看來，便都是毫無意義的。凡是與鞏固個人權力背悖的事，都是背悖中國共產黨的事——這便是毛澤東的最後政治信條。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中共黨駐在重慶的機構，約有五十個職員，這個機構由周恩來和董必武主持。

陳家康是重要職員之一。他是江西人。受過大學教育。在過去一年裡，他擔任周恩來秘書的工作。他英文不差。跟重慶所有美國軍事人員都搞得很熟。他是他們的常客。在延安，他們把他當做好朋友一樣的加以招待。

劉少文年近四十。他出身於毛澤東的同一地方。

不過，劉的傳記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詳細記載。他曾一度幫着朱德，支持因紅軍領導權問題，與毛澤東發生激烈衝突的張國燾。……但這已是很久以前的過去之事了。

劉在重慶機構中擔任一個特殊任務。他負責有許多間諜人員，李克農對他很器重。

現在，劉少文便完全是李克農的人了。如果我沒看錯的話，李克農和康生相互很嫉妬，毛澤東便利用這一點來加以運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卅日

希特勒的德國，顯然已到了最後末日。因此，蘇聯能採取措施，來保衛它遠東邊界的時候已經接近，這便是中共黨領導階層所以正在舉行一連串會議的原因。

毛澤東急忙的掉過頭來，與蘇俄作一賭博，利用這個手段，來敲詐美國和蔣主席。

昨天，我給莫斯科提出了下面的一個報告：

「最近的事件顯示，毛澤東和他的一批主要伙伴們，正在急速地重新安排，擴展他們對蘇聯的不忠實把戲。他們的目的，是爲了他們自己圖利的利益，儘量的排擠蘇聯在遠東的活動。……」

一九四五

一九四五年一月

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

毛澤東今天跟我談話時，再度強調中國革命的轉變，並不需要熟讀馬列主義。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國，了解它的需要、風俗、歷史。……

毛澤東甚至避免提到聯共。他也沒表示對我們布爾塞維克黨的經驗有些許興趣（雖然他喜歡提到這個黨）。

毛澤東把沒人能挑釁的權力緊緊抓牢後，開始顯示日益希望在所有的黨政事務上，他都是無可爭議的權威。……

毛澤東做出一種符合他地位的動作態度。聽他說話的人必須非常注意，因為他的聲音非常低，難以聽清楚。他的行動很遲緩。他可以絲毫不動地坐在椅上，一坐就是好幾小時。

他脾氣暴躁，很容易動怒。……

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

我去見了毛澤東。

毛澤東正在準備共黨七全大會的文件。看來神色困頓。講話很慢，常常停頓下來，思索着腦筋裡想起的事。他一再地站起來，在屋子裡踱步，伸伸懶腰。他的頭髮落到臉頰上，但是他也沒把頭髮擱回去。他會停在桌案邊，低頭翻閱文件，啜飲清茶。

毛的姿態與行爲顯示出他相當具有信心，相信別人無論如何都會等候他作表示。通常他很健談，但是有時候又故作姿態，故意三緘其口。

毛抱怨一大堆弱點。

毛個子高而強壯，然而却不耐體力工作。他避免散步、晒太阳、運動。……

毛抱怨他的年紀。他哀傷地說：「歲月不饒人，快老囉！」他是一個邈邈鬼，抽煙非常不整潔，褲子、上裝經常沾着煙灰。他隨手亂丟煙蒂，到處亂彈煙灰，那副德性實在令人噁心。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

赫爾利繼續設法在美國控制下，調停國共問題。美國駐華陸軍武官戴巴斯上校、日本問題顧問魏梅葉、魏梅葉屬下的艾德華少校，和其他一些官員，昨天由重慶來到延安。

美國大使赫爾利透過戴巴斯，向中共領導階層提出了一封信。

赫爾利的信中說，現在已有一切條件，可由「特區」和國民黨進行順利成功的談判。他要求毛澤東和周恩來，准許他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宣傳部長王世杰及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一道來延安。

戴巴斯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及葉劍英會談。他們對這位美國武官表現得很含蓄、冷淡。

今天，戴巴斯和另外幾個美國人，携同毛澤東和周恩來拒絕開始談判的答覆，飛回重慶去了。他們交給戴巴斯一封信，毛澤東代表中共，要求緊急召開全國民民主大會會議，以及准許給重慶的共黨報紙新華日報可有充分自由。毛澤東堅持由全國共同討論一切有關中國民主改革的問題。

中共領導階層這種不妥協的強硬立場，其目的若不是要與國民政府決裂，那就是要在國

際上孤立它。毛澤東考慮到由於日本繼續採取攻勢所產生的環境條件。國民政府實際上已遭受到所有抗日同盟國家新聞界的攻擊。

毛澤東繼續利用赫爾利鑄下的錯誤，他在去年十一月十日簽署了那個國共之間的延安草約。毛澤東知道，這位美國大使已發現他正處於尷尬的地位，將不得不在「特區」與重慶的談判中進行斡旋，以免國共雙方的緊張情勢惡化，馴至發生武裝衝突。這正是毛澤東不顧事實，天天在要求清單上增加一些花樣的緣故。在他看來，現實情形就是藉顯示國民政府已是個破產者，來吸引美國人同情「特區」。……

從消息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刊出那篇文章後，中共頭目大大改變了他們對和美國人會談的看法，把他們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的政治支持不會變化之上。然而，他們並沒有從軍火庫中拋棄他們的舊政策。他們以一種新形態來繼續進行這個政策。現在他們以頑強態度做工具，來敲詐美國人。……

戴笠是 蔣主席的人，他領導國民政府的反間諜組織。蔣主席對他極為信任。美國武官戴巴斯上校是少數能和他見面的人之一。重慶幾乎沒有人見過他。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

毛澤東和我一起外出。

葉劍英走過來。毛掏出一支香煙，點上火。他蠻能靜靜等着。

葉劍英說，美國人顯示對在延安的俄國人很感興趣。

葉劍英的結論是：「你的情報機構令他們非常感興趣，宋賓。」

毛澤東補充了一句：「記者們也很感興趣。」

毛談的是去年外國記者參觀特區那回事。當然，美國軍事觀察團和好奇的記者，都禁不住很想探聽莫斯科在此地的立場。……他們都很驚訝地發現，這裡只有三個俄國人——我自己、奧洛夫和黎瑪爾（普羅盛科沒算進去，因為他只是偶而才在延安出現）。至於駐在特區的美國人却是一個大代表團，人數有時達到數十名軍官。拿運動員的術語來說，就人數講，美國人占上風。……

我認爲美國人對整風知道得不少。（要謝謝誰？馬海德？）縱使他們並不了解共黨內部意見不和的錯綜複雜情形，他們已掌握住主要之點——毛澤東希望實現他的國家主義的「現實的馬克斯主義」。他們把這種「馬克斯主義」解釋爲反蘇主義。他們便並不需要再知道什麼了。

當然，並非所有觀察家都是這樣研判整風意義的。但是戴維斯、謝偉志、魯頓（史迪威

亦部分如此）等人，顯然及時認清毛澤東這種觀點所提供的機會。有這樣一個黨魁，他們就不再有多想中共的經濟政綱了。與他結盟的基礎現在手頭——他正為政治上的孤立地位而掙扎，在這種掙扎奮鬥背後，可以分明看出一種反蘇的意識。觀察團的先生們絲毫不差的從中共領導階層的情緒中，嗅出了反蘇俄的氣息。

史迪威、戴維斯、謝偉志和魯頓，是最危險的一種「盟友」。他們比他們那些不相信毛澤東的反俄王牌，斷定他祇是花言巧語的同僚們，看得更遠，遠得很多，其他的美國軍官祇是遵循他們所奉的指示，而毛澤東的作風，實在一點都不符合於這種指示所稱的毛澤東是「第一號共產黨」——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中，還有什麼進展可說！……美國軍官遂斷定這個「第一號共產黨」只是花言巧語而已。

史迪威這批人（戴維斯、謝偉志和魯頓）了解，美國和「特區」結盟，將可敞開了比傳統傾向於國民政府或是有有限的利用中共軍事部隊，更為重要的遠景。……

史迪威充分了解這個情勢。無怪這樣一種人會集合在這位將軍身邊。不容置疑地，史迪威是個中國問題專家，他在年輕時，曾在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供職甚久。這就是為什麼太平洋戰爭一開始，羅斯福總統便立即任命他為中緬戰區美軍總司令，並兼 蔣主席的參謀長。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

共黨與美國人的關係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共領導階層認清，和美國人談判成功的機會，已逐漸接近於零。以美國援助來解決內部政策問題的希望，也正煙消雲散。最糟的是，毛澤東希望藉美國對團結抗日集團的關切，來使國民政府失去活動的力量。如果將來他當了權，他保證美國可自他們對中國經濟的投資，獨佔極龐大的利潤。

因此，美國將不會允許全國抗日戰爭具有革命性質，並不令毛澤東煩惱。重要的是利用他們的援助，壯大力量，把蔣主席推到後台，以重慶體制的腐敗嚇壞白宮，強調重慶政府的垮台是無可避免的，而且就經濟前途的觀點看，這個體制也是不可靠。毛澤東像個商人，自吹自擂，試圖證明他的貨色最好。……

所以，美國人被他們對共產黨的極大恐懼所征服。他們準備相信中共黨的領袖們，而不是他們所走向的那種勢力。雖然他們設法做去，但還是不夠大膽，沒法把共產黨頭目們的小政治把戲，和日益滋長的革命運動，加以劃分清楚。白宮認為這樣太冒險。美國使者不斷的奔波於華盛頓與重慶、延安道上。誘惑固然很大，但是令人擔心之事却更大。美國人認為莫斯科是支持毛澤東的。毛澤東充分認識這點！這個湖南佬費盡心計，力圖令美國人相信，

中共黨是完全獨立的（！），並且竭力使他們了解，在遠東孤立蘇俄，不祇是符合美國利益而已。華盛頓沒拿他的這種話認真看待。華盛頓認定，毛祇是想犧牲美國來從中取利。

毛澤東對美國人惱火透了，現在他決定利用他們對中共部隊的興趣，從他們那裏榨取另一個重大利益——用美援將 蔣主席置於不斷的控制和壓制之下。雖然美國人對武器吝嗇，他們並不排除給予八路軍和新四軍援助。誰將在此地與日本人對抗作戰？讓他們以延安提出的各種各樣要求，來拘束 蔣主席。……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

毛澤東繼續不斷以同樣的數字來加緊餵飽美國人和我。我懷疑白瑞德對這一切做何感想？

一如過去，白宮亟欲控制中共武裝部隊。美國力圖促成中共和國民政府的政治解決。這表示白瑞德正在吞下釣餌。美國人在延安和重慶之間穿梭往來，並且輪番的向國民政府和毛、周之間甘言哄勸。然而，這可能不只是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問題。美國想控制中國的政治發展；他們夢想指導這個政治進程，並且把一切的事都歸他們控制。

前些日，我發出一封重慶的電報。通常我從毛澤東手中接過一些電報，那就提供了我們

一個晤談的藉口。他終於選擇了我，作爲他與莫斯科通訊的傳遞人。毛澤東居然相信了這套手法。……

這通電報的要旨是：毛澤東一心一意的專心注意到在倫敦舉行的世界工會大會。他從這個大會，見到了另一個工具，來塑造斷然預定方向的輿論。這種輿論煽動美國人對國民政府增強壓力。因此，參加這個大會將可促進這個同一政治問題的解決（孤立國民政府、美國可能再轉向延安、還可能繼續避免與日軍發生大戰役的策略）。

致世界工會大會的電報，將需經由重慶發出。毛澤東沒有把握，國民政府的新聞檢查官是否能讓它發出去。這就是他爲什麼要悄悄的告訴莫斯科，他將派遣一個專差到印度去，發出這個給倫敦大會籌備委員會電報的原因。

這份給莫斯科的中電，毛澤東又要了他那的套數字遊戲的老把戲。因此，他把中部各省一些主要地區工會的會員數目，吹噓成堂堂二十萬人（包括八個地區）。一般而言，這種工會是否存在，還大有疑問。中國長久以來一直陷於戰亂，受到嚴峻的戰時管制。在這種情勢下，會有什麼工會存在呢？

然而縱然這種工會確有存在，也不會有人去計算其會員的人數。中共領導階層甚至都沒有法精確的說出，他們武裝部隊實力的精確數字。每個司令員可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思報告他

的兵員數額。延安什麼也沒有控制。每一階層，都搞浮報人數這套把戲。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這增加指揮官的聲望，增加他的功績，同時也提高延安領導階層的興趣。

毛澤東有一回和我談話時，抱怨中共部隊裡有驕兵悍將。這使我再度相信，「浮報人數」在這兒是合法的。

隣省山西東南地區的工會，至少有會員十二萬四千人。天曉得，他們如何能在毗鄰戰場的情勢下，言之鑿鑿，確定這個數字。

延安地區，工會會員人數多少可能比較可信，但是我要強調「多少」這個字，因為甚至這個數字也大約有六萬一千人。

毛澤東告訴莫斯科，這是大概數字，因為農村人力尚未計算進去。

晉綏邊區工會會員人數最少——一萬七千人。但是在山西河北邊區工作的「無產階級抵抗日本法西斯暨解放協會」人數，却剛好是廿三萬五千人整。

中共在華北的據點（山東職工組織）約有十四萬四千這類勞工。

毛澤東在電中寫道，中共領導階層已決定派遣職工代表團，出席將於倫敦召開的世界職工會大會。

工會的全部實力是八十萬人。中共領導階層想派一個全權代表團去倫敦。

仔細勘對這些數字，以及致莫斯科電文草擬的方法，使我相信，這是蓄意編造的一件錯誤情報。跟過去幾年拍出去的許多電報一樣。……

我在毛澤東的電報上加註我的意見。我告訴莫斯科，這份電報只能當做證明他企圖混淆聯共領袖的一個文件。

毛澤東並不期望接受聯共領導階層的任何意見。這種意見對他來講，沒什麼意思，因為長久以來他一直就在進行着一些與進步的世界工會的綱領並不協調的行動。

毛澤東的目的是要利用國際工會大會，另搞陰謀，來達成他的內政政策的目標，這種目標是跟與日本作戰的利益南轅北轍的。他強調他是為團結各民族力量而戰。事實上，他的行動目的是要在中國製造分裂和權力危機。至於說，將入侵的日寇趕出中國這件事，他希望這個工作由外國部隊（蘇俄和美國）來做。

工會組織的人數絕對是假造的。這份電報是由中共「政治局」委員周恩來起稿的。如果說，這是他苦心孤詣，熬夜寫出來的結晶，也不會誇張。周恩來是中共大部分「外交」文件的起草人。他毫不保留地支持毛澤東對莫斯科的撒謊作法。……

博古告訴我說，周恩來在電報中加上了一段，要派遣一個特別信差，攜帶訓令到印度，拍發致倫敦世界工會大會籌備委員會的電報。但誰也沒有打算派出這樣一個信差——這是中

共領導階層集體撒下的大謊。關於派遣特別代表，攜帶包含每一細節的文件（並且不只是有關解放區的工會活動）赴會，曾有一項秘密決議。中共領導階層假設，這些文件會在中國挑撥起新的政治糾紛，再度震撼業已不安定的局勢，而最主要的是，迫使蔣主席忍受着未來再有的新地方損失。很顯然，蔣主席決不會同意以這種團結來抵抗侵略者。倫敦大會因而將是對抗日統一戰線的又一打擊。這套齷齪把戲要在日軍進展順利之時進行。……

周恩來也說，要採取一切可能措施，讓康生的諜報網，確定將文件轉到倫敦，以免代表團（或代表）未克抵達倫敦，而全功盡棄。……

毛澤東命令，有關解放區工會特別政治報告的種種消息，務須讓大會知道。

毛澤東要我拍到莫斯科的電報，它的日期與這個問題做成決定的日期，大大不同。這再次證明我是對的。這地方沒有人對莫斯科的意見感興趣。……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九日

我覺得毛澤東對我懷有某種程度的不滿，這當然是康生進言的結果。葉劍英暗示，這個情報局長正對他施壓力。然而葉劍英很堅定。除此之外，葉劍英很滿意。由於整風已高唱入雲，他跟康生的關係已是冷淡中透着幾分禮貌，使它和緩下來。贏回來的時機來了。葉劍英

很技巧地搞了一下康生。康生徒費心力企圖恢復舊關係的嘗試，令葉劍英高興。的確，康生在一年半至兩年前，也是這樣要弄每個人，一手操縱「正義」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

毛澤東情緒低落。在他要求下，奧洛夫替他打針。然而，即使在這種時候，毛澤東還是親自指揮黨務和軍事。

一九四五年一月廿二日

戴巴斯上校携同赫爾利大使的另一封信，於星期天搭乘專機，由重慶來到延安。

白宮準備促成由中共派遣代表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這是一個很大的讓步。

然而，毛澤東反對周恩來到重慶去，他稱軍事委員會是「欺騙輿論的機構」，妨礙中共的主動地位。……

中共已採取種種措施，來破壞重慶這一動議，並在國內外各地人民的心目中，竭力詆毀蔣主席。

美國人表現出異常的精力和緊張。可能這跟三大盟國即將開會有關，也有可能這和羅斯

福特打算訪問中國有關。有一件事是無可爭議的——他們希望控制此間的情勢，他們想要兩面討巧。但是迄今還沒有一人這樣做成功的。……

但是事實依舊是，赫爾利不斷要求周恩來到重慶去。赫爾利依然希望彌補他的錯誤，並在中國建立控制力量——同時控制國共雙方。

美國人特別不耐煩進行各種的談判，他們擔心蘇俄無可避免地會在遠東有所行動。毛澤東也考慮到這些問題。政治走馬燈愈轉愈快！每天都出現一些新客、記者會和報界領袖。

一九四五年一月廿五日

赫爾利的建議經過了三天的討論，這三天三夜裡，毛澤東和副手們絞盡腦汁，希望想出一些方法來拒絕國民政府最新的建議，同時又不致引起社會一般人士的不滿。戴巴斯上校耐心地守了三天，靜候答覆。……

星期二，周恩來偕同這位美國陸軍武官飛往重慶。依我看，戴巴斯比平常緘默。的確，他沒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機場上，他的一批同胞歡送他登機。

周恩來此行正式目的是與蔣主席會談，而以赫爾利做居間的調人。

赫爾利大使勢將在美國外交史上，留下「中間人大使」的英名。

毛澤東私下告訴我：「共產黨在原則上反對參加 蔣主席的軍事委員會。」

和往常一樣，毛澤東並非徹底坦誠。現在中共領導階層期望，以蘇俄的利益為犧牲，比透過美國的調停所能取得的，取得更多的收穫。這就是他們所以同意談判，以便不致因其政治要求方面的激烈改變，而激怒了輿論的原因。周恩來揣着一大堆文件和重慶方面必然不會接受的條件，飛往重慶。

一九四五年二月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

周恩來與國民政府代表於一月三十日，在重慶外交部長宋子文的辦公處舉行了一次會談。

王世杰代表國民政府，建議由民主同盟派遣一個代表參加政府，但是他反對召開各黨派會議。

周恩來發言指責國民黨專政，要求召開國民大會。

儘管赫爾利積極調停，周恩來拒絕讓步。赫爾利說，他預備返美述職。……

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

毛澤東並不反對凍結與重慶及華盛頓的一切外交活動，但是他害怕輸掉這場賭博——如果蘇俄不對日本開戰，那怎麼辦？

令中共領導階層既不安的就是，蘇俄在遠東的地位正在不斷增強，隨之而來的部隊新部署，以及中共地位無可避免的要再鞏固。應該依靠誰呢？美國？蘇俄？

想到延安的事務，我不由得想到一個法國人說過：「謊言就像賈幣，由罪犯製造，而由老實人流通使用。」

國家主義，承認「現實的馬克斯主義」以及拋棄原則，逐漸征服了中共黨的幹部。毛澤東被當做活神仙崇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我設法取得了一些外國記者延安之行後的報導。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生活雜誌」上，登出美國記者白修德的一篇報導。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是，我們意識型態上的這一敵手，所強調的此間的一些事實。他們絲毫不差地掌握住毛澤東修正馬列主義的本質——他不接受西方馬克斯主義的教條。在這種排斥之下，滋長着毛澤東的反蘇思想。

這篇文章也證實了毛澤東混淆輿論的結果——他謊稱八路軍對抗日軍的真正性質，也誇

大這些戰役的規模。特區裡搞這套欺瞞外國新聞界的努力，產生了效果。其中一個個舉動就是，中共部隊對抗日本軍閥調查報告。葉劍英去年向外國記者朗讀這份調查報告，後來並經延安解放出版社整理出版。這篇報告上的數字變成了「官方」資料。不僅外國記者引用它，連美國觀察團也引用它。毛澤東希望這些數字記錄在歷史上。從這些捏造數字評斷，抗日戰爭是由於毛幫才大勝。白修德在文章中也引用了這些數字。

像白修德這一類文章，劃出了美國政壇、商界人士未來活動的一個「新的產金地帶」。接受白修德訪問並不是中共頭目不加思考的任意行動。他們向這個年輕的資產階級新聞記者透露的消息，也不是無心中透露。這是一種深謀遠慮的行動，藉着在這場戰爭中，美、蘇是反希特勒的同盟國家這一特性，巧加偽裝。毛澤東利用盟國關係遂行其反蘇、反布爾塞維克的行動。

中共領導階層藉「生活雜誌」這篇文章，向美國商業界宣佈他們的政治、經濟綱領。在任何情況下，這都不是可以掉以輕心的詭計。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

毛澤東接到周恩來一封電報，詳盡的報告談判經過。周恩來曾數度與赫爾利、宋子文、

王世杰、張治中會談。

蔣主席並不打算放棄一黨專政，不過赫爾利已盡力勸他不要如此。赫爾利認為國民黨領袖談論民主是言不由衷的，他誤以為宋子文和王世杰是自由派。然而，他們像蔣主席一樣墨守舊規。

赫爾利建議改組軍事委員會，把美國及國共雙方的部隊連合起來。任命一位美國人做總司令（指揮中共的所有部隊，包括在敵後活動的共軍在內），國共雙方各派一人擔任副司令。

周恩來說，這個解決方案不方便、不公平。赫爾利請他諒解。

赫爾利警告說，除非問題能獲積極解決，否則，他將向羅斯福總統報告他的任務已告失敗。但是如果他們能讓步，羅斯福將可能訪問中國，表示他親自認承協定的結果。

宋子文告訴赫爾利，共產黨想奪中國政權。

赫爾利並不反對支持中共那些在國民黨高級官員認為太於過份的要求。但他擔心讓步和協定，將被所稱企圖染指中國的蘇俄所利用。

一九四五年二月九日

周恩來在談判時提出一個新方案，如果接受這個方案，就等於中共的軍力，將以美國租借法案項下的武器供應為代價，而獲激劇增強，同時使中共建立對中國武裝部隊的控制。

在重慶會談中，國家利益被丟到九霄雲外。沒人認真地想到抗戰，日本仍繼續在中國占奪新地區，抗戰這回事，他們把希望寄託於蘇俄和美國。重慶和延安激烈地討價還價。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

與奧洛夫散步一小時，藉聊天一舒心中塊壘。有一大堆新聞。……

我告訴奧洛夫最新發展的消息。他默默無言。

我說，現在有一件事使那湖南佬非常煩惱。那就是即將於一個半月之內屆滿的日蘇中立條約命運如何。莫斯科是否會廢棄這一條約？這個哈姆雷特式的問題折磨着你的病人。如果這個條約廢除，我們將開始對日本展開軍事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對他自己是完全不同的機會。美國人依靠 蔣主席，同時又使盡一切手段來控制毛。從他的觀點看，進一步發展將使他能作一正確的抉擇。

奧洛夫說：「我的病人對他的健康很煩惱。江青在這方面也沒好到那裡去。我一週裡被找去好幾次。」

毛澤東決定從重慶召回周恩來。現在情勢的發展，蔣主席出乎意外的預備對延安堅持的若干問題，提出讓步。

延安發了一個無線電報到重慶，召回周恩來。讓周恩來再留在重慶是太危險了。蔣主席的讓步將會公開發表出來，而毛澤東將會繼續不理會國共雙方的草約。這個技巧的運用，勢將暴露了延安頭目的政治騙局。的確，延安一面呼籲讓步，自己却拒絕提出折衷辦法。

延安必須決定，在不能違背輿論之下，如何破壞蔣主席的聲譽，從而撇開任何折衷妥協。周恩來是此間的重要顧問，他的「第一號外交家」的名氣非常響亮。

事實上，延安的頑強正有一種新的性質。日蘇條約命運如何？蘇俄是否將會廢除該約攻打日本關東軍？果真如此，就值得讓步嗎？在這種情形下，是否可占莫斯科便宜，更輕易地得到一切政治、軍事和物資的利益？

毛澤東對我和蔣得過分。任弼時對我說：「也許你是比我們這許多，他的老戰友還更可信任。」

毛爲了逢迎蘇俄，唱着他的「長沙老調」——我一直是聯共和蘇俄人民的真正友人。
毛澤東把他的粗鹵偽裝成爲美德，經驗相當豐富。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昨天，毛澤東跟他一小批副手會商之後說，儘管相當遺憾，對重慶妥協幾乎難以避免。不過，在四月中旬莫斯科的意向尚未明朗之前，却萬萬不可妥協。

毛澤東給他駐重慶代表的指示要旨是：「盡一切可能，拖長與重慶的談判，使其懸而不決，直到那個時候。」

過去幾天內，毛澤東由我經手發出了一連串的電報。他假裝很誠實，給莫斯科送去了大批統計數字，關於他與國民黨關係的看法，並且暴露美國的「陰謀計畫」。……

如果說毛澤東所知無多，那就錯了。他徹底研究與東方有關的讀物。他消化了一大堆記錄、報告、軍事檢討和其他文件。他對於關係到中國的最新問題，知識相當豐富。

毛澤東在一份電報裡說，國民政府把他們一切希望寄託在美援上面。重慶力促華府儘速開始把盟軍部隊空運到中國來。蔣主席的目的是要借美方的協助，改編他的部隊，裝備最新武器，並將步兵機械化。

毛澤東說，華盛頓的目的是要套牢共產黨。蔣主席和羅斯福總統都在朝這方向做去。毛澤東電報的這一部分，可說不打自招，他們雙方都想要和美國結盟。都想設法以美國

武器和金元之助，來清算他們的賬。爲酬答這種援助，雙方願意把中國經濟供越洋貿易商發展。華府選擇了蔣主席，因此毛澤東現在向蘇俄提醒要階級團結：美國和蔣主席已有協議，這對特區構成一種威脅。

爲了激怒莫斯科，毛澤東又在電報中編造了大批關於「國民黨在政治上賣身投靠」（毛在談話中如此對我說）的事實。他又耍了那套虛報數字的伎倆。

他說，中央政府的部隊約有一百五十萬官兵。這顯示他們的兵力已極大減少。

國軍的作戰能力陷入了「民族解放戰爭」開始以來的最低潮。而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兵力則已增加到官兵七十一萬人。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從毛澤東發給莫斯科的電報，顯得有一個毫不含糊的結論。毛澤東說，在去年，國軍兵力極大的超過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只有完全不負責任的人，才會在一九四三年七月時，以反國民黨的運動，以及將八路軍的部隊，從前線撤回，使「特區」暴露於失敗的危險。

這是一種特別不負責任的作法，除此之外，還必須證明分化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是正確的。關於這點，最好的辯證就是反國民黨的歇底里以及破壞抗日的戰鬥行動（這是正中敵軍

下懷的)。

分化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可以追溯到西安協議簽訂之時。其目的是要與「共產國際」斷絕關係，然後逐漸消除與「共產國際」有關連的黨員，並且承認其戰術和聲望。這就產生了整風。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拿「特區」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冒險孤注一擲，以求達成他的國內政策目標。但是這種冒險是完全鹵莽的！毛澤東相信，蘇俄不會聽任國民政府剿滅中共。不過，我曾見到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危機時期，那副驚慌、狼狽的樣子。

毛澤東突然變得舉棋不定——萬一蘇俄因對希特勒苦戰，無法伸出援手，那就怎麼辦？這種假設使毛澤東猶豫起來。後來，我聽說毛澤東得了瀉肚子的痼疾，俄國人刻薄的把這種病叫做「熊病」（亦可譯作「鹵莽病」或「俄國病」）。

毛澤東知道一九四三年對蘇聯的意義——軍事、經濟極度困厄，是戰爭的轉捩點。我不時供給他這方面的消息，使他完全了解此事。毛澤東不理會這個事實，冒險一試，想拉蘇聯下水，介入遠東的衝突。

根據中共領導階層正在滋長的看法，蘇聯現在應加入抗日戰爭，利用其軍隊與物資，解放一些在中共方面所將用來轉為基地的土地。至於中共的部隊他們將大部份加以保全，專門

用來在未來對國軍作戰，分裂這個國家之用。中共部隊祇應促進未來蘇俄或盟軍部隊進行作戰，讓他們扮演主要角色，來擊潰日本。這種機會不應錯過！應該善加利用——這是中共頭子們所蓄意的計劃重點。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

整風的特性，這些天正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提出解釋。在中共黨的歷史目前這個階段，所有的理論，乃是基於以「現實的馬克斯主義」精神所作成的「毫無爭議」的結論之上。這種曲解的馬列主義，是專為用來實現毛澤東的目的，而非用來對封建的資本主義制度作革命鬥爭。此地人人正加以說服、已說服、或是被迫相信黨內的暴力行動是必需的，這是對階級敵人總鬪爭中的一部分。這被用來掩飾國際派（教條主義者）所施的精神和肉體的懲罰。

整風已變得比較不再那麼顯眼。它已在新的假馬克斯主義掩飾下改變了形狀，以便剷除所有那些與毛澤東觀點並不脛合，以及並不符合於他的「現實的馬克斯主義」的人。總之，在此地，批評是不容許的，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經毛澤東贊同的事，否則一切的事大家都「深信」是決非真實的，此地的人談着列寧主義的作品的風格，但心裡根本不曉得這種風格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風格。

黨的民主在此地被解釋爲，是所有一切的人，從事重覆毛澤東的說話，在每一場合引述他的談話，甚至很荒謬的談話的權利。黨員只准在命令和指示的範圍之內，表現主動。

毛澤東的指導方針，經劉少奇仔細的編成一套論旨，以不同的形式，覆誦一種觀念，實際的意思就是，整風運動是歷史所必需的，它改造了受資產階級道德和哲學影響的年輕新黨員。據稱，整風已把這些小資產階級份子改造成真正的共產黨人，並且幫助他們「更加堅定的保持着勞動階級的立場」。整風據稱暴露了那些在共產黨各領導階層中的代表，不時出面反對人民鬪爭的擴大、反對建立新的解放區，反對中國紅軍（八路軍和新四軍）質與量的成長的機會主義者。據稱，這些機會主義者反對奪回被日軍占領的中國領土（這些領土被假設是在工農勢力控制之下）。害怕日本人，「使某些黨員的階級意識變得麻木」，「他們開始將他們無產階級的立場向國民黨讓步」，他們說，必須加強抗日統一戰線。

據稱，毛澤東消除了這些偏差，救了黨，並且指出一條通往勝利的明確、具體的道路，在此毋庸置評。

蔣主席告訴他的老同志和黨內高級工作人員，他要依據孫中山的遺囑，和國民黨一同建設一個新中國。

蔣主席說：「我祇能把權力移交給人民，但是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把權力交給其他

政黨或任何個人。赫爾利是個蠢貨！美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情形。我們是能摧毀中國共產黨的。」

蔣主席這段話，是毛澤東在其致迪米特洛夫的一封信電報中的說詞。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八日

任弼時帶着說教的意味，告訴我說：「中共黨中央委員會遵義擴大會議，從領導階層中除去了左傾機會主義份子；從一九三五年一月以來，黨就一直由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他懂得把馬列主義哲學，應用到我們革命的現實方面的藝術。……」

很顯然的，有關中共這些舊事和不太遠的故事的談話，都跟準備召開七全大會有關連。中共領導階層正在熱切的進行活動。外國電台有關反希特勒同盟領袖（史達林、羅斯福和邱吉爾）舉行克里米亞會議的報導，以及蘇聯情報局的官方聲明，全都成爲徹底分析和預測的題目。

毛澤東和我作了一次長談。

最令他感到興趣的是，蘇俄是否會在遠東參戰。我就報紙刊載的公式全文，做了一個最詳盡的報告。

一九四五年二月

毛澤東應該了解蘇俄的意向，這是極爲重要的。他應跟誰結成集團？也許最好能對美國讓步，接受 蔣主席的計畫？

簡單的說，延安的外交現正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

毛澤東的所羅門王式的判斷是「等待」——等待到四月中旬，在此之前，不做任何重大的政治決定，同時也將七全大會的開會日期予以延期。

由於美國不願再多作讓步，蘇俄對日蘇協定（協定有效期限將於四月十三日到期）的態度，必須弄個一清二楚，然後再能決定延安的政策。

博古在一次會議中說，克里米亞會議不可能不討論到所有盟國對法西斯主義日本進行聯合作戰的問題。博古深信蘇俄頭目已簽署了一項預見蘇俄即將參加遠東戰爭的協定。

博古的立場很合邏輯。這個立場考慮到日本的侵略路線，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有意分割許多蘇聯的地區，最後終因史達林格勒戰役俄軍的勝利，而告清醒過來。

博古的見解，過去是一個國際主義者，現在仍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他沒法不考慮到蘇俄參戰，將可幫助中國被奴役的人民。他表示這些想法，希望在我輪到發言時也應開誠佈公。儘管我很尊敬他，但我沒法講出什麼肯定的話。

同樣的，我也沒法滿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認爲蘇俄是不會對日本作戰的。

毛澤東對蘇俄在遠東武裝參戰的問題，想得很多。毛澤東認爲，蘇俄已經流血殆盡，經濟已經殘破，人力困竭。

毛澤東把影響深遠的新的政治決定（尤其是對國民政府的關係），與日蘇中立協定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敲詐 蔣主席，壓迫他，爲接近將來的內戰蓄聚兵力，或是同意協議，承認重慶當局的正確，簽署美方建議的草約，都在此一舉。

這就是爲何他對觀察團雖然極感不滿，但仍並不斷絕與它連絡的緣故。

朱德、葉劍英和另外一些軍事領袖深信，蘇俄將會廢棄日蘇協定，投入對日作戰。朱德不相信蘇俄會忘却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在內戰期間的干預（組織及支持柯察克運動、不同的白衛軍政府，以及謝米諾夫運動），在卡森湖地區的挑釁、卡爾金戈爾的血戰，以及一九四一—四二年準備發動攻擊的種種夙仇。這裡中共軍事領袖們都堅定考慮到蘇俄的協助。

總之，在中共領導階層內部，意見極其分歧不一。

蘇俄這套外交伎倆，彈性運用和秘而不宣，使毛澤東很感困惑。他決不會不知道，莫斯科有意要把他們的一些重要決定保持不給他知道。莫斯科的保留態度，使毛澤東很爲沮喪。他當然很清楚，在此幕後究竟爲了什麼原因。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

延安的一切宴會，都好像是在慶祝毛澤東個人的重要日子（如，他的生日）似的。人們開懷痛飲、高聲大笑和閒扯談。然而，所有人的耳朵都豎起來，仔細聆聽毛的說話。……

毛澤東稍微得醉醺醺時，他的說話特別難以了解。他那湖南人單調的含糊不清的喋喋之語，在這種時候變得特別重濁。這種單調的喃喃之語，不時被二、三個音調高昂的字語打斷。略為喝醉時，毛澤東就失去了他那副重要的外貌，有時就像個農夫般，在進食的地方以粗嘎的嗓子高喊起來。

握着我的手，他突如其來地說，他從來沒見過從莫斯科來到中國工作的人，會比我更優秀人。這時候，我必須又乾掉一杯烈酒。大量烈酒一再注入我的杯裡，但沒人注意到酒杯是否空的。

毛澤東也舉杯喝酒。他的臉孔變紅，頭髮從中間分開，眼睛閃亮，一直呆笑。他的臉孔變得很有生氣，失去了通常的冷靜。……

「宋賓，我真高興你在本黨歷史上這一個偉大的時刻，與我們合作。你知道，我真正的尊重你。」

大家便都爭先恐後，要跟我喝酒。這簡直無法拒絕。每個人都一飲而乾，可是我却乾了太多杯的酒。

敬酒在此地並不常有。他們光是又說又喝。我只希望把我的神智保持清醒。他們拿各式各樣、無盡無休的問題來問我。實際上，我是被各種問題沖暈了。……

所有這些又攙雜着毛澤東格外喜愛的粗鄙笑話。這些笑話常常非常下流，非常輕浮。揄他們同志的失言、嘲笑，和哄堂暴笑。

從言談和觀察，我知道中共「七中全會」將在這幾天中開會，它與即將召開的「七全大會」有所關連。「對遵義會議（毛澤東掌握黨權）以來黨史的評估，發生了極大的矛盾，因而企圖平息這一切矛盾。」

周恩來一九三九年秋天到過莫斯科。他在交談時，告訴了我他對當時的印象。當然，他不會告訴我全部觀感和印象。求取蘇俄武器支援中國革命，是毛澤東示意周恩來訪問莫斯科的目的。我在適當的時期曾獲悉其中消息。這正是我滿懷興趣，聆聽他對訪問莫斯科印象的另一套說詞的緣故。……

同時，周恩來在莫斯科時，他澄清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立場。他早已了解其立場是，由中國全國所有一切勢力，聯合抗禦日本的侵略。一般而言，他要試探蘇俄政府對遠東問題所

持的態度，以便判斷其政策方向，以及蘇俄參加對日作戰的可能性，連同隨之而來的種種後果。我對周恩來了解很深。我並不懷疑他訪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對蘇聯與重慶決裂之可能性有所了解，並為中共部隊預備所有必需的武器。

這完全忽視了世界大戰剛剛發生的軍事、政治局勢！他們只想到他們的計畫和利益，未嘗考慮到蘇俄軍事上的複雜性。……

一九四五年二月廿一日

中共七全大會經正式決定於三月舉行。

這項決定和其他若干決定是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通過的。會中曾聽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中共「主席」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的報告。

會中一項重要決定，是以「特區」及所有經共黨解放的地區，成立一政治與行政中心的切實步驟。這個中心的成立已延至國民黨六全大會之後。國民黨六全大會的結果，將可提供必要的論證，來辯解成立這樣一個「聯合行政中心」——中共領導階層最重要的行動之一——是正當的。成立這樣一個聯合中心，將使中國最後的、無可挽回的形成分裂。

成立這樣一個聯合中心之後，與「重慶集團」的磨擦，勢屬難免。這就是內戰必不可免

的原因。

這個計畫在延安經過仔細闡釋。從成立聯合中心到內戰的可能開始，整個週期將有數年之久。這將需要五六年，甚或更長的時間，因為在毛澤東看來，抗日戰爭還將繼續多年。（毛澤東說：「中國將在今後兩三年中，肅清日軍。」）

國民黨六全大會無可避免的將通過決議，加強軍力。

毛澤東不願錯過這個機會，都將對在延安和重慶的自由派報紙、所有進步團體、國民黨施以劇烈抨擊。

以共黨所有基地成立一個聯合行政中心的計畫，將被視為自然的事情。在目前這樣的時侯，這個步驟在中國國內外都不會引起不滿，雖然這必然會擴大全國抵抗侵略活動的分裂。毛澤東認為，這個步驟對中央政府的權力，將會造成極大的損害，對其政治、經濟方面均極具破壞力量。蔣主席將被認為是破壞統一戰線的團結，以及其他所有一切失敗的「負責人」。

會議發言人強調，聯合中心僅應在國民黨六全大會之後成立。

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就中共領導階層和國民黨領袖之間的談判，提出了一長篇報告。他的報告證實了我的臆測和其他一些事實。

成立毛澤東未來政府（所有一切蘇區的聯合中心）的實際措施業已決定。這些措施即將在數日內實施。

要通知全國「解放區」成立一個全中國工會中心，不到一個星期即可做到。它的最後名稱，延安同志尚未決定。總之，這裡將會出現一個所有已解放的蘇維埃區的聯合工會組織，在此組織內的領導角色，當然是由特區運用順當的黨政機構來擔任。這將是最後爆發內戰的第一個雷聲！

周恩來的報告並未占滿整個會議的議程。不消說，最重要的事情是毛澤東的演說，其後的日子，毛的演說受到相當多人討論。毛澤東在其演說中，第一次清晰地構成他對克里米亞會議決定的態度（大部分與蘇俄參加對日作戰有關）。

毛澤東說，蘇俄必然會參加對日戰鬥行動，應該毋庸置疑。大家對此應該明白地認清！毛澤東又說，共產黨的任務是，要求英、蘇、美三國領袖干預重慶「一黨政權」的事務。反希特勒同盟的領袖們應該了解，蔣主席的政府必須接受共產黨的主要要求。反希特勒同盟所有盟國是否可能都會同意這種要求，非常可疑，實際上不在考慮之列。以下是毛澤東進一步演說的梗概：美、英、蘇三國領袖可能加以拒絕，我們不應感到意外。但儘管如此，我們不應放棄我們的戰略計畫（成立聯合中心）。我們在蘇、美、英三國領袖之前，應對此

計畫維護到底，只有極端困難的情況才會迫令我們退却。

妥協可能成爲無可避免——這很遺憾。這個因素必須顧到，如果我們被迫同意妥協，我們必須使它變成我們的小勝。「堅持主要的要求，以便隨後得到在以最高價退却！」這便是毛澤東這一部分講詞的主要意思。毛澤東這段話受到聽衆讚許。

在此，毛澤東完全洩露了他的內心秘密——他不會從蔣主席手中接過權力。要強者自願放棄權力，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利用國際政治勢力，迫使蔣主席分出權力並不是「烏托邦」的空想。想到中國戰爭的特殊情形，這不是「烏托邦」的空想。

爲了這個目的，毛澤東宣布，共產黨應運用一切手段，爭取由反希特勒同盟的領袖們，對於身爲反法西斯集團一份子之中國，採取一些明確的決定。蔣主席在羅斯福、邱吉爾和史達林這樣一種力量之前，必然會讓步，而這種讓步將對我們有利！我們應該設法贏取最強大的政治勢力之支持。這就是所以不排除蔣主席將會改組他的政府的可能性之原因。而且這種改組，必然很激烈！在這方面，共產黨就有極大成功的機會！那個「重慶獨裁者」必定會接受對我們有最大利益的條件。目前情勢對我們是最有利的。

在這種情況下，與國民黨進行任何會談，都是錯誤的。我們應該等候到四月中旬（暗示將在日蘇協定命運決定之後，情況就會明朗）。

緊接着，毛澤東承認，要在中國成立聯合政府，實際上很少可能！事實應該用現實的眼光來做判斷！如果爭取成立聯合政府一事經證明為並不可行，但這仍然是一個可以用來改變全國情緒，使之成爲有利共黨的有效手段。在將來，我們也要提出一些在重慶難以接受的要求和條件！「這就是我們對 蔣主席所採取的戰略政治計畫！我們要使他在我們面前再沒有退却的餘地！」

毛澤東的立場已很明顯。主要的事是「把 蔣主席迫入絕境」，也就是發動一次內戰。餘下的事就是處理輿論，使共產黨有時間實施全面動員。

以對日抗戰的偽裝，來佔奪土地，便是爲未來的內戰擴張基地。除此之外，提出條件的策略，可束縛目前也正開始準備與特區作戰的 蔣主席。在此方面，美國人可能會極大增加對國民政府的援助。這就是毛澤東若不能完全排除它，亦須極力限制美援，以及迫使美國顧慮輿論的原因。……延安將暴露盟國所有如此一類的行動。

毛澤東也有一些嚴重隱憂——他對蘇聯是否將會對日作戰，無法肯定。他口頭說蘇聯將會作戰，實則對此並無把握。這說明了何以中共領導階層要將所有堅決的外交暨內政政策行動，拖延到四月下半月決定的原因。這是毛澤東的典型作風。他甚至對他的親密戰友，也保留幾分，不肯盡吐真言。

除了評估當前政治情勢及有關工作之外，毛澤東也特別着重華北局勢的檢討。他向聽衆鄭重宣布，華北局勢相當好，可以說它是共產黨的禁燴，而不會算是誇張之詞。其力量、影響力及部隊的強勁，不容置疑。然而，改組當地幹部，將會更好，「加強幹部，鬭爭就在眼前！」

「……我們不應沉湎於自我幻想：必須加強察哈爾、綏遠和熱河的幹部。所有沒效率的蘇維埃及黨幹部均應免職！這也適用於內蒙及東北。……」

然後，毛澤東回到成立全蘇區工會中央委員會這個問題上面。

就我對毛的了解，這個委員會將擔任一種保險絲的作用。工會籌備委員會將召集代表開會。代表們將通過不只是工會事務的決定。他們將通過一項有關必須成立中國全蘇區聯合行政中心的決定（他們將會要求立即成立該中心）。這將摧毀「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權」。

毛澤東整篇講詞，雖未排除妥協的可能，但却號召爲內戰作準備。在這方面，毛澤東並未認真考慮中國的局勢。毛澤東指示的本質就是，以武力奪占土地的方針。周恩來和毛澤東駐重慶其他助理的政治表演，除了爭取時間，愚弄羣衆以及敲詐勒索之外，別無內容！

朱德在會議中對其活動亦做了一番報告。他的演說顯示出「整風明顯的復起」。十分突然的，他開始悔過（悔過在此地風行一時）。他說他過去低估了毛澤東的軍事天份。所以他

才犯了堅持把中共大軍調往華南和東南省份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及時的指示，免除了危險（例如錯誤的選定軍事行動的地區，把兵力分散為小單位等等）。毛澤東再次扮演了救星的角色！

朱德也說，他在重要的政治問題上犯了錯誤。他曾希望在整個中國爆發一次革命，然而在此國內，是必須以戰鬥來逐漸奪取政權的。

朱德說：「相信能够立刻在全國奪得政權，是我犯的政治大錯！」

於是，毛澤東透過朱德做傳聲筒，號召利用對日作戰的特性，來奪占國民政府控制地區的戰術。同時，毛澤東向大家發出警告，與國民黨公開總決裂，充滿着中共潰敗的危險！奪占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加強軍力、「策動」事件（這是爲了激怒 蔣主席），以及在同時，要認識兵力的對比，明顯的不利於中共，內戰將導致特區的毀滅。

不僅是毛澤東的冒險主義及其希望蘇聯在嚴重糾紛時會伸出援手，更兼以他狂熱地希望奪權，這種希望經常（太經常）令他失去常識！

毛澤東認爲農民是內戰中可以利用的主力。農民被土地危機所箝制。農業危機必可幫助他們擾亂全國，震撼 蔣主席的權力，毀滅這個國家！

馬克斯主義的成熟，並未必成爲中國共產黨的成熟。黨的領導階層日益轉向小資產階級

左傾主義。……

蘇聯在歐洲戰勝法西斯勢力的雷聲，傳到延安。毛澤東業已十分清楚的一項事實——美國人不希望與蔣主席分手——重要性益發增加。毛澤東別無選擇。中共除了蘇聯外，沒有其他盟友。毛澤東的保證，並未會消除美國政治領袖的疑慮。美國將加強蔣主席的力量！這個事實決定了毛澤東的行爲。

在抗日作戰中與莫斯科結盟，可能在客觀的使中共內部勢勢正常化，形成新一代的共黨國際派方面，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一九四五年二月廿二日

二月十八日，「消息報」刊出一篇題爲「關於中國局勢的若干事實」的文章。文中稱蘇俄希望在適切顧及中共利益的情況下，來解決遠東問題。

很顯然的，儘管毛澤東在政治上所採的手段，我們莫斯科的領導階層對中國共產黨還是堅決維持給予支持的路線。

對中共黨的支持，就是支持中國革命，以及中國人民反對國內外壓迫者的奮鬥。如果這項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獲勝，那將是繼我們「十月革命」之後帝國主義的最大失敗。蘇俄在

中國將有一個得力的朋友，與它聯盟將使社會主義陣營處於異常有利的地位。

一九四五年二月廿三日

毛澤東的政策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他今天提出某些要求，一個星期後，他會堅持一些截然不同的要求。昨日他羞辱受到尊敬的黨工人員，今天却會給他們一些重要的職務。現在他正與美國人「渡蜜月」，隨後就會在他們背後一脚踢去。……

這就是常常有人稱做的神密的東方外交，詭詐而且令人猜不透。……但這是外行人的想法，事實上這項政策是合乎邏輯而且一致的。

這種合乎邏輯、一致的作法，也就是毛澤東採取的政策典型。情況改變，他就適應這種情況，繼續改變鬭爭的表面形式，並非本質不變，主要的內容，一仍其舊，並無變動。在這方面，這表示全力反對抗日聯合戰線；反蘇俄運動；以及剷除教條主義。

在此根本沒有一點東方神秘狡詭作風的痕跡。不錯，他破壞他的諾言和協議，他隨意褒貶別人，對外偽裝民主主義者，在家裡却是一個貴族作風。對白瑞特和一些外國記者演戲，對我却講些無聊的話，同時欺騙莫斯科。……

胡說！這種情形根本沒有一絲東方人的機智和靈巧，所謂這種情形，都是平凡的謊言。

如果這裡真有所謂東方外交手腕存在，那就可能稱爲卑鄙無耻的行徑。

一九四五年二月廿六日

召開中共黨七全大會的決定，激起了一片熱情。又是一陣吵吵鬧鬧，包圍在王明、楊尚昆、王稼祥、洛甫幾人的周圍，又是一大堆公開指責（在會議中）和秘密的批評。……

「整風」已有效地應付了它的任務。甚至王明的過去同僚也再度開始指責他。因此楊尚昆說，王明對蔣主席走階級投降主義路線。這句話是楊尚昆說的，而楊與王的交情，不僅是過去的同志而已。

在上海時期，他們共同推行共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他們共同對付毛澤東和李立三的機會主義行動。

即將召開的大會，使前「莫斯科派」的人很感不安。他們曾受到侮辱，黨員對他們毫不同情。「整風」也「已暴露了這些投降——機會主義者的身份」。整風使每一個人相信，「大家現在延安能够活着，都歸功於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才智。」

在黨的各集會中，發言者一再不斷地說，「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的正确路線，也是最熱誠於解放戰爭最後勝利的人。」

在口頭和印刷品中，都表示「關於馬克斯主義，我們不應像西方馬克斯主義者一樣，必須想到從中國的現實來進行。」

我現在深信，這次大會將採取與國家主義思想妥協的路線。

上次我和毛澤東有過一次不尋常的談話，那次談話沒有杜松子酒，沒有威士忌，也沒有寒暄。我們正在談着一些無關緊要的瑣碎事時，毛澤東不知不覺的改變了話題，談到死亡的問題，談到這種不可避免的死亡，談到一個人命運的冷酷無情。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聽他一個人說話，否則他會自艾自怨，但爲了表示和氣，在你離去之前不會發作。他喜歡有人聽他講話，有異議的話，就嚴重傷害到他。但是他外表上不顯露出來：他會和和氣氣的與你告別，但會記住每一件事！

他自言自語的談到生命的脆弱與短促。想到死亡，便會令他沮喪。在思路的牽引下，他說到孔子，一些騷人墨客，以及自己作的一些歪詩。

他越來越憂傷，同時越激動，他那種蠟像般的莊嚴姿態，蕩然無存。他越說越快，以沙啞的聲音喊出他要強調的話，並且支開想要進來的人。

他還問我問題，但沒有等我答覆，又開始自言自語，有時似乎忘掉我的存在。

他不耐煩的將手伸到棉襖口袋中，搜出一根煙，點上火深深吸了一口，心不在焉的微笑

著。一根煙燒完時，他又點上一根。棉襖的釦子掉了，他生氣的扔到一旁。

接著他又問我問題，不幸的是我不知如何回答，他看著我，等候回答，濕潤的眼睛充滿了激動的神情。……他並非想要揭穿我的無知，他只是沉湎於自己的思維中。

我能說什麼呢？我聳聳肩，承認對死亡一知半解，但表示，我還年輕，還有時間看點東西，將來會瞭解的。

但我說：「在革命前，我們在鄉下的學校，老師曾教我們聖經。聖經上談到死亡時說：『生於土……歸於土』。」

毛展齒而笑，將煙頭丟到地上。

分手時，他突然問我說：「這裡的漂亮小姐沒有一個你看上眼嗎？別害羞。……」
我笑著拒絕。

一九四五年三月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中共頭目們一直在躲避赫爾利的調停，但顯示無意與美國人決裂。一方面，他們假裝反對那些帝國主義者，將他們的陰謀詭計，秘密報告莫斯科，另一方面，他們也不與觀察團斷絕接觸。

今天，對毛澤東本人也覺意料之外，他接到了史達林的一個覆電。於是這個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隨即召開了一次會議。……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

召開全會的決定，使黨的生活就像觸電般的震動起來。他們一個接着一個的開著會議。

但這件事該如何處理呢？「整風」明白的宣告了有種反俄性質，而「教條主義」却完全是與聯共思想觀念原則背道而馳的東西。

在這次全會中，所有這種情形都可能抖出來。怎樣才能預知會議的代表會說什麼？又不能檢查每句話。情勢很微妙，毛澤東正在設法找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再度指示研究某些文件，其中大半都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作品。特別着重在研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

單是一眼看一下「研究中的作品」，就可看出，其主要用意，是在顯示毛澤東的作品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承先啓後，發揚光大。

「新民主主義論」的要義，是在於把馬克思的思想順從毛澤東的觀點。

馬克思主義的專門名詞，提到馬克斯與列寧的作品，以及從這些作品中引用的文字，造成一種使人對此一問題具有深切研究的錯覺。對於史達林的歌功頌德，遮掩着以「現實的馬克斯主義」精神所作出的危險結論。

毛澤東憑着這部「新民主主義論」的作品，提供了對「共黨國際」的觀念進行鬭爭的理論基礎。在這部書中，便種下了「整風」、消滅「莫斯科派」以及國家主義的根源。

「現實的馬克斯主義」實際上是毛澤東自己對於發展「中國革命」途徑的看法。由於對

社會階級成份的界說含糊不明，使人人提心吊膽。

恐怖與暴力——他們現在把這稱爲是鞏固黨的地位。這就是所謂「整風」的整個作風！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改造所有人的思想（甚至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亦不例外），以確保他們承認將來他對黨的絕對權力。每一個人自上至下都給挨上一鞭！也就是說，對黨內及黨外幹部進行的整肅，主要是考驗對毛澤東的忠誠——「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

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

毛澤東在我們談話結束時，對我說：「這裡有一些漂亮的小娘們是不是？絕對健康。你覺得懷疑？還是你另外有什麼心上人呢？」

真沒想到毛澤東也會拉皮條！我笑着沒有答腔，我們就此分手。

但到了晚上，一個女孩子悄悄的來到我們屋裡。她嬌羞地跟我打招呼，說是來整理屋子的。

她像每個一人一樣，穿著粗布衣服，但棉外套上面露出了一個白領子，在這裡是很少見的。她的腰部纏着一條軍用皮帶。細細的纖腰。圓圓的兩頰。黑黑光潤的皮膚。天庭豐滿，黑色的頭髮披在肩上，插着一朵花，沒有用髮夾。一對細長的大眼睛。

是的，靠着延安那種微薄配給生活的人，看起來總有點不同。

我搬出一條板凳，放在靠牆邊唯一的一棵樹下，她神情緊張的坐下來，但微笑着。接着她親切地答覆我的問題，一直很小心地等待着，交叉着兩腿，瘦細的小腿，套着一雙編織的拖鞋。

我替她拍了幾張照片，然後送她離去。

她的確是個很美的女孩子。

我們一邊走，一邊告訴我她是個大學生，剛入學。實在太年輕了。

天！這種事多麼卑鄙與齷齪！真希望我是在自己的家裡，坐在桌旁，家人環繞着。這樣的事會實現嗎？我真該回家去看看嗎？可是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有那個朋友會來接我呢？有誰逃過了戰火還活着呢？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

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國軍也漸漸受到了準備內戰氣氛的感染，因為延安一直就在暗中有着系統的進行着這個內戰了。

這是對中共領導階層多年來陰謀破壞大規模對日抗戰行動所施的報復。同時，中共部隊

正以對日軍作戰爲藉口，積極活躍，着手把國軍部隊，趕出個別地區。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

毛澤東可以坐在靠手椅中，毫無表情的一坐幾小時。依照傳說，他代表一個專心致意，心無旁鶩的「政治家」。他「關於一些大的問題，瑣細俗事不會分去了他的心。……」

我認爲，毛澤東在開始他的活動之初，即有意使自己塑造了這種氣質，這種氣質並不是他的廬山真面目。但是多年來的做作，便使這種氣質成了他的格局的一部分，這種格局，是要在人們的眼中，表示一個偉大天朝的真正政治家。……

毛澤東跟我在一起時，他愈來愈減去這種尊嚴的表演，他那種粗魯態度和懶散神情，便愈來愈變得明顯。他的笑話粗俗，他的訓誡，常夾雜着一些下流的字眼。

在毛澤東的窩居中，江青支配一切（不只是在此地）。毛澤東和他的老婆，從不請人到他們的住所去，只有周恩來是例外。

周恩來知道如何使自己變成例外。令我驚訝不已的是，毛澤東深信，殘暴乃是正義的結果。再正確的說，根本就沒有殘暴這一回事！

世界上有正義——祇有正義！他絕不懷疑自己所作的決定是否合乎正義。於是這種對殘

暴的信念，便變成了暴力，這就是他做事的典型風格。

我從未聽過他對任何人表示同情，也許除了跟外國人或從其他基地地區來的代表之流的客人談話時。……在這樣時候，他就能講到他對被壓迫人民的悲痛，抱怨日軍的殘暴，對普通老百姓講一句鼓勵的話。……

這兒有幾個毛澤東，一個是具有中央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靈光的毛澤東，他的形像就是現在新聞界所投射出來的一種。一個出席會議，參加工作人員集會和全會的毛澤東。在這種場合他顯得很敏捷、機智、聚精會神的模樣。

另一個是對付地方行政機構、軍隊和黨的工作人員——這些人爲了工作，多多少少常來與他聯絡——的毛澤東。這時，這個中共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就是活生生的一個古代統治者的形像，但由於稱呼「同志」和握手爲禮，多少顯得了民主化一點。

接下來，還有一個現在我愈來愈多作着私人見面時的毛澤東。

這並不是胡扯，這個政治變形動物，確實把所有一切的民族傳統都考慮到了。這也是一種對時代的讚禮。毛澤東永遠以一種最適合於某一情況的姿態，出現在人的面前，不是顯得樸質友好——一個誠正的「黨同志」——就是像石碑樣的不可動搖，故意顯得心不在焉的樣子。一種專心沉思之中的「靠手椅的思想家」；一個超然脫俗的「哲學家」。

他坐在靠手椅中，有時傾聽，把對話者籠罩在一片香煙的煙霧中，或者就是祇有他一個人的談話。如果情緒好，那就單調地強調某些話的語氣；如果情緒激動，就以一種驚人的談話的持久力，大聲的哇哇叫喊。他能一口氣講二、三、四個鐘點而不停，這還是私人的談話。

他也可能呆坐在那兒沉思，對談話者視若無睹，祇是偶爾禮貌性的點點頭。……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

謝偉志再度來到「特區」，並受到尊重的接待。在「特區」，對他有種很斷然的看法，謝偉志懂得中國的情形，他不但是出生於成都，而且也在中國受過教育。的確，在上海一所專供有錢人唸書的學校（主要是歐洲人）。他的外交生涯，全與中國有關，他已走遍大陸各地。

周恩來認為他是個有「進步眼光」、「沒有偏見」的人。儘管謝偉志很難以令人相信不是間諜，但他並不像一個間諜樣的進行活動。他很小心謹慎，提防着容易出錯之處，態度謙遜，完全實事求是。

結果知道，謝偉志來到延安，原來並未獲有赫爾利的批准。赫爾利本人目前正在華盛

頓，謝偉志便抓住了這個機會。這個美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在與葉劍英和周恩來舉行的一次機秘會談中，告訴他們，赫爾利是不會讓他到延安的。

我幾乎立即就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他們討論的事情，太平常，使中國同志們認為可以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秘密，使他們自己可能明瞭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些中國同志，對這個美國外交官異乎尋常的坦誠，很感迷惑。

謝偉志的年齡，與他的經驗並不相配。他在上海完成學業後，返回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得文學士學位。接着任美國駐昆明代表團技術人員，開始他的外交生涯。跟著他到北平，在美國大使館任譯員。在北平服務了幾年，他顯然表現了他的才能，由譯員一躍升至副領事級。一般而言，謝偉志給人一種討人喜歡的印象。很有教養，精通華語，能傾聽別人意見，最重要的是，一個很懂事的人。這大概就是為什麼他在一九四一年即為大使館三等秘書，隨後不久，在一九四三年成爲二等秘書的緣故。

謝偉志很年輕，沒有赫爾利那種自滿的態度，這種人往往總有種有意義的思想。……很可能史迪威對他很器重，而史迪威便是直到最近，美國所有有關中國的重大決定據以作成的人。也可能就因爲這樣，使謝偉志能得很快的遷升。

謝偉志在延安時，每個人都提高警覺。他的職位不高，但所知很廣。總之，他不浪費時

間，並不是那種祇照指示範圍做事，決不多做的人。

這個美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稱他的大使是保守派。赫爾利並不瞭解中國的情形，中國的傳統，以及目前最複雜的情況，却要處理所有的中國問題！這就是他所以反對赫爾利的原因——也是謝偉志談話的真意所在。謝偉志進一步報告說，赫爾利對國共之間的衝突，有他自己的看法，這個看法便與印度及中國戰區前美軍司令的觀點，發生了衝突。結果，史迪威被迫離開中國。戴維斯遭到同樣的命運，所有其他在中國設法尋求新政治解決方案的人，也都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認爲在這方面，謝偉志所言不虛。我親身目擊了赫爾利在政治上所犯的重大錯誤。我也曾在宴會中觀察這位將軍兼政壇人物。在宴會中，幾杯黃湯下肚之後，他便開始吹噓他與克里姆林宮的私人關係。他這樣做，顯然的是要給毛澤東一個印象。赫爾利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然後宣稱，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他是美國總統駐莫斯科的私人代表。之後，他以美國代表團顧問身份，參加德黑蘭會議。接着，赫爾利又吹噓他參與決定世界命運的決策，以及與史達林的關係。

德黑蘭會議所作的決定，以及一九四三年蔣主席與羅斯福的會晤，所有這些事件在延安都引起了病態的關切。赫爾利感覺到了這種情形，薄醉微醺渾陶陶的，開始高談他參加菲

律實戰役的經過，他所受的傷，以及在俄克拉荷馬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現在赫爾利是美國大使館館長，謝偉志無論在年齡方面，或是在階級或聲譽各方，都無法與他相比。因此才有這種不顧死活之舉——未經許可，來到「特區」。關於延安，在謝偉志認為，由於赫爾利的原故，犯了一個政治錯誤。赫爾利把國共之間原本已相當複雜的關係攪得更加混亂了。但是，爾赫利的任務，恰好剛剛相反——制止聯合抗日集團的分裂。赫爾利一錯再錯，他不接受任何人的意見，在他覺得，他祇聽一個人的意見，那就是 蔣主席，但要用這個方式來設法解決問題，是荒謬的。祇照單方面的意見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因此，赫爾利便把美國軍事及外交行政方面所有有才智及進取心的人，一律都調離了中國。誰敢違抗他呢？這個同一的赫爾利，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是美國的陸軍部長。（天哪，誰能比一位部長知道得更多？即使是個過氣的部長——這就是謝偉志沒有表達出來的想法。）

謝偉志說，他認為赫爾利的政策，對於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以及美國都有害。因此，他和魯頓曾向華府提出了一份報告，批評這位新任大使的作風與政策。魏梅葉也知道這份報告的內容，他也同意他們的結論。

謝偉志席不暇暖的就趕回了重慶。目前他除了身為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外，也擔任中國戰區盟軍總部的政工官。

謝偉志與周恩來討論了中共現階段政策的本質與展望。這個美國人顯然想要瞭解延安外交政策的具體目標，他只關心一個問題：延安領導階層現階段的政策內容。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

很明顯的，中共與美國締結政治與軍事聯盟的希望，並未實現。白宮已正式宣布，供給中央政府軍的武器，限於對付日本之用。

延安頓時改變了主意，他們故意的使他們與觀察團的關係變得很緊張。

不過，毛澤東並未完全排除可能使白宮改變對「特區」態度的情況。他私下希望華府可能仍會正確的評估與延安修好的好處。謝偉志的訪問顯示，在美國人中，仍有一些「冷靜見解」的人，而且很可能在最高行政部門也還有這樣的人。

因此，觀察團仍照舊駐在延安，儘管除了單是客套寒暄之外，各種問題再無更多的進展。

但很明顯的，毛澤東擔心着祇怕這種不穩定的狀態繼續維持太久，他擔心最後必須與蔣主席作面對面的談判，而在蔣主席之後，還有一個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是爲何他很明顯的同時把政策轉向莫斯科的緣故。

表示這種政策轉變的一個方式，是周恩來下令將訓練口頭翻譯和文字翻譯俄文譯員機構的學生人數加以調整。

延安也對重慶採取了某些行動，來暗示與蘇俄的團結。「特區」的報紙開始以公開敵對的口氣討論 蔣主席的施政。關於與國民黨商訂的草約全部條款，在未到應該發表之時，都給提先發表了出來。報紙現在幾乎用最後通牒的措詞，發揮着議論。絕不讓步！這也是廣播中的主要論調。

這使延安的美國人慌了起來。他們到此地不僅是作情報工作。除此之外，他們的任務也在阻止毛澤東採取主動。他們要鼓勵、勸阻、暗示，並實際的阻止延安在許多軍事及政治方面採取強烈的行動。但現在毛澤東却拒絕等待機會！報紙的論調也愈來愈尖銳，愈來愈不可妥協。

美國人立即注意到中共領導階層此種政治路線的轉變。在重慶，中共代表與美國總部發生了摩擦，不過，並非真正的摩擦。美國方面只是決定對毛澤東施以壓力，直到現在，毛澤東原是一直表示完全準備達成諒解的。

但他們並未想到，事實上毛澤東在這方面是有他自己的意見的。攆不到「油水」的盟友他並不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並非每一個人都挑選「寵幸」的，這正就是毛某的作風。

毛澤東發出了命令，改變對觀察團的關係。不過談判之門仍須保持敞開，必須讓大家明瞭，「特區」並非孤立，大家必須想到此點。蘇俄是「特區」的盟友。

毛澤東認為內蒙及東三省的情況，很有希望，將來他們都會淪於中共控制之下。他在華北的地位也同樣的鞏固。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

延安當局對觀察團的態度，也有了激烈的轉變。代表團的臨時團長克洛姆萊少校，立即將一切情形報告了重慶。

在重慶，氣氛比前更緊張了。

美國人不顧一切，仍在謀求促成國共雙方的和解。他們仍希望研究出一個能為雙方接受的條約草案。

蔣主席極力保持對全國的控制。共黨代表透過種種要求，對進此種控制的基礎，來施行攻擊。美國方面設法進行說服，希望蔣主席讓步。他雖很不情願，但還是同意了。然而中共代表却採取了一種「不妥協」的立場。美國人不斷對重慶的中共代表團施以壓力，但這就立即影響到在延安的觀察團。

在重慶，產生了一次大爭執，赫爾利顯然陷入了死角。

克洛姆萊拜會了葉劍英，提出了適當的抗議。但葉劍英對於此事早已接獲堅定指示。他明白告訴克洛姆萊說，國共關係的惡化，完全是出於美國的錯誤。形勢一天天緊張。……康生顯然已陷於孤立地位。

一九四五年三月廿五日

一如所料，召開全會的日期又告延展。全會現已決定在四月召開，或許在十五日揭幕。中共領導階層這項決定，直接顯示其未來的決定將視日俄條約的命運而定。這個條約即將於四月初到期，他們在延安正以極大的耐心靜待這個日子。

那些人將在全會中提出報告，是個大問題，每一個人都爭取這個權利。

在軍事問題上，實際上絕無爭執。朱德是「總司令」，所以由他報告軍事。

當然，毛澤東將是大會的主要演講者，他的政治報告大致已準備就緒，唯一要做的就是詳細解說而已，但在日俄條約的命運未經確定之前，現在這樣做便屬過於輕率了。

毛澤東並未忽略了康生。這個情報局局長將提出「黨幹部暨非黨人員考核委員會」的工作成果報告。

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這個報告原先並不在預定計劃之中，但整風已將整個黨搞得天翻地覆，這個問題已不可能再加隱瞞。當然，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在他黨的幹部之前沒什麼好擔心的。他在這方面絕對具有信心，他的權威是無法動搖的。

康生的報告，對於一九四二—四四年中共黨內鬭爭的情況，可能作個毛澤東所教唆的描述。在黨的歷史中，將一勞永逸的出現一個順理成章的說法。這份報告也可為毛澤東擋掉對他本人所施的攻擊。因為這樣可能由康生擔當起部份的罪責，對毛澤東來說，這是個很好的脫身方法——這次的事，祇是一個狂熱的政策推行者做得太過份的問題，如此而已。

陳毅也負責提出一份報告。他是華中問題的專家（負責基地及中共部隊），他當然要提出報告。在此主要的問題是再行擴大基地。

特務頭子彭真，也未冷落。他是整風最活躍的贊助者，也是堅決的反俄派份子。過去他都是在城市裏工作，從事秘密活動，甚至曾在上海坐過牢。因此他多多少少熟悉城市革命工作的難題，所以他負責處理這個問題。

在大會中，彭德懷也要對他所熟悉的事提出報告：在華北幾省戰鬪行動的過程。建立並擴張基地，便是八路軍的主要任務。

劉少奇（修改共黨黨章）、周恩來以及毛澤東的報告，將是會中的主要報告。現尚保持

極大機密的新黨章草案，其中列有若干條款，將使毛澤東很明顯的處於一個獨有的地位。毛澤東敢將這些條款作為未來的「黨章」的一部份嗎？總之，這個草案和全會其他許多文件，現在都還保持着機密，當然，這絕非是擔心洩露了經濟及軍事秘密的緣故。

一九四五年四月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

毛澤東不能容許對康生提出譴責，因為這麼一來，就間接表示，他自己的路線也是錯誤的。所以康生的報告已從全會的議程中剔去。毛澤東採取這一步驟，並非未經長久的猶豫，雖然這樣一份報告早就可以備妥，總結整風的結果。

彭眞的報告並無明顯的原因，也從議程中剔去了。是不是可能因為其中對中共在城市方面的的工作，並未提供充分的資料？因為預料彭眞要談的正是這個問題。……

博古也在大會演說者的名單中剔除了，原因也不清楚。總之，毛澤東並不信任博古，儘管以對莫斯科的修好而言，他當然可能發現博古是非常有用的，博古原準備在大會中報告有關黨的新聞工作。

所有這些決定都是在三月廿四日作成的。

將這些問題剔出議程外，都是毛澤東自己的建議，而中共「中央委員會」擴大全體會議通過了這些建議。

從議程中刪除的，還有鄧發對於工會工作的報告，這也是獲得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決定阻止對康生及其支持者的攻擊，並非是他特別關懷這個情報局首腦。即使對整風粗略的看上一眼，就可明白誰是「人員考核委員會」的幕後支使者，以及一九四二—四四年的運動究竟是種什麼思想觀念的意義。

毛澤東堅定的認為，這次全會不應引起莫斯科方面注意到中共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人格完整的問題。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

反對康生的怒潮，也已威脅到了毛澤東。他發現難以撲滅這種不滿的情緒。原因十分簡單，因為他沒法用正當的名稱，來稱這種發展。在恢復轉向蘇俄的情況下，繼續假冒爭取共黨國家主義的特質來鬭爭教條派主義者是危險的。蘇俄在未來的行動中，可能會考慮到中共領導階層的這種情緒。

毛澤東正在盡其全力，避免讓大會討論整風問題，或者盡可能的用少許幾句話來搪塞過去，或是不准討論這個問題。（而這是祇有在他覺得無法解決時纔出此一策。）

看來毛澤東似是準備抓住康生，作為報復活動（歪曲）的唯一罪人。

毛澤東希望經由這個方式，來保持整風構想不受玷辱，因為整風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光榮的標幟」。

小心排演多年的大會全套滑稽表演，已一天接近一天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毛澤東正竭盡一切，避免討論黨的內部問題。否則這樣一種討論，可能就會揭穿了這些時來，他所指使一直都在鼓動的權力鬭爭：對王明派的壓制，閹割國際主義的意義，以及秘密的反俄活動。因此，毛澤東有意集中全力，來解決當前的難題。這樣做法，他就可以制止在全會中產生任何歧見，造成一種意見一致的氣氛。這種一致的意見，便可使參加會議的人深信，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是絕不錯誤的。

毛澤東絕不動搖地，一天天的推展他的計劃。最後，報告草案分送給了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然後黨的同志將在全會中提出他們的意見。

我曾看到了這些報告。那算什麼報告！其中沒有隻字提到中共黨過去十年來，特別是過去三年來，所有各種過程的實質內容。

所有難以對付的棘手問題，都必須悄悄帶過——這是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事。必須盡一切力量來防止代表們提及黨的內部問題。

在報告中沒有一處提到人名，關於這點，再沒有旁的情形可以解釋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四日

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記者會中宣佈，美國有意僅與國民黨合作，停止對「特區」運交一切武器裝備。

赫爾利顯然忘記他已不再是陸軍部長，而是一個外交官。他在華府的記者會中，對延安頭子提出威脅，扯下了和事佬的面具。……

毛澤東原本預期盟國對他在八路軍及新四軍中的「鐵腕手段」會感到興趣。

憤怒的毛澤東暴跳如雷，咒罵美國不已。因為擬議中的聯盟的崩潰，使他最燦爛的美夢也跟着破碎了。

在舊金山正在進行一個國際會議，着手建立一個聯合組織。這是全世界所有進步勢力的

重大成就。在此間經過短暫的爭論之後，伍修權、董必武及陳家康將代表「特區」，去參加會議。

毛澤東在全會中的報告草案，對蘇俄與中國人民過去的關係，作了一個回顧的分析。毛在報告中強調蘇俄援助的誠意，以及蘇俄隨時準備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毛澤東指出，蘇俄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沒有蘇俄參加，是沒法，也決不能討論太平洋問題的。

毛澤東在報告中，用了很大部份講到國民黨與蘇俄關係的圖利性質，一種根本上對莫斯科具有敵意的關係。國民黨祇是以表面的仁愛偽裝它對莫斯科的憎惡而已。

在過去，伍修權也贊同王明的見解，由於是「教條主義者」，因此也吃過很多苦頭。

他之所以列入「特區」參加舊金山聯合國會議的代表團，是因為他充份精通俄文。他對俄語的造詣，確實非常高超。如果你閉上眼睛去聽，你根本不會相信是一個中國人在講話，甚至沒有一點土音的痕跡。毛澤東派出伍修權是懷有某種目的的。第一件伍修權懂得俄文，第二件是他列名為國際主義派，也就是說，他很可能為蘇俄代表團所接受。

正像過去一貫的情形，毛澤東現在希望靠蘇俄的幫忙，在舊金山解決他的政策的一些主要難題。

陳家康是周恩來的人。

陳受過大學教育，過去在青年運動中極爲活躍。自從去年夏天以來，他實際上就是周恩來的秘書。

伍修權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求學，他學問不錯，對於政治經濟有專長。

董必武一八八六年出生於湖南。是資深的共黨革命黨人，曾參加首屆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和西竄。在國共合作期間（到一九二七年）以及目前抗日聯合戰線中，擔任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聯絡人。他曾參加去年林伯渠、王若飛（代表中共黨）與王世杰、邵力子及張治中（代表國民黨）之間的談判。

邵力子幾乎一直都代表國民黨與中共進行的會談，曾任國民政府駐莫斯科的大使。

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

中共的所有計劃和夢想，全都寄託在未來蘇俄參與解決遠東問題上。此一問題的解決，當可有利「特區」，同時相當的彌補早先寄託於美國那份已經破碎的希望，這就不免導致對黨內各派勢力作一重新整頓。

換句話說，在目前的情況下，忽視莫斯科是太危險了。關於這一點，又表示在黨內不免要作一妥協。因此，毛澤東急忙將或多或少反映他反俄政策，他對「共產國際」影響力的反

抗，以及其他對他有惡劣反應的「事蹟」，從議程中剔除。

所以就決定康生和任弼時不要在全會中發表演說。

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

毛澤東在大會議程中，剔除了兩項最重要的報告——康生及任弼時的報告。

這個巧妙的安排，使毛澤東將可緩和一下對康生一幫人的攻擊，或許還可能把這攻擊整個擋回。否則他們在大會中是會够受的，因為「黨幹部暨非黨人員考核委員會」的委員便是黨的「檢查官」。

目前的政治問題就像軍事問題一樣，是不會引起爭執的——這就是毛澤東計劃的中心。在這方面，這次大會將向全世界（特別是莫斯科）表現中國共產黨的「精誠團結」。

這個舉措也在掩飾毛澤東政治把戲中的另一個欺人手段。因為大會將不再討論黨內的政策問題，這就可以解釋為黨的代表，因此也就是整個的黨，無異議的一致同意，認為這種政策是種不辯自明的「真理」。換句話說，毛澤東的總路線將可不經討論或辯論，給以無條件的通過。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

赫爾利在華府的記者會，造成了一種高氣壓的印象。中共頭子們認為，美國大使這番談話，對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內外的地位，是個嚴重的政治打擊。

毛澤東現在激忿的談論着「美國對華的新政策，特別是對中共的新政策」。現在所有一切要美國協助的希望既已破滅，毛澤東便惡毒的把赫爾利稱爲是「帝國主義者」。纔祇五個月前，毛澤東還稱讚這位美國總統特使的「卓越能力」，並且感謝這位將軍大使「對中國人民的熱情」。在宴會中曾說了多少讚譽之辭；當時毛澤東是多麼高興，對於這位「沉着的美國政治家」的精力，感到多麼快慰！

多善變的心！就像俄國諺語所說：「剛捧過了，反轉臉來便咒罵！」

赫爾利受到了普遍的怨恨。顯然誰都不原諒他所做的事。關於這個情形的一個證明是，毛澤東下令將去年十一月九日晚上所草擬，並由赫爾利與毛澤東簽了字的條約草約，拍了一張照相影本。

毛澤東將這份照相影本交給董必武，他不久即將搭乘飛機參加舊金山會議。在適當的情況中，這份影本將發給新聞界加以發表。到時赫爾利就無法否認確實有這個草約存在。如果

新聞界懷疑這份條約的真實性（總之，這份條約原應保持秘密的），董必武就會拿出條約的原本，如此一來就會損害到赫爾利，因為上面有他的簽字。

中共頭子對於赫爾利的訪問倫敦，與邱吉爾會晤，以及他即將前往莫斯科，與史達林的會晤，很感不安。他到莫斯科，預料將轉交羅斯福總統一封給蘇俄頭子的親筆函，據廣泛推測，赫爾利的活動與遠東問題，主要是中國問題，具有直接關係。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

任弼時和康生的報告草稿，在目前舉行的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中，正在提出討論。大會原應開始工作，但對這兩份報告引起的激忿，終於變成了激烈的爭吵。尤其是在「特區」黨組織代表的會議中，激憤之情，特別劇烈。這批代表以高崗為首。對於這批代表的情緒，不難瞭解：「特區」是遭到整風最厲害的地方，簡直不可能平息這些代表的憤怒。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都提出了加以檢討。陳獨秀、李立三、博古、王明、「莫斯科派」和康生一幫人——都受到了猛烈抨擊。

毛澤東採取了一切方法，來制止這個不愉快的發展，代表們一個個被叫到一旁進行個別談話。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

美國總統羅斯福突於四月十二日去世。

羅斯福的去世，不僅是美國的重大損失而已。羅斯福確是一位認真的、有遠見的政治領袖。

他是在一個畫家爲他畫像時逝世的。

副總統杜魯門接任了美國總統之職。

蔣主席向他的將領們發出一封密函：

——共黨正在加緊其對日軍佔領地區的控制，現正積極在湘中、皖北及長江流域一帶擴大勢力。

——共黨正散佈不利於收復國土之戰的宣傳。

——共黨現正採取一切手段，來阻止國軍的反攻，在國內製造糾紛，爲了這個目的，正在尋求外國援助。

蔣主席要求各級官兵將領，改善紀律。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現在所有的演說及報告，都已依照毛澤東政治報告的一套方式寫成：「蘇聯——是朋友兄弟，所有被壓迫國家的希望！」

然而，「現實的馬克斯主義」仍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哲學教條，雖然這一點是仔細的悄悄一筆帶過。不過，很明顯的，毛澤東在這方面，一點都不退讓。他寧願犧牲康生和彭真，也不會放棄他畢生所爭取的這個主要的事。

毛澤東已為未來數年作成他的選擇。他不得不這樣做；他知道無法對抗擁有美國全力支持的蔣主席，因此，投靠蘇俄是他唯一能走的路，中共黨的整個工作型態，就照此一方式正在進行修改。

毛澤東這種為莫斯科所表演的可笑的「大腿舞」，突然變得卑躬屈膝，一副尊敬的姿態，同時滿口吐着正宗馬克斯主義的詞句。

毛澤東現在將一切作為賭注都押進了聯共的國際主義原則上，他冷靜而有計劃的這樣做去。一般普通黨員祇把表面的表演，看做了認真的事。他們為蘇俄的勝利歡呼，報紙、電台、政壇人物的演說，為蘇俄造成一種誇張的友好氣氛。

這個傀儡戲的牽線，牢牢的握在毛澤東的手中。他急於要達到他的目的，而致洩露了他的真意：達到他的目的，而決不絲毫放棄了他的原則，「現實的馬克斯主義」的原則。必要時，可以犧牲他的忠實同志，來維持他意識形態的地位。毛非常明瞭，這齣戲的結果，就完全有賴於他的政治手法了。

毛澤東渾身都感緊張。他擔心代表們會衝破仔細規劃的演說詞的範圍，而自行其是。他自己也擔任在一旁提示台詞的角色，中共黨史上這段最恐怖的十年中，內部權力鬭爭痛苦的哀號之聲，絕不能洩露出去。

蘇俄政府已宣佈廢止與日本的中立條約，這是證明我們不能撇開太平洋局勢的發展，而袖手旁觀。

延安大聲歡呼。毛澤東這幾天頗為興奮。蘇俄政府的決定，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聲望，這裡每個人都知道，國民黨很快就會謀求跟共產黨妥協了。

延安盛傳，蘇軍與中共部隊在未來的對日戰爭中相互接應是免不了的。
中共頭子目前最樂意做的事，就是歌頌蘇俄和史達林。

在延安，每一個人——從低級黨員到高級工作人員——現在都認為，蘇俄軍隊將會解決

延安所無法單獨解決的問題，是勢所必然的。他們將為中共「解放」內蒙，將把關東軍逐出東北，當然勝利還是歸於中共。毛澤東顯然是希望將「特區」擴大成爲一個廣大幅員，蘇聯將會替他贏得這個地位的。

在赫爾利的華府記者會之後，中共對蘇俄政府這個決定，特別稱道不已。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一日

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的擴大全會終於已成過去之事。毛澤東使用壓力，講好話，作許諾，達到了他的目的。全會中所發表的演說，獲得認可，激動之情也平息了下來，代表們都頗守紀律與服從。

毛澤東自那篇陷入泥沼的歷史性的報告中拔身出來。他向代表們發表了一些冗長的演說，設法緩和平息不安的情勢，憑着他個人的威勢和公開的壓力，總算把醞釀中的風暴控制住，連我也沒料想到代表們的反應會那麼強烈！

關於任弼時的報告，全會通過一項「關於本黨歷史的若干問題」的決議，這一文件大部是譴責博古和王明，特別是「共產國際」的觀念。

據宣佈，全會即將在數天內正式揭幕。

我綜合過去幾年來的筆記與報告，獲得下列一些結論：

一、毛澤東與美國接觸，目的在獲得武器，這點毋需再加解釋。

二、對重慶的政治要求，目的在孤立中央政府。毛澤東似已完全忘懷他的這種舉措可能造成分裂。戰爭只是達成其個人目標的權宜之計。

那些要求都不切實際。他的目的，是將蔣主席塑造成一個固執、愚蠢的人；破壞聯合抗日行動；誘騙美國與「特區」簽署協定。他的主要王牌是盟國對八路軍及新四軍的興趣。

三、在延安簽署並由赫爾利認可的草約，其中的條件使該約根本無法實現。蔣主席絕不會同意將全部政權交給共產黨。草約中的條款本身即帶有這種意味。赫爾利陷入圈套中，至今未能解脫。美國在某方面，也因為這個與白宮有密切關係的政客所犯的大錯而蒙羞。

四、毛澤東設法憑武力達到其政治目的，而不顧中國的軍事及政治情況。（他以西安協定作為掩護，佔領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些地區，表面上却是為了建立新基地。）

五、毛澤東想要美國與中共結盟。在彼此交往之中，毛將中共說成是美國可以依賴的一股勢力。儘管他成功的希望渺茫，他仍試圖說服與他談判的美國重要官員，可將他視為可靠的盟友。

六、毛澤東自己在政治與軍事方面與美國聯手，是想設法孤立蔣主席。這一點在

蔣主席是很瞭解的，這在一直以各種政治建議把什麼事情搞得亂糟糟的美國，也很瞭解。蔣主席充分明瞭，美國方面對毛澤東的任何讓步，都將削弱重慶的權力。所以他把史迪威調了職。

七、毛澤東與美國聯手，也希望制止蘇俄積極參與解決遠東問題。

毛澤東與盟國間的接觸，主要特點就是共同反對蘇俄。美國起先認為這個歷久不衰的反俄情緒是一種策略。無論如何他們不敢犧牲蔣主席。至於毛澤東，他自己洩露了內心的秘密！他所簽署的任何協定，便是基於反俄主義而來的（共產黨「一種國家主義色彩的」）。毛澤東非常明瞭，在意識形態上，蘇俄一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主要敵手。他知道這點，現正設法從中取利。然而，這僅是一種技巧的策略，我知道這些會談的每一細節。爲了換取美國的武器及盟誼，毛澤東曾答應與莫斯科一刀兩斷。

八、毛澤東藉着對國民黨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作爲他破壞聯合抗日戰線的正當理由，指責蘇俄及共產國際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指稱他們迫令中共與蔣主席聯盟。（國共西安協定是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二日簽字的。）

九、毛澤東與美國所有的一切接觸，又顯出了他另一面的政治化裝。他很清楚的表明，他並非共產黨人，而是中國的「主要民族勢力」。他的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絕無共同之處。

十、所有承諾和原則，如果不能符合他的目的，毛澤東都準備加以否認。條約、傳統的國際關係，或是人民的疾苦，對他都無關緊要。……毛澤東把辯證論解釋為不顧原則的行動自由。用比較更率直、更精確的話說，他的辯證論可說是無耻的行爲與不忠實的勾結的混合物。

十一、儘管蘇俄援助武器、金錢，給予在莫斯科求學的中國學生獎學金；儘管給予中共強力政治支持，阻止國民黨中比較反動的份子剿滅中共，毛澤東却在納粹對蘇俄發動戰爭那幾年間，採取了背叛的立場。在一九四一—四二年，日本即將攻擊蘇俄那段最痛苦的時刻，毛澤東却以麻木不仁的態度，靜觀局勢的發展，甚至下令八路軍勿對部署於蘇俄邊界的日軍採取積極行動。當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喬治亞人以及亞美尼亞人在通往莫斯科、列寧格勒、塞瓦斯托波爾及史達林格勒等地的路途上，垂死掙扎時，毛澤東却開始在黨內進行清算，報復「教條主義份子」及中國的共產國際份子。此後不久，他就下令八路軍停止對日軍採取戰鬥行動，讓他們準備毫無阻礙的攻擊蘇俄。

十二、毛澤東從他自己那套「現實的馬克斯主義」的哲學立場，摧毀「莫斯科反對派」，詆毀共產國際及其活動。

十三、毛澤東以「反蘇主義」及「國家主義」腐化幹部，並在黨內使用恐怖手段。

十四、毛澤東玩弄假造的數字，掩飾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對日戰鬥行動的真相，以及「抗日統一戰線」的真實性質。

這些數字便由世界各大通訊社加以廣泛使用，而並不提到來源（延安）。這些數字因而成爲「正式」資料。它們不僅並未說明中共戰時活動的真相，但却歪曲了歷史進展的眞正景象、它們的特性、方向以及程度。更重要的，它們遮蔽了中共頭子的真實意向。

中共七大大會即將於明日揭幕。據一九三八年中共「六中全會」的決定，這次大會原應於一九四〇年舉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時，王明曾發表演說，談到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他的演說獲得與會代表一致通過。唯一對王明的報告提出批評的是毛澤東，但經過辯論之後，他體會到有遭孤立的危險，最後終於投票贊成那個決議案，同意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是對付日本侵略的唯一正確策略。

此後不久，王明以及後來「莫斯科反對派」的份子，大半都動身去到漢口，代表中共參加蔣主席的政府。

王明在漢口一直留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漢口被日軍佔領爲止。毛澤東此時並不浪費時間，趕忙致力加強自己的地位，並準備進行整風運動。此時正是康生的懲罰組織力量日益擴大之

時。毛澤東也開始着手證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次會議以及中共「六中全會」有關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定爲「無效」，因此共產國際的立場也是「無效」的。

因此，中共即將於明天揭幕，舉行七全大會。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三日

中共「七全大會」終於揭幕。

揭幕詞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任弼時發表。

他的演說內容，大致如下：

「本黨」廿五年的歷史，是一個有勝利、有失敗的時期。在這期間曾作了很大的犧牲。鬥爭仍在繼續進行。

我們的主要「成就」，是所有的中國人民，都維護我們的政治路線，並歡迎「新民主主義」。在我們鬥爭的途中，馬克斯主義逐漸與中國人生活中的具體事實相融合。毛澤東的標幟，成爲「解放」中國人民的標幟。

我們已進入世界重大變化的時期。希特勒即將打垮，民主制度即將獲勝。在東方，日本將在二、三年之內被趕出中國，我們要開始建設一個新的民主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在現階段

的處境。

任弼時之後，由毛澤東演說，大要如下：

中共「七全大會」將決定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人民目前面臨兩種命運的抉擇，即將由他們來決定。本屆大會必須決定人民要走的路線。大會必須團結全中國及全世界的人民，以確保勝利。

柏林不久即可攻陷。在東方，抗日戰爭尚在進行。但勝利已不在遠。已在我們掌握之中。

在毛澤東之後演說的是朱德、日共代表岡野、劉少奇、周恩來和林伯渠。他們的演說都是千篇一律：概略的分析國際局勢，呼籲擊潰日本帝國主義，簡略的追述中共過去的歷史，評估當前的形勢、成就，增加力量、團結。

所有發表演說的人都指出，有了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就有了「領導人」和「標幟」，這些都將繼續領導他們，迎接一個接一個的勝利。……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四日

散會時候，一個中國同志走過來對我說，從現在起，我在大會中所記的筆記，都是「機

密文件」。他說，這是毛澤東親自下的命令。他拿去了我的筆記本，請我等一會。

十五分鐘後，他回來了，把筆記本還給了我。筆記本的封面上蓋了一個「機密」的戳子，還有一些漂亮的字蹟寫着：「宋賓同志，這本筆記是機密文件。所有各頁，均已編上號碼，任何一張都不能撕下。每次會議之後，筆記本都要繳回，不能携出會場。大會結束後，這本筆記必須交出。」

因此我必須交出我的筆記，只有到明天下一個會議之前，才能取回。

我在會中記下來的毛澤東演說詞，並未列入大會的正式紀錄中。我想這篇演說不會原原本本的公開披露，事實上，這篇演說是個機密文件。除了毛澤東本人和參加大會的代表外，誰都不會曉得這篇演說的內容，當然，這並非是因為它包含中共的任何政治或軍事機密的緣故。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六日

毛澤東的政治報告令人驚訝。有些論調與事實完全相反。在很多問題上，理論與實際根本不相符合，好像採取了一些平行的、往往是分歧的途徑。

使人有種印象，演說者設法避過了所有有關黨內鬥爭的重大問題。他的議論不斷的隨着

不同的事實而有不同。即使是隨便的研究一下，就可顯示這個報告並不能支持中共頭子們的實際政策。毛的演講，用意在掩飾他以馬克斯主義口號加以偽裝所進行的私人權力鬭爭，來實現他的脫離馬克斯理論，或是遮掩過去整風那些見不得人的動機和手段。這就是爲什麼這篇報告聽起來很誠懇，而實際的事實，這種誠懇却是虛偽的。而且這個報告是非常矛盾而不正確的。在一方面，他假稱「霸權的必要」等，宣告對國民黨進行無可妥協的鬭爭。另一方面，却稱與國民黨聯盟將屬權宜之計。這個問題本身顯然有種意義，表示對日戰爭將會繼續進行下去，大會即將動員一切力量，來對國民黨鬭爭。這些話顯然應作如下解釋：中共將繼續保全實力，把國軍部隊排擠掉，包括佔領新的地區。這就是他所講的意思。

報告中的若干數字，先是稱爲應有的數目，然而幾乎就在同時，立即把它稱做是確實存在的（例如，在中共控制地區的人口數目）。

總之，這篇報告有太多的漏洞。

在整篇演說中，毛始終表示他對黨幹部的關切。整風所造成的損害，顯然很嚴重。在理論部門，黨內人員已被剝奪了一切的主動。甚至誰也不再設法將馬克斯主義理論應用到實際的工作上。黨內祇有少數幾人有權「交下」指示，由所有其他的人去執行。在這內戰迫在眉睫的複雜政治情況中，這種缺乏獨立行動的情形，是非常危險的。陌生的思想觀念必須有力

的、富有創新力的加以處理，以配合於各種不同的情況。黨幹部在思想觀念方面的散漫，顯然使毛澤東深感關切。在一方面，毛無法否定整風，更不用說是加以放棄。但另一方面，報復的不利結果，已過於明顯，不容加以忽略。毛的談話，彷彿就像是在大聲嘶叫：我們不能傷害黨的幹部，我們要尊重他們，我們需要幹部！

在延安已寄居多年；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現在有很多理由值得令人關切。……

這種關切便隱藏着黨所作的諾言：不再對地方黨幹部施行報復，不再重演過去的作法。否則就會很難保留住對新地區的控制。毛澤東設法向地方幹部保證，非常感激他們的努力，他們無須擔心。他這樣做，主要是激勵他們活動。他在人事方面的政策，就像在理論與實際方面一樣，似乎是在調和不和，妥協歧異。他想保持「整風」的精神，同時又要重新喚起黨內的活力、同志關係、以及對前途的信心。這個問題本身即表示：毛澤東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嗎？

毛擬定了一些輝煌燦爛的樂觀的計畫，很少顧到要把它們和現實連在一起。這份報告非常虛偽，很技巧的拼合一起，因此便很方便的略過了所有爭論的問題不提。

他長篇大論的談到聯共，談到蘇俄以及蘇俄領導階層。這完全是一種運用的手段，與他過去的行動無關。在我覺得，那聽來就是一大堆空話。

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目的，工作和歷史，以及在此種情況下國共的聯盟，都加以作主觀而且含有偏見的處理。

誰也不敢對此報告的內容，提出質疑或批評。據瞭解，這篇報告便是一個詳盡的指示，一道命令。我可輕易的想像到，進行討論，祇是對這個報告提出一種說明而已。

高級黨工人員與一般黨員之間的關係，也是獨特的。同志間通常應有的關係，是完全不存在的。在民主的門面後面，遮掩了上級對下級那種軍隊樣的專橫。代表們那種唯命是從的態度，自降了他們的人性尊嚴。整風確實發揮了作用。

要正確瞭解毛澤東的演說，必須對他的政策，他那套迂迴曲折、模稜兩可的名詞，有一充分的了解。

例如說「動員廣大羣衆」，意思是說準備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新的土地，並發動內戰，也就是說，「動員」與「抗日戰爭」是毫不相干的。

「發展一九四一—四五年的勢力」，可解釋為發動游擊戰，採取有限度的戰術，降低抗日行動，以便集結力量準備未來對國民黨作戰。

「我們已糾正必要改革的政策」，意思是說，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已進而採取了提出無法接受的要求，作為解決國共之間歧見的策略。這是自認以階級意識評估各種發展，來偽裝

進行政治分裂。據毛澤東本人表示，這個策略可追溯到一九三八年，旨在破壞抗日統一戰線。

整篇報告都充滿這種含糊不明以及缺乏誠意的字眼。……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七日

毛澤東的演說，追述到一九三五年的血淋淋事件。他談到軍隊和地方幹部時說：

江西蘇維埃地區的紅軍，完成了「長征」。他們到達「特區」時，所有黨軍幹部，對當地黨「軍幹部曾施以殘酷而不公平的對待。……」

毛澤東對黨的缺點所作的假批評，（如「我們是布爾塞維克黨人，不過我們是免不了犯錯誤的。」）用意在掩飾「特區」地方黨部及蘇維埃組織工作人員的痛苦。當初毛澤東曾派遣大批軍隊在當地「維持治安」，那是說，消滅當地的蘇維埃及黨組織，來建立新基地，取代舊機構。毛澤東希望他能成爲新基地的領袖和主子，他的權威在那邊不會受到挑戰。

高崗，特別是劉子丹，原來在這個地區曾被看做是「人民英雄」。在面臨國軍的封鎖及全國長期的戰爭情況下，從長期的游擊戰中，他們在延安附近的驢延，建立並加強了一個蘇維埃區。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的先頭特種部隊在陝西大肆殺戮。當地所有黨和行政工作人員全部遭到逮捕。那些挺身而出保衛他們頭兒的人，便都遭到了殘酷的殺害。

大屠殺一直進行到毛澤東率領的主力軍抵達爲止。紅軍的主力部隊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達陝北的。

特種部隊和紅軍的懲罰行動，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引起了強烈的激憤。他們認爲毛澤東應爲這種報復行動負責，因爲大家心中都毫無疑問的明瞭，這是他下的命令。

在這種情形下，毛澤東便把這個責任推在率領那些懲罰部隊的司令員身上。高崗、劉子丹和另外一些在這大屠殺中劫後餘生的人，便都恢復了原有的職位。……

進行這項懲罰活動的人，在那年冬天逮捕了高崗、劉子丹和他們的一些戰友。他們把這些被捕的人留在外面徹骨的寒凍中，來折磨他們。在高崗、劉子丹和另外那些同志被整得半死不活時，他們便拳腳交加的迫着他們站立起來，在兩排人中間走去，受着夾答刑罰。早先在富田的時候，毛澤東的嘍囉們還曾廣泛的使用火的酷刑。

這次他們重施故技，被捕的人都挨了火刑。這些年來，高崗絕口不談，從未講到他所被迫經歷的事，在那種嚴刑拷打之中，他右腳大腿的肌肉，都給燒得露出了骨頭。

毛澤東的典型手段是：對於那些顯得太表獨立作風，威脅過大，令他不安的人，都毫不留情的加以對付，然後將自己置身報復之外，將此歸咎於那些犯有技術錯誤的人。

在富田的報復事件，以及「高崗與劉子丹事件」之後，都是這種情形。整風之後，情況亦同，將全部過錯歸咎於康生和他的一些同事身上。

一九四五年四月卅日

周恩來提出了一個報告（亦即一個補充報告）：

一、關於統一戰線：共產黨與國民黨。

二、建設的教訓（在黨與外交政策方面的教訓）。這一部分的主要結論是：我們在戰爭開始時所提出的口號並無改變：「建立聯合政府」。

周恩來接着評述在各個時期國共關係的發展：

一、西安事變以前。這是動員廣大羣衆進行抗日鬭爭及反國民黨鬭爭的時期。

二、西安協定，成立抗日統一戰線。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二日，中共發表與國民黨達成協議的宣言。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四日，蔣主席發表聲明，正式證實那項協定的存在。當時的口號是：「安內第一！」

三、漢口淪陷前的時期（漢口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爲日軍佔領）。

四、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國民參政會召開以前的時期）。

五、當前時期（目前情況已完全反映於我們所提出的要求中）。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着重於國共關係的第四個時期（一九三九年至四四年），亦即中共部隊奉毛澤東之命，不顧「百團大戰」，開始降低對日本軍事作戰之時。

這也就是與國民黨關係惡化的時期。毛澤東逐漸的分裂了抗日統一戰線。

一九三九年日軍進攻長沙流產後，國軍部隊與中共部隊的關係益轉惡化，這是正好符合毛澤東的計劃的。他逕自推進他搗毀與國民黨團結的計畫，儘管在口頭上他還是繼續表示支持西安協定。他聲稱與國民黨的團結，是受了自由派人士和「共產國際」的逼迫所締結的。這段時期在一九四四年結束，這並非祇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原因就是就在這年四月，日軍從開封地區發動了一個攻勢，到年底時，把中國帶到了軍事災害的邊緣。

因此，在一九四四年，毛澤東結束了他的觀望策略，這便是他以進行游擊戰之名加以偽裝的主要策略。

這時中央政府的權力因日軍的大規模攻勢而受到了極大破壞。毛澤東此時認為他所以拒絕參加積極對日作戰行動，因此將民族聯合統一戰線轉為一個騙局，專為等待的一個機會已經來到。他認是這時已是採取行動的時候。現在爭奪權力對他已有了明朗而現實的希望。國軍部隊已精疲力竭，政府組織鬆散。民族統一戰線中政治盟友的勢力已經衰竭。一旦發生內戰，成功機會現已大致相等。

周恩來作了一個重大的轉變。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七月之前，周恩來是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首席代表。

毛澤東稱他在反對派中的地位是一個「經驗主義者」，並將周列入「莫斯科反對派」的集團中。事實上周恩來也確是屬於這個集團的，因為他贊同王明的觀點，同時支持共產國際的決定。

在整風的過程中，毛澤東設法詆毀某些「莫斯科派」的人，同時爭取另外一些人到他那邊。從事實判斷，周恩來是毛主要爭取為盟友的人，因為毛曾為他保留了悔改以及以後與「現實的馬克斯主義」聯合的一切道路。

在毛澤東和康生的壓力下，周恩來不僅擺脫了與王明集團的關係，同時也譴責共產國際的活動。因此他從毛澤東的反對者，一變而成他的最熱誠的支持者。到一九四三年年底，他開始執行毛澤東的一些最艱難的使命，諸如調節毛與王明的衝突等。

毛澤東所有一些最重要的計劃，全部都沾有周恩來手跡。他是中共頭子們與美國人接觸的主要策動者。一般言之，他是對西方具有好感的中國人之一。

周恩來在與美國的談判中，擔當了最積極的角色。他是中共外交政策所有一切最重要行動的幕後主持人。他支持毛澤東孤立蘇俄以解決遠東問題的立場。如所週知，他們對美國的依賴，為時甚暫，總之，這並非是他們的錯。

周恩來憎惡康生（周曾在整風中吃過苦頭）。

周恩來的女兒，與馬海德之妻蘇菲是朋友。

周恩來處理各種問題都很冷靜。他爲人小心謹慎，非常健談，但同時又守口如瓶。他能很輕易的適應任何情況，在黨、政、軍各機構都有他的人。這些人似乎自成一個獨立集團，對他忠心耿耿。

他見多識廣，在政治上的彈性幾乎達到了機會主義者的地步。我認爲機會主義是他在政治方面的主要特性。

周恩來是少數參與毛澤東私人事務的人中間的一個，事實上，毛澤東有時求助於周恩來解決一些家務事。……

周恩來經常能夠貫徹他自己的決定，但做得好像是出於毛澤東的意思。儘管他能隱藏鋒芒，但他的天賦稟質高於毛澤東。

周恩來的朋友，無疑包括葉劍英和朱德，但他的最好朋友，是在十六歲時就嫁給他的鄧穎超。

一九四五年五月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

陳毅和高崗在大會上發表演說。……

儘管高崗過去被整得很慘，但他仍然很會交際。與人往來，沒有一點愁容，也沒有不信任的樣子。他很愉快，隨時開個玩笑。他倔強成性，極爲明顯。他不是個有耐性的人，而是個倔強的人。在康生的委員會裡，他已克制到了忍耐的邊緣。

洛甫是中共最高級工作人員之一，他從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共產黨。一九三一年，當選爲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五年，任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長。他受過工程、文學、和社會政治學教育。曾經翻譯過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王爾德等的作品。……曾做過出版商。後任中共黨「中央委員會」主要機關刊物——「紅旗」雜誌和「戰鬪月

刊」的主編。他在莫斯科留學多年。他是「莫斯科反對派」的一個活躍份子，在一九四二—四四年之間曾遭整肅。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

洛甫是第一個在共黨大會上發表演說的人。

繼洛甫之後的第二個演說者是康生。

康生談到兩個問題：（一）農民問題（在這階段是中心問題）。（二）特殊問題：（甲）日本對中共基地的軍事情報活動；（乙）國民黨的情報；（丙）國民黨和日本合作訓練間諜；（丁）美國和國民黨的情報合作。

我是在這全會中唯一的蘇俄觀察員。中共黨本屆全會是一個特殊的大會！從一開始就很明顯，這次全會是要建立毛澤東的一人統治。……

德國電臺報導，希特勒已死亡。如果這是真的，這就有點不公平。這個罪大惡極的元凶，竟逃過了人民的審判。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

博古在全會中發表了一篇報告。然後是彭真發表一篇聯合報告。

現在雖無時間詳細分析洛甫的演說，但可提出一些初步的概略結論：

一、整風以「實際生活的馬克斯主義」的精神，改變了洛甫的意識。（「由於整風的關係，我澈底研究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作風與觀念。」）

二、他的演說明白地說明了中共黨內的鬭爭。原原本本的提了出來：反李立三運動；對毛澤東富田機會主義的鬭爭，國際派的暫時成功，毛澤東對中共黨內「教條主義」的有系統的鎮壓。（「對付所謂反革命進行鬭爭，採取了錯誤的方法。……」）

三、藉譴責蘇俄在教育國際派幹部上所擔任的角色以反映毛澤東的觀點。爲了奉承毛澤東而辱罵蘇俄的教育制度，等於否定蘇俄共黨的經驗價值。

四、宣佈毛澤東的「馬克斯主義」，是中國所能接受的唯一革命哲學體系。將馬克斯主義跟毛澤東主義視爲一物。（「我將不能成爲毛澤東的學生。因此大家都可把我視爲並非馬克斯主義者。由於過去讀了馬克斯的作品，我們欺騙了別人。將來我將仔細注意毛澤東同志的教誨。」）

五、以毛澤東一切鎮壓行動辯爲正當（從富田事件到整風）！毛澤東不能再期望這個中共中央委員會書記長做得更多了，他從前是著名的國際主義者，和王明站在一條陣線上的人。

六、但最驚人的事，是洛甫提議「在黨內進行永久性的整風」，爲毛澤東觀念的勝利，繼續進行整風。

七、洛甫對他自己的朋友們施以當頭一棒一個最惡毒而最不公平的打擊！他不但譴責王明和他以前的朋友們，而且用黨的名義來攻擊他們。（「他們尋求分裂我們的黨，來達到幹出國民黨特務沒法子達到的事。證據是在我們黨出現了一些具有一種不利於毛澤東同志傾向的文件。」）洛甫是指王明和王稼祥致中共黨七大大會的信。

八、他歪曲共黨歷史，以取悅毛澤東。

九、他確定黨新特質與新關係（事實上在最近幾年裡已經形成）。這是一種向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低頭屈服的精神。爲了毛澤東「永恆的公正」，他要求放棄人類的尊嚴。洛甫已經到了把毛澤東視爲「神靈天才」的地步，認爲他在中國革命史上是無人能及的。

十、他用種種方法來貶抑馬克斯主義的價值。據他說，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將無結果。

十一、他採取了偽造的手法。他以一種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簡直喪失個人的尊嚴，作爲中共黨「無產階級精神」的通行證。在與會各代表當中，實際上沒有一人是屬於工人階級的。因此，高談「無產階級精神開始在我心中發展生根」，是胡說八道！發展生根的是毛

澤東思想，而不是馬克斯主義思想。

十二、一個整風的結果——一個人在精神方面的驚人墮落，在個人方面的貧乏，就是整風的一般特性。

劉少奇和周恩來一直不斷都在暗中競爭。兩人對這一點，都不太小心。這是一種殘酷的權力鬭爭，在毛澤東的默許下進行。如果有什麼東西使劉周聯合起來的話，那就是對康生的敵視——一種瀕臨厭惡的敵意。

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

外國電台報導，柏林已在五月二日晚陷落。德國在義大利的部隊，已於五月三日投降。在舊金山舉行的國際會議，正繼續進行。此一會議目的，是在成立一個聯合國的組織，並批准國際軍事法庭的成員，來懲罰那些主要的法西斯戰犯。

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廣播，一再反覆報告「希特勒的死亡」。他的權力已經授予一個德國元帥。

今天共黨大會中的第一個發言人，是聶榮臻，第二個是楊尚昆，楊尚昆之後是陳雲。

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

洛甫、聶榮臻、楊尚昆和陳雲的演說，導致一項確切的結論：

毛澤東從「共產國際」的自行解散取得了一切可能的利益，這個決定雖然是基於馬列主義的共產革命業已成熟所作成，但實際上却解開了中共黨國家主義份子原來被網縛住的雙手。

在「共產國際」自行解散之後，國際派的每一獨立地位，便都受到了壓抑。

二次世界大戰的情勢，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此情況下所作自行解散的不可避免的決定，激劇的促成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爭取其自己路線進行鬭爭的機會。

「共產國際」自行解散的決定，在毛澤東便把它看作爲可以毫無妨礙地實現任何旨在增強個人權力地位的政治決定的機會。

這在整風的狂暴中，在中共頭目們跟美國人談判的乖張行爲中，以及現在在共黨大會中發表的演說中，便變得特別的明顯了。

艱苦殘酷的二次世界大戰，對毛澤東個人，却是一種僞裝了的真正的天賜之幸。它產生了各種共黨不在理論方面作迅速的轉變，在「民族解放」一套口號掩飾下，進行這種轉變。事實上，「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斯主義」，就是在那時候成熟而具體化的。全會中的每一篇演說，實際都證實了我的結論。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自行解散的決定，強烈顯示了毛澤東的本質，秘密的宗派主義和分化的政策，現在便可隨心所欲了，於是開始很快的重新改造着黨。

這次全會終於使我相信毛澤東精打算盤的天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全世界的人，包括中國在內，都是一大災害。但是對毛澤東却是一大福音。在悲傷、不安、衝突和政治危機中，毛澤東的政治目的，却就更易向前推進。那就是——一條奪取政權的道路！

古希臘人很聰明的說，人是衡量一切東西的尺度。從這個意義來說，毛澤東正以最精確的尺度，在創造他自己的世界（應用政治手腕、欺詐與謊言）。

談聶榮臻的演說。

一九三八年五月間，日軍發動爭奪武漢三鎮的作戰。但這場戰役產生了一種長期血腥的性質。於是日軍改變他們的計劃，進攻廣州。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佔領了廣州。

歐洲的慕尼黑協定，使日本軍人因此希望在遠東也能達到同樣的協定，也就是說，希望能得到世界各主要國家同意，依照日本的利益，來瓜分中國。

日本法西斯主義者預期東方的張伯倫和達拉第，能設法說服中國政府投降。東京依賴於

反蘇的資本主義世界大國，能盡力做去，祇要日本和德國能對蘇俄發動攻擊。但是中國的戰爭繼續未停。十月底，日軍攻入漢口。蔣委員長領導的中國政府，被迫撤離該城。不久以後，重慶成爲中華民國的首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國民參政會發出總動員的號召。「東方慕尼黑計畫」顯然失敗，中國人民決不接受日本的奴役。

在佔奪廣州和武漢的戰役中，日軍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因此降低了他們的攻勢，但這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是因爲日本控制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後，現在便正在準備對蘇俄發動一次戰爭。蘇俄的遠東和西伯利亞吸引了日本。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繼續採取他們對法西斯德國所採的同一綏靖政策。從東西兩方面同時進行粉碎蘇俄的計畫，非常配合他們的胃口。在西方，慕尼黑協定已解開了希特勒縛住的雙手。張伯倫和其他一些反動政客，認爲毫無疑問的希特勒現在就會向東去了。

因此，日本開始縮減對中國的軍事行動，抽出軍力來對蘇俄發動進攻。

聶榮臻在全會中宣佈：「把政治與軍事問題連在一起，是錯誤的。在一九三八年日本急劇減低他們在中國的軍事行動後，就不應該進行軍事行動的。」就在那個時候，日本軍閥在蘇俄邊境發動了攻擊。聶榮臻宣佈，這是爲了慕尼黑的利益，也就是說爲了某些國家的利

益，並稱，我們應該停止對日軍的作戰，將作戰降低為游擊行動。因為甚至在那個時候，毛澤東便是堅持主張如此的。這就是說，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事作戰以及後來的「百團大戰」，都是不必要的。

讓蘇俄盡它的力量去做好了——這就是他的演說的意義。

在另一方面，聶榮臻很遺憾的說：「當時我們沒有聽毛主席的話。」中共應該讓蔣委員長去打日本。根據毛澤東的理論，中共應該躲藏在他們的基地中，等待主要的敵對勢力在鬭爭中流盡了血。

「百團大戰」的策動者是毛澤東，他曾將此作戰計畫通知了「共產國際」的。

現在聽了聶榮臻對大會的演說，加上和毛澤東的交往多年，再印證其他許多的事實，使我相信毛澤東所設想的作戰行動，有下面兩項目的：

一、擴張中共現有的地盤，建立新的基地，這就必然的會影響到共黨和國民黨之間的聯盟。這個行動的準備活動，所以那麼極小心的保持着秘密進行，不讓中央政府的軍事指揮部知道，並非沒有理由的。

二、毀損「共產國際」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因此破壞王明和其他國際派份子的地位。八路軍的「百團大戰」遭到挫敗，給予毛澤東一個機會，從機動戰，轉變為游擊戰。他

現在有了必需的，證明其爲正當的理由。

毛澤東是以八路軍的失敗爲代價，達到了這個在政治與軍事的目的。對毛澤東而言，中國共產黨員和部隊官兵的英勇，都沒有什麼意義——不過是他計畫的一部份。

聶榮臻和其他許多的發言人，都譴責那些年的機動戰，來證明對日本採取游擊戰是正當的。但他們儘管很坦率，却忘了這次作戰的設計者，正就是毛澤東本人。

後來，毛澤東却把這個作戰的失敗，歸咎於「共產國際」、「莫斯科反對派」、以及八路軍主要指揮官身上。

聶榮臻的演說，揭穿了毛澤東的議論所稱八路軍的技術落後和武器缺乏，乃是他主張採取游擊戰的主要原因的投機性。

毛澤東之將軍隊改取消極防衛，根本並非爲了缺乏武器或是日軍所居的優勢地位。他自己分裂中國的計劃，使中國因日軍的侵犯而日趨衰弱，同時保全他自己的軍力，以便在隨後的時期，進行奪取權力的鬭爭。世界各國軍隊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利益，他自己人民的犧牲，一些城市的摧毀——所有這些都是他計畫的一部份。他的計畫的細部，部隊「官」兵的英勇，以及艱苦的生活——這些也都祇是同一計畫的細部。爲了這個目的，而不是爲了對日作戰，他要求武器：沒有武器，這個計畫就不能實現了。所有這些年來，毛澤東一直都堅

守一個原則：他能等待，來贏得這場戰爭，至於等待的代價，不在考慮之列。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

德國一位部長和德國前駐英國大使牛賴德男爵，已遭逮捕。牛賴德開了一份戰犯名單，交給「聯合國戰犯委員會」。英美電台一再重覆播放德國投降的聲明。蘇俄政府未作宣佈，這算是那一種投降？沒有蘇俄代表參加，怎樣能接受法西斯德國的投降？

我已精疲力竭，我必須把大會上的所有演說摘要記錄，當場翻譯，記錄下來。演說者說各種方言，把這些方言所表示的特殊意思翻譯出來，是多麼困難。此外，我必須說明大會的進行情形。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消息明確傳來：在柏林一個郊區，德國武裝部隊的無條件投降議定書，已經簽字。

在蘇俄方面，這個議定書由朱可夫元帥代表簽字。空軍上將泰德代表盟軍遠征軍最高統帥簽字。由凱塔爾、荷立柏和史頓甫代表德國武裝部隊簽字。

五月九日上午四時，布拉格以及許多捷克城市，從德國侵略者手中，獲得自由。

戈林和季斯林均已被捕。

終於勝利了，再沒有希特勒，在德國再沒有法西斯主義了！我們希望將來也不會再有。我們歡呼，使中國人大吃一驚！

我們用大杯斟滿烈酒，爲勝利，爲我們的人民，爲所有對法西斯而戰的人，舉杯祝賀。我們互相擁抱，我們甚至高歌。……

勝利了！勝利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

陸定一在大會演說，接着是劉伯承。

陸定一的演說：

他強調毛澤東創立了他自己的主義。他特別讚揚整風，是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

他實際要求一個永久性的整風。一個不斷的整風運動經由劇烈的改造黨內教育的制度，便能達到這個目的。

他呼籲進行一次更加嚴厲的黨的整肅，警告大家黨內過份民主的危險。

劉伯承的演說：

他承認對日戰爭，一直進行遲鈍。（我們總是用游擊戰對付日軍，祇有在對付國軍時，才進行正規的傳統作戰。）

他證實，正規作戰和傳統作戰的矛頭，乃是向國軍進行的。

他證實，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四五年所用的戰術，是一種觀望戰術，目的是使中共軍留在他們的基地。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

有關對日戰爭的報告和國際局勢的分析進行的辯論，已經結束。參加辯論的有所謂「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代表，包括洛甫、聶榮臻、楊尚昆、陳雲、陸定一、劉伯承、博古。

他們都承認了他們的錯誤，這種錯誤，簡括的說，便是以教條主義的方法，處理馬列主義，在實際工作中與羣衆失去接觸，低估了毛澤東。

所有演說者對蘇俄都顯示了雙重的態度。

幾乎人人都讚揚蘇俄是中共的偉大盟國。

一九四五年五月

四三七

同時，所有的發言者都多多少少表現了反蘇的情緒。他們自責爲「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以及其他的錯誤，事實上都是針對蘇俄共黨的思想觀念原則而言。這種自責，同時也等於是否定這些原則，並確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新哲學（「毛澤東的學說」）。

這種雙重意義，最重要的是反映着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對蘇俄的態度：一方面是依靠蘇俄的威力，利用此種威力作爲政治資本，另一方面譴責和壓制教條主義（也就是掩飾反俄運動）。

毛澤東最高興在大會中受到奉承，現在就特別明顯了，這一點可以從他對各代表演說的反應上看出來。

在這些演說中，有很多事情都很可能不必提的。總之，如果這些事情已經很明白，爲什麼還要一再重覆的說呢？然而每一個人都把整風期間硬生生裝進他們腦中的觀念，又小心翼翼地重覆講出來。演說者不但不變的都讚揚着毛澤東的報告，而且還讚揚着他的其他言論。從毛澤東嘴裡講出、筆上寫出的一切東西，都是「最好的」、「深刻的」、「有意義的」等等。毛澤東坐在他的座位上，傾聽着這些說話，便向演說的人，展開一個讚許的微笑。

大家在演說中隨處提到「毛主席」（註：原文已加括號）作品中的主題，並非用來支持某一點，或是某一結論，而是要在大家面前，尤其是在共黨頭目們面前，表現演說者所受

的「整風至福」。

毛澤東花了多少年的時間，在黨內進行鬭爭，無情的整肅，政治的機巧運用，來確保全會能依照他的方式進行，最後才召開這次大會。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

劉少奇提出修改共黨黨章的報告。

在他報告的前言中，劉少奇說：「從今以後，中國共產黨必須視爲一個新的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新型的政黨。」

「這種改變一定會影響到：（一）組織的形式，（二）工作的方法與形式，（三）黨內部生活的形式。組織形式改變，形勢、情況、任務也將改變。雖然各方面都有重大改變，但是自從六大大會以來，我們組織的形式一直未有改變。」

劉少奇明天將繼續他的報告。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

莫斯科繼續廣播情報局的報導。今天的報導說：「在各戰線，移交德國戰俘的工作已經

完成。」這顯得就像是最後的戰時報導了。

劉少奇在大會中繼續報告。

我仍在想着他所說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新型的政黨，那到底是個什麼型式呢？截至目前爲止，黨所進行的轉變，在中共領導階層，是否認爲已經完成了呢？

總之，這個共黨主要理論家（在毛澤東之後輪到第二位）的談話，表明中共領導階層明確的了解在黨內進行的這種理論轉變。這種自認，根據舉行全會之前所有種種發展來看，便顯得格外重要。

劉少奇似乎綜括了一九三五至四五年間共黨內部鬭爭的結果，由於這個鬭爭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就變成了一個「新型的政黨」。

現在延安有三十二位美國觀察員。

美國飛機每天在重慶和成都之間穿梭飛行，運送醫藥供應品及鑽鑿油井的裝備（油田在延安附近），供給特區和此地的美國人員。

這些飛機也載着美國情報人員、石油工程師、鑛冶專家。這些美國人雖然受到當地當局

冷漠的接待，但他們毫不客氣的在「特區」住了下來。

美國人運來了強力的無線電設備，以完整的基礎進行他們的氣象服務，並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情報中心。

美國人利用中共黨領導階層希望從他們取得較多物資援助的事實，現在便忙碌地與當地人民、軍事人員和共黨幹部進行接觸。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

在全會中討論的部份問題：

- 一、召集中共所有各基地地區代表會議，以所有這些地區，成立一聯合委員會問題。
- 二、美國的態度問題。
- 三、蘇俄的態度問題。

四月二十二日，一家延安報紙宣佈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組織所有中共黨基地地區的聯合職業委員會。這家報紙也宣佈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建立一個代表各基地地區的婦女組織。

五月三日，也是這同一報紙，宣佈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聯合解放區的所有青年組織。

因此，現已採取一項重要步驟，着手準備成立一個解放區「政府」，這個「政府」將定名為「解放區聯合委員會」。

這個問題對中共黨的領導階層，一向是最重要的，但是由於情況並不確定，阻止了它的實現。不過，所有這幾個星期，這幾個月，中共的頭目們一直沒有時間來建立輿論，支持他們的目的。

現在白宮的態度已很明朗，毛澤東已無第二種想法，美國究竟將會支持那一方面。中共頭目們現在便採取具體措施，來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

正式成立此一機構的意義是非常明顯的，這將是一個毛澤東的「政府」，這是朝向內戰的一個步驟，一個打算取得蘇俄支持的步驟，一個如果沒有了它的支持，便不可能實現的步驟。因為如果沒有蘇俄的支持，這一步驟便將祇是一個騙局了。這種委員會式的「政府」，以有限的資源，面對以美國力量支持的國民政府，它將成爲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很顯然的，中共的頭目們現在便仰仗蘇俄，它的協助，和最廣泛的支持。

這就是爲什麼毛澤東告訴代表們說，成立聯合委員會的問題必須不稍拖延，予以解決的原因。他建議召開一個解放區的會議來開始着手進行，這個會議將宣佈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毛澤東把這個機構稱爲「中國人民解放聯合委員會」。他強調中共黨要有自己的政府是

如何重要，同時他禁止使用「政府」這個名詞來稱這個機構，他要所有代表為這個機構想一個最好的名字。

這個政府的問題對毛澤東來說是最燙手的問題。他警告代表們，在目前的情況中是不能依照民主的原則來舉行選舉的。

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和選舉代表參加一個制憲會議，單是這一事實就可能引來各種反動份子的咒罵、毀謗和威脅。毛澤東說：「我們沒有理由要退縮。因為我們是為人民的利益採此行動，而且我們的行動無疑是正確的途徑。」

因此，在短期內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已成定論，現在毛澤東便已從談論轉為行動。從他的呼籲要求大家更加小心審慎，這就讓全世界知道，關於權力的問題，中共黨已決定採取迅速的行動。（這一問題曾由共黨的五個高級人員加以討論。）但在辯論過程中，這五個高級人員對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的問題意見並不一致，有幾人全力支持成立這樣一種委員會。事實上，他們要求立即成立此一委員會。他們贊成等到國民黨六全大會結束，但堅持現在就着手籌備的工作。事實上，這一批人主張採取行動，不管外面的環境如何！要走捷徑，宣佈「中國人民解放聯合委員會」的成立。贊成這個路線的是周恩來，他主張採取最堅決的行動。周恩來警告說，在蘇俄對日本開始軍事行動之後，再着手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就太遲了（而

且可能使莫斯科陷於一種尷尬的地位)。如果如此的話，有關國家的政府，可能便會責備蘇俄的干預。

他們的反對者說，成立聯合委員會不合時機，而且冒險。這些同志堅持，必須對中國國內的政治情勢有一徹底的認識。他們解釋說，不但必須等到國民黨六大會結束，到時雙方的意見都已有了具形，而且也應知道國民黨對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開國民參政會的態度。不把各方面的立場加以考慮，就採取行動便屬時機沒有成熟，為時太早了。

毛澤東舉棋不定，而且不願對此問題明白表示他的意見。結果，情勢愈來愈變得有利於周恩來的一邊。很可能這五個高級人員，已經同意了周恩來的路線。

毛澤東似乎大半時間都在專心一意的想着有關召開國民參政的問題。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

對美國態度的討論：

去年一批外國記者來到延安，以及隨後美國觀察團的到來，使特區的頭目們勾起一種希望，可以從美國得到武器與彈藥，而這個希望又產生了各種狂妄的整軍計劃等等。

赫爾利的記者會打破了他們這方面的希望。美國現在對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採取了明確

的態度。這一點不但反映在中共頭目們的情緒上，同時也反映了在「特區」所有人民的態度上。從前對美國人的友好很快就轉壞了。

這種情緒可以從他們在中共「七全大會」中的表情看出來，許多演說者強調需要維持跟英美的戰時同盟，但這祇是做做表面的。

共黨對與國民黨的關係所採取的立場，已有二種非常確切的形態。

他們可能走向內戰，也可能採取一種和平的轉變和相當容忍的態度。在此情形中，便必須努力設法組織一個聯合政府。這樣解決問題，是和國民黨實行政治聯盟的唯一正確方式。

然而，關於和國民黨關係上所提出的一切對待辦法，絕不是中共首領們在大會講台上所說出的全部真話，還有第三種途徑呢？

對日本的攻勢，無疑是由南而北進行的，如果如此，盟軍可能在南方、北方和中國沿岸中部的許多地方登陸，他們將會把中央政府的部隊、行政機構、警察機關，搬到這些地區。美國一定是這樣做。而且，美國登陸部隊一定不會讓新四軍和八路軍阻碍中央政府的軍隊前進。如果是那樣的話，與美國以及國軍部隊的衝突，將是無可避免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沒有別的出路，只有不顧任何代價堅守他們的地盤，不讓美軍和國軍進去。於是中央政府便

會向全世界表示，中共軍這些真正必要的措施純屬挑釁之舉。新聞界便會發動積極的反共黨運動。共黨甚至被指責幫助日本。中央政府便將盡量利用這些事實來孤立共黨。所有國際反動勢力便都會拉進了這個孤立共黨運動。（蘇俄將利用它的聲望來平息這種喧囂。這是共黨首領們未說出的意見。）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已宣佈。

毛澤東宣稱，蘇俄是中共唯一的真正朋友。其他盟國的價值，已由歷史本身來表現出來，以英國為例，它正企圖扼殺希臘的自由，其他的正準備在中國犯同樣的罪惡。

至於跟國民黨關係的發展的特質，中共的首領們並不排除蘇俄領導階層會出面調解，成立一個單一的聯合政府的可能性。蘇俄必須平衡美國的影響力。

不論是以各種不同方式發生內戰，或是盟軍登陸作戰，以剝奪共黨的主動為目的，美國必然的會被指責為壓制中國人爭取自由鬭爭的罪人。

所有演說者都確切相信，蘇俄一面對日本作戰，同時勢必還有辦法來保護中共。蘇俄是不會讓中國共產黨給毀掉的。

第三條可能採取的途徑——也就是盟軍在中國沿海登陸——在大會中並未公開討論，只定廣泛的暗示，沒有說出來。

所有的演說者都充滿信心，相信蘇俄一定會對日本採取軍事行動。這個情調，給予所有

蘇維埃區的代表，黨、軍、及行政人員一種新的生命。然而祇有在需要蘇俄對某些目的能够給予幫助時，蘇俄才是親近而親愛的。這差不多就是確定蘇俄的實用價值的唯一角度。

我的信念，從代表們對現在中國境內三種不同發展的態度得到了支持。不管這種發展可能採取那一途徑（聯合政府，內戰，盟軍在沿海登陸），蘇俄對其中任何一條途徑的結果，都會要他負起責任。在延安流行的心情是一種寄生蟲的心理。大會呼籲黨對日作戰，保衛他們的收穫成果，這些祇是口頭的空話，實際上他們都把一切希望寄託在蘇俄身上。

觀望戰術，而不是動員黨的力量。在會中的演說，這種情緒並不像為代表們安排的座談會中說得那麼明白。在代表們私下的談話中，這個情形就特別坦率。

毛澤東對我說：從今以後，中國已成爲世界政治興趣與矛盾的中心。他說，在歐洲祇有一些不太重大的問題要解決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日

國民黨六全大會在重慶舉行，蔣主席，軍政部長陳誠，參謀總長何應欽發表演說。

我對此次共黨大會覺得很矛盾，參加會議的代表，大半都是軍人，具有地下革命活動紀錄的資深黨員。他們參加過艱苦的戰鬥。這是黨的精華、黨的希望和黨的前途所寄，但他們

也受到了整風的影響。

除了對特區有利益之事外，誰也不了解國際主義。對他們來說，國際主義就是別人（當然包括蘇俄在內）答應援助中共。這種感覺便是代表們中間普遍心情的基礎。

但影響到這兒人民的，還並不祇是整風一種。長年在山地的生活，缺乏馬克斯主義的書籍，除了毛澤東控制的消息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消息來源。當地人們半封建式的生活，以及物質的困難，全都留下了它們無法磨滅的痕跡。

馬克斯的語句，往往給用來作為偽裝，愈多提到馬克斯的理論的締造者，愈多提到這些人的名字，這樣的一種演說，便愈受重視，儘管其中空無一物，味同嚼蠟。……

英國在希臘鎮壓民主抵抗勢力，使中共黨首領們深感不安。軍事干預是一個新的、意外的、非常危險的敵人。這就是中共黨首領們深深的希望我們給以支持和直接援助的原因。毛澤東極力向我表示他對蘇聯的友好感情。他說，面對與美國軍事干預支持的國軍即將發生的武裝衝突，祇有蘇俄能幫助中國共產黨。這是第一次對於蘇俄對中共所扮演的角色、及對遠東問題的正當解決辦法，所作的多少正確的評估，打進了他的爭論路線之中。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二日

國民黨代表大會，已於昨天在重慶閉幕，蔣主席已拒絕了與共產黨建立聯盟的構想，他認為，共產黨並不承認中央政府的權力，也不遵守他們的承諾。

今天的第一個發言人是林彪。

林彪曾參加毛澤東率領的西竄。他曾統率一個軍團，隨後統率第一一五師。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中他曾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他積極支持毛澤東。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他在莫斯科留學。他的妻子曾一度遭康生的報復，他深深的痛恨這個「情報局長」。

林彪演說的簡略分析：

林彪實際上承認中共多少年來一直「自行封閉」的事實。中共很少跟外界連繫。

他很焦慮的講到共軍和民衆之間的連繫很微弱。

他警告大會說：共黨正在實行軍事化，中共黨是一個軍事化的組織；共黨正遭受了完全軍事化的威脅。

他抨擊「教條主義者」和他們的首領。

他呼籲共黨注意，共黨現已受到退化成爲一個軍事組織的威脅，他並指出共黨與民衆連繫不夠的危險。

林彪的演說是這次大會中最嚴肅的一篇，雖然他也已向毛澤東屈服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三日

今天第一個發言人是張鼎丞。

他是個資深「官員」。在一九三四年，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曾任新四軍一個師的師長。

張鼎丞談到整風和黨的教育，落後的半封建思想對黨的大衆的影響，以及必須以整風的措施來克服這種影響。他對中國紅軍的發展歷史作了一個簡短的檢討。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五日

毛澤東發表特別演說，說明即將舉行的共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

他建議中央委員會委員酌量增加名額，以具有豐富經驗的新同志充當，和遴選工作表現良好的老黨員參加。選擇候選人的標準，應充份相信當選的同志會支持此次全會的政治決

定。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六日

史迪威現在擔任美國陸軍地面部隊統帥。依我自己的看法，我對他的命運很感興趣。我是從美軍觀察團一位團員那裡得知史迪威新任命的。

魏德邁在中國是以比較反動著名，這位將軍是反蘇的。

從葉劍英那裡所接獲的消息中，有一個報告說，駐在重慶的英國大使館接到倫敦一個電報說，英國政府決定改變它對蘇俄的政策。

英國政府有意採取一種對蘇俄施行壓力的政策，逐漸拒絕合作。……邱吉爾痛恨蘇俄的老政策，又再度顯示了出來。

毛澤東昨天兩小時的演說，可以歸納如下：

——當選「中央委員會」的人，一定要保證執行本屆大會的主要政策。

——上屆「中央委員會」大部份的委員，都是值得連選連任的，他們實際上都證明是能領導這個黨的。

——大會將選舉一些富有可貴實際經驗的同志，來擔任新的「中央委員」。

「中央委員會」的新組織在人數上必須大加擴充。

最近毛澤東一直設法在我們的關係上，加上一些個人的友誼。毛澤東邀請我去和他促膝長談的次數，比以前增加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八日

五月二十五日，美軍觀察團新團長彼得金上校由美軍空軍上尉史坦爾陪同，拜訪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接見他們，並且和他們會談。

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九日

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會談中，史坦爾強調這次會議是非正式的。

會談的要點是美國希望獲得中共黨領導階層的許可，在中共控制的地區，發展他們的軍事情報網基地。

史坦爾還是保持着他前任謝偉志的精神，他報告重慶盟軍指揮部的意見，據稱認為與八路軍和新四軍從事聯合軍事作戰是可能的，他們願意和中共軍合作。這就是史坦爾談話的要點。

史坦爾警告說，這種合作最初自然是有限制的。

美國主要是指望擴大和鞏固他們的情報中心。他們準備以最新裝備供應這些中心。中共軍也可使用這些中心，不過有一個條件：完全由美國人負責管理他們的物資和技術基地。

史坦爾建議建立一個無線電廣播網，但也有一個同樣的條件——人員全部都是美國人。

一九四五年五月卅日

今天在共黨大會上發言的有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

朱德的閉幕演說，呼籲學習毛澤東的軍事觀念。

周恩來談到現階段的中國革命，談到需要聯合一切軍事力量來擊敗日本，這就需要暫時放棄對國民黨的公開戰鬥，他說：「我們的口號是建立一個聯合政府！」

目前中國陸軍大約有三百五十三個步兵和騎兵師，坦克約一百六十輛，飛機二百五十架。

中共部隊約為六十一萬六千人——十五個步兵師，七十六個步兵旅，兩個騎兵旅。

日本有三十二個步兵師在中國，一個坦克師——總共將近一百萬軍官和人員。從南洋撤

退的軍隊，使日本在中國的遠征軍兵力增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一九四五年五月卅一日

蔣主席辭去了行政院長兼職，由宋子文接任。宋子文出身富裕的宋家，他跟美國銀行家有密切的聯繫。

毛澤東對共黨大會發表閉幕演說。

在談到一般問題的一段，毛澤東提到動員羣衆的規模。

現在已是振臂而起（意謂組織羣衆）的時候，但這並不是表示冒險活動。我們要怎樣來振臂呢？我們必須要爲自己利用機會，這就是他演說的意思。

一九四五年六月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

朱德的軍事報告，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報告的翻版。劉少奇對修改黨章問題所作的報告，也同樣的是舊調重彈，他們在各自的報告中，都複述了毛澤東的意見。

關於選舉中共「中委會」委員及候補委員的問題，仍未解決。

這次全會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澤東提出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共有四套，內容各有不同。

第一份報告（論聯合政府），由毛澤東於四月二十四日，在黨大會上提出。在這份報告中，一切都用它們的正當名字稱呼。毛澤東避免曖昧詞句，並且公開概述了他對各項大事的意見和評估。他也分析了中共黨務工作的缺點。

第二份報告，限在黨員中間傳閱，它跟在大會中提出的那份報告，並無太大的差異，但是措辭便要溫和得多。報告中全然未提到蔣主席。關於黨務工作缺點祇略提而過，措辭也十分籠統。

第三份報告，是用以對外發表的正式文件，跟第一、二兩套報告相比，這份報告的措辭，甚至更加溫和，所有主要項目都經過慎重修飾。報告中也未提到中央政府元首。

最後一份報告，就是早已由延安新聞媒介公布了的那份政治報告。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

中共七全大會的重大結果如下：

- 一、總結了黨內鬭爭的結果；
- 二、概述了對國民黨的政策；
- 三、呼籲動員軍力，以擊敗日本；
- 四、通過了在全部竊據地區和基地，擴張地盤，並加強軍隊的政策；
- 五、計畫將中共活動焦點，自鄉村轉移到城市；
- 六、宣布必須將游擊戰術，改成機動戰術；

七、警告共黨提防美國，可能以武裝部隊，消滅中共；

八、表示了對中共唯一朋友與盟友的蘇俄的態度。

中共這次大會的最重要結果，是總結了黨內鬭爭的結果。在大會中，並未有提到這個問題。康生在全體會議中演說時，又流眼淚又咒罵，一切事統統在會上擺平了。

全會所解決的最重要事情，就是承認毛澤東在黨內所採取的路線，一直都是正確的。

反對派都已摧毀，那些頭兒們也都或多或少地，以動人的表情，公開承認了他們的錯誤。

毛澤東對王稼祥寫悔改書的事，特別感到高興。

毛澤東有理由相信，一個團結的堅固基礎已經奠定。在所有問題上，和各級黨組織中，反對勢力實際都已擊敗。

大會要求每一共產黨人，都須受「毛澤東思想」的教誨。

不過，毛澤東說，完全的團結，仍屬遙遠。目前，黨的團結還是比較性的。至於黨內完全團結，還得經過一次長期的鬭爭。

毛澤東說，每一軍事單位，每一「蘇區」（甚至組織完密的大蘇區），都像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個體做去。人人都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過活。大家追求的，是單一個體的發展，而不

知有中央指導的任務，人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務。

毛澤東說，爭取黨內的完全團結，鬭爭尚在前頭。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日

第二個重大問題，是對國民黨的態度。將來所要採取的方法，是可以預見的。毛澤東的思想，便是未來對國民黨關係的最後的、無可改變的基礎。

全會譴責所有那些爲了跟國民黨結盟，而據稱阻撓了「民族解放運動」，並妨害了「解放區」發展，避免「嚇走委員長」，只看到國民黨長處，向重慶搖尾乞憐，使他們自己適應於國民黨而損害了他們本身實力，並不對國民黨反動特性，進行一貫鬭爭的人。

主要的要求（需要採取一切努力），是組織一個中國的聯合政府，主要的任務（爲了達到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和力量），是阻止、妨碍，並排除召開一次國民大會的任何可能。

毛澤東在他的政治報告中說，共產黨至少應當集中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照最廣泛的意義），對國民黨施展無情的批判和堅決的鬭爭。其餘六分之一的手段，應當保留下來，作靈活運用。

分析毛澤東的這個報告和另外一些報告，以及別的言論，無疑表示，這次全會的目的之一，就是實行動員（全面動員，積極準備打一場內戰）。要求組織聯合政府，和反對召開國民大會，只是走向內戰途中的兩個階段。

國民黨和蔣主席是決不會同意組織聯合政府的。延安準備着這樣一種要求會得遭到拒絕。如果情勢轉到這個情形，就緊接着宣布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解放區」聯合政府）。這樣一來，內戰就可實現，因為在對日抗戰過程之中，國共雙方之間的鴻溝，便會越來越深。

中共的整個政策，所有一切的意向與目的，便都是從早日進行無可避免的內戰這個事實出發的。新四軍步兵第七師和第二師的戰鬥行動，在陝西所進行的備戰活動，從「特區」調出部隊，一批軍方和黨方同志同時朝同一方向出發離去，以及共黨在湖南河南兩省的活動，都可證明此點。這一切都只是在準備進行一次內戰。

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

全會曾討論了擴張共黨基地的問題。與會代表一致決議，贊成擴張政策。人人都把希望寄託在共黨武裝部隊的擴展上面。這個任務是激劇增加游擊部隊和人民志願軍的實力。大多

數代表發言的主要論點，便都是在增強武裝部隊，並建立新的基地。

大會也討論了跟日本軍閥作戰的問題，但所有發言的人，絕無例外，都將必需與日軍作戰丟到九霄雲外，全力的詆毀國民黨。大家開頭都談到對日作戰，最後却呼籲對國民黨鬭爭。

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

大會的一個結果，是決定在城市中加強黨務工作。毛澤東說，黨在城市中也必須和在鄉村中得到同樣的成功。

美國觀察團白白就在延安，毫無收穫，形成笑料。但美國人卻很重視這個觀察站，很冷靜地幹着他們的工作。

毛澤東無意在蘇俄未和日本開戰之前，跟盟國斷絕關係。

我說的「盟國」，指的是美國人。

美國人在中國已穩牢地取代了英國人的地位。就英國來說，在中國境內的「作戰」，大半是由倫敦報社的特派員進行的。……

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

英、美、法、蘇四國代表，於六月五日在柏林簽署宣言，宣布德國戰敗，並由四國政府接管德國的最高權力。關於佔領區的計畫，將在報端公布。「大柏林區」將劃分為四個佔領區。這個宣言是由蘇俄的朱可夫元帥，美國的艾森豪將軍，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以及法國的塔西尼將軍，共同簽署的。

蔣主席拒絕了日本請中國派遣代表，進行和談的要求。

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

中共黨全會定今天選舉「中央委員會」委員。

在七十九個提名人中，將有四十五人當選。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

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在國會表示，將不顧一切，進行抵抗。如果戰爭蔓延到日本本土，該國便將利用其一切地理之利。

在中共黨全會開始選舉「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之前，毛澤東今天在大會發表演說。他的講詞摘要如下：

「王稼祥同志這次沒有當選中央委員會委員。他過去犯了錯誤，同時他是個對黨有功效的人，也是個能幹的工作人員。」

「另一個事實：邊義會議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王稼祥和洛甫的支持，那次會議就不會如此的成功。這是因為他們當時已經開始脫離了他們的錯誤路線。我們到了陝北後，王稼祥便被派往共產國際。他從莫斯科回來之後，正確地報告了共產國際的路線。那時，我黨的處境困難（他指的是和國際份子的歧見）。共產國際的路線是贊成投降主義。王稼祥是正確的。」

「王稼祥同志是中委會『論發展軍政幹部間接觸』等四項決議案草案的執筆人，這使他有很大功勞。」

在毛澤東講話完畢之後，便選舉中委會後補委員。

毛澤東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十日的聲明，意義多麼地重大！

毛說，「打從邊義會議開始，一直到目前，已經過了好幾個階段，黨已經失去了……它的多元性。」

這應解釋為如下的意思：所有並不符合毛澤東路線的觀點和意見，都已在中共黨內受到壓制。因此，「黨已經喪失了它的多元性」，採取了清一色的色調，毛澤東的色調。這是遵義會議，和對第三國際的鬭爭，以及三年整風的結果。這是按捺毛澤東模式造成的團結！再

沒有更令人信服的證據了！

關於王稼祥俄國之行的目的，所作的解釋，使我感到詫異。他原來是毛澤東派去的特使。在那時候，這個黨的新頭目曾交託他從事蒐集有關第三國際「親投降主義者活動」的資料。早在那時（！），毛澤東就開始準備對共產國際，及其在中共黨內部的同路人進行一個決定性的鬭爭了。自從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就一直在執行他自己的路線了。

毛的這些言論，生動地說明了他的策略，是在分化反對派的團結，並且在他們昔日支持者的協助之下，鎮壓異己份子。在所有這些年裡，毛澤東就一直都在應用這個手段。

現在，毛澤東就心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在政治意識上，尚未受有上屆「中委會」二十五名委員那種標準的思想訓練，可能「開始太多想到自己」，也就是說，他們將表示自己的意見，因此「推翻了車」。

這些短短的談話，顯示了多麼激烈的鬭爭！毛澤東只不過略微揭開了一點黨內政治鬭爭的幕簾而已。這種對過去所講到的一點的短短的枝節之事，展開了一幅何等的景象！鬭爭是何等的劇烈！性質又是多麼的邪惡！

我認為毛澤東在過去的公開聲明中，還從未有過如此坦率地表示過他心裡要說的話。但的確，他現已有恃無恐，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已是黨的十足主人了。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選舉結果已經宣布。

大會選出了「中央委員會」的四十四個委員，三十三個後補委員。

在中委會選舉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和任弼時四人，各得五百四十三票，林彪得五百四十一票。

王明得了三百二十一票，博古得兩百七十五票。博古和王明兩人，都當選了中委。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在大會閉幕會中發表了演說。

中共七全大會在唱「國際歌」聲中結束。

現在略談一下中共七全大會中的辯論。

所有發言，可以分爲兩類：

一、過去反對毛澤東路線者的演說。

二、所有其他人的演說。

第一，關於從前反對毛澤東路線者的演說，

(甲)、洛甫、博古和楊尚崑的聲明。

在這三人的談話中，以博古的談話，最爲莊嚴。

大會對洛甫的演說，表示了容忍。

洛甫和楊尚崑公開懇求毛澤東寬恕他們過去所犯的「罪」。他們的聲明，是對他們在各階段所犯「錯誤」的屈辱檢討，是一種自我鞭笞，和對他們「小資產階級觀念」，提到被指稱他們在那裡學得了教條主義與機會主義的莫斯科，與造成種種錯誤的共產國際領導階層進行聯絡等等（洛甫）所作的譴責；證明「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同時也是對毛澤東的謳歌和頌讚。

博古並未讚揚毛澤東，他表現得很莊重。

(乙)、周恩來、彭德懷、聶榮臻的演說，以及朱德的部份發言。

他們很有分寸的談到各自的過錯，並沒有作自我譴責。大會對彭德懷的談話，很不滿意。

(丙)、王明和王稼祥並未在大會中發言。他們寫了悔改書，承認他們在黨內所犯了所稱的錯誤。

高峯雖然是反對毛澤東的一個主要人物，但他既未發言，也沒寫悔改書。

第二、關於其他人的演說。

這些同志並未對他們的錯誤作自我檢討，亦未說明他們在理論方面的一致，或是證明

「毛澤東路線」的正確。

他們每一個人都談到具體的工作，大半都是關於過去的事，較少談到有關現在，根本沒有談到未來的事。只有李富春、葉劍英和林彪是例外。

大半演說在理論和文化水準方面都很低。

康生的談話，集中於兩個問題：一是黨的農民政策，一是他那部門的活動。

康生在農民問題上可以佔到便宜，因為那些毛澤東的反對派所犯的錯誤，大半就都在這個問題上。

這個情報局頭兒不嫌費辭的把情報和反情報工作，大捧特捧，說得天花亂墜。雖然毛澤東已在他的報告中，承認黨幹部暨非黨人員考核委員會，犯了錯誤，同時，大會都在期待康生提出一些解釋，但他卻沒有一字提到在幹部檢查和整風運動中所犯的錯誤。

康生演說完畢後，主席團便立收到雪片般的發言條，紛紛要求康生說明，他爲何對他的錯誤，默不作聲。

主席團建議，或是由康生登台發言，或則由他向主席團提出一個書面報告。這個佞臣悍然拒絕說，他是在「執行毛澤東路線」(！)。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

現在談一談關於中共領導機構選舉的事。

早在黨大會開鑼之前，就已作好了有關的準備工作。主要工作是在防止情感衝動，並且將洛甫、王明、博古、王稼祥和高峯幾人，都拉進中共「中央委員會」。

到了五月二十五日，明顯地可以看出，這個目的，並沒有達到。大多數代表都主張選舉一個人數不多的小型「中央委員會」，並且反對上述諸人。

這就使毛澤東不得不於五月二十五日，走上臺去，發表了一篇演說。他花了兩個小時，講到大會選舉的原則，候選人的選擇，以及選舉那些曾犯過錯誤的同志的必要。

爲了說服大會，毛澤東甚至力稱，那些犯過錯誤的人，是格外更有價值的（！），因爲他們想到他們的慘痛經驗（這也就是說現在他們已有充分的訓練），就不會再犯錯誤了，至於那些並未犯過錯誤的人，由於他們自信緣故，可能便會輕易犯了錯誤。

在同一次會議中，毛澤東採取了另外一個行動，建議將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人數（委員和候補委員），暫時確定一個數目。毛澤東建議組成一個大約七十個委員的「中央委員會」。大會自然同意了。

毛澤東眞是在演戲，他強調必需要把洛甫、王明、博古和王稼祥選上。這些人都已入了名單。目前在莫斯科的李立三，也單上有名。

選舉原定五月二十日前後舉行，但是一直到六月九、十兩天纔舉行。這是因爲產生了爭論的緣故。代表們要求把名單上的每一個人，附上一篇小傳。

因此，選舉具有了一種整肅的性質（須知幹部都是在整風氣氛中養成的）。洛甫、博古、王明和另外一些人，在各代表團舉行的會議中，又開始受到討論，並遭惡毒的謾罵。

接着輪到了賀龍（軍閥態度和不正確的工作作風），康生（幹部檢查），彭眞（幹部檢查），彭德懷（軍事錯誤和不作自我批評），高崗（捏造西北的史實，及自我吹噓），陳毅（陰謀反對他的政委，並且組織小團體對付他），以及其他一些人。……

以選舉爲中心而進行的政治鬭爭，使人對黨內鬭爭的情況，以及毛澤東絕不厭倦談到的中國共產黨團結的價值，便可有一個清晰的觀念。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

根據七全大會的決議，「中央委員會」定爲四十五人。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代表們投票反對鄧發、王稼祥和高峯。

決議案規定，「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訂爲三十三人。

四十四人當選爲「中央委員會」委員。

鄧發和高峯兩人均告落選，這使毛澤東很不高興，但他對王稼祥的落選，才真真的感到了煩惱。要讓鄧高兩人仍然留在黨的領導機構內，實際上已沒有一點希望。不過毛決定要將王稼祥拉進「中委會」去。毛澤東毫不掩飾的對各個代表團的領袖人物和團員施行了壓力。

此外，他還向大會建議，將王稼祥列在「中央委員會」後補委員的候選人名單上。

一天，他要求與會代表，不要選舉第四十五個「中央委員」。

在選舉中委會後補委員之前，毛澤東在會中發表了一篇演說，強調王稼祥對黨的貢獻。

結果，王稼祥不僅當選爲候補委員，而且得到了次多票。

新「中委會」全體會議，已定一週內舉行。毛澤東會在此會中，高高在上，將可操縱一切。無疑的，在隨後舉行的全會中——縱然不是在第一次會中——毛澤東必能成功地將王稼祥選入「中央委員會」。

毛澤東的反對派在思想觀念方面的不穩定，不僅使毛澤東可以鎮壓他們，而且隨後還可與其中若干人一起，從事詆毀共產國際的政治重要意義，以及聯共的經驗。「莫斯科派」放棄他們立場，給了毛澤東一個機會，去修正馬克斯主義。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

目前可以確定的說，毛澤東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他當了中國共產黨頭子後，就開始了他對共產國際的鬭爭。毛澤東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十日的演講，毫無疑問的顯示了這一點：遵義會議標明了中共路線激劇轉變的開端。以前毛澤東避免公開談到此事。在這次大會中，他說，是的，自從遵義會議以來，他就一直在對共產國際「主義投降主義的路線」進行鬭爭了（這也就是反對列寧創立的第三共產國際的馬列主義政策）。

六月九日、十日和十一日，美國觀察團代表史坦爾、杜姆克和史文生三人，分別拜會了毛澤東、朱德和葉劍英。他們說明，因奉魏德邁的命令，即將飛往重慶，特來造訪。

毛、朱、葉三人在和美國人談話時說，不論是美國、英國或蘇俄，誰幫助中國人民，他們就把誰視爲朋友，誰反對給予這種援助，就看作敵人。

他們告訴這些美國人，在美軍總部和中共軍總部之間，未經簽訂軍事合作協定之前，便不可能談到將美國人送往敵後，或在敵後建立氣象站等等的問題。

史坦爾說，他曾接獲通知，美軍最高當局有意派遣他們的人員前來延安。

葉劍英重申，如果這位官員是來談判大規模合作，而不是討論一些瑣碎私事的話，中共

領導階層是歡迎他來到延安的。

一九四五年六月廿一日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中說：

——目前時機，尚未成熟，不能反對與國民黨合作。

——必須進行批評，以消除人們，因國民黨的勢力，仍然很大，而且比中共的勢力大得很多，而可能存有的幻想。……

——中央軍的官兵，百分之百都是國民黨員，而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總實力中，共產黨人只佔了一半。……

目前，中共控制了大約二十處抗日民主基地。

一九四五年六月廿五日

毛澤東的最近聲明，確證了我的若干結論。自從（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以來，對於中國共產黨成爲一種影響勢力的共產國際，他一直都在進行鬭爭。毛澤東在選舉「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後補委員之前所發表的聲明，就可證明這個事實。

他把共產國際視爲他的思想觀念的敵人。這一鬭爭，導致他修正馬克斯主義，並且發展了他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哲學——「現實的馬克斯主義。」

繼續進行鬭爭，就是反對國際主義，在蘇俄正對希特勒主義進行戰爭時，背叛蘇俄，並以對「教條主義」進行鬭爭的藉口，斷絕與聯共的精神聯繫，以及在中共黨內，倡導一種大國沙文主義思想意識。

中國國內的情勢，他就心會有被美國消滅的恐懼，以及他個人的自私自利，現在使他成爲我們的盟友。僅只是個盟友而已；而不是一個在階級和思想意識鬭爭中的兄弟。他要從我們的結盟來檢便宜。他以冷靜的算計，作爲他一切行動的方針。這就使他不止一次的與黨內活的勢力，發生衝突，不論他們可能受到了什麼樣的「精神整肅」。毛澤東一輩子就都在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

一九四五年六月廿六日

舊金山會議已結束。聯合國憲章已經簽字。

各國代表團團長都在閉幕會上，發表演說。

美國總統說，法西斯主義並未完全消失，要剷除暴君、摧毀集中營比較容易，要消滅造

種成這暴端和集中營，並賦予他們實力的思想，却就比較的難了。

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不計代價，在國內奪取政權。只有在黨能保證他會得這個權力，他才對黨具有興趣。因此，他提出了這套外表看來是理直氣壯的標語和口號，並提到馬克斯和列寧。

一九四五年六月廿八日

中共黨召開全會，便意在準備發動內戰。不論與會代表講了些什麼話，一切歸根結蒂便是與爭國民黨作戰。……

全會完全遵循了毛澤東的步驟——這是對「莫斯科派」作無情的鎮壓，與共產國際思想觀念原則分裂的結果。

在蘇俄和法西斯德國進行生死搏鬥的那些年中，中共的一切活動，都在為日本軍閥幫忙。然而在目前，在遠東問題的解決，有類於蘇俄的時候，在美國方面那些主張用軍力消滅中共的人，並不反對粉碎中國共產黨的時候，毛澤東就假裝着他是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和我國人民的朋友。中國的政治情勢，以及世界的局勢，都使這個破壞團結的大師，別無其他的選擇。

一九四五年七月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

奧洛夫夫今天向毛澤東祝賀中共建黨二十四週年紀念。毛澤東爽快地回答說：「如果沒有蘇俄，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大批「飛行堡壘」天天都在把日本城市炸得瘡痍滿目。B-29 轟炸機，實際上飛行於日本戰鬥機無法接近的高空。它們就像在作空中閱兵式地，以大編隊飛過目標，投擲炸彈。

毛澤東於五月三十一日，在全會作總結報告時，談到檢查幹部和反間諜的問題。

下面是他那篇演說中有關部份的簡略摘要：

——我們必須將某些錯誤，轉為我們的武器；體罰早經禁止；證據不可忽視，我們必須永遠謹慎地處理每一件事。

——但是我們也必須鼓勵對各種問題，處以認真的態度；我們決不能容忍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有害的。

因此，毛澤東就在大會主席台上，向所有黨員宣告，「精神整肅」和其他所有一切鎮壓行動，在思想意識本質方面，是無可疵議的。

他發出號召，繼續無情地懲罰那些不滿份子，並將整風的鎮壓方式，作為黨生活的一種條規。同時，為了「安慰」與會代表們，他假惺惺答應他們，在康生的刑房裡，將擴大「作到客觀，沒有歧視」。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

美國人認為日本的命運，已經註定。可能還有一年、兩年、或者三年，但絕難逃過失敗的下場。日本的工業，已經摧毀，同時，這個海洋國家的商船隊，實際上已蕩然無存。然而，儘管在廣播中，使用了輕蔑的口腔，但從其中不難辨出，他們對進攻日本本土的前途，有種不安之感。美國人估計他們自己死傷的官兵，將有一百萬人。他們一直把這未來的進攻，稱為是一次「血腥的」進攻。

全會開了五十天。這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但這絕非只是由於那些解決了的問題太複雜的緣故。這段漫長幾個星期的時間，是過去黨內鬭爭的一個反映。

不，這些代表都乖乖的很聽話。不過必須准許他們在會中說出他們所要說的話，使他們的悔改和譴責的說話，可以用來證明「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斯主義」路線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有意挑選的方法。

在選舉過程中，最近黨內的激烈鬭爭也曾一度重新發作。然而這些代表還是絕對服從毛澤東，祇是必須壓下他們對「莫斯科反對派」份子的敵視，同時將所有那些「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全部都送進那些共黨的領導機構裡。這就需要一些時間，一段很長的時間。

國際派份子的聲譽已經受到很大損毀，因此毛澤東便必須對代表們好言勸說，使他們聽從他的建議。在這新的情勢中，他迫切需要這些「教條主義者」，「莫斯科的人」，「經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他們為他的政治路線提供了一個掩幕，並且在這筆交易中，都已經過了紀律的訓練。

這就是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的過去，七全大會五十天加起來的情形。

一九四五年七月廿一日

史達林、杜魯門、邱吉爾、以及他們的外交部長，在波茨坦開始舉行一個會議。

一九四五年七月廿七日

邱吉爾在英國總選中落選。在英國，由工黨艾德禮率領，組成一個新政府。邱吉爾現在處於屈辱的地位——他得在波茨坦會議進入高潮之際，收拾行李，離開波茨坦。

在延安活動的一個美國觀察團，是美國情報處在「特區」的一個中心。這個觀察團由三十二人組成，團長是彼得金少校。情報處人員八人，電務員九人。

另外，在中共各處基地，到處都有美國情報處的工作人員。

蘇俄將會打敗日本，它不會讓美國人採取行動，來對付「特區」。蘇俄部隊必須協助中共軍隊，並作掩護，來攻佔華北各省，而且蘇俄將會對中共，給以物質與政治的協助。這是中共領導階層的想法，全會的代表們，也以不同的方式，重覆講出了這種想法。

這就是毛澤東爲何要將康生，從「特區」政治生活前線上調走的真正原因。這個人——毛澤東的最親密和最忠心的助理——由於他的反蘇俄態度，在莫斯科的惡名太大了。

毛澤東只是擋開了針對康生的打擊而已。

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

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說：「我們要堅決的朝向完成戰爭的道路前進。」
宣傳部長王世杰已被任命為中國的新外交部長。

儘管美國在華的已經顯露了帝國主義的政策，但是中共領導階層却不想跟美國斷絕關係。

實際上，這是一個「長遠政策」，旨在在中國及遠東情勢，仍屬撲朔迷離之時，確保它和美國的堅強關係。中共頭目們希望美俄兩國的利益，會得發生衝突。在那樣情形中，他們就很可能從兩方中的一方，得到武器和其他援助，不管它們是來自何方。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

昨天，美國以大編隊機羣，每隊八十九架，轟炸東京。在過去二十天中，盟軍總共擊毀了日本的小型登陸艇一千零三十五艘，擊落飛機一千二百七十八架。

國軍部隊已在所有各前線，加強作戰行動。

日軍防線已被迫縮短。他們的戰鬥部隊集中在較小的地區。結果，日本在陸上的抵抗，並未鬆弛。日軍正在作困獸之鬪，守住每一重要陣地。

東京的計劃，極爲明顯——經由頑強的抵抗，來迫使敵人，放棄要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要求。日本軍方耽心，他們最後也會落得和法西斯德國及其頭目們的一樣命運。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

美、英、俄三強波茨坦會議，已在昨天結束。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釐定應行採取的措施，來消除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並劃定戰後歐洲的疆界。

國軍已經克服廣東省平陸縣。日軍頑強抵抗。

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將軍說，中國的登陸部隊，已經完成戰備。

在過去幾天內，東京一直沒有廣播他們例常的戰報。

毛澤東熱切的設法試探蘇俄的意向。同時，他用各種方法，來迫使蘇俄，在未來的對日

戰爭中積極干預中國的內政。他的夢想，是以蘇俄紅軍，在毗連作戰的地區，摧毀國民政府的軍事與行政機構。他想把蘇俄拖進跟國軍的衝突。如果這個計劃失敗，他就希望瞞住蘇俄紅軍，建立新的中共軍，重新裝備他的武裝部隊，並在中國攻佔新的廣大基地。所有這些不同的構想，多少都是以蘇俄與重慶政府，發生軍事衝突爲先決條件。

對毛澤東來說，我們並不是思想意識上的盟友，而只是他所希望用來達成他自己目的的一個工具而已。毛澤東在跟我談話時強調，我們是「解決太平洋問題的有關的一方」。

在這一切背後，還有美俄兩國衝突的危險。

毛澤東正如癡如醉的陶醉在一種他認爲，可能很快朝向他自己目標推進的情勢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所有的美國廣播電台報導：第一顆原子彈，已於昨天投擲在日本。它的威力相當於兩萬噸黃色炸藥。杜魯門總統警告說，整個日本將犁庭掃穴，夷爲平地。

這顆炸彈是投在廣島的。炸彈爆炸後，全城籠罩在一片濃烈烟火之中。

在七全會中所發表的言論，理論水準低得可憐，這使我想起了我在「精神整肅」巔峯期間（一九四二年）所得的結論。

中共幹部的文化水準，距要求很遠。談不到良好基礎的教育。馬列主義原則，只是形式加以接受。這不是教育，而是一種極膚淺的急就章理論訓練（教練）。大半工作人員，都以他們所接受的學童般的訓練，感到滿足。同時，他們機能地、自然地、同時熱心地吸取「毛澤東思想」。這是因為這種思想正是普遍於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媒體的本質。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

關於波茨坦會議的結果，世人紛加評論。

八月六日，美國使用了一種嶄新的武器，一顆超級炸彈，對付日本。杜魯門和艾特禮都為這件大事發表了談話。所有電台，自晨自晚都在講到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的事。美國電台說，廣島已全部毀去。

在中國沿海地區的日軍陣地，遭到自航空母艦上起飛的美機攻擊。

國際軍事法庭已經成立。

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率同中國外交部長，和一批高級官員，昨天又去了莫斯科。史達林接見了宋子文。……

毛澤東天生是個演員。他知道如何隱藏他的情感，靈巧地扮演他所需要的角色，甚至在他所非常熟悉的人之前。

有時他以非常嚴肅的態度，對一個人耍弄鬼計，隨後問他，他是否成功。……

今天我和毛澤東有一次晤談。一同上街。毛很滿意，在陽光裡眯着一雙眼睛。在開過七大大會後，他情緒很好。他的上衣領子，照常的解開了扣子，他詳細的談到黨的團結。

這種「團結」方式，毛澤東把它用來掩蓋他在奪權鬭爭中所採取的殘忍手段。……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蘇俄政府昨天告訴日本駐莫斯科大使，自八月九日起，蘇俄認為它已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

在七月中旬，日本政府曾要求蘇俄斡旋遠東和平。當時，蘇俄曾將日本政府的這個要求，通知了中、美、英三國駐莫斯科大使。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俄軍已在廣大的前線，越過蘇俄與中國東北的邊界。從濱海省進兵的俄軍，已經突破日軍鋼筋水泥防線。在伯力地區，俄軍已迫使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一帶地方進入戰鬥。

「蒙古人民共和國」也對日本宣了戰。

美國昨天又投擲了一顆超級炸彈，現在日本長崎也已完全毀滅。

這種毀滅力強大的新武器的出現，將使戰爭的性質，發生激劇改變。

蘇俄的參戰，使中共領導階層惶惑不安。這兒誰也沒有料到，俄軍部隊竟能如此快速的從德國調來遠東，並且具有這般巨大的打擊力量。紅軍部隊已粉碎了日軍防線。

這種惶惑與不安，生動地顯示出中共領導階層的老「毛病」——低估蘇俄的可能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

俄軍部隊穿過大森林，走過沒有路徑的地面，沒有水的大草原，翻山越嶺，一路向前推進。關東軍士氣消沉，鬪志盡失。

艾森豪飛往莫斯科，作一友好訪問。

紅軍在中國東北與外貝加爾湖地區的攻勢，癱瘓了毛澤東的意志。由於中國情勢的劇烈轉變，必須緊急採取重要的決定。然而毛澤東這時卻完全失去了主意，不知所措，幾乎瀕臨

了虛脫的邊緣。

這幾天來便特別明顯的說明了毛澤東的懦夫本性，也就是他特有的本色。他再也沒有像他平常那種皇帝般的端莊架勢。從各方面來看，我看到了一個害着「熊病」的意志薄弱的小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日本透過它駐在瑞士伯爾尼的代表團，宣布向所有跟它作戰的國家無條件投降。

毛澤東在和我談話時說，蘇俄在現在和將來，都應當給中共提供免費的援助。中共和俄共之間目前和未來的關係，全看這方面來決定了。

在此可以很恰當的一提，羅薩·陸森堡對機會主義者所作的評論：「你們並不是站在馬克斯主義上面，你們是坐在馬克斯主義上面，甚至是躺在上面……。」

我甚至要用比這更嚴酷的話，來批評毛澤東和他在中共黨內的支持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紅軍在中國東北和外貝加爾湖地區的快速推進，以及在中共頭目們目中視爲可怕而難以

征服的關東軍的崩潰，使中共頭目們大感意外。這裡，他們又低估了蘇俄的軍事與經濟潛力。

毛澤東突遭巨變，簡直的楞住了，我們很難了解，他究竟是否樂於看到這種發展的方
向。……現在他只是給他的幕僚簽發一些命令。

賀龍和聶榮臻的部隊，奉命奪取太原（山西省會），並向東北方向移動，開往北平。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八月十三日，俄軍繼續在中國東北，發動攻勢。

蔣主席給毛澤東打了一個電報，建議在重慶舉行會談，來解決在抗日作戰過程中所引起的歧見。

毛澤東相信未來前途是屬於他的，而且只是屬於他的。

我看到了一個未來鬪爭的舞台。

張天翼曾經寫道：「請相信我的話，在這個世界上，就有一些為未來希望所寄的人！」
這個人不是毛澤東，不是康生，……。

我相信而且看到確有這種勢力存在。透過武力和整風的武斷作風來說服，既不會成爲，

也不可能他們的信仰。一點點的微粒，小小的分子，結晶而成爲真理，在真理之前，暴力在過去變得無能爲力，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

一個人可以撒謊一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但決不能永遠撒謊！

於是我再寫下這句話：「請相信我的話，在這個世界上就有一些爲未來希望所寄的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莫斯科證實，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

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條件：無條件投降。鈴木內閣已辭職。鈴木說，日本人民決不會忘記這個戰敗的日子。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已於昨天自殺。

中蘇友好聯盟條約已在莫斯科簽署。

中共黨「中央委員會」最後通過了一項關於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訓令。這項訓令說明了黨的現況，及其目前和未來的任務。

除了其他任務之外，這個訓令強調，必須鞏固新解放的地區，並援助中農，因爲他們「構成了農村的主幹」。

關於對美國及國民黨的批評，建議採取溫和態度，但只限於在延安如此。各地凡有遇險

的美國人，各地都應加以協助。

各基地各部隊都應準備，協助將來從事登陸作戰的美軍。

對美國人民以及美國政府中的民主人士，應表示同情。

由於在被「解放」的地區，發生軍事磨擦，使國共雙方之間的緊張情勢，與日俱增。

日本的投降，使中共領導階層大為驚愕。他們認為，在任何情況之下，日本都應該能再防守好幾年（至少兩年）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延安領導階層的寄生特性，已充分表露無遺。

黨頭子們茫然不知所措。你可以感覺到對蘇俄指揮部的行動有種隱隱不滿的意味。中共領導階層原來期望蘇俄和外蒙軍隊的打擊，如非針對包頭和歸綏，就會針對內蒙、針對張家口。

然而他們的希望落了空。紅軍基於軍事的考慮，施行打擊——以最小的損失，來徹底擊敗敵人。

中共領導階層認為，蘇俄挑選中國東北，作為其唯一的軍事作戰地區，出賣了中國共產

黨及其武裝部隊的利益。這方面，他們牢騷滿腹，怨聲不絕！

朱德代表中共黨的領導階層，打了一個回電，拒絕了 蔣主席所提關於會談的建議。現在中共頭目們所談論的主題要話，便是打內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

日軍在我們前線，繼續進行抵抗。但在若干地方，他們已經開始投降。

在緬甸境內，個別的日本駐軍，仍在繼續抵抗。

日本海空軍的高級軍官，紛紛切腹自殺。

東久邇宮，奉命出任日本首相。這位親王並不是一種奔走和平的人。此人生於一八八七年，軍校畢業後，曾在法國就了七年。一九三七年，他當過日本武裝部隊中的空軍首腦。

我偶然碰巧，看到一個新四軍參謀部打來的電報。這個參謀部的報告，斷然的表明，在中共領導階層和日本侵華派遣軍最高指揮部之間，有着長久不斷的接觸。

這個電報無疑表示，有關與日軍總部接觸的報告，是經常都有送到延安的。

後來我證實，共軍和日軍雙方參謀部之間的接觸，由來已久。這種接觸的兩頭終點，就是延安和南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

延安發出了一道接一道的命令。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和民兵，都向日軍佔領地區開拔。敵人士氣瓦解，未作抵抗，只是堅守着一些堅強的據點。

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的軍事部門，積極展開活動。延安忙成一片，大家幾乎連雲眼打盹的功夫都沒有。

這般忙碌的唯一目的，是要趕在國軍的前面，攫奪新的地盤和日軍的軍火庫，並且不計一切代價，阻止中央軍前進。

延安的一個密令是：摧毀所有一切顯示堅持向前挺進的國軍部隊，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可能的話，就將他們趕出新攻佔的地區。

軍人、黨工人員，和蘇區工作人員，一批接一批的離開了延安。……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日

日軍部隊在中國前線並不投降。他們並不作戰，但他們也不接納中國的代表。國軍參謀總長何應欽飛到玉山，與日本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舉行會談。

陳毅似乎隨同何應欽，一起飛往該地。

由於害怕遭到報復，在未簽訂投降條款之前，日軍拒絕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一日

日本關東軍已在大部份前線，停止抵抗。

葉劍英告訴毛澤東，我已知道了新四軍參謀部來電的內容。

毛澤東花了很長時間，向我解釋，中共領導階層為何決定與日本佔領軍總部建立接觸的原因。

一個可耻的事實，這就是毛澤東為何要為他的解釋，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論證。

這次談話顯示，所有這一切顯得是多麼的不體面。跟日軍總部的關係，是很早就已極秘密。建立了的在中共領導階層中，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件事情。原來是毛澤東的特工人員（毛所稱的「聯絡人」），派駐了在南京岡村寧次的參謀部。不論何時，如有需要，他就在日本反間諜人員的小心保護之下，通行無阻地川梭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參謀部之間。從毛澤東處送來的必要情報，便留在新四軍參謀部，等着這個特工人員（原屬日本人）。同時，這個特工人員所帶來的情報，便在新四軍參謀部，立即譯成密碼，用無線電報，發送延安。

共軍與中央軍部隊的混戰和衝突，漸漸的蔓延到全國各地。延安和重慶的關係，激劇惡化。報紙上正在進行相互譴責。

局勢實際隨着每一小時繼續惡化。國共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威脅，正在迅速增長。

何應欽將軍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軍的投降。所有日軍部隊，都奉令集中在那個地方。日軍指揮官的正式投降儀式，也在那裡舉行。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二日

毛澤東接到 蔣主席的邀請，約他到重慶去會談，商討雙方歧見，並研訂協定。

毛一直保持着緘默。他現在令我想起了一個人，他不管風向，只顧煽起火頭，而不問火勢燒向那一方向。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三日

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國東北和庫頁島南部，蘇俄紅軍部隊，已在朝向預定的方向推進。

俄國空降部隊，已降落在大連和旅順，開始解除日本駐軍的武裝。

堪察加南方各島上的日軍，也向俄軍投降。到處都在收容戰俘，收繳武器。

頭一批盟軍人員，定八月二十八日，在東京着陸。

蔣主席已前後接連兩次，邀請毛澤東去到重慶會談。中國已經瀕臨內戰邊緣。

重慶新聞界對於毛澤東的拒絕邀請，無不深感痛心，紛加抨擊。照中國人的習慣，兩次拒絕一個人的邀請，是一個莫大的侮辱。報紙說：「『第一號』共產黨人已決定派『第二號』共產黨人，也就是他的右手周恩來來。然而，周恩來已來過重慶多少趟了，他在這裡，曾在數不清的場合，和預先安排的記者會，以及各種集會中發表了演說，但是一切等於白講，一無效果。」

延安廣播電台在答覆 蔣主席的邀請時，要求重慶放棄「一黨專政政權」。

蔣主席在他的第二個電報中，建議和毛澤東舉行緊急會商。鑒於日本已經投降，和國共雙方關係的惡化，這個會談是必要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

八月二十四日，蘇俄紅軍遠東部隊，進入了預定地區。

在瀋陽地區，俄軍「解放」了一座盟軍戰俘集中營。日軍在這座戰俘營內，關有官兵一千六百七十人，將領二十八。

在八月二十三日，俄軍俘擄敵軍官兵一萬四千人。

蔣主席發表了一篇冗長演說。

中共領導階層沒有料想到，在一九四五年的下半年，局勢會發展得如此快速。這不僅顯示了中共領導階層在政治上的短視，而且也表明了他們對蘇俄的態度。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六日

重慶報紙報導，蔣主席又給毛澤東發出邀請，要他與他會面，討論國共雙方的歧見。

蔣主席說：「國家的前途，繫於此一會談。」

蔣主席下令派遣一架空軍專機，去接毛澤東前赴重慶。

中央政府部隊已開進上海和南京。國共部隊在全國各地都有零星小衝突發生。

日本首相東久邇宮要求日本人民「保持最高的鎮靜和紀律」。

蘇俄政府決定不干預中國的內政，引起了中共領導階層的通知。

毛澤東被迫同意在重慶與蔣主席會面。這是蔣主席發出的第三次邀請。

除了一些正當的要求之外，還有一些在蔣主席不會加以同意的要求。毛澤東充分了解

這一點。他還是存着一點希望，認為情勢可能會得變化，於是局勢就會照着他的心願發展下去……

莫斯科所作有關不干預的決定，表示拒絕支持毛澤東的冒進政策，這種冒進政策會引起充滿世界衝突的情勢。

目前，問題已越出了純粹中國的國界。毛澤東的行爲事實上造成了美國和蘇俄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先決條件。

莫斯科堅決拒絕牽進這樣的一種軍事衝突中。這使毛澤東的個人計劃受了挫折，也推翻了他不願現有局勢，有意利用他人替他進行作戰和行動的詭計。紅軍和美軍部隊在順利的情況之中，已漸漸的結束了處理中國境內日軍殘餘部隊的工作。在此種情勢下，繼續進行毛澤東的政策，無可避免地便會導致中共與國民黨的衝突。美國支持國民黨。蘇俄藉與重慶政府簽訂條約，乃是從中國和整個世界一般的情勢出發的。

莫斯科宣稱，它將遵守今年七月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條約。這是對毛澤東的當頭一棒！他所指望的由蘇聯的軍事威力，保證他能採取自由行動。而且，他原曾夢想到在當時所產生的這種造成衝突的情況。

跟延安政權的願望正好相反，過去兩週把他們這套政治詭計的背景，完全揭了開來。他

們要把我們推向戰爭。中共竭盡所能，要使這場戰爭變成無可逃避。延安絕不考慮這場戰爭會走上一場世界大戰。

莫斯科的處理方法，不僅考慮到中國的情勢，而且也考慮到其他地方的局勢。這就是斷然的拒絕掀起一場新的世界大戰。……

毛澤東也對他在談判期間個人的安全問題，感到驚憂。他認為 蔣主席的邀請是一個陷阱，他為他的生命擔心。……

周恩來也很活躍，忙着準備文件，發佈命令，協調一切問題。毛澤東完全沒了主意，實際上完全避開了一切事務。……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七日

毛澤東接受了 蔣主席的第三次邀請。關於此事，重慶早先已接獲通知，於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今天搭乘一架空軍飛機，來到了延安。國民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與赫爾利同行來到延安。

赫爾利顯得很困頓，雖然他在與毛澤東會談時，仍像平日一樣，瀟灑自如，談笑風生。他跟毛作了一次長談，但是就我所知，這是雙方相互試探意見。赫爾利並未講到什麼肯定明

確的話，但是表示他希望，最後能見到毛澤東和蔣主席，同坐在一張桌上，解決双方的爭執。

宴會上，客人都限於祇談一些普通應酬話。對赫爾利來說，國共双方的協定，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私人問題，他的整個事業都押在這一注上。在這方面，他曾犯了一個大錯誤，現在的情勢，又給了他一個恢復聲譽的機會。

延安方面雖然想盡方法，希望摸清蔣主席對重慶會談，會從政治錦囊裏拿出些什麼妙計，都未成功。客人說，他們一無所知。

延安電台列舉中共的要求，表示這些要求如果不能滿足，協定即無可能。……

毛澤東再度要求證實，蘇俄政府準備保障他在重慶的個人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脅，他就要躲到重慶的蘇俄軍事代表團去避難。我證實說，他的個人安全可以受到保障，他可以在必要時避入蘇俄軍事代表團，受到保護。然而，所有這些顧慮都是多餘的，因為蔣主席不會侵犯他的生命。這是莫斯科可以堅定保證的。……

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即將於明天搭機飛往重慶進行會談。

赫爾利在重慶機場說：

「我獲蔣主席的同意和毛澤東個人邀請的，將前往延安。我即必須和毛澤東及其副手

一同回來。……我很高興。一年來，我們一直都在勸告中央政府，避免分裂，進行內戰。討論磋商的範圍很廣泛。然而，國共領袖可以達成協議，帶來光明的希望。」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

美軍已在上海登陸。

一支盟軍艦隊在東京外海巡戈。……

千島羣島方面，日本只留下了一個島嶼。其他島嶼都已爲俄軍占領。

昨天，毛澤東在重慶發表了一篇聲明，大意是國內團結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一項當務之急」。

毛澤東說：「我應國民政府主席 蔣介石先生之邀，前來重慶，討論團結和建國的重要問題。現在，對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正在準備走上和平改造的階段。當前的時機是特別重要的。目前，保障和平、實行民主和國內團結，是必須立即解決的最爲重要的問題。國內所發生的許許多多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迫切問題，應以和平、民主及全國團結的合理基礎，予以解決，俾便建設一個獨立、強大和繁榮的新中國。我們希望中國所有抗日政黨和愛國人士，能共同努力奮鬥，以求實現這些目標。我感謝 蔣介石先生邀請我到重慶來。」

蔣主席設宴接待毛澤東。

延安的報紙報導說：「我們完全決心與國民黨及其他民主政黨簽訂協定，以促進各種問題及早解決。我們必須爲未來的一個長時間，與國民黨建立堅強的聯盟，這種聯盟將使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可能得以實現……。」

至於，國共簽署協定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延安報紙堅持，必須實現中共方案中的同一批那些要點：承認解放區政府，成立聯合政府，等等。……

隱藏在這一切之後的是，希望情勢會變，莫斯科的態度會突然轉變。

然而，蘇俄政府今天重申，決心不干預中國內政，並且遵守它與中國國民政府的條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卅日

主要戰犯名單已經公布。其中包括將由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批提審的人。

美艦米蘇里號昨天進入東京灣。美軍已在東京附近開始大規模登陸。

南京傀儡政府首腦陳公博自殺身亡。

談判於八月廿九日在重慶開始。國民政府的代表是 蔣主席、王世杰、張治中。

蔣主席和毛澤東於八月廿八日宴會上會面。據重慶報章報導，他們二人前次見面，剛好

是在二十年前，國共雙方仍然合作的時候。

中國仍處於尖銳的政治危機中。中共部隊仍與國軍繼續競奪日軍武器和新的土地。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央政府部隊之間的零星小衝突，迄未稍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卅一日

一九四〇年以前，特區裡只有很少幾個我的同志在。但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之間，特區便有了一些非中國人，包括若干其他東方民族（蒙古人、日本人、朝鮮人等）的代表，和少數外籍醫生。

這就使毛澤東能够秘密地策劃整風，並且採取措施，使其他國家社會大眾弄不清中共部隊（尤其是八路軍）從事抗日戰爭，及其破壞抗日統一戰陣線的性質。不過，我們應該這麼說：這種破壞行動是不斷的由解放日報刊出的愛國文章，舉行羣衆大會，發表公開聲明等等伎倆遮掩住了。在特區本身，自從一九四一年以來，反國民黨的政策已成爲中共領導階層政策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沒有一點情報消息曾違背毛澤東的意旨，從這個小小的封閉世界外洩出去。即使現在，延安不斷有許許多多外國記者，軍政領袖到訪，毛澤東和康生對每一個黨員和士兵的嚴密控

制，使他們能成功地繼續玩弄提供不實消息和印象的把戲。只要適當地安排一些「來自人民大眾的老百姓」，只有他們能准許答覆外國記者和政界人士的問題。所有其餘的人，不是噤若寒蟬，就是在答覆中滿嘴都是口號教條。完全順從，不敢表現出一個人的獨立意志，取代了革命的民主。所有這些年裡，前線的實際情況和中共政策的真正方向，都小心謹慎地隱瞞住了我們俄國人——雖然他們繼續不斷的要求蘇俄在所有一切情形中方面都支持這個政策。

這裡曾發生過暴力的事件，其中真相外界絕不會知其全貌——卽令知道，也只是片斷而已。誰也不知道中共七大會的全部真相，這個會議必將對中共發生極大的影響。報上刊登的「官方」報導，並未反映事實真相。許多演說，包括洛甫、楊尚昆、毛澤東及其他人的發言，都從記錄簿中抽出。其他談話亦經大肆刪改，方才刊出，以一種全然不同的面貌，表現出整個大會的工作。

在七全大會中，除了少數日本人、朝鮮人和蒙古人之外，我是唯一的非中國人。毛澤東深信我不知道主要的事情——說服及要挾代表們的幕後鬭爭，充滿着反蘇、國家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鬭爭。

現在，這次全會的歷史，已以一種與事實全然無關的精神加以闡釋。說得厚道些，這種闡釋與事實不符。事情經過均以模稜兩可之詞，虛構偽造，以及大事刪改。

一九四五年九月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

重慶會談的情勢，正在逐漸轉變中。報上甚至報導，國共雙方談判氣氛友善。

重慶報紙帶着譏諷的筆調寫出：「現在毛澤東稱呼蔣先生叫主席，而不是法西斯反動的獨裁者。他現在也管政府叫國民政府，而不是蔣政權。」

延安政策的特性，就是要從有關方面，擄取一切可能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思想觀念的考慮是無所謂的。目的就是利用局勢，擄取一切。……

法西斯日本的潰敗，解除了中國為侵略者奴役的威脅。但是，毛澤東這種寡廉鮮耻的政策，却使中國人民付出重大犧牲，他們在中共默許日軍入侵的結果下，生命損失無可計數，財產破壞亦無可計數。……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

日本投降典禮昨天在美國戰艦「米蘇里號」上舉行。

在降書上簽字第一個是日本外相重光葵，第二個人是日本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

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

盟國廣播說，日本的經濟狀況很艱困，並且將要持續多年。……

根據來自重慶的一項報導，蔣主席和毛澤東已就一些政治問題，達成相互諒解。

現在，很顯然我也應該回莫斯科去。對我這麼一個軍事記者，兼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代表而言，戰爭亦已經結束了。

譯後語

今年一月間，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兄，自美購來「佛拉第米洛夫延安日記」一書，要我翻閱一下，是否可以譯出，在本報連載發表。我以公餘之暇，花費了幾天功夫，仔細讀過一遍，覺得這在當前專以揭發隱私、荒誕故事、或新聞熱門題材，爭取暢銷的美國出版界，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我便決定承擔下來，着手翻譯的工作。

在最初翻閱時，對本書雖已有了一個概略觀念，並曾寫了一篇關於本書及其作者背景說明的文章，但現在此書全部譯竣，使我對本書又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

本書英文本出版者說，本書記述，有時染有政治偏見。這是無可避免的。作者是蘇俄共產黨人，自以蘇俄共黨的立場為立場。這個立場，就是他在莫斯科，啓程前去延安之前，他所奉到的指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已決定建立一個抗日統一戰線，並指定中國共黨的主要任務，在「結束內戰，與國民黨採取聯合行動，團結中國人民所有一切勢力，來保衛中國的

完整與獨立，對抗侵略」。

此點當然絕非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已一反其過去之立場，放棄了向之以中國作為世界革命（控制整個世界）策源地的陰謀，而對中國特別友好起來，並且還關切到了中國的完整與獨立。共產國際決不可能有此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其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也並非在佛拉第米洛夫來到延安前剛作成的。早在抗戰一開始，共產國際就已作成了這個決定。作者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中說，「王明從莫斯科回來時，向中共黨『中央委員會』報告，需要採取與國民黨締結單一抗日戰線的策略。中共黨『中央委員會』無異議的一致通過了王明的建議。」最近出版李天民著「周恩來評傳」中亦稱，「抗戰開始後，……一九三七年十月，陳紹禹（王明）乘蘇俄巨型單翼發動機飛機，自莫斯科回到延安。……陳紹禹歸來後，一九三八年三月，出任在武漢成立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指揮大後方中共工作及執行統一戰線策略。」王明原在莫斯科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建議採取單一抗日戰線策略，顯然是啣命而來，回國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已。

如所週知，共產國際雖然是由各國共黨代表所組成，但實際純為蘇俄獨裁者史達林的御用機構。史達林固然以整個世界為其未來的理想帝國，天無二日，國無二王，無法容忍希特

勒的獨霸世界。但納粹德軍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方纔對蘇俄發動戰爭的。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國對日抗戰爆發之時，希特勒還在捷克製造糾紛，張伯倫的慕尼黑協定，尙未誕生，因此，很少就能確斷德國必然會要進攻蘇俄。

史達林要中共黨與國民黨締結統一戰線，很明顯的便祇有兩個目的。一是有意要中共借抗戰之名，與國民黨打成一片，造成北伐前國共合作時期的局面，再相機陰謀，達到攫奪政權的目的，另一是不欲見到中國敗於日本，以免一旦日軍佔領中國，要在虎口之中奪下這塊肥肉，自然就要多費周章了。

從抗日戰爭開始，到納粹德國進攻蘇俄，其間相隔，足有四年之久，毛澤東自始至終即未顯有誠意，與國民黨聯手合作，團結一致，對抗日軍，明眼之人，早可不言自明。況王明既奉共產國際之命，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策略，在毛處處表現抗旨違命的情況下，必然會向莫斯科提出報告，是可以料想到的。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中，如真爲中國的利益着想，自仍儘有餘暇，一面靜觀歐洲局勢之發展，一面正好以「保衛中國的完整與獨立，對抗侵略」的大題目，從中出面干預，制止毛的破壞聯合陣線。但他却並未如此做去，坐視毛之胡作非爲，直到希特勒事前一無動靜，在一夜之間，突然片面宣布廢棄德蘇友好協定，並立即同時向蘇俄歐洲邊境，發動閃電攻擊，這纔使他慌張了起來。再加日軍在西伯利亞邊境的裝態作勢，

迫得他把國共的抗日統一戰線，認真的看成爲中蘇的共同利益——當然，這也不過是暫時性的。

但在此時，毛澤東於「百團大戰」吃了大虧之後，早已下令停止採取作戰行動，甚至逐漸與日軍有了暗中勾結。莫斯科軍事司令部雖幾番要求中共採取行動，配合作戰，以解西伯利亞方面後顧之憂，而毛始終置若罔聞，反而乘蘇俄軍事危急之機，開始對王明的國際派開起刀來。

佛拉第米洛夫也是在這個時候，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派到延安去的。由於德軍在俄西部的深入，日軍在東部的威脅，造成了兩面夾擊的態勢，於是抗日統一戰線，乃屬刻不容緩之事，而毛澤東却偏偏採取了相反的方向，而且對効忠史達林的國際派，橫加壓迫，愈鬥愈兇。這種情形，佛拉第米洛夫看在眼中，自然愈看愈不對勁。如毛澤東與康生之謀以汞的處方，來謀害王明，延安在整風運動期間，對黨內同志的種種迫害，對國際派的威脅，有時怒火中燒，却因任務在身，又不能不善爲應付。有時所記心中感想，不免顯得激烈，令人有偏頗之感。

佛拉第米洛夫固然顯得是個頗有人性的共產黨人，從他在日記中寫到他對遠在家鄉的家人的想念（大半刪去未譯），可見他也確是個性情中人，因此，許多議論，便顯得不像是個

共產黨人的說話。但從人性的立場來看，便也毫無可怪之處。蘇俄共黨也不乏有人性正義之人，我們能說索忍尼辛、沙哈洛夫之流不滿人士的言論，也是存有偏見的嗎？

不過，他的日記，令人最感染有偏見之處，是在他把毛澤東的殘暴卑劣作風，以及他所作所爲，僅在一己之私利，而以個人之權力爲目標，施以激烈的抨擊。平心而論，毛不過是師承史達林的典範，採取獨立的地位，來發洩他個人的權力野心，無論青出於藍，抑或小巫之見大巫，總屬一丘之貉。而佛拉第米洛夫以蘇俄共產黨人的地位，見不及此，便是他的最大偏見。但本書的價值，決不因此而稍有減損。

本書英文本出版者另又指出，書中若干記載，含有某些前後不相一致之處。這也是無可避免的。因爲這是一本日記，從佛拉第米洛夫到達延安之日起，逐日記事，而非事後追述，作有系統的記載。作者初到延安之時，多少猶如一張白紙，對當地情況，所知甚少。每日所記，不過都是隨時所得見聞，寫下一點觀感，尙無深入的認識。以後時深日久，接觸日多，所見日廣，所記所述，便亦隨時更改，如抽絲剝繭，真相愈來愈明，因此乃顯得前後有了不一致的情形。本書如循此方向讀去，自亦不覺其爲可怪了。本書譯文節譯時，已儘量將前面部分顯屬不甚正確之處，儘多加以適當之刪除，而多加保留後面部分漸見明朗的記述。

本書之真正價值，是在作者以蘇俄共產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戴上抗日統一戰線

的眼鏡，站在人性的立場，把他在延安的親身經歷，像照妖鏡似的，將毛澤東的爲人性格，如何破壞抗戰，如何殘害同黨同志，種種奸詐陰謀，纖毫無遺，一一暴露紙上。其中所有記載，大半均非外人所能得知，亦非前人所曾道過，其說服力量，決非付出任何代價，所能遊說得來。

今天適逢總統 蔣公逝世一週年紀念之日，想到他一生以反共救國爲責志，其間頗多爲國內外人士所不諒，尤其在抗戰戡亂期間，所受毀謗尤多，讀佛拉第米洛夫一書，徹底的暴露了毛匪的陰險真面貌，益見 蔣公對共黨及匪酋，明辨審察，認識之深，及其數十年來，掌舵執政，領導國人，所循方向之正確。當年深中共黨宣傳之毒，昧於良知，爲共黨推波助瀾者，乃至至今猶對毛黨存有幻想者，應知有所愧疚警戒了。

本書英文本，如譯成中文，不下四十餘萬字，聯合報因篇幅有限，僅譯刊其中極小部分。茲因讀者紛紛來函，亟欲一窺全豹，特依原文，去蕪存菁，節譯成三十二萬字，列爲聯合報叢書，由聯經出版公司刊印單行本問世，其中自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部分，由本人主其譯事，其餘自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九月部分，分請林添貴、陳永綽、李玉成諸兄協助譯出，併此致謝。

周新寫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四日總統 蔣公逝世一週年紀念日